



1921-1949

中共吴江地方历史

第一卷

中共吴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

中共吴江地方历史

第一卷
(1921—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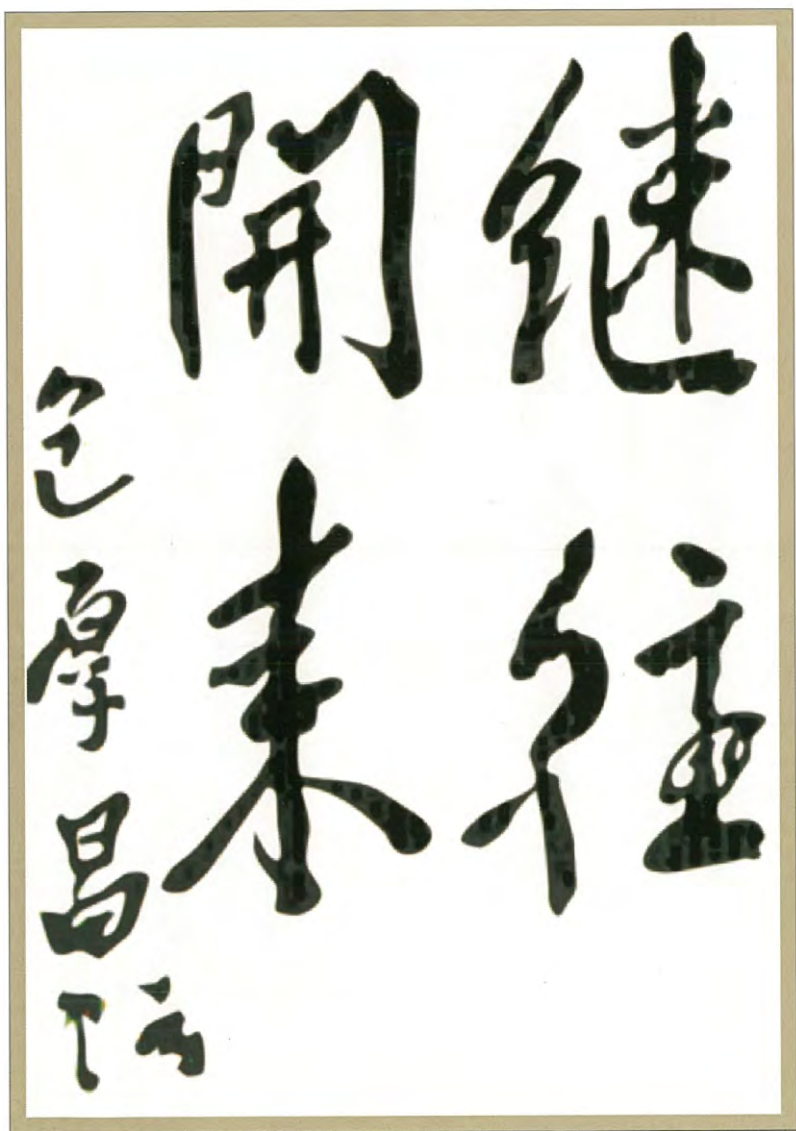
中共吴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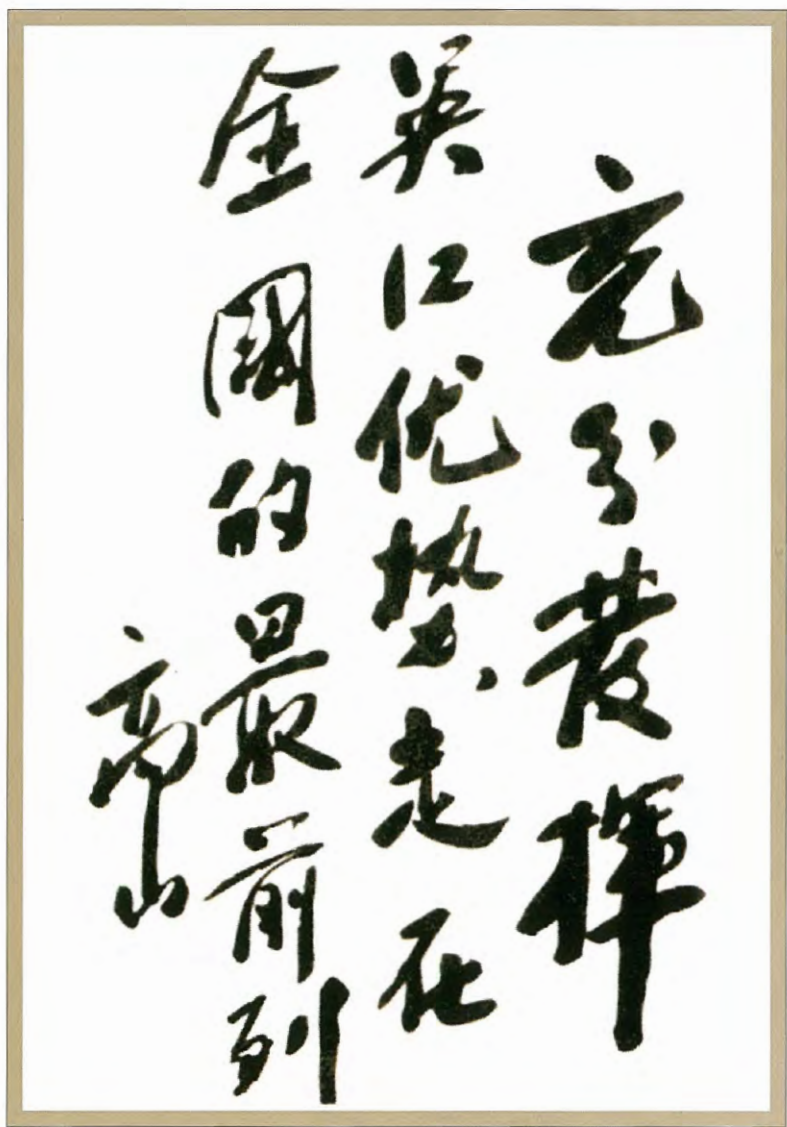
2006.6



原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政委诸敏（抗战时期任中共淀山湖工委书记）题词：如铁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包厚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苏中地委常委兼苏常太工委书记)题词。



原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高山（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苏州工作委员会书记）题词。



1926年3月12日，张应春手执旗帜，走在女工游行队伍的最前头。



1926年4月5日，瞿秋白、杨之华与吴江县国民党女党员合影。后排右三为瞿秋白，前排右一为杨之华，左三为张应春。



图为中共严墓区第一个党支部水家港支部成立之地，位于
青云水家港。



图为严墓镇枫桥境的福泰兴烟纸店。1940年11月，中共浙
西路东特委和吴兴县委机关同设在严墓。当时，中共吴兴县委机
关就设在该烟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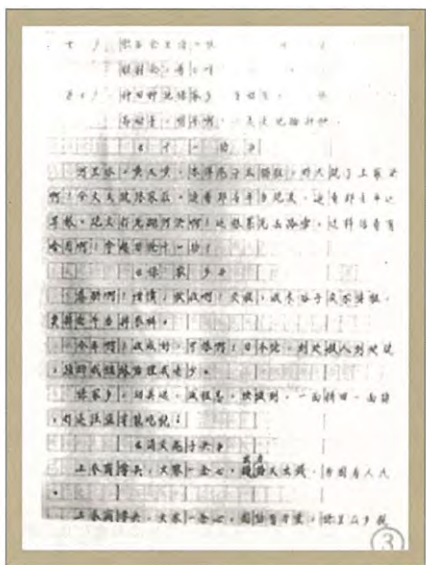


图为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组织秘密传阅的文件，由中共黎里支部刻写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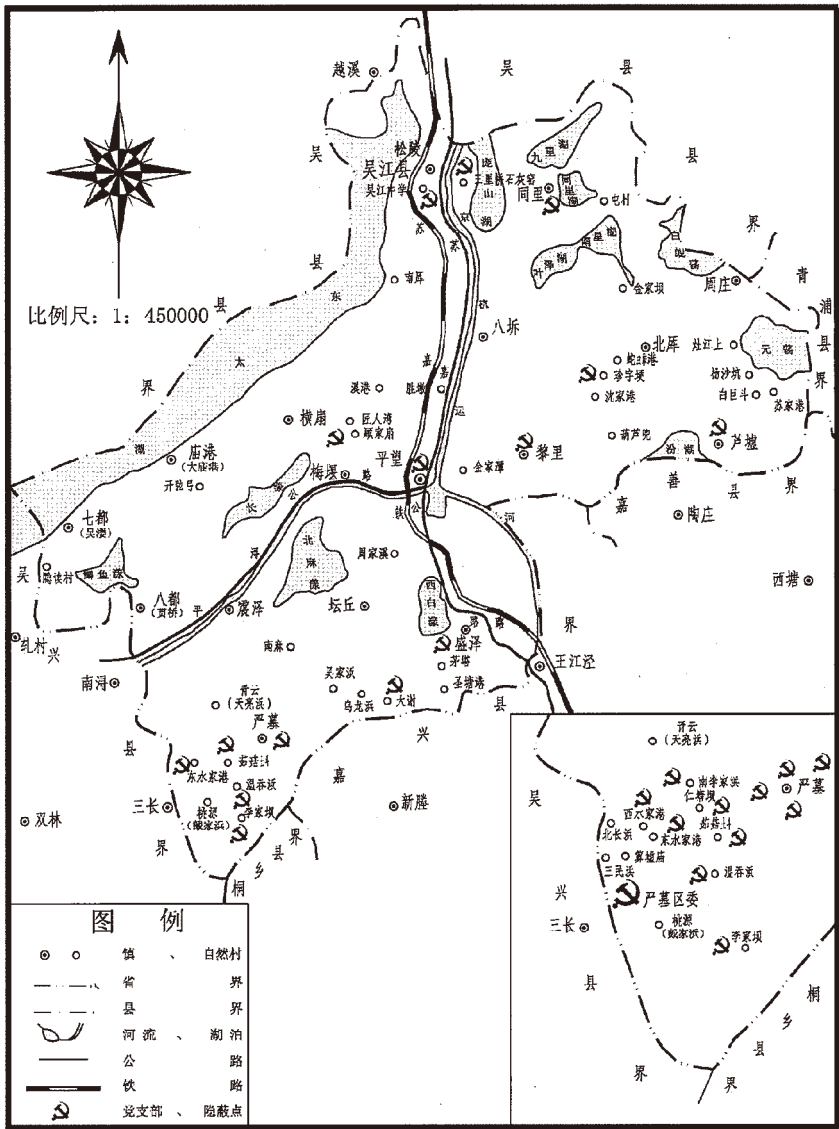
图为三里桥石灰窑，座落在吴江门外三里桥东密港河道中的一个土墩上，是包厚昌等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

1936年秋，中共党员庄绍楨、丁秉成等进入吴江县政工队。他们利用政工队的合法身份，宣传抗日。这是当时政工队在严墓区活动时抄写的抗日歌曲：《干一场》、《保家乡》、《消灭鬼子兵》等。



图为肖心正等同志于1936年出版的《义旗》部分期刊，前后共出版了6期。

吴江县地下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1938.10 — 1949.4)



注：苏嘉铁路于1944年被侵华日军全线拆毁。从此至吴江解放时，苏嘉铁路仅存路基。

序

朱 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之际,中共吴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同志经过对《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的修订补充,正式出版了《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的出版发行,既是吴江党史部门一项重要成果的展示,也是吴江党的建设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的公开出版,必将很好地发挥对全市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成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吴江,既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恢宏悲壮的乐章中,也跳动着吴江人民革命斗争的铿锵音符。五四运动的号角、农民暴动的枪声、抗日救亡的烽火和人民解放的战旗,都曾在这方热土上激荡。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吴江的一些仁人志士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之路。“五四”运动爆发后,吴江人民也迅速、广泛地行动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吴江更成为早期中共党员频繁活动的地区之一。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吴江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十分复杂,敌我斗争十分激烈。尽管情况复杂,形势多变,但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未停止过,许多共产党员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吴江的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有着鲜明地方特色,而又可歌可泣的历史华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吴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先辈们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坚持从吴江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一轮又一轮改革大潮

带来的每一次机遇,开拓进取,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全面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到 2005 年,已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去年底,我们又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制定了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按照这一规划,到 2010 年,我市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从而全面完成“两个率先”的任务。这是一个催人奋进而又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心血的目标。在这新的任务面前,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定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强化学习,踏实工作。要把学习理论和学习党史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发扬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永不满足的工作激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富民强市和“两个率先”的伟大实践,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06 年 6 月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21年7月-1927年7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后的吴江	(3)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夕的吴江社会	(3)
第二节 五四运动在吴江	(7)
第三节 吴江人民声援五卅运动	(8)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吴江的早期活动	
第一节 党团员在吴江的活动	(13)
第二节 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人	(16)
第三节 北伐军进驻吴江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	(19)
第四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吴江	(20)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三章 中共吴江独立支部的建立和农民斗争	(23)
第一节 中共吴江独立支部的建立	(23)
第二节 农民斗争及其受挫	(24)
第四章 “九一八”后吴江地区的革命活动	(27)

- 第一节 抗日反蒋运动 (27)
- 第二节 白色恐怖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29)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 第五章 抗战初期的吴江 (35)
 - 第一节 吴江沦陷及日军的罪行 (35)
 - 第二节 沦陷以后的吴江 (37)
- 第六章 党组织的建立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 (40)
 - 第一节 新四军军部派员到吴江开展抗日工作 (40)
 - 第二节 中共特科在吴江争取地方武装及吴江支部的建立 (42)
 - 第三节 中共浙西特委在吴江的活动 (50)
- 第七章 在日伪顽夹击中坚持斗争迎接胜利 (57)
 - 第一节 严墓区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57)
 - 第二节 吴江三区抗日斗争基点的建立 (60)
 - 第三节 淀山湖地区的开辟 (62)
 - 第四节 “忠救军”楔入,党组织被迫撤离 (64)
 - 第五节 日伪“清乡”,坚持斗争 (66)
 - 第六节 淀山湖地区的地下斗争 (69)
 - 第七节 在汪伪特工站的隐蔽斗争 (73)
 - 第八节 配合主力,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74)

第四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5月)

- 第八章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组织的活动 (79)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79)
第二节 我党政人员的北撤	(81)
第三节 淞沪党组织的调整	(83)
第四节 翥桑文艺社及其《浅作》	(84)
第九章 革命力量的发展	(86)
第一节 内战爆发后的吴江形势	(86)
第二节 青(浦)吴(江)工委和浦西工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88)
第三节 吴(江)嘉(兴)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92)
第四节 华中十地委系统在吴江的活动	(100)
第五节 苏锡吴工委系统在吴江的活动	(107)
第六节 丹北党员在同里的活动	(115)
第十章 迎接解放的斗争和吴江的解放	(117)
第一节 迎接解放的斗争	(117)
第二节 县、区党政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127)
第三节 吴江全境解放	(129)
附录一:综合资料	
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共浙西特委系统吴江情况综合	(137)
中共淞沪地委(工委)系统吴江县党组织工作概况	(151)
中共华中十地委吴江开辟区简况	(165)
中共苏锡吴工委吴江党组织情况概述	(170)
中共丹北同里支部情况	(181)
吴江县各系统党组织关系隶属表	(183)
吴江县党员人数统计表	(189)
附录二:大事记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	(19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204)

抗日战争时期	(209)
解放战争时期	(221)

附录三：回忆录

我在大革命中	毛啸岑(237)
吴江乡师读书会的一些情况	杨源时(241)
“武抗”和吴江政工队	施光华(249)
抗战初期特科在吴江的活动	施家骅(254)
吴江纪事	金若望(261)
我在吴江走上革命道路	刘 明(271)
我的回忆	沈如淙(277)
回忆我的革命活动	沈英杰(283)
浙东、浙西之行	金佩扬(288)
在吴江工作的前后经过	金 亮(293)
我为开展武装斗争来吴江	秦克强(297)
当年曾有那么一个隐蔽点	俞双人 陈乃元(304)
党的地下印刷厂和秘密联络点	平静人(310)
回忆我的一段活动	焦康寿(321)
吴江工作的点滴情况	朱 帆(327)
筹建三里桥石灰窑的经过	吴 明(332)
开辟吴江革命工作的情况	许丽娟(335)
我的工作回忆	高 山(345)
地下党工作回忆	倪 明(348)
吴江中学的活动情况	胡 斌(354)
吴江学生运动	王新五(358)
我在同里	孙瑞成(362)
“地下团”芦墟支部的点滴回忆	沈立人(365)
忆念沈月箴	肖心正(367)

附录四：烈士传略

张应春	(377)
孙世实	(382)
丁秉成	(385)
钱康民	(387)
虞仞千	(390)
沈文潮	(391)
王化鹏	(393)
陈有民	(396)
顾葆恒	(396)
倪淑英	(398)
姚之英	(400)
顾关通	(403)
沈 波	(407)
寿 鸿	(410)
潘天扬	(411)
吴义琛	(414)
寿保全	(414)
倪金龙	(414)
后记	(415)

引 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间是吴江”。被称为“吴根越角”的吴江，位于太湖流域腹地，江苏省最南端，东临上海，西濒太湖，南接嘉兴，北依苏州。全市总面积 1176.68 平方公里（不包括东太湖水域 85 平方公里），境内湖荡密布，河道纵横，水面约占总面积的 22.7%。

吴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6000 多年前，吴江的先民就在这儿繁衍生息。至后梁开平三年（909 年）始置吴江县，县治松陵镇。元元贞二年（1296 年）升为州，明洪武元年（1369 年）复为县。清雍正四年（1726 年）分设吴江、震泽两县，民国元年（1912 年）重又合并为吴江县。1992 年，撤县建市为吴江市，隶属苏州市。至 2005 年，全市辖有十个建制镇，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和一个市级开发区。

吴江地处沪宁杭大三角和苏嘉湖小三角的中心，是连接沪皖、贯通苏浙的必经之地，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平望更是历代军事争战中心。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曾与清军在平望进行过殊死搏斗。辛亥革命后，在吴江的团、连级驻军从未间断，调防频繁。

吴江人民具有爱国主义和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传统。明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553 - 1555 年），吴江人民屡破倭寇入侵，唐家湖大捷更使倭寇闻风丧胆，人民人人自奋。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1860 - 1863 年），一些有识之士曾资助太平军抵抗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1909 - 1911 年），陈去病、柳亚子、金松岑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组织雪耻学会、自治学社和中国教育会支部等进步团体，为推翻清政府奔走呼号。民国四年（1915 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里丽则女校师生奋起反对，立碑明志。袁世凯称帝后，何嘉禄、徐朴成先后在吴江县城和严

墓举旗讨袁。“五四”运动后,一批进步报刊相继创办,新文化、新思想在吴江得到较为广泛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吴江成为早期中共党员频繁活动的地区之一,侯绍裘、沈雁冰、萧楚女、恽代英、陈望道、杨之华、邵力子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先后来吴江宣传革命,撒播革命种子。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抗租抗税斗争在吴江仍此起彼伏。抗日战争时期,在“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旗帜下,各种游击部队活跃在芦、莘、厍、黎水网地区和西南部的江浙交界地带,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有中共浙西特委、中共中央特科、中共淞沪地委(工委)、中共华中局城工部、中共华中十地委、中共上海局苏锡吴工委和中共丹北工委系统的党组织,在吴江境内开展艰苦的地下斗争,打击反动势力,壮大人民力量。临近解放时,中共淞沪工委和华中十地委系统的党组织,策反各地自卫队,利用掌握的武装保护地方安全,为吴江的顺利解放奠定了基础。

“风云长遣动心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英勇的吴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历史华章,这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必将永载史册。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21年7月 - 1927年7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后的吴江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夕的吴江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吴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吴江人民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过着贫困的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1912年,北洋政府为加强其集权统治,将吴江、震泽两县合并,定名为吴江县。在吴江,地主、豪绅、官府相互勾结,控制着政治、经济、文化大权,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吴江为“聚宝盆”,巧取豪夺,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吴江紧靠通商口岸上海和苏州,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近代工业逐步产生。1911年,震泽设立电报局;翌年,同里马兆源油厂开办;1915年,盛泽创建发电厂;1916年2月,县内第一家丝织厂(经成丝织有限公司)成立,购进提花机24台;同年3月,吴江电报支局建立;1918年,震泽书记米厂创办;翌年,盛泽复兴电灯公司、黎里明星

电灯厂先后诞生。但是,这些近代工业的建立,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利益。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扩展政策,对蚕丝等原料进行疯狂掠夺和大量倾销人造丝、洋布、洋纱、金属品等,使本来以蚕丝业为主的吴江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传统的土丝、土绸、土布等手工业奄奄一息,集镇一些手工业作坊如铁器、铜锡、香烛、印染等逐渐萧条。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也渗入吴江城乡各地。从1890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衡特立以行医为名到震泽进行传教起始,各教派先后到盛泽、桃源、七都、坛丘建立教堂和传教。1898年,天主教在黎里、同里开教,继之传教范围扩大到盛泽、芦墟、震泽、平望等地。到1922年,吴江县共有教堂6所,拥有教徒近2000人。盛泽亦有教会学校一所。

吴江农村沿袭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县111.8万余亩土地中,约有60%集中在地主、富农、工商资本家和小土地出租者手中,而占总人口约88%的农民中,佃户约占71%以上。地主用地租、高利贷等形式残酷地剥削农民。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必须先付一定的押金,且押金不再退还。农民辛勤一年,难得温饱,如逢旱、涝、虫灾,颗粒无收,租米却不可免,租米最高可占收成的65%。农民怨声载道。地主催租逼债,手段毒辣,名目繁多,有预收地租、押板、押船、押牛、大秤大斗、大租田转小租田、地租转债务等10余种。如过期交不上租米,要加收三限(一限为10天,加米3升),如逾三限交不上租米,则要抽押、打板子、吃官司。因此,贫雇农民常常卖儿鬻女,倾家荡产。此外,还有高利贷的剥削。每年青黄不接或遇荒年,天灾人祸以及婚丧嫁娶,贫雇农不得已向地主借米。利率最高的借一石还二石三斗;一般的借一石还一石六斗,最低借一石还一石三斗。最终,被高利贷盘剥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无数。

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清朝统治者不

断向人民转嫁负担,沉重的赋税压得老百姓透不过年来。吴江地势低洼,天时稍有失调,便水涝成灾。农民无收,居民粮紧,生活困苦,加上匪盗横行,到处人心惶惶。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付出艰辛的劳动,却饥不果腹,衣不蔽体。残酷的剥削压迫,促使农民多次起来反抗,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六七十年间,吴江农民比较有影响的反抗至少有16次。辛亥革命前后这种反抗尤为激烈。1906年,震泽地区的饥民捣毁平糶局,抢了当地的米店。1910年,震泽、七都等村镇乡民聚众千余人,拆毁绅董房屋;平望、黎里、芦墟、同里及太湖边各乡村民群起先后捣毁自治局。同年9月,八坼抗租农民袭击清军“飞划营”,伤兵勇2人。1911年,淫雨成灾,湖水陡涨,水势横溢,冲坍圩岸甚多,全县农作物严重欠收。地主强行逼债,官府敲榨勒索,黎里100多户农民忍无可忍,拿了锄头、铁镢、菜刀、木棍涌向镇上,打跑了司官,大吃沈家馆;同里200多农民到自治公所要求救济未允,就集合村民1000多人,捣毁自治所,并抢走所有钱粮。消息传开,四乡响应。没有几天,又有两伙饥民,其中一伙达三四千人,聚集镇上,冲官府、抢大户。地主、官僚闻风丧胆,接二连三“飞禀请兵”,但是,清朝统治阶级本身已经自身难保而无暇顾及了。

在吴江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一些仁人志士也开始探索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之路。1898年,陈去病、金松岑在同里组织雪耻学会,提倡维新运动。这是本县对西方学术研讨之最早团体。1903年,陈去病在同里办中国教育会,鼓吹革命。1905年,柳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创办《自治报》,1906年改名为《复报》,猛烈抨击当时所谓的“预备立宪”,积极宣传民主主义。1909年11月13日,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苏州虎丘发起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团体——南社。他们以诗歌为武器,在反清、反袁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辛亥革命的来到大造舆论。到1916年,南社共发展社友1325人,而吴江县人最多,可以说吴江是南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这不仅因为陈去病和柳亚子都是吴江人,而且南社在吴江

活动频繁,影响很大。《南社丛刻》总共出了 22 集,其中 17 集在吴江编辑。柳亚子先生在黎里的居所则是南社的通讯联络处。

新文化的传播,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使许多青年人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客观上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吴江人民之所以能够迅速、广泛地行动起来,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就被袁世凯篡夺。1915 年 5 月 9 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以出卖国家的主权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一场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在全国商、学、工界旋即兴起。我县同里雨则女学全体师生,立即投入这一爱国运动。她们召开反对“二十一条”大会,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宣誓不买日货,许多同学在手帕上绣上“誓雪国耻”,还有一些人刺破手指,用鲜血写成这四个字,以表明爱国雪耻之决心。会后,由殷同薇等 140 人同立“国耻纪念碑”。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正式宣布自己当“中华帝国皇帝”。他卖国称帝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组织“护国军”进行讨袁斗争,吴江亦即响应。1916 年 4 月 18 日,由吴嘉球、殷佩六组成护国军宣布独立,并在夹浦桥、三里桥一带挖战壕、筑工事,加强防卫。次日,北军自苏州南下,午时交战,打到傍晚,护国军失利撤退。随后,徐朴诚在震泽、平望起事,反对袁世凯,也被北军击散。但由于各地强烈反对,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只做了 83 天的皇帝梦,不久便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吴江人民自发的经济斗争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均遭失败,但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广泛传播,要求革命的愿望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不断滋长。

第二节 五四运动在吴江

1919年5月4日,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爆发了,从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中,吴江人民以极大的热情纷纷投入战斗。

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前所未有的革命激情,奔走呼号。学校相继罢课,学生涌向街头和乡村演讲,讲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耻辱、卖国密约的内容、青岛交涉的始末等,听众云集,无不义愤填膺。各地群众举行集会,参加者多达数万人。5月27日,吴江中学与苏州学生会一致行动,为“国耻纪念”举行通电罢课。5月31日,苏州学生联合会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而召开第四次常会,并派代表到吴江报告各界进行斗争的经过。6月5日,吴江一万多群众召开大会,声援“六三”上海工人大罢工。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新思想运动,一批宣传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书刊和社团在吴江涌现。1923年4月,柳亚子和毛啸岑等64人创办《新黎里》半月刊,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黎里》的《发刊词》指出:“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又一变矣。”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冠以“新”字号的吴江、盛泽、莘塔、严墓、同里、平望、震泽等报刊相继出现。《新盛泽》以“扫除一切阻挡新生事物的障碍,提倡新思想,鼓舞民众士气,反抗妖魔鬼怪,改革旧社会,为民求幸福”为宗旨。《大分湖》发刊词说:“用严密的笔墨,为民请命、与子同仇,鼓吹新思想,对行政教育的腐败、土豪恶棍的横资,都应切实监督,严正讨伐”。柳亚子在《新黎里》报连续发表《哀悼列宁氏》、《拜孙悼李楼随笔》、《列宁和孙先生》等文章,称颂列宁

“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功业”，认为列宁的逝世是“世界进化的不幸，人类的不幸。”《新莘塔》主张“本良心，为主义，上之如教育行政，下之如民间疾痛，不厌麻烦，不怕强暴，把社会上种种奇形怪状尽量地披露，将暮夜里一般魑魅，囊括扫除之。利用那笔锋墨阵，杀开一条血路。”这些地方小报顺应了历史潮流，说出了人民的心声，风行一时，影响较大。

此时，柳亚子经过长期思索，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政治思想有了明显的进步，并在文章中反映出来。然而，新生事物总要受到旧的顽固势力的排斥和扼杀。1923年5月，柳亚子与陆某因迁分湖先哲祠引起纠纷。陆即以柳亚子在《乐国吟后序》中自称“列宁私淑弟子”^①为证，诬告柳亚子“宣传过激主义，有碍治安”，使柳主办的《新黎里》报被县署勒令停刊，柳险遭不测。后经毛啸岑等同仁向全县各界阐明事实真相，据理力争，于同年8月《新黎里》报得以复刊。1923年10月，柳与叶楚伦、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新南社”（旧南社在辛亥革命后就开始分化，到这时已名存实亡），有廖仲恺、何香凝、沈雁冰等参加。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下，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学团体，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为第一届负责编辑主任。《新南社成立布告》云：“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强调用诗来唤起民众，宣传革命。在这个时候，柳亚子已走在国民党的前面（国民党在1924年1月改组），“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什维克之主义”，自题“独拜弥天马克思”。新南社这段时间的革命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吴江的广泛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 对自己所敬仰而不得从学的前辈，常自称为“私淑弟子”。柳亚子先生十分崇敬列宁，故自称是“列宁私淑弟子”。

第三节 吴江人民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学生及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打死十余人,打伤多人,酿成“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吴江各界反映强烈,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新黎里》报出版了“五卅”事件特刊,以示愤慨。《新盛泽》报、吴江县教育会、震属七区教育会、震属初级中学、省立一师吴江分校、盛泽平民教育会、震泽丝业公学、八都村全体农民及一些工商业者和个人,联名或分别致电上海新闻报馆、《民国民报》、上海各报馆、上海学联、全国各公团、北京政府、北京外交总长、南京卢宣抚使和省长、上海交涉员,以表示对“五卅”运动的声援。电文表示,全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惩办卖国贼,要求政府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借地,以雪奇耻大辱,维护国家的尊严。

吴江县教育会、学生联合会、黎里区教育会、黎里商会、盛泽市董事会分别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数项援沪办法。国民党吴江县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区党部也分别召开会议,号召各界声援“五卅”运动。第四区党部临时主席柳亚子、执行委员张应春、毛啸岑等在盛泽召开盛泽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并举行演讲会,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唤醒同胞”等口号,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继之,上海惨案严墓后援会发表宣言:“这次外人惨杀我们的热血同胞,是野心家瓜分中国的动机”,“大家再不起来秉良心拚热血去援助奋斗同胞,再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示,非但已死的壮士不能瞑目于泉下,就是满腔热血的奋斗者也要心寒。”吴江青年学生会发表宣言:“我们确信社会是龌龊的、阴险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社会的龌龊与阴险,就不去谋建设和改进。所以我们要组织青年学会,一方面要砥砺学行,一方面要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做一些社会事业。”同里青年雪耻会号召同

学们利用寒暑假向民众宣传,声援“五卅”运动。

柳亚子等5人组成的第一支演讲队,一边向市民演讲、一边进行募捐。当时黎里有260多个单位和个人,共捐大洋338元,小洋95元,钱40文。震泽丝业公学教职员和学生一面游行、演讲,一面就地募捐,共募得大洋253元,小洋701角,铜元4068枚,解至全国学生总会。震泽15个团体的2000余人游行,他们手执小白旗,上书“援助同胞”、“收回租界”,高呼口号,场面异常壮烈。观者拥挤,路途堵塞。震泽召开民众大会,讲者激昂悲愤,闻者泪下,拍掌之声相继不绝,大有不雪此耻、宁作牺牲之慨。莘塔各界人士和学生,齐集学校操场,整队出发,游行全市。人手一小旗,沿途高呼口号,词颇激昂。学生唱国耻歌,悲壮之声感人极深,观者甚众。游行毕,分段演讲中国受外人侵略之惨史,听者动容。吴江县中学、省立一师分校等十余所学校的近千名学生集合游行,劝同胞热心救国、抵制洋货。松陵镇学生演剧筹款,支援上海工人。同里二铭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印刷爱国传单,分发各商店,并张贴桥头、巷口,劝导各界提倡国货,实行抵制洋货。

苏州工业学校宣传团专程到同里,演讲上海惨案之经过,并游行示威,散发“抵制英日货”、“经济绝交”、“宁为主死,不为奴亡”等传单,号召大家一致行动起来,抵制强权。上海学生联合会邀请苏州新舞台全体剧员到吴江、同里义务演出,筹款救济上海“五卅”案之失业工人。同里五友社、恒丰烟纸店首先将英、日货封存,专售国货。其余商店闻风效仿。吴江东门有一家小酒店,门上写“不要吃我家的酒,要吃帝国主义的血”,下书小字“为救国、自愿停业”。商界均以卖日货为耻。在群众性抵制外货的爱国运动影响下,震泽卷烟税征收局偕同警察所,扣压了美国“大美烟公司”在震泽非法贩售的烟船及职员。

6月底,平望、黎里、莘塔等地市民隆重集会游行,公祭被帝国主义惨杀的诸烈士。平望学生停课一天,各公法团体停止办公一天,商

界休业3小时,以示哀悼。黎里镇学校罢课,手工业工人罢工,3千多人臂缠黑纱参加公祭,各商店均挂“打倒帝国主义”、“毋忘五卅,坚持到底”的白色纸旗。游行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声震屋瓦,观者无不肃然起敬。北厍张应春在葫芦兜领学生组织别动队,在乡村游行示威,宣传演讲。

同时,《新黎里》报发表《沪案同仇宣言》,要求当事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谢罪;《新盛泽》报上言论《民众之觉醒》,阐明今日之中国比殖民地还不如;《新严墓》报发表文章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新黎里》报发表朱季恂的《追廖仲恺先生声中的呐喊》的文章;《南麻报》发表《国耻感言》,号召“爱国同胞万众一心,贵有决习,共谋抵抗”;《新严墓》报发表题为《迫击炮》的文章,指出:“什么叫新?老实说,就是革命,我们要救中国,只有实行民主革命,我们了解中国有国民革命的必要,有国民革命的可能,口号便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方法便是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26年5月9日,盛泽镇各界为不平等的“二十一条”举行国耻纪念会。各学校、团体齐集东社庙广场,高唱国耻歌,发表演说,后整队游行。每人各执一面纸旗,上书:“抵制日货”、“毋忘五九”、“坚持到底”等口号,并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绸业小学、第一、第四、第五等各校也均在县内举行纪念会,组织演讲队至东庙、花园街等热闹地点演讲。

在五卅反帝运动的影响下,吴江人民为了生计,反对剥削的斗争不断涌现。1925年11月30日,《震属市乡公报》(第85期)发表特讯:“本县第四区(黎里区)小学教员开展要求加薪运动”。盛泽、同里、平望等地烟商,为抗议开征卷烟特税,停业罢市。盛泽绸行和机户工人为增加收入停业暴动,当局派军队前往镇压。12月,黎里糖坊工人因百货昂贵、生活艰难,要求加薪维持生计,集会万年楼茶庄,讨论罢工。黎里小学教员发表加薪运动宣言。严墓镇南货业伙友为维持生活,议决加薪运动,并发表宣言:“工人、农民立刻觉悟起来,

树立起光明灿烂的旗帜,打倒反动势力!跟着前辈向前去,杀开一条血路来”。1926年6月1日,盛泽踹坊^①业因米珠薪桂,生活艰难,公议加薪。

吴江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五卅运动,同时五卅运动也锻炼了吴江人民,为以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抗日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① 旧时依靠手工方式为绸匹进行踹(磨)光的作坊。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吴江的早期活动

第一节 党团员在吴江的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吴江成为共产党在江苏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

从小随父在盛泽镇长大的邵力子,1921年5月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月,参加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早期党员。邵入党后,仍偕妻居于盛泽外祖母家,不时从上海回吴江参加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进行革命宣传,推动了马列主义在吴江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传播。

1923年后,柳亚子作为一个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先生首创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自题“列宁私淑弟子”。他后来结识了共产党的领导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他称自己为“革命军的马前卒”,在吴江及上海、江苏一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与吴江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同反动政权进行顽强的斗争。柳亚子与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吴江成为中共早期党员频繁往来之地,许多著名党员相继到吴江县各镇演讲,鼓吹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5月3日,吴江县在黎里镇隆重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会场十分壮观,大门口树起一座柏枝牌楼,上悬“为国捐躯”匾额,两旁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柏枝对联。大小花圈分列在孙中山遗像两旁。各方送来挽联甚多,最引人注目的是沈家港农民“铲除旧势力、推翻资本家”的一联。大会主席柳亚子介绍

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张应春任司仪,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发表题为《如何竟孙先生之功》的演说。5月16日,《新黎里》报出版了《吴江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特刊》。同年7月14日至19日,在黎里市公所举行夏令讲学会。讲师中有中共党员侯绍裘(讲题为《五卅惨案与中国工农党》、《教育界之切身问题》)、杨贤江(讲题为《青年问题》)、沈雁冰(讲题为《最近国际政治状况》)、王一知(讲题为《妇女问题》)、董亦湘(讲题为《民族主义》)。在此前后,中共著名党员萧楚女、恽代英、沈雁冰、陈望道、杨之华等也相继来吴江。他们在吴江县各大镇多次演讲,在知识分子和工人、学生中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热情宣传革命真理,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运动。听者拥挤异常。

1925年10月,北厍葫芦兜村张应春(女)由侯绍裘介绍,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尔后,多次回家乡吴江县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3月8日,由张应春创办和主编的月刊《吴江妇女》创刊,共出五期。她接连撰写了《国际妇女与吴江妇女》、《革命与妇女》、《妇女与政治》、《悼爱国惨死的女烈士》、《反对摧残女权宣言》等文章,并兼任发行和校对工作。3月12日,南京举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张应春与柳亚子、侯绍裘等先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那天上午,她在南京夫子庙贡院召开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会后举行群众游行,张应春手执“拥护国民会议”的旗帜,走在女工队伍的最前头。她迎着时代的风云,站在斗争的前列。张应春被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任命为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济难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25年11月,中共党员陈味芝回震泽镇开展革命工作。陈化名凌云,以震泽丝业公学为通讯处,前后四次写信给中共中央(代号“曾延”):《为吴江县民校开代表大会征求提案事》(1925年12月23日)、《吴江县国民党代表大会及震泽镇情况》(1926年1月4日)、《学生会成立和在吴江县活动》(1926年1月17日)、《吴江民校工

作情况》(1926年1月27日)。并向中央报告了他在吴江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上连提议案五个,通过四个:《党内党的训练和教育案》、《拥护国民政府案》、《申讨叛党党贼案》、《组织吴江县反帝国主义同盟案》。未获通过的是《组织非基督同盟案》。陈味芝还积极参与了《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案》、《申讨段政府案》的提出,使之通过。并向中央告知了震泽学生会已正式成立,表示愿进一步开展学生工作;还就发展党员、介绍组织关系、开展学生运动等问题作了请示,要中央不断通告。他在吴江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劳动者快快团结起来吧》、《要建设中国,要组织起来》、《学说被人信仰及反对的原因》等旗帜鲜明、语言犀利的文章,全力为革命奔走呐喊。

同期,横扇第一小学教师傅缉光由团中央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怎样唤起民众》、《无系统地随意谈谈国民党》等进步文章,热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间内,中共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到吴江检查工作,写信给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赞扬吴江县横扇傅缉光“阶级性极深,对于主义信仰甚至”。称赞震泽丝业公学陈味芝竭力革命,要中央立即去信联系。

1926年年底,吴江县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组长费清,团员有费霍、费孝通。同期,吴江县松陵镇夏锦涛(夏帮基)和黎里镇毛嘯岑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大革命时期,吴江县革命气氛十分活跃,游行演讲、标语和宣传品到处可见,马列主义思想在全县传播。各种“新”字号报纸不断发表进步文章,鼓吹革命。《新黎里》报刊登中共党员陈望道给新南社社长柳亚子的信,《新盛泽》报发表中共党员杨之华《在最近政治状况下党员应如何工作》、《怎样才能达到妇女解放》、《妇女运动的主力军》等文章;《新严墓》报刊登中共党员王若真《现今妇女及此后应有的觉悟》、《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点的结果》;《盛泾报》刊登中共党员萧楚女在吴江县平望镇的讲演稿全文。在吴江各地报纸上,同

期还刊登了中共党员沈雁冰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杨贤江的《五卅惨案之意》、姜长林的《追廖先生》、毛啸岑的《进化——退化——赤化》等进步文章，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真理。

第二节 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人

1922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表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改选了党的领导机构，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承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此，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它在全国的影响迅速扩大。

1924年初，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当年春，设在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派柳亚子回吴江县秘密发展组织，筹组县党部。邵力子也委派家住吴江县的复旦大学学生党员在暑假去震泽一带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组织发展主要在学界进行，先后组成城区、同里、盛泽、黎里、平望5个区党部，13个区分部。

同年8月24日，在盛泽镇城隍庙召开全县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柳亚子、朱季恂和中共党员侯绍裘、邵力子等出席。会上，柳讲《中国革命史》，历述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事业；朱讲《政党与国家》，分析“专制”和“共和”的不同；邵讲《中产阶级与国家之关系》。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行监察委员和常务执行委员，柳亚子为常务执行委员，县党部设在黎里镇。县一大后，全县党员约200余人，分9个区党部，34个区分部。县党部下设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

1925年7月14日，在吴江黎里镇四公校召开第二次全县代表大会。会议决定，设立妇女运动部、青年运动部、农民运动部、工人运

动部。中共党员侯绍裘、沈雁冰、杨贤江、王一知、姜长林、董亦湘等参加工作。15日晚，县党部举行提灯示威活动。党员敲锣击鼓，至茶肆公开演讲。演讲者有省党部常委朱季恂及侯绍裘、徐蔚南等，民众蜂拥而往。

同年8月23日，吴江、松江、铜山等十三县，利用通讯方法选举出朱季恂、侯绍裘、刘重民、戴盆天、张应春、柳亚子、董亦湘、黄克西、宛希俨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姜长林、高尔柏等为候补执行委员，正式成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省党部执委及候补执委中，除柳亚子、朱季恂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外，其余皆为共产党员。其中，省党部宣传部长为柳亚子，组织部长为朱季恂，调查部长为侯绍裘，妇女部长为张应春、副部长为杨明暄。柳亚子、张应春、杨明暄均为吴江人。以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的反帝运动。基层的国民党组织和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亲密无间地战斗在第一线。如吴江县国民党三区二分部（盛泽镇）在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全力投入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工作轰轰烈烈。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侯绍裘、刘重民、张应春等五人作为江苏省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柳亚子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25年10月10日，在震泽丝业公学召开第三次全县代表大会。省党部执行委员柳亚子以四区一分部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中共党员、省党部执行委员、省党部组织部副部长姜长林到会并发表演讲。11日，举行追悼廖仲恺大会。县代表大会以后，县执委连续召开四次会议，对“西山会议”表示义愤，不承认非法成立的南京市党部，查询发电附和“西山会议”党员的意向，并开除附和党员的党籍。12月25日，震泽丝业公学召开云南起义10周年纪念会，中共党员陈味芝发表演说，要学生认清帝国主义侵略现状，赶快觉悟起来，拯救危险的中国。随即组织全校学生会。

1926年1月1日,在平望镇八慵园得真堂召开第四次全县代表大会,柳亚子出席会议。中共党员、省党部代表、宣传委员萧楚女与组织部副部长姜长林参加会议。中共党员陈味芝(震泽)、傅缉光(横扇)出席了会议。会议决议:通电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通电庆祝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声讨叛贼;通电庆贺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声讨段祺瑞;组织吴江县反帝国主义同盟。晚上举行露天演讲,姜长林发表演讲。3月,为消除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团体“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县党部派农民运动部主任汪大千赴各区宣传三民主义兼考察党务。他在南塘港、坛丘等地召集农民演讲,力图把组织发展推向农工商各界。吴江县第五区党部同期发表《震泽国民党对于时局的宣言》,指出:“民国以来,变乱频繁,无时或已。考其原因,厥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结合所致”。

1926年4月5日,在同里侍御坊召开第五次全县代表大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为会议主席,选举产生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通电,反对国民党右派非法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员侯绍裘、杨之华和瞿秋白在会上演讲。侯讲《反对派的历史》,杨讲《妇女与政治》,瞿讲《中国妇女与国民党》。同时举行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

1927年4月1日,在松陵镇召开第六次全县代表大会,选举第三届执监委员。时全县党员有800多人。

大革命时期,吴江县的国民党区县党部,在左派人士的支持下,与中共党员密切合作,彼此配合。吴江县的“孙中山追悼大会”、“五卅殉难烈士追悼会”、“廖仲恺追悼大会”的隆重举行和“青年雪耻会”、“五卅惨案后援会”、“国民外交后援会”的成立,《吴江妇女》的出版,“新”字号报纸的创办,“平民夜校”、“夏令讲学会”和“寒假训练班”的开办,吴江县学生联合会和吴江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建立,县党部青年妇女部的设置……都是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下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吴江县党部成为当时江苏著名的左派县党部组织之一。

第三节 北伐军进驻吴江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4日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胜利发展,1927年春已将革命推向长江流域。

2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第二连由浙江到达黎里镇,驻西栅宁绍会馆。翌日,区党部借商会分所开欢迎会,党员暨党队长轮流演讲,报告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并要求驱逐混进国民党里的土豪劣绅。尔后,六十三团团团长陈辞修到黎里,随带机关枪连、工程队、卫生队、宣传队、通讯队、侦察队、迫击炮队,团部设在天主堂。陈团长邀集各界开座谈会。3月5日,国民革命军向平望进攻,刘峙部前锋到吴江县同里镇,何应钦调两个团往平望。3月13日,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由平望到黎里,赴各要隘视察防线。孙中山逝世2周年纪念日 and 北京惨案纪念日,先后两次在黎里镇泖泾弄先锋营操场举行纪念大会。3月10日始,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各连相踵至芦墟镇。14日,先遣司令李明扬至,一时芦墟城隍庙、泗洲寺、天主堂、乡公所、米业公所驻扎殆满,尚有多数军队驻在船上。芦墟镇南栅登瀛桥内外,舳舻相接,旗帜飞扬。过兵络绎不绝,浩浩荡荡。

直鲁联军为加强吴江防务,向吴江增兵,联军十三旅第二十五团由苏州调吴江驻防;一百六十五旅由苏州调同里驻防。3月17日,国民革命军会攻吴江。下午1时至4时,北伐军与联军第十三旅二十六团在龙王庙交战。是日,北伐军左翼二十一师攻克吴江。3月18日,驻吴江的直鲁联军慌乱北撤,全部退集城外瓜泾桥(夹浦桥)。原驻同里的联军一百六十五旅同时移至瓜泾桥一带。同时,国民党

吴江县党部由黎里镇迁到吴江城区。下午4时,国民革命军先遣别动队一大队抵达吴江县城。19日黎明,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率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3个团相继开到。全城民众,夹道热烈欢迎。城内到处张贴“欢迎北伐军”的标语。各界群众手持红绿标语小旗,上街游行,大放鞭炮,高呼“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北伐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学生整队上街,唱着国民革命成功的歌曲。商店高悬红旗,陆续开市。严部抵吴江后,即令队伍分驻于北门外三里桥一带,师部设城内爱德女校。当日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到者三千多人。军民互相祝贺,工农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3月19日,二十一师政治部党务科长陈士鼎邀集吴江各界代表83人在县城下塘街县党部开会,宣布吴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委杨天骥为主席兼民政委员、黄仲良为财政委员、陈言为司法委员、沈振东为公安委员、唐昌言为教育委员、龚厥民为实业委员、邱糾生为公益委员。工农商学妇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各行业工会相继成立。吴江县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县党部党务工作受二十一师政治部领导(师政治部主任邝廓和几位科长、秘书均为中共党员)。县党部组织人员到全县各大镇开展国民革命宣传,配合当地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团体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吴江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不断高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3月20日中午起,革命军二十一师与直鲁联军一、三两个混成团在瓜泾桥交火。革命军严重师长亲自指挥,以六十一团攻左方,六十三团攻右方,中路为六十二团,枪声、炮声激烈。战斗到21日上午结束,直鲁联军向尹山桥溃退,革命军俘虏敌兵67人与夺获之枪械辎重,一并押回吴江城,沿途群众热烈庆贺。苏州市党部派员来吴江慰问。

第四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吴江

正当北伐战争向前推进的时候,蒋介石叛离孙中山先生制订的

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破坏国共合作,密谋策划反革命大屠杀。1927年4月6日,设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把二十一师政治部的领导成员(大多为中共党员)诱到上海龙华扣押,把二十一师调出苏州。4月9日,蒋介石指使亲信温建刚等人雇用流氓、特务、士兵袭击捣毁由上海迁往南京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30余人。省党部秘书长毛啸岑和张曙时被暴徒强行绑架。次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肃清反革命派万人大会。大会由中共党员、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刘重民主持,省党部党务委员、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代表省党部强烈谴责蒋介石唆使流氓打手捣毁省党部、拘捕省党部负责人的反革命罪行。会后,三四万群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请愿、抗议。途中遭反动派唆使的军警流氓武装镇压,死伤千余人,被捕和失踪者也在千人以上,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〇”惨案。当晚,中共南京地委在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地委委员以及省、市党部和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4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侯绍裘主持。深夜,由于叛徒告密,会场被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笏臣带领50余名便衣特务突然包围,侯绍裘、刘重民、张应春、陈君起(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谢文锦(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许金元(中共党员、原苏州市党部负责人)等10人被捕。侯绍裘、刘重民、张应春等被关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内,敌人对他们用尽了各种酷刑,甚至残忍地割去了刘重民的舌头。但他们始终威武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敌人一无所获,3天后残酷地将他们装进麻袋用刺刀活活捅死,深夜投至通济门外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吴江张应春年仅25岁。同期,李一湾被害于金山,宛希俨殉难江西。

面对国民党右派政变的严重局势,中共上海(江浙)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派区委组织部长、主席团成员赵世炎到苏州传达党的应变方针。党内同志已暴露身份的立即撤离,未暴露身份的隐蔽或

转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苏州,第十独立旅旅长兼苏州警备司令张镇冲砸了苏州总工会,发表杀气腾腾的布告,扬言要“严加惩办反动分子”。并宣布戒严,禁止两人以上集会。兵士荷枪实弹上街巡逻。

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出现的严峻情况,很快波及吴江。中共党员在吴江各地的活动被迫中止。反动势力乘机起哄,城区党部同部分社团举行清党活动大会。会后,搜捕县党部执委,县党部被查封。蒋介石指派驻苏州第十旅到吴江指名搜捕柳亚子和毛啸岑。柳亚子正在黎里家中,深夜缇骑入室,柳幸匿楼上“复壁”免难。中共党员、时任省党部秘书长的毛啸岑,当日正在吴江城隍庙举行“反吴讨奉”大会,闻讯后即往浙江西塘避难。县党部委员、县工会负责人吴锡圭在震泽被捕,后死于上海漕河泾监狱。县党部骨干和左派进步人士均遭通缉,被迫纷纷出走他乡。此时,中共上海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戴盆天秘密隐蔽在吴江县北厍沈家港。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使吴江地区出现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6月,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到吴江成立特别委员会,各区党部组成改组委员会,实施清党。县行政委员会正式取消,县党部特别委员会进行国民党员登记,凡是有中共党员介绍的或有左派嫌疑的国民党员一概否定其党籍,有的被通缉、逮捕。同时,全县各群众团体也相继被解散,停止了活动。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深刻地教育了人民,为以后党组织在吴江县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 - 1937年7月)

第三章

中共吴江独支的建立和 农民斗争的受挫

第一节 中共吴江独立支部的建立

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到巨大损失。但是,党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仍在白区坚持斗争。在度过了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后,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步得到发展。

1927年6月,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上海区委改组为江苏、浙江两个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于当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不久,江苏省委决定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改建为中共吴县委员会(亦称中共苏州县委),原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周学熙任县委书记,机关设在中张家巷26号。共青团苏州特别支部改建为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陈铿任书记,机关设在仓米巷2号。8月,江苏省委经过两个月的艰难工作,省委委员渐次补充,陆续派员去各县、市加强工作,恢复党组织。在此前后,吴江县成立中共独立支部。这是在同省委失去联系的全省各地党组织中,恢复建立的十一个县独支之一。1927年11月,赵霖受中共江苏

省委委派,到苏州任中共苏州县委书记。中共苏州县委下辖吴县、吴江、常熟三县党组织。吴江县松陵镇夏帮基(1926年在日本东京由童长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县委工作,负责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吴江独立支部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活动,并有一定的发展。当年12月15日,吴江县独立支部消失。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为加强秋收斗争的领导,中共沪宁特委(又称苏常特委)成立,统一领导昆山、吴江等十多个县的党组织。吴江县夏帮基亦调苏常特委工作。特委机关开始设在常州,后转移到苏州,直至特委撤消。8月,原中共苏州县委书记周学熙由原中共苏州平江区委书记傅缉光(吴江县横扇小学教师)介绍到吴江县黎里小学任训育主任,直至1929年初离开。

第二节 农民斗争及其受挫

1927年10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江南各县负责人会议,报告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决定各地要在最短期间内发动农民暴动。12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制订了《江苏农民运动的第三次计划》,指出:江南暴动计划要发动苏州、常熟等8个县及上海近郊的“游击式斗争”,“以尽可能造成总的骚动局面”。尔后,党、团江苏省委致信党、团苏州县委:“苏州的党与团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加紧准备去推进暴动。”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农民秋收斗争的决议案。为了加强对外埠工作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6个特委,吴江等14个县属京沪特委。

国民党为了镇压秋收暴动,于9月间任命第三师师长钱大钧兼任江南“剿匪”司令。并在各地增加兵力,配备轻重武器,实行各乡联防,推行连坐法。

随着江苏农民运动的掀起,吴江农民也纷纷开展抗租斗争。

当时吴江县农民,普遍遭受旱、虫等灾害,粮食欠收,青黄不接,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而地主非但拒绝减租,反而高成收租,加紧逼

租,变本加厉地榨取农民的血汗。广大农民被逼得透不过气来,对地主及爪牙恨之入骨,民怨沸腾,斗争情绪十分高涨。1928年12月下旬,吴江县同里区北乡东圩农民陆加金积极发动农民,聚众愤起抗租。反动当局不胜惊恐,吴江县政府把陆加金拘押到县。1929年夏,中共尹山支部书记王兆杰到吴江县庞山湖一带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并带领几十个农民去南京告状,中央农业部被迫在庞山湖地区减租。1929年下半年,在江浙交界的吴江县严墓算墟庙、虹桥、三民浜一带农村,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领导人是一位外来的姓王的中共党员。由于他们对敌我力量缺乏正确的估量,认为农村暴动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迅速开展了抗租斗争,进而发展为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而敌人对农民的暴动准备已有所觉察,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一面向反动当局告密,一面雇用武装警察,调集浙江南浔、乌镇一带的地主武装,联合进行猖狂的血腥镇压。由于当时农民组织还不健全,缺乏经验,又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必要的准备,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下,刚刚兴起的农暴斗争很快就被扼杀了。

1930年夏秋之间,中共苏州中心县委成立前后,正值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由于不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只是围绕“暴动”这一中心去开展工作,制定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斗争策略,导致江苏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有的荡然无存。

以贫苦盐民、农民为主,拥有2000余人的农民武装“天下第一军”(曾用“松沪游击队”名称),在首领徐天雄(与共产党组织失去关系)、王启明(中共党员)的领导下,活动范围逐步扩大。1930年5月,发展到江浙两省八个县境(金山、平湖、吴江、嘉善、嘉兴、青浦、松江、奉贤)。1931年4月,两省国民党反动当局联合进行会剿,一些中共党员骨干随“天下第一军”被摧垮而遭捕杀。

吴江的广大人民反抗当局及地主豪绅的斗争绵延不断,遍及四乡。1932年5月,吴江邮电工人罢工,《吴江日报》为之停刊3天。

1933年,吴江各区因欠交田租而被关押的佃农达3000多人,严重影响了佃农的正常生产和生活,迫使佃农举行暴动。

吴江人民自发的经济斗争,是他们为改善自己的悲惨处境所作出的最大努力。屡屡发生的群众斗争反映了吴江人民的觉醒,也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它使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希望,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

第四章

“九一八”后吴江地区的革命活动

第一节 抗日反蒋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十几万在关外的东北军,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撤至山海关以内。日本帝国主义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吴江,激起了全县各界群众的强烈愤慨,纷纷成立反日救国会,还召开群众大会,进行示威游行,号召民众奋力抗日,抵制日货。吴江乡师、吴江中学的师生,在吴江城关游行示威,振臂高呼抗日救亡口号,号召商界和群众抵制日货,散发油印传单,出版《突击》、《灯塔》、《革命行动》、《旭光》等刊物。反日救国会和学生自治会每天派员去轮埠检查日货,各商店、码头将所有日货一律封存,直接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吴江的经济利益。

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攻打上海。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吴江与上海近在咫尺,战事飞传。在这期间,全县各界人士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十九路军。2月4日,第一批由各界抗日救国会征集的近千袋饼干、白米、酱菜等食物、药品慰送前线

将士。不久,各地自卫委员会相继成立,劝募捐款,征集支前物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持和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的热潮。之后又多次募集饼干、酱菜、香烟、丝绵衣被等日用品,派员送往苏州军督团联合办事处,托六十师军需处代为转送前线,以资抗日将士充饥御寒。《吴江日报》连续登载抗战消息和各地群众抗日救亡动态,呼吁“人人应缩食节衣,统筹粮食,以备赡养抗日战士。”

由于战事激烈,不少上海居民离沪避难到达吴江。2月20日,大批难民抵达黎里,他们以目击者的身份,称道十九路军的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愤怒控诉日军侵华暴行。吴江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行动起来。3月18日,吴江各界联合召开东北沦亡半周年纪念大会;20日,盛泽旅外学生举行小学同学抗日救国演讲会,出席演讲者31人,与会五六百人;5月7日,吴江各界举行国耻纪念会;27日,吴江派员赴苏州,参加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并以二丈白布书写“为国捐躯”匾额一块,及印制宣传品10000张,在苏州散发;6月29日,县教育局召开会议,决定主编国耻教材。

蒋介石政府继续执行妥协投降政策,竟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役,使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烈,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统治和经济压榨的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

1932年7月,严墓、横扇、庙港、震泽等地,16000余饥民聚众抢米,县政府怕事态扩大,宣布无利贷米2500石,饥民凭票借米,秋收后归还,事态才告平息。1933年9月,肉业公会请求屠税局减税,屠税局非但未允,反欲增税,双方谈判无结果,肉业代表晋省请愿,并决定全县罢市。1934年7月,震泽镇四乡农民因久旱饥荒蜂起抢米,成群结队多达数千人。继之,爆发农民闹荒风潮,大批农民不畏强暴,揭竿而起,声势浩大,省政府派兵进行残酷镇压。10月,由于物价昂贵,生活艰难,盛泽端坊业全体工人罢工,事态逐渐扩大,工人代

表徒步到吴江请愿，向当局提出解决问题的四项条件。11月，盛泽三民电机丝绸厂因厂方停机搞整顿，引起工人不满，厂方遭工人包围；梅堰镇发生售烟纠纷，驻平望的江苏省保安队派兵赴梅堰，激怒公愤，全镇罢市。1935年1月，平望镇国民党区公所关押的300余佃户捣毁栅门，举行暴动，群集在区公所门前广场，抗议反动政府无理拘押佃农的暴行，为首的7名农民被当局逮捕。同时，桃源北长浜、杏红桥一带农民聚众向浙江乌镇、南浔的地主“借粮”（吃大户），每家去一人，摇船的、步行的，有几百人之众。7月，盛泽镇米业因对营税局不满，全镇米业罢市一天。次日，四乡农民因无处买米，结队请愿。下午2时许，数10人冲进营税局，将用具杂物捣毁。继而捣毁公安分局大门，打伤公安局长，县政府连夜派军警镇压。9月，开凿震泽新开河工程的千余农民，从平望等地涌到震泽区公所，反对三达公司赊欠河工工钱。震泽全镇商号响应，闭门罢市。1936年3月9日晨，40余农民手执纸旗赴县请愿，强烈抗议政府对庞山湖实验场进一步筑堤围垦，封闭十字港、长条港，禁止船只往来等条令。10月29日，同里教师推举7人为代表，赴教育局请愿，要求速将拖欠教员9、10两月薪水付清。

人民群众此起彼伏的自发的经济斗争和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使国民党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而中国共产党则成为众心所望的领导力量。

第二节 白色恐怖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30年代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逐步走向巩固和稳定。他们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党内连续出现的几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蒙受巨大损失。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绍禹（王明）等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

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开始了左倾盲动主义对全党的第三次统治。

在王明路线的统治下,白区的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苏州地区的党团组织如同全国其他白区一样,面临着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白区党组织采取公开路线和进攻策略,造成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叛徒、变节分子加紧破坏共产党组织。经过如此再三的摧残和打击,苏州地区的党团组织先后中止活动。在吴江,国民党加强了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强化了对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的控制。反动军警防范严密,进步活动受到压制,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极大限制,开展革命工作的环境十分艰苦。

1930年4月,中共淞浦特委委员顾桂龙受党的派遣,与中共浦南(金山)县委书记翁明哲一起来到吴江县盛泽镇进行革命活动。在盛泽镇旅馆内联系工作时,被叛徒王志芹认出,向盛泽水警队告密,顾桂龙被军警联防大队逮捕,作为“要犯”押回枫泾。8月2日,顾桂龙在松江玉皇阁刑场英勇就义。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中共党员毛啸岑遵照侯绍裘诀别嘱咐,“四一二”政变后,回吴江乡师继续从事倒蒋活动,并参加了中华革命党。8月,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毛啸岑为该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在吴江县松陵、黎里等地发展组织。后仅吴江乡师一校就发展青年学生70多人参加,并建立了第三党吴江乡师支部。这些青年还秘密阅读马列著作,并去农村搞武装活动。1931年7月,在吴江城内举行了全县代表大会,主张实行革命三民主义,打倒蒋介石,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1931年11月,第三党总干事邓演达被枪杀于南京,毛啸岑奉命离开乡师,该党吴江乡师支部即停止活动。

1932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在苏州的组织基本被搞垮。但仍有一些中共党员冒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利用多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不畏强暴,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

理想和高贵的革命品质。

1932年春,中共江苏省涟水县委委员兼城区区委书记刘淇生到吴江县警察局以挂名警士实做文书为掩护,在吴江开展革命工作。刘因不同意王明路线中搞飞行集会等做法,遭到省委巡视员陈伯阳(后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的排挤,强制涟水县委书记开除刘的党籍,国民党涟水县政府也密令通缉他。当时县委组织部长暗中劝他外出找党申诉。后经涟水县有关党员证明,刘的组织关系得以恢复,由上海王元健(徐平羽)负责单线联系。刘来到吴江后,结识了吴其超(湖北英山人,中共党员,时任县政府司法录事,与我党的特科有联系),并团结了进步青年史翊美(又名史复,时任吴江县政府文书)、易静初(在黄埔分校受过训,参加过C. Y^①,参加过广州暴动,思想进步,时任吴江县保安大队第四中队长),与他们分别进行革命活动。接着刘淇生通过介绍,先后认识了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进步学生赵乃元、徐德润、杨源时、陈孟豪等人,在吴江县城组织秘密读书会,并勇敢机智地展开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读书会的成员后发展至23人。

读书会的性质和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吴江白色恐怖严重,在国民党县政府的职员、驻军和吴江乡师中从事革命活动,处境是十分危险的。为保证安全,读书会完全采取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会员个别吸收,活动采取隐蔽方式,斗争注意策略。当时要会见刘淇生必须按约定,在吴江公园梅林内秘密碰头,讨论世界观、人生观和革命道路问题,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革命信念。有两次特殊情况,在松陵镇曹王庙、北塘街的连升客栈秘密聚会,刘向大家介绍苏联革命和江西苏区的情况及谈论福建事变的前途等问题。读书会成员还阅读有关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普罗文学书籍,及高尔基的《母亲》

① C. Y 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组织名称的英文缩写,也是当时共青团这一组织的代号。

和《士敏土》、《读书生活》等书刊。期间,吴其超的住所秘密藏有马列书籍和党内刊物。在吴江乡师还按年级成立读书会小组,除一年级外,其余三个年级都建立了小组。小组不时进行学习讨论和工作交流,并从事抗日活动。他们发动乡师学生向《绿波》杂志(16开本的铅印刊物)投稿,用小说、诗歌、论文、漫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

读书会通过吴江乡师学生会,组织和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学生到街头、轮船码头、茶馆、酒肆宣传抗日,号召抵制日货,使用国货。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出兵抗日,收回东北,在学生中批判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的错误主张。喊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等口号。在乡师还举行抗日义演,将游艺募捐所得的120元钱悉数支援马占山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镇江举行的江苏全省童子军大露营时,吴江乡师读书会同学写了“反对法西斯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停止内战、出兵抗日”等革命传单,在营地秘密散发,宣传抗日民主。在当时震动很大。国民党省政府曾派出军警去营地加紧戒备并进行搜索。在童子军比赛时,吴江乡师(63团)比分被压低,引起全团公愤,吴江学生拥进江苏省政府要求公平处理。反动当局诬蔑63团“大闹省政府”,吴江乡师校长为此被免职,教师被撤换。

此外,刘淇生,吴其超、史翊美密切合作,共同掩护和照顾了两位革命同志。一个是共青团员樊澌(湖北英山人),其时刚从上海国民党监狱期满释放,由吴其超介绍,住到刘淇生处数月,阅读进步书刊,吴其超、史翊美常前往看望,后由刘淇生资助樊澌回归家乡。另一个是被苏州高等法院判刑的共产党员汪赋纯(即江干臣),由吴其超介绍给刘淇生。为避免苏州反省院的叛徒认出汪赋纯,在吴其超的努力下,通过其父吴煜恒(时任苏州高等法院庭长,与我党董必武及特科有联系)的帮助,汪赋纯由苏州转到吴江县看守所关押。期间,刘淇生、史翊美、吴其超时常资助照顾,并不断向他提供革命书刊阅读。

刘淇生还与吴江乡师赵乃元商量开展兵运工作，曾利用易静初的关系，组织进步同学打入保安队当兵。当时正好易静初在无锡惠山训练新兵，此举最终未能实现。其后，刘淇生让史翊美做县府卫士班长小杨的工作，使小杨思想获得很大进步。

1933年秋，刘淇生与上海王元健约定谈吴江工作，并解决读书会中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当时刘已将史翊美、赵乃元、徐德润、杨源时等确定为吸收入党的对象，刘淇生去上海按约定地点与王元健接头，王临时有事未能相见。其后虽与王联系数月，终因失去联系，读书会中发展党员的问题也就未能解决。读书会的一系列活动，把吴江乡师的面目搞红了，陈孟豪、赵乃元被先后开除学籍，徐德润被“留校察看”，杨源时受“警告处分”。为找寻党的组织，陈孟豪、徐德润、史翊美等多次去上海，通过世界语协会、《读书与生活》社等关系，找过党组织。

吴江秘密读书会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使一批进步青年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一大步。徐德润离开吴江乡师后，在黎里按乡师读书会的原则，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有30多名教师、店员参加，除学习革命理论书籍外，还发行《大众生活》、《永生》杂志，每期多达100份，传播抗日救亡消息，鼓舞青年抗日热情。陈孟豪曾两度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生工作关系，被捕坐过牢。后陈在家乡吴江县莘塔搞起了一个流动图书馆，出借马列书籍和普鲁文艺读物。张鹏举、樊修德、杨源时、刘炯等都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先后投身革命，实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志愿。

1934年末至1935年间，吴其超、史翊美、易静初先后离开吴江，吴江乡师读书会成员亦均已毕业分散，刘淇生也为反动政府所注意，于是离开吴江去东台赵乃元处进行革命活动。秘密读书会至此解散。

吴江秘密读书会虽然中止了，但对推动此后中共吴江地下党组织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1933年，中统江苏省室派特务员顾林凡到吴江建立特务室。顾

到吴江后,借共产党嫌疑之名,将震泽沈天宝等两人拘捕送往镇江省室,训练发展参加中统组织。后又陆续派特务到吴江,发展“细胞”(所谓“关系人”),进行特务活动。

同年夏,中共海门县委领导成员张冠今(化名沈则张,1925年入党,是中共海门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到吴江县震泽镇,以池塘桥小学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10月,张与近乡东庄桥小学教师朱碧元(朱振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时,因叛徒出卖,被中统吴江县特务李良成逮捕。张被关押在吴江看守所,朱被解去苏州反省院。

1935年冬至1937年春,沈毅(沈炳康)、陆先引以县地政局干事为职业掩护,与中共党员杨若鸿和梁维濂、梁何迅、刘之奇等组织“读书会”,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国家大事。以沈的住宅——松陵镇北下路河边的一幢房子为基点,进行秘密集会活动。尔后,又成立了“大众社”,出版《大众报》。创刊号在苏州印刷发行,部分带回吴江,在吴江中学散发,向中学生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大众社”组织募捐演出,有合唱《松花江上》、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突然反动特务冲了进来,城内警察加岗,严加巡查。沈毅、陆先引于当天紧急撤离吴江,其余成员隐蔽星散,“大众社”夭折。但“大众社”播下的革命种子,激励着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有的后来参加了新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吴江地区活动的中共党员,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事革命活动,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敌人的严重破坏下,党员撤离,活动暂停。但是,吴江人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党的影响还在,革命的火种还在。人民相信黑暗不会持久,共产党一定会回来!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 - 1945年8月)

第五章

抗战初期的吴江

第一节 吴江沦陷及日军罪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全面侵占中国的野心,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布通电:“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消息传来,吴江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成立抗敌后援会,进行宣传、慰劳和募捐,并派代表将募集之大批物品送往前线。汇集在镇上的爱国青年尤为热烈,四处奔走呼号,情绪高涨。盛泽的“风雨歌唱团”和吴江的“怒吼歌咏团”在吴江戏院联合演唱救亡歌曲,还到各地巡回演出,并举办座谈会和进行街头演讲。南京国立剧专教授侯鸣皋,约苏州实验剧团的韦布、曹孟浪等组成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来到吴江、同里、八坼、黎里、平望、盛泽、芦墟等地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毒药》、《月亮上升》等话

剧,进行抗日宣传。

由于淞沪战事激烈,苏嘉路上兵运繁忙,各界抗敌后援组织及群众,主动为过境兵员运送茶水干粮,送上支前食品、物资,接下大批难民、伤员。为了有秩序地收容难民和及时救护伤病员,吴江县中西医师联合成立救护委员会,并举办“伤兵医院护理训练班”。经过培训的护士,自愿报名到吴江医院参加救护工作。当时吴江医院、吴江师范、杨家祠堂均住满伤兵,医护人员在炮火声中日夜奔忙。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十军乘隙在杭州湾北部金山卫登陆后,从西南面迂回包围上海,使上海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一部日军向北沿苏嘉铁路、苏嘉公路和平浔公路长驱直入进犯吴江,处于交通线上的城镇无不遭到日军的烧杀、掳掠。平望镇为苏嘉铁路的中心站,故首当其冲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10月15日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11月13日,日军经黎里镇后长荡,在金家潭抢夺了数只逃难船,伪装偷渡袭击平望,日军进镇后,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400多名来不及避难的居民全被枪杀,尸体遍地。河中浮尸漂延数里,家属认尸的哭嚎声半月不绝。特别在东溪河石灰窑、北河西街罗家弄堂口、南大街吴会丰花园、石家港水瓶庵旁、北大桥弥陀殿后等处,尸体成堆,血腥冲天,惨不忍睹。日军离镇时,一把恶火直烧了三天三夜,700多间房屋化为瓦砾。这次暴行是平望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致使户户破损,数十家绝户。继之,日军又侵震泽,放火烧毁商店130多家,房屋200多间,商品、钱物损失更大。此后,吴江各镇相继沦陷。

1937年11月11日夜,日军从西塘窜入芦墟,杀害正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士兵30多人,水警五六人,民众10余人,并放火烧毁城隍庙。第二天中午,日军开到黎里,居民闻风纷纷逃避,十室九空,各店铺均遭抢劫,沿途各种物品抛散狼籍,并杀害了不及避难的居民数人,奸淫妇女数十人。

1938年1月18日至25日,千余日军驻芦墟一星期,南市一段不

能通行。他们强住民房,各户遭劫,用具均被焚毁,损失无法统计。妇女被焚者尤多。凡日间见有妇女之人家,夜间即破门而入。又逐日至乡间抢掠,到莘塔、周庄附近乡村扫荡,捉鸡捉鸭,寻淫烧杀,无恶不作。

2月18日,千余日军开抵莘塔,住凌姓三墙门,物件损毁甚多,居民逃避乡间。敌又分抵各乡村扫荡,妇女惨状尤烈。据目睹者云:某村一厅堂上,集妇女20多人,于2小时内逐一奸淫,无一幸免。

继之,日军又两次进袭芦墟,用稻草或硫磺枪纵火,烧毁住宅1000余间。白巨斗、苏家港、洋沙坑、南尹、灶江等村,一天之间化为废墟,死伤百姓175人。盛泽、严墓均遭烧杀掳掠,死伤居民无数。

第二节 沦陷以后的吴江

吴江沦陷以后,民房、商店、工厂毁于一旦,电厂停电,客车瘫痪,群众蜂拥避难。国民党县政府土崩瓦解,县党部迁至震泽浜湖一带,地方士绅大部分咸集于尚未沦陷的严墓(铜罗)四乡。散兵蜂拥,匪盗四起,社会秩序极度混乱。

进驻吴江的日本警备队、宪兵队、特务班和宣抚班,与伪武装警察队、绥靖队,分别驻守县城松陵、盛泽、震泽、平望等镇和交通要道,并修筑据点,设立兵站,实施点线占领。

当时新塍地痞郭剑石迎奉日军进驻嘉兴,被委任为苏嘉湖全线维持总会会长。吴江汉奸王连卿任吴江维持会长。1938年1月,维持会改名为自治会。3月28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维新政府下设绥靖部,“井上公馆”派出日本浪人、特务配合各地汉奸,收编土匪、游杂部队,组成3个绥靖军司令部。原浙江水警某区长徐朴诚(震泽人),率领旧部卖国投敌,被任命为第一绥靖区司令。此时,20年代初曾任江苏省议员的朱元直附逆投敌,出任傀儡吴江县知事公署知事。

日军为建立其殖民统治,除军事侵略外,还加紧政治欺骗和经济

掠夺。他们打着“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幌子，宣传所谓和平，鼓吹“中日亲善”，并动员逃难群众回乡“安居乐业”。为了掩饰他们的罪恶行径，在震泽等地怂恿市民肆意抢劫，再向抢劫市民开枪，导演一幕日军“维持”秩序的丑剧。并以此为背景拍摄电影，恬不知耻地宣传东亚“圣战”的“正义性”。

吴江乃丝绸之乡，1937年初有桑地98000余亩。然而沦陷以后，主要桑区震泽、平望沿公路的桑树被砍伐殆尽。日伪华中蚕丝公司在吴江设立办事处，对蚕桑、丝绸的产销进行统制；在盛泽设通动公司，垄断丝绸运输，同时控制了苏嘉、平湖、江同公路的汽车运输业务。并开筑平望与黎里的简易公路，以加强日本军营与日伪据点的联系。

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党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向南、向西撤退、转移。其中一些零星部队流落吴江。在这非常时期，这些部队及地方武装，在吴江地区各占地域，其中主要有江浙边境的赵安民、朱希、江鹤松部队；北厍、黎里的郝道生部队；沿太湖七都、庙港、横扇、松陵等地的程万军、曹绍纹部队。他们内部成员复杂，目的不一，逐渐分化瓦解，有的加入革命行列，有的被国民党收编，有的则投靠了日军。

1938年9月，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江阴朱松寿抗日部队的朱广运（朱言信）到吴江县梅堰太平桥，开展抗日工作。他在梅堰和黎里一带活动，争取地方武装，发动农民筹备枪支，组织“苏浙抗日行动委员会”。同年11月27日，由于汉奸告密，被日军逮捕，杀害于盛泽圆明寺分水墩。梅堰群众前往收尸，将他埋葬在太平桥鲢皮湾。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展开，使日军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威胁，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由于战线延长，财力、物力、

兵力缺乏,日军在中国的国土上只能把守交通点线及主要城镇,而广大农村并无多少兵力。因此,国民党流亡政权才有机会折回原地活动。1938年上半年,第三战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委派沈立群为吴江县县长兼抗敌自卫团司令。沈立群受命后,从江西上饶转道上海,会晤了王岳麓、毛啸岑等吴江知名人士,又到黎里和国民党区长,商计筹建县政、恢复基层组织,并邀集了太湖地区的赵安民、朱希、程万军等游击司令,协商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税收、统筹军饷等事宜。9月,成立了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别称游击政府),流动于苏嘉路两侧黎里、坛丘一带。11月,沈立群借助国民党六十二师及朱希部队的力量,得以立足于路西严墓,来往于雷墩荡、章奥村、瑾下浜等处。县政府设有民政、财政、教育三个科和财务委员会,另有谍报队、破坏队、常备队和政工队。全县设8个区,配齐区长,但大部分为敌占区,无法就任。同时,沈立群任命赵安民、洪斌武、汪鹤松为国民党吴江县抗敌自卫团副司令。

此时,国民党吴江县县党部也迁到严墓乡间。

第六章

党组织的建立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上海的原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组织及中共浙西党组织,先后到吴江开辟工作。

第一节 新四军军部派员到吴江 开展抗日工作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共10300人,下辖四个支队。4月4日,新四军军部移至皖南歙县岩寺。5月4日,毛泽东电示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7月1日,新四军军部由歙县岩寺进驻皖南泾县云岭。

1938年9月,中共党员庄绍侦(庄真,南浔人)受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派遣,从安徽省泾县回太湖边开展工作到达严墓,其任务是:物色可靠对象,介绍他们去新四军,以扩大新四军队伍。严墓区(现铜罗、青云、桃源一带)位于吴江县的最南端,与浙江重镇新塍、南浔相毗邻。当时南邻的乌镇及吴江县盛泽等主要城镇都驻有日军,但严墓无日军据点,又无国民党军队的活动。且境内大小湖荡

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没有公路,交通不便,天然地阻碍了日军的行动,因此,这里成了许多人的避难场所,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均设在严墓。

庄绍桢经同学姚璧成(南浔人,任朱希部队参谋主任)介绍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担任政工队队长。他利用这一机会,邀请进步青年洪海泉(南浔人)筹组政工队。此时,县政府刚刚成立。地方上失学、失业青年较多,很快就吸收了盛泽、震泽、庙港、南浔、湖州等地20多名要求抗日的青年。为了提高队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庄绍桢决定在算墟庙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他公开以新四军的身份向青年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进行人生观教育;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队员们演出。还把从部队带来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报刊、小册子等分发给青年阅读,宣传共产党抗战方针,提高青年的抗日积极性。经过半个多月的学习,大部分学员转为政工队员,由庄绍桢带队到章奥村、严墓镇、南麻、吴家浜等地进行巡回宣传活动。每到一处,住一两天,出壁报登载打鬼子胜利的消息,辅以漫画贴在大桥边、广场上,吸引大量群众观看。庄绍桢还自编自导短剧《军队与老百姓团结起来打鬼子》。同时组成歌咏队,合唱、齐唱很热烈,受到群众的欢迎。

1938年9月,庄绍桢输送张斌、马佐龙(马文祥)、沈世钧、李庆魁、周蔚昌、凌文华、金再祥(金流)等进步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张静贞、陈有民、金衡等青年在政工队的影响下也投奔了新四军。在这个时期内,庄绍桢还发展了洪海泉、江月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政工队在庄绍桢的带领下除了搞宣传外,还多次袭击日伪军。1939年初,庄绍桢和县常备队员张树源几次身带短枪、手榴弹,到隐墩一带打击残害农民的土匪,镇压匪首,维护地方秩序。同年秋,为了教训横行乡里的伪税警,庄绍桢带着几个政工队员,全副武装埋伏在与南浔交界的乌盆兜古坟的石人、石马群里。袭击那些平时为虎

作侬、欺压百姓的家伙。镇上的商店关起门板,人们盛传是新四军打过来了,日军吓得龟缩在司令部里不敢露面。政工队员陈家驹,用自制的炸弹,在震泽日军开会地点引爆,玻璃窗全被震碎。为之,震泽镇戒严三天。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政工队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40年初,庄绍桢指示洪海泉到杓头抖办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然而县政府的教育局长时常来学校窥视行动。为此,洪海泉决定暂避南浔家乡。谁知刚到南浔,就有日军宣抚班南浔侦缉队派出的汉奸到洪家探视。不得已洪海泉赶紧去震紧,暂住父亲的茶叶店里。4月经庄绍桢同意,洪海泉离开吴江,投奔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夏,庄绍桢指派顾关通等5名青年到路东(苏嘉路以东)的北厍乡、金家坝乡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们贴标语、发传单,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的丑恶嘴脸,并在内部出版的《正义》油印刊物上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投降派“挂羊头、卖狗肉”,丧失民族气节,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他们还多次机智勇敢地避开敌伪军的封锁,把刊物、传单散发到敌占区,在群众中积极扩大影响。

第二节 中共中央特科在吴江争取地方 武装及吴江支部的建立

1937年冬,坚持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的中共中央特科,基于众多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寻求党的领导及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决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地方游击队做争取改造工作,使之成为我们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由此特科成立了自己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总会设在上海)。1937年底,特科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经过培训,用“武抗”的名义派往各地开展工作。同时,在工人夜校、难民收容所动员一些青年骨干,一同前往。

此时,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特科秘密党员王绍鏊(吴江同里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声望,积极进行

抗日活动。他利用社会关系,将中共党员丁秉成等及一批“武抗”成员介绍到赵安民、程万军、郝道声部队和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开展工作。

【争取抗日武装】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高原委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山东省峰县(今枣庄市)人李愈秋(又名陈显堂,化名丁秉成),到江浙太湖地区开辟工作,争取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丁秉成带了章燕、周奋等四人,从上海出发,前往驻在江浙边境的赵安民部队。

赵安民,吴江松陵人(祖籍河南)。1934年9月因共产党嫌疑罪被捕。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而随之出狱。10月,由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江浙两省联防处参谋长的同学钱康民介绍,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太湖别动队司令,钱自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树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赵去安吉、长兴、吴兴等地筹备武装,动员热血青年,收集流散枪支,于1938年1月建立了一支500余人、300余支枪的队伍。

丁秉成等人到达双林以后,由与“武抗”建立了联系的钱康民陪同,与赵安民协商有关安插我人员的问题。经钱康民努力,赵安民同意将部下龚圣祥大队的枪支带到太湖里拉队伍。于是,钱康民雇船偕大队长龚圣祥、章燕、堂弟钱荣初一起出发。不料船行至横扇附近,被程万军部的龚国良大队扣押。后来钱康民经程万军部政训处处长金鲁望帮助,几个人才获释放,但武器尽失。此事未能成功,丁秉成返回上海。

1938年秋,丁秉成奉命再次到吴江开辟工作。其任务是:争取改造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随同前来的有:刘子荣(大刘)、章燕(小刘)、华大闲(陈正之)、俞哲(周奋)、叶初晓(鲁秋生)、林风(南德钦)等“武抗”成员。由吴江县平望人沈月箴当向导。抗战爆发后沈通过表兄毛啸岑从柳亚子那里找到共产党的关系,1938

年9月经王绍鏊介绍参加了“武抗”。她此次回吴江由丁秉成单线领导,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并通过毛啸岑的关系,担任国民党县政府的办事员。刘子荣、叶初晓、华大闲等经民主人士王岳麓帮助,分别进入县常备队和县政工队。丁秉成、林风通过王绍鏊的关系,与程万军部队的副司令曹绍纹建立了联系,并与“武抗”在程部的内线倪子璜及金鲁望接头,将林风安插在政训处任总干事。丁秉成等人以政训处下属的“青年服务团”为党的活动基点,发展“武抗”会员,为进一步开展工作作力量上的准备。不久,震泽青年施家骅加入“武抗”。

程万军原是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九军的一个连长,淞沪战役后率24人退至吴江。撤退时,军长夏楚中临时委任程为陆军第七十九军别动队队长,以便沿途收集队伍退到后方。因交通阻断,程万军等逗留湖滨一带,而溃兵散卒越聚越多,乃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总司令部,程自任总司令。曹绍纹原籍湖南,他在湖南人中拉起了一支队伍,同程万军部合并,当了副司令。金鲁望是1924年经钱涤根介绍入党的国民党党员。1935年参加上海抗日救国会。因动员学生罢课请愿,被教育部勒令解职。1936年9月,因蒋介石阻挠抗日救国,愤而退出国民党,携家回湖滨。1938年3月,金接王绍鏊函召赴沪,后奉命回湖滨参加程部,任程的秘书。程万军部队共有5000人,司令部设在吴淞,活动于七都、庙港、横扇、湖滨一带。

丁秉成到程部后,住司令部金鲁望处。丁经常找曹绍纹谈心,对他进行革命和抗日救国的教育。正当工作取得深化之际,程万军执意投靠日军,丁秉成计划拉出其中1600余人归曹绍纹、钱康民指挥。然而到了10月,程万军将部队全部开进苏州日军据点。后由伪绥靖部收编。1939年1月,程万军任伪绥靖第二区司令,4月间部队移驻无锡,后驻湖州。丁秉成带了林风、施家骅等“武抗”会员从庙港撤至龙泉嘴与县大队中的“武抗”同志会合。当时曹绍纹居住庙港,丁秉成仍继续做曹的工作,鼓励他树立信心,重建抗日队伍。1939年2

月，曹绍纹患严重眼疾去苏州治疗，被程万军发现而软禁，关系中断。

这时特科又陆续派来了中共党员施光华（胡光华）、张琼英（化名李太太、丁秉成爱人）及“武抗”会员江军、华荣田、林家春（洪奔）、王振华、沈润泉、吴坤年、吴正大、于大桢、裘益明、裘吉明等青年。丁秉成等人通过王岳麓的帮助进入县政工队，丁任政工队指导员。他们利用政工队的合法身份，广交朋友，宣传抗日，积极发展“武抗”会员，为立足吴江开辟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9年3、4月间，根据特科党组织的指示，丁秉成由施家骅陪同，通过统战关系与游击队长郝道生建立联系。经协商，郝道生同意接收“武抗”会员刘子荣、江军、于大桢、章燕、沈润泉等人编入部队。郝道生是东北人，于淞沪抗战中溃败流散在黎里。他的队伍里有一部分人原先是东北军的，郝以东北老乡为亲信，收集散兵，吸收当地人参加，拉起了200来人的队伍。后得到黎里两个士绅的资助，筹集粮款给养。丁秉成数次去黎里，同郝道生会面，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然而，1个多月后，郝部遭日军突然袭击而被打垮，沈润泉牺牲，其余“武抗”人员撤至严墓，进入县政工队。

【中共吴江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1939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上级指示，中共吴江支部在严墓车家坝建立，丁秉成任书记，组织委员张琼英，宣传委员施光华。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兼支部书记，张琼英、施光华、刘子荣、华大闲任支部委员。“武抗”成员编成了若干小组，在党与“武抗”支部的领导下，在政工队和当地青年中发展会员。党支部在“武抗”会员中，培养先进分子，吸收为中共党员。

党支部积极从政治理论上对“武抗”会员进行培训。从上海秘密运来一批革命书籍，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进步文艺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供大家阅读。还以时政讨论会、出墙报、演讲、演剧等多种形式，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和宣传工

作能力。并且经常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培养和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为党培养和充实了一批新鲜血液。“武抗”以县政工队为立足点,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严墓、算墟庙等地区的农民、青年群众中,工作开展得很好,影响很大,鼓舞了农民和士兵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他们参加政工队的演剧、歌咏活动。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激起了沦陷区群众的义愤,《流浪三部曲》、《在太行山上》、《救亡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响彻田野。有的同志还分工到附近农村,在青年男女中组织小规模抗日宣传、减租减息、办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等活动。

【太湖义勇军的建立及受挫】 赵安民的部队建立以后,因与国民党七十六师发生磨擦,于1938年3月向杭嘉湖地区转移。途中,他们边进行抗日宣传,边继续扩充兵员。至7月,部队扩编到8000余人、6000余支枪,可谓声势浩大。钱康民、赵安民向战士们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进行军事训练。部队纪律严明,赏罚分明,军风较好。10月,日军、和平军大举围攻双林,钱康民、赵安民身先士卒、英勇顽强,与敌血战三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率部突围。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赵、钱二人的威信却提高了。

1939年3月,赵部又改编为江南挺进纵队步兵第三团。纵队司令调邱玉林任团长。邱在检阅赵部时,发现该部军纪严谨,认定其中必有共产党分子。邱先派兵设法围攻未成,后由第三战区政治部派来一批政治指导员进行监视。同时以调虎离山的方式,安排赵安民去湖南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钱、赵二人心急如焚,赵临行前恐钱身份暴露,劝钱暂时离队,去担任浙江省抗敌自卫总队长。此时,丁秉成指示钱康民抓紧时机从赵部拉出三四十人枪。事成,又几经周折,终于创立了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他们坚持执行党中央“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仅两个多月,部队就发展到100多人,并与

当时已东进到达无锡梅村的新四军“江抗”^①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去无锡联系的俞哲带回叶飞的口头指示：待主力继续东进或回师时，让丁秉成、钱康民带吴江武装去会师。

江浙太湖义勇军活动于吴淞、义皋、大钱一带。指战员们生活艰苦朴素，与民秋毫无犯，深得群众的信任。老乡们送茶送饭、掩护伤病员，主动为部队传递情报，一片军民鱼水情。义勇军抗日杀敌的英雄事迹在东太湖畔到处传颂，国民党反动派为之深感不安，视丁秉成、钱康民为眼中钉。环境日趋险恶，丁秉成坦然地对爱人张琼英说：“关键时刻一定要顶得住，要经得起考验。”

1939年8月23日，丁秉成、钱康民带着队伍走到七都隐读村南20里处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六十二师和吴兴县常备队有预谋的包围袭击。丁、钱走在队伍最前面，临危不惧，果断指挥战士突围，但终因兵力悬殊，丁秉成、钱康民等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日寇！”而英勇牺牲。张琼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强忍着极度的悲痛，与施光华一起做队员的思想工作，同时抄写文件报告，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派刘子荣携带密信回上海，向组织上汇报情况。很快，刘带回高原的指示，要施光华负责，首先派人护送张琼英母子回沪，然后将政工队的党员及“武抗”会员分批撤离吴江，回上海待命。不久，这批党员和青年骨干由张琼英、刘子荣负责，转入“昆山联抗”工作，受“武抗”影响的4名老政工队员陈子耘（陈友民）、江月芳、徐惠英、谭立中随同去参加革命队伍。

“武抗”在吴江活动的时间虽短，但是它在吴江开展敌后武装斗

^① “江抗”是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简称。1939年5月，为贯彻执行向东发展的方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由茅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向无锡、苏州和上海近郊地区挺进，在与无锡、江阴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合编后，改用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经过与日、顽军的多次激战，新四军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开创了江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争,培养了一批爱国家、爱人民、追求真理、有革命理想和勇于献身的青年骨干,他们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受到了切实的锻炼。奉命转入昆山“联抗”^①的绝大多数同志入了党,1940年5月,昆山“联抗”入编为“江抗第三支队第一中队”。6月18日,该队在大风湾反扫荡战斗中,勇敢顽强,给敌寇以迎头痛击。江军为掩护战友转移,中弹后捂住腹部外露的肠子,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从吴江转移到新四军“江抗”的同志,还有俞哲、林家春、陈子耘、张静贞等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情报交通工作】 掌握敌伪动态,收集情报,是特科同志在吴江工作的另一重要任务。沈月箴进入国民党县政府以后,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和丁秉成的意图,主动接近进步青年,与他们亲切交谈,交流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活动,赢得了不少青年朋友的信任和喜爱。1938年9月,沈月箴介绍黎里青年金大鹏(金若望)参加“武抗”。10月,沈、金二人在黎里镇小学邀集了20多名有志青年,举行抗日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2月的一个深夜,沈月箴与肖心正(县政府会计)一起潜入敌占区盛泽镇,在观音弄一个富户家中,挖掘出埋藏在地下的一支步枪,一支手枪和许多子弹。1939年2月,沈月箴介绍肖心正加入“武抗”。她还积极做县常备队政治教官俞清志和县政府司法书记沈文潮的工作,使他们参加党的秘密工作。沈月箴进入县政府后,巧妙地周旋于上层人物之间,得到县长沈立群等人的赏识,为收集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起初,县政府与后方的文件往来,都是由通信兵穿越浙江省吴兴、长兴的游击区,步行来往于张渚的国民党江苏省第二区专员公署之间,常常一趟为期累月。后来由沈月箴担任交通员,她冒着生命危

^① 1939年8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和武抗派出干部10余人到昆山陶一球部,充实骨干力量。9月初,陶一球以国民党蓬閻区区长名义,与国民党菘葭区区长赵宗尧联系共同抗日,不久成立了两区联合抗日大队,简称联抗。

险,伪装携带文件,经敌区的铁路、公路,越过层层关卡,传递文件。每次从张渚回来,先在黎里或严墓戴家湾住处,将有关重要情报资料抄录下来,及时交给党组织。通讯员的任务是艰险的,途中要经过苏州、无锡、张渚等地区,每一处都要受到日伪岗哨的多次盘查。在当时条件下,单身妇女住宿是很受人注意的,旅馆内常在半夜遭突击检查,但沈月箴都从容对答,没有出过差错。

1939年夏,金大鹏从黎里来到严墓,和沈月箴一起工作。8月23日,丁秉成牺牲后,沈月箴同离开吴江的“武抗”人员一起撤往上海。她临走前通知金大鹏和肖心正留在吴江,等候上海来人联系。适逢国民党江南行署举办特种工作训练班,通知各县政府选派人员前去受训。为了取得有利活动的职务,金大鹏争得机会去山丫桥,打入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冷欣指挥部的“特种工作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取得该部上尉情报员之合法身份,被派回吴江。于是,金大鹏成为国民党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不受县政府管辖,凭着这“灰色”外衣,行动上得到不少便利条件,有效地掩护了自己。

1940年2月,金大鹏和肖心正与中共社会部在沪负责人吴成方接上关系,继续为我党进行搜集情报的工作。此时,县政府的“交通”已另派别人担任,不能象沈月箴担任交通那样直接取得文件。金大鹏、肖心正利用县长之侄沈文潮担任“总收发”之便,仍旧得到一切情报资料。情报到手后,经过密写,寄往上海秘密通讯处或亲自交送领导人吴成方。日子久了,沈文潮从金大鹏、肖心正热心取阅国民党来文中的密件察觉到他们的身份,向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一起工作,并希望能领他到上海去与上级见面。金就嘱他把一张王绍鏊写的“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捐款收据送进吴江城,交给金鲁望。后得到上级同意,金大鹏带沈文潮去见吴成方。沈回来后参加我党情报工作。

第三节 中共浙西特委在吴江的抗日活动

1937年12月,重新出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雄,为了在浙江站住脚跟,发展自己的势力,在抗战初期,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采取较开明的立场。他在抗日形势的推动下,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于1938年2月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为了推行这个政治纲领,从省到县建立起“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浙西地下党正确运用这个有利形势,派遣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省、县政工队,许多党员干部担任了政工队的领导工作,大多数政工队实际上成为我党的群众工作队。党通过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展群众抗日活动。

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后,随即对全省各地党组织的组建工作进行部署。6、7月间,省委派徐洁身(徐进)到浙西了解情况。徐获悉江浙边界的朱希、汪鹤松游击队里有我地下党员活动,即将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要求调派干部到朱希部队做统战工作。为了争取这支队伍,省委即派徐由整等2名党员到朱希部队参谋处,协助徐洁身做党的统战工作及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朱希部队的抗日活动】 朱希,湖北麻城人,出身自耕农家庭。1927年加入共青团,并任共青团麻城特支书记,负责农运工作。曾担任过麻城第一届农民协会委员,湖北省农民协会代表,与土豪劣绅作坚决的斗争。同年秋,受党委派去汉口活动,因联络机关尽遭破坏,且土豪劣绅追捕甚紧,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迫于生活,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陆军第十三师。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不失时机地进行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前任十三师七十七团二营营长。

“八一三”淞沪战役撤退至皖南时,朱希受命组建十三师游击队,并被委任为司令,汪鹤松任副司令。游击队初创时约有200多人

枪,号称“孝(丰)、安(吉)、长(兴)、吴(兴)”军游击队。该部一面进行游击抗日,一面不断收编从上海战场撤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并在莫干山难民区接纳了大批嘉兴、吴兴、上海、杭州等地流亡的热血青年和学生。

1938年3月,部队运动到乌镇西部,击溃了郭剑石(新塍大汉奸,有七八十人,五六十条枪)部队。4月初,部队途经白马塘时,恰遇五六艘日军汽艇由乌镇方向开来,部队紧急部署,设下埋伏圈向敌人开火,击毁敌3艘汽艇。

白马塘小捷后,朱希获悉乌镇敌人兵力空虚,遂连夜奔袭乌镇,与日军宣抚班发生激战,11名留守日军悉数被歼,日军伍长绝望之余,剖腹自杀。缴获战利品计有机枪1挺,长枪11支,盒子枪1支。这两次战斗的胜利,使朱希部队在当地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武装。各小据点的日军都惊恐不安,慌忙撤向沪杭、苏嘉铁路沿线的大据点和震泽、南浔两大镇,龟缩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出来。

朱部几次与日军短兵相接取得胜利,壮大了声势。驻严墓、新塍一带绥靖军第一区司令徐朴诚的一个巨春山大队反正,接收改编,流落太湖之滨的两连湘军随之归顺,江浙交界地区的王春林部约500人也投效于朱希部下。上海、南翔、青浦、朱家角、黄渡等地不少游杂部队闻风附归,人数常不下近百。加上许多本地青年纷纷加入部队,朱希实力大增,从原来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了4000余人,扩编为5个团9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朱希部队开辟了一块以乌镇为中心,包括严墓、双林、练市、新塍的游击根据地,成为江浙交界一带实力最强的国民党游击部队。

收复了江浙边境的乌镇以后,为了防御敌人反攻,朱希派副司令汪鹤松带第八大队100多人枪驻扎严墓乡下巴家埭、算墟庙,与乌镇成犄角之势。此时,与我地下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汪部负责民运工作的韩昌也随来严墓。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接触四乡的农民群众,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江南游击区民众抗日

救国会”。

6月20日清晨,日军一个小队乘汽船到严墓扫荡,在严墓岳王庙遭汪鹤松二十二中队痛击,丢尸4具。日军不甘罢休,于当天中午,又派一二百人赶来报复。敌人从严墓后经桥登陆进入镇北面,隔河向汪鹤松部队猛扑,汪鹤松率部顽强抵抗。日军几次冲过石桥,均被歼灭,死伤数十人。激战至晚,日军被迫拖了一船死尸败走。

8月,朱希司令部探知日军除在沪杭铁路、苏嘉铁路设有重兵把守外,在平浔公路的震泽、南浔两处兵力单薄,遂决定乘机夜袭南浔,拔除这个钉子。17日夜,朱希亲率一团一个营的兵力和少年先锋队,首先在南郊康王寺桥发起攻势。战斗打响后,抄到敌后的汪鹤松部迅速策应,猛攻南浔市中心,一时枪声大作。扼守康王寺桥的敌人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向东栅逃命。朱希率队穷追不舍,毙敌30余人。原在西栅护路的一队敌军回援市区,亦被汪鹤松部迎头痛击,丢下10多具尸体狼狈逃走。汉奸邱某匿居在丝业会馆内,被朱希部下抓获处斩。紧靠震泽的南浔为朱希克复。

翌晨,日军汽艇自吴兴方向开来,敌人不知南浔已为朱希控制,大模大样闯入市河。朱希在南浔市河两端潜伏兵力,待敌艇一到,突然下令开火。船上敌军措手不及,当场被打死七八人,余敌纷纷落水溺毙。仓内满载的物资都成为朱希部队的战利品。

不几日,吴兴日军组织兵力反扑,企图骚扰南浔、乌镇,截断朱希归路。朱希部队西、北两面受敌。朱希眼看南撤不成,果断下令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东袭震泽,一举击溃汉奸张大千的伪军,冲进敌伪司令部。正在震泽的日军顾问斋藤狼狈逃往平望。此役共缴获敌汽船1艘,马达11只,还有大批枪支弹药和文件照片,俘虏伪军10余人。攻击震泽不久,日军从平望向西发动大举进攻,朱希主动率部从震泽西南撤回乌镇。

【党组织在朱希部队的建立及活动】 1938年9月,以中共党员温永之为队长的吴兴县第二游击大队,约150人枪,为摆脱国民党吴

兴县政府的吞并,要求中共浙江省临委派到浙西了解情况的徐洁身来领导。组织决定,徐洁身以中共身份、徐进的名义与朱希谈判,把温部编入朱部,成立独立大队。朱希表示同意。由此徐洁身等党员进入朱希部队,后上级又派去党员徐由整。10月,成立了党小组,徐洁身任小组长。党小组积极开展工作,恢复了韩昌等人的党籍。接着帮助朱希建立政治部,强化青年服务团,建立妇女工作队,开办训练班,抽调和轮训各团、大队的军官和士兵。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抗日救亡宗旨,激发士兵抗日爱国热情。在我党影响下,朱希、汪鹤松部队纪律严明,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一定提高。

韩昌恢复党籍之后,即在“江南游击区民众抗日救国会”中,发展了积极分子沈英杰、徐阿珍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于1938年10月成立党小组,韩昌任小组长。与此同时,徐洁身两上皖南,要求新四军军部调派干部,并选派了许多进步青年到新四军接受培训。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日本侵略者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力对付敌后抗日力量,以维持其占领区。江南日军从华中抽调大批军队,残酷扫荡东线江浙边境游击队,先从上海市郊开刀,继而扑向苏嘉公路以东地区。

此时,太湖程万军部在日军胁迫下屈膝投降。同时,日军通牒朱希,逼其归附,遭到朱希拒绝。于是,敌人开始调集兵力,日夜打造船只,决定用武力来消灭朱希部队。为避敌锋芒,减少损失,朱希决定部队撤退。

1938年11月9日,盛泽、吴兴、南浔、嘉兴、桐乡、崇德、杭州、武康等据点日伪军近万人,配以飞机、汽艇,分多路扑向朱希部队驻地。10日,敌人相继侵入严墓、新塍、乌镇,并四处追踪朱希部队。

朱希在敌人进攻之前,已率部撤出乌镇。但由于撤退前麻痹轻敌,准备不足,许多本地士兵眷恋乡土,不愿移走他乡,撤退时又没有及时化整为零,而采取大部队集合行动,结果队伍臃肿庞大,行动迟缓,至10日方撤至徐洪村。这夜,由于向导迷途,部队夜宿练市钟家

墩。直至次日清晨,朱希一查军用地图,始觉方向不对。正待下令退出却为时已晚,尾随之敌已从四面紧紧包围了钟家墩。

钟家墩是练市近郊的一个大水庄,北、西、南三面环水,仅东南、西北各有一条陆路通练市、善琮。狡猾的敌人没有直接从正面发起进攻,而是从两侧进行迂回包抄,他们用轻重机枪严密封锁东南、西北两条出路,派汽艇来回巡逻水面,并出动飞机轮番扫射、轰炸,使钟家墩完全变为孤岛。

11日上午9时许,各路敌人相继登陆。在迫击炮、掷弹筒、机关枪火力的掩护下,开始紧缩包围。朱希部队在仓促情况下应战,十分被动,但在朱希亲自指挥下,仍进行了顽强抵抗。许多士兵高喊“打倒鬼子”,奋不顾身扑向迎面冲来的敌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地形不利,兵力不易展开,朱希向西北、东南组织的几次突围均告失败。血战一昼夜,除副司令汪鹤松率一部分武装冒死冲出重围外,其余部队均被日军围歼于钟家墩。直接阵亡者八九百,另有部分队伍零乱溃散杭嘉湖各地,朱希本人也靠勤务兵拼死相救,用菱桶泗水才幸免于难。党员徐由整牺牲。

钟家墩一役,伤亡甚大,朱希率残部400余人退至孝丰整编。此时,徐洁身带着新四军干部、中共党员周达明(和康)从皖南新四军军部赶来。朱希即委周达明为参谋主任。同年12月,徐洁身、周达明介绍刘明重新入党。

1939年春节后,朱希为重振旗鼓,再次打开沦陷区局面,由汪鹤松率领100多人枪再度开到严墓。随来中共党员有周达明、刘明、韩昌等人,建立了党支部,由周达明负责。周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上政治课,讲抗战形势,教唱抗日歌曲,讲解游击战术,很快稳定了部队情绪,增强了抗战决心,得到上下官兵的信赖。

4月13日,侦察员报告:5艘日军汽艇从乌镇出发,开往南浔,中午将途经桃源阳和桥。汪鹤松立即亲自前去观察地形,与骨干一起研究战斗方案,下达伏击命令。我地下党同志亦不失时机地宣传、鼓

动、激发士气,战士们磨拳擦掌,决心为死难同胞报仇。吴江县政府常备队闻讯前来助战。部队在南北阳和桥之间的沿河两岸桑林设下埋伏,河西布置兵力100多人,河东50多人,在北阳和桥两端配置3挺机枪。正午12点,河面上出现了5艘满载日军的汽艇。当第一艘、第二艘汽艇驶进南阳和桥后,汪鹤松一声令下,两岸各种武器猛烈开火。艇上的日军猝不及防,被打得丢盔卸甲而无法回击。两艘汽艇中弹沉没,艇上日军及翻译近30余人全部丧命。第三艘汽艇尚未深入火力圈,就慌忙掉头逃跑,与后面两艘仓促靠岸。日军上岸后,在南阳和桥架起三挺重机枪,向东北、西北方向猛射,企图以火力优势压制游击部队。汪鹤松部队士气高昂,奋力回击,激战两个多小时,终于凯旋而归。这一仗打得日军心惊胆颤,直到夜晚才敢派人来打捞尸首,拖走被打坏的汽艇。从此,敌军再也不敢走这条航道了。

4月,周达明奉命调回新四军部队。5月,浙西特委为加强汪鹤松部队党的力量,派徐洁身、郑衡、李志良到该部成立特别支部,书记徐洁身,组织委员刘明,宣传委员韩昌。郑衡任政训处主任(负责与浙西特委联系)。政训处下设总务、组织、民运和宣传4个科,科长分别由徐洁身、刘明、韩昌、谢立衡(群众)担任。

阳和桥战斗的胜利,在群众中反响很大,部队很快扩编到2个营。至11月,党组织在部队和地方上已发展党员40多人,其中部队30多人。仅政训处就发展了庄雪英、徐加生、徐惠琴、汪群等5名党员。汪部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深感不安,活动处处遭受阻难。11月,在款项无着的情况下,汪鹤松通过吴江县县长沈立群,要求江南行署提供给养,行署趁机委汪以团长头衔,将其收编为江南保安第三团。党组织对汪的行动多方劝阻无效。年底,汪鹤松带一营和团部到溧阳整训。然而不久,团、营、连政治干部全部被撤换,军事干部配备副职,整个部队被苏南国民保安司令部控制。留下的第二营由郑衡带领,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损失很大。上级指示大部分党员转移浙西,韩昌一人留在严墓地方继续开展工作。

【严墓区党支部的建立和发展】 1938年底,浙江省委为了统一领导浙西党的斗争,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决定建立中共浙西特委。1939年2月,以顾玉良为书记、朱辉为组织部长、徐洁身为宣传部长、张之华为妇女部长、黄炎为青年部长、彭林为军事部长的中共浙西特委成立。韩昌的组织关系隶属浙西特委。

韩昌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党员,1939年5月,成立了严墓区第一个党支部——东水家港支部,沈英杰任书记。不久,又建立了李家浜党支部。1940年2、3月间,在三民浜成立了严墓区委,韩昌任书记。5月,建立水家港妇女支部。同月,韩昌奉命调回浙西,由沈英杰负责区委工作。8月,塘北区委书记赵子扬(王士烈、杨永源)调到严墓担任区委书记。赵子扬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11月,建立茹菇垞支部,盛友鹤任支部书记。

1940年10月,中共浙西特委以京(南京)杭(杭州)国道为界分路东特委(又称浙西北特委)和路西特委,吴江县严墓地区原属浙西特委领导的党组织,改由路东特委领导。11月,路东特委机关和吴兴县委机关同设在严墓水家港,由担任小学教师的区委书记赵子扬和开烟纸店的吴兴县委书记史烈青负责掩护开展党的活动。驻严墓的有特委书记朱辉,吴兴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贝纹和特委交通陈浩天等人。

第七章

在日伪顽夹击中坚持斗争迎接胜利

1940年春,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吴江县知事公署也改称为吴江县政府(汪伪)。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迫降、诱降,国民党政府执行分裂、倒退、反共的投降主义路线,县政府内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日益猖狂。他们监视干扰共产党人和抗日力量的活动,形势向不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然而浙西和特科的同志在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工队及其严墓农村逐步建立了立足基点,他们利用这一有利因素,坚持敌后斗争,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

第一节 严墓区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1939年秋,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加紧反共,下令政工队再次上天目山集训,意在消灭政工队内共产党的力量,彻底改组省政工队,使之成为反共的工具。鉴于这一情况,浙西特委指示,在浙西公开的群众工作已难开展,政工队牌子不宜再用,只有全部转入地下,党的工作才能继续进行。为此,党组织采取相应对策,组织政工队内的党员撤离、转移或以各种公开职业作掩护,转入秘密斗争。转入地下活动的吴兴县委书记王子达(虞路文)与在严墓的中共党员庄绍桢取得联系,此后庄绍桢归浙西吴兴县委领导。

1940年夏秋,中共党员王化鹏(王听涛)、朱闻礼(曾又余)、陈友群等先后从浙江省政工队转入吴江县政工队,并在瑾下浜建立中共浙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朱闻礼,组织委员庄绍桢,宣传委员王化鹏。10月,庄绍桢、王化鹏通过严墓青年凌文华、邵耕耘(邵哲)、姚

之英(恢元)、沈步青(沈波)等创办“严墓青年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进步书刊，出版油印快报《正义》和《严墓新闻》。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凌文华、邵耕耘、姚之英入党。11月，建立严墓镇党支部，支部书记王化鹏，组织委员凌文华，宣传委员邵耕耘，青年委员姚之英。此外，党员同志还深入农村，王化鹏自己动手编写《识字课本》，举办“识字班”，谱写抗日歌曲，不但提高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而且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得到群众的拥护。

特支书记朱闻礼去严墓农村，与区委书记赵子扬、当地党员沈英杰、盛友鹤、沈阿五等一起在算墟、竹里、志和、白区、太洪5个乡，发动青壮年农民组织“联村会”。他们先是采用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古老方法，联络感情，组织群众，然后开办夜校，地下党员和民运骨干自己动手编印课文，用浅显道理启发群众的觉悟，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如用“东一村，西一村，村村有男人，村村有女人”的简单课文，启发大家，为什么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却要受小日本的侵略，深受日寇烧杀抢掠之苦？如果我们住在东一村，西一村占全国人口总数80%以上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农民组织起来，难道还不能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大地吗？用“江南有了新四军，华北有了八路军”等通俗易懂的课文，给群众讲解抗战形势，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来上课的青年很多，热情很高。农民们纷纷要求参加联村会。1940年冬，时机成熟，区委书记赵子扬在阳和桥道院召开“联村会”成立大会，沈英杰任干事长，盛友鹤任副干事长，沈阿五任干事。“联村会”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抗日的任务。他们办夜校，教唱抗日歌曲，策划减租减息，为贫苦农民说话撑腰，深得群众拥护。“联村会”共发展会员400多名。

早在1939年7月，为驳斥汪精卫卖国投降的谬论，教育青年明辨是非、树立抗战信念，肖心正、马希仁等创办了期刊《敌忾》。他们仿照《生活周刊》、《上海周报》等编排格式，用匕首投枪式的短文，以锐利隽永的笔调，深入浅出地阐明抗战理论和必胜信念。肖心正任

编辑,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都写了抗日救国文章。然而,《敌忾》只出了一期创刊号,因县政府顽固派的反对和从中阻挠,被迫停刊。1940年6月,改名《义旗》重新出版。1940年秋,金大鹏、肖心正等根据上级指示,设法联合了政工队在镇上演戏,大唱进步歌曲、冲破了沉闷的空气,受到抗日青年的普遍欢迎。然而此举引起了国民党的注目,认为青年集中行动,一定有共产党活动,何况那些歌曲和剧本都带有点红色。不久,政工队又在镇上召开“二五减租”座谈会,宣传减租减息,参加者有县政府、县党部、严墓区政府等各界代表及当地青年。会上县党部代表提出反对意见,双方展开激烈争论。地方士绅和国民党县党部纷纷攻击政工队搞异常活动,庄绍桢成为一大目标。

从1940年夏续办《义旗》刊物,到联合举办抗日宣传活动,再到召开“二五减租”座谈会,激起一阵宣传热浪,对推动青年抗日斗争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浪潮正在酝酿,吴江路东、路西两派地方势力趁机发起“倒沈(县长)”活动。他们叫嚷“县政府里有共产党活动”,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空气。县长沈立群颇感紧张,他面临被告发“容纳异党分子”而受查办的危险。所以不得不一再申言,在他的县政府内没有发现共产党活动,只把引起风波的原因归到公开过新四军身份的庄绍桢。到10月间,传闻天目山浙西行署有吴江“黑名单”之说。江南行署又下令撤销苏南各县政府所属政工队,改为青工队(青年工作队),属县党部领导。于是庄绍桢被撤职,政工队被解散。由此,浙西同志失去了立足吴江的基点。为了争取把他们留下来,金大鹏设法担任青工队长,使政工队原班人马进入青工队。

1940年11月,“黑名单”之风似乎已经过去,马希仁、金大鹏、肖心正等人又举办了“税务人员训练班”。这个班由马希仁发起。他深感国民党作风腐败,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更由于日军的入侵,许多亲朋好友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他想通过办这个训练班帮助更多失

业青年得到参加抗日的机会,施以政治训练,培养一批青年税务员,改善税务人员的素质和解决一些人的生活出路问题。而我地下党则希望通过“税训班”培养抗日力量,党员同志极力怂恿马希仁办好训练班。他们积极活动,招收了20多名青年学员。金大鹏同青工队(原政工队)浙西方面的朱闻礼、王化鹏商量,聘他们为教师,得到他们全力支持。因为双方的想法不谋而合,都想通过训练灌输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求民主、求进步的意识,课程安排除会计知识外,着重讲解时事政治形势和历史知识。教材的内容完全取材于《上海周报》、延安的《解放周刊》和《民主解放运动史》等革命刊物。开办“税训班”的风声,自然被反共势力获悉,路东凌元培(三青团吴江负责人)于某日突然来实地“视察”,向县长兴师问罪,认为“税训班”是共产党活动。此时,中统巡回教育团在严墓建立了吴江办事处,进行反共和收集我情报活动。为防止不应有的损失,党组织决定缩短训练计划。一个月后,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四乡稽征点,随同地下党开展民运工作。

第二节 吴江三区抗日斗争基点的建立

1940年初,三区区长张品泉被日军杀害。金大鹏、肖心正利用沈立群安插培植亲信的意图,推荐思想进步与我党关系密切的爱国青年俞清志当区长,打算把三区发展成一个抗日活动的基点。此举虽遭到县政府内一班争权者的非议,但因俞清志是县长沈立群从上饶带来的唯一青年军事骨干,最后还是决定委任俞清志为三区区长,兼三区抗敌自卫队区大队长。3、4月间,俞清志带着从县常备队中挑选出来的30多名精壮战士,组成三区自卫队,并配备了特务长、文书及两名区助理员,走马上任。当时,三区有六个乡,离敌占区重镇盛泽不到5公里,中间只隔开一个宽阔的西白漾,乡间常有小股敌人前来骚扰,一些乡保长与盛泽镇的伪组织相互勾结,催收军粮,农民的恐日心理比较严重,情况十分复杂。

俞清志上任以后,积极革新区政,不准乡、保长为日伪军征粮,违者作汉奸论处,并建立了情报线,掌握日伪军动态,收到了良好效果。1940年6月,俞清志得到日伪将袭扰三区的情报,立即与新滕张鹏飞部队取得联系,互相呼应配合。俞清志将部队悄悄拉到茅塔乡,三个班的兵力分散潜伏在桑林屋群之间。傍晚,敌人的汽艇在圣塘港靠岸,50多个日伪军“神气活现”地登岸。走上大溪桥时已是黄昏,敌人全部暴露在淡淡月光下。俞清志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发,日伪军慌乱下桥后退,五六个人跌进河里,盲目滥射,枪声一夜不绝。而俞清志早已带着部队安全地回宿营地了。第二天傍晚,又捕获了盛泽派来刺探军情的诨号“劈牌位”的汉奸曹永生,经上级批准,就地枪决。由此极大地鼓舞了队员的抗日信心,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护,开创了三区的新局面。

1940年冬至1941年初,三区青年中曾开展了一系列小规模武装抗日活动。1940年12月12日,发生了俞清志等到盛泽敌占区击毙汉奸叶冠吾一事(叶系安清同盟会会长,该会以青帮流氓为骨干,是日本宪兵部队豢养之鹰犬,简称“安清会”)。因俞清志革新区政的行动与原有旧势力逐步发生矛盾,俞清志为有力打击汉奸的气焰,排除旧势力的干扰,使三区走出一条抗日路子,决定除掉叶冠吾。我党情报部门的同志为了推动俞清志坚持抗日,为了把三区工作抓起来,作为一个活动基点,也大力支持他杀叶。12日下午,金大鹏和沈文潮找俞清志了解杀叶的准备情况,得知俞已派出潘逸溪去盛泽,金担心力量不够,于是3人也随后赶去。夜7时许,由盛泽青年许永蓼带领,来到毛家弄叶宅。俞清志、沈文潮两人把门,金大鹏和潘逸溪上楼,对叶各开一枪,将叶当场击毙。从进门到脱离现场,前后不过一分钟光景。杀叶之举在青年中产生强烈影响,连从来不拿枪的人也要求亲自杀敌。1月23日,县政府办事员朱见华单独潜入盛泽,在闹市举枪向一名日军伍长射击。2月26日,俞清志又到盛泽,从容踏进伪区公所,当众击毙了伪区长简汗青。在日军严守的据点中,

接连发生日伪汉奸被杀事件,使敌人惊恐不安。县政府内的青年为此受到鼓舞。常备中队长张贻翼在日军扫荡逼近时,不顾敌众我寡,握一挺机枪,迎敌阻击,掩护大家转移。尔后,他又去梅堰,带了六七个青年在公路上伏击日军的车辆,取得了打死打伤日军5人的胜利战果。

第三节 淀山湖地区的开辟

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贯彻党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指示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团长叶飞的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向东路地区挺进。5月初,六团与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三路军(梅光迪任司令、何克希任副司令)会合,沿用“江抗”番号,并成立总指挥部。为了加强党对东路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了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任书记。6月底,“江抗”总指挥部根据陈毅电示,去苏州、常熟以东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江抗”于7月23日到达青浦东乡,同顾复生的三支队会合,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中共青浦工委书记顾德欢介绍了上海外县的情况。当日,“江抗”在顾复生部配合下奔袭在上海西郊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大队姚友莲部。“江抗”一部在追击搜索途中,袭击了日军虹桥飞机场。

1940年4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决定派谭震林到东路组织军政委员会,全面领导东路地区党、政和军队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坚持东路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的民众运动,扩大抗日阵地,一直发展到京(南京)沪、沪杭、苏嘉三条铁路全线,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与此同时,成立了“江抗”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上海外县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全部由江苏省委移交给“江抗”东路指挥部领导,从此东路地方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

7月,东路特委决定建立昆嘉青中心县委,顾德欢为书记,谢永

康、周达明、吕炳奎为委员,统一领导黄浦江以西各县(包括青浦、吴江、松江、嘉定、昆山)的工作。中心县委着手抓外县的地方建党工作。10月,青昆嘉中心县委改名为中共淞沪中心县委,仍由顾德欢任书记,增加金子明为委员。与此同时,经“江抗”东路指挥部决定,以“江抗”三支队一部为基础,加上上海、青浦等地来的一批青年学生、工人,组成“淞沪游击纵队”(青昆支队),顾复生兼任司令,周达明任参谋长,吕炳奎任政治部主任。该部的任务是:向铁路以南发展,开辟淀山湖地区。恢复青东地区,打通与浦东的联系,将浦东、浦西连成一片。

中心县委书记顾德欢负责地下党的工作,并负责领导和派员去吴江,昆南、松江等地,开展地下党的点线工作。为了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顾派刚从“江抗”司令部训练班回来的夏明辉(夏光表)去青西及淀山湖以西的吴江地区开辟党的点线工作。夏到吴江后,以在平望西塘街“大生杂货店”作伙计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40年10月,夏明辉经上级批准,发展金佩扬入党。1941年初,夏明辉到黎里,在金佩扬住的西王家弄口开了家“大同烟杂店”,作为落脚点。同年冬,“大同”店址改由金佩扬的爱人和姨妹摆香烟摊,作为联络点。

“江抗”东路指挥部为了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确立了肃清反共势力、积极向外扩展的行动方针。1940年冬,“江抗”淞沪游击队恢复青东地区的工作,开辟昆南淀山湖地区。通过打击伪匪、镇压汉奸,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些抗日自卫队和地方常备队。

1941年1月底,日伪在浦东进行持续一个多月的大“扫荡”。4月,正当淞沪游击纵队与浦东部队准备在松江天马山会合时,国民党“忠救军”(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袁亚承(阮清源)率教导团第三团及淞沪行动总队1千余人进犯淀山湖地区,袭击驻青浦谢石关村的淞沪游击纵队一部。淞沪游击纵队遭受重大损失,参谋长周达明等壮烈牺牲。连接浦东、浦西的计划未能实现,淀山湖地区的抗日斗争

转入地下。

第四节 忠救军楔入，党组织被迫撤离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翌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第三战区出动了“忠救军”的三个教导团和三个行动总队，分三路向苏南东路地区推进，妄图消灭我抗日主力。以阮清源为司令的苏嘉沪挺进纵队（教导第三团）开进吴江东部，流动于芦墟、莘塔一带。国民党顽固派还指使盘踞此地的残余势力，进行暗杀破坏活动。吴江县政府内的顽固派也蠢蠢欲动，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

1941年初，“联村会”上书县政府，要求实行“二五减租”未得通过，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搜捕，“联村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赵子扬、沈英杰等被迫离开严墓，隐蔽他乡活动。3月，沈英杰和邵耕耘由浙西特委书记朱辉介绍，到新四军六师苏南行署干部训练班学习。1个月后，沈英杰被分配至江防局，邵耕耘去苏北解放区。

2月，中共海北工委海盐工作团团长马雨亭（化名蔡允中）从海北工委到路东特委，转到吴江县三区任大谢乡事务员。

3月，驻严墓的浙西路东特委和吴兴县委机关，分别撤向浙江的南浔和双林。赵子扬、俞应华、朱乐琴、姚之英等先后去三区，加强了三区的力量。秋，赵子扬、蔡允中建立大谢支部，支部书记周炳发，组织委员丁少荣，宣传委员沈沛乾。为改变三区局势和对付猖狂一时的日军扫荡，蔡允中等人提出一套各村联防的办法，收到明显效果，农民生活稍得安定。在此基础上，党组织采取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方法，组织群众办夜校，讲解抗日形势，教育群众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敌人。王化鹏等配合形势创作了《快点组织联村会》、《干一场》、《保家乡》、《消灭鬼子兵》等抗日歌曲。党员还深入农村调查，组织学习老区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在一些乡村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迫使地主、富农同意减租。同时，党员

还注意做好统战工作，耐心教育倾向抗日的乡、保长为为我党服务。王化鹏曾布置沈步青等结交庄浜的保长，使他做好联村会的串联工作，为地下党提供物质上的帮助，遇有敌情通风报信。后来地下党员被迫撤离三区时，这位保长还帮助办理了“良民证”。

1941年3、4月间，大批“忠救军”涌入吴江，日伪军频频扫荡。新任县党部书记长王逸芝与“忠救军”紧密勾结，要彻底清查吴江异党活动。县长沈立群深感紧张，但他为了个人的前途、命运又矢口否认本地有异党活动。针对这一情况，原青工队员全部撤至三区，金大鹏任区大队副，王化鹏任区指导员，朱闻礼任区分队长，各乡事务员、干事均由党员担任。隐蔽活动的区委书记赵子扬到大谢乡接替蔡允中任乡事务员，蔡允中任区中队指导员。

“忠救军”进入严墓后，四处布设暗哨，搜捕共产党人。转入农村活动的庄绍桢，因身带《方志敏、瞿秋白传略》被捕。肖心正为此受牵连。庄绍桢熟悉地形，夜间趁敌不备逃脱，肖心正由沈立群保出。接着严墓镇党支部组织委员凌文华被捕，税务局长马希仁为之觅保获释。马希仁因此被撤职。迫于形势逆转，苏浙特别支部书记朱闻礼决定，王化鹏、沈步青等人转移去新四军六师。就在他们离开三区驻地、准备通过新塍转达解放区的途中，突然遭到鬼子“清乡”部队的搜索，不幸被捕。因关押地点不明，党组织无法营救。后沈步青越狱，王化鹏因伤重无法行动被日军杀害。情况危急，上级指出：吴江的组织已暴露，必须立即撤回上海。朱闻礼、陈友群、沈步青、姚慕征等奉上级指示去新四军六师，金大鹏、肖心正则先后去上海。

8月中旬，已避去上海的肖心正，因未了账目需要清理，又回到严墓农村，与沈文潮、虞仞千同住瑾下浜农民家。肖向他们传达了上级对形势的分析，并相互交换了情况。20日，即肖回严墓的第7天清晨，“忠救军”逮捕了原税训班学员袁璋。肖闻讯赶到镇上营救无效。“忠救军”得悉肖的行踪，密谋杀之。傍晚，肖从镇上回农村宿地，途中听到枪声，谨慎地折回镇上一个熟人家投宿。当夜12时

左右,忠救军便衣多人,突然敲开沈文潮、虞仞千的房门,追逼他们交出肖心正。沈、虞二人从容不迫地回答:“不知道。”特务翻箱倒柜大肆搜查,一无所获。遂将沈、虞绑架而去,从此杳无音讯。解放后,获悉沈文潮、虞仞千当夜被敌人用小船押到南浔马腰的桑田,秘密杀害。党和政府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11月,沈英杰在江防局,因日伪大清乡无法隐蔽而南归,到南浔找到特委书记朱辉,组织关系被介绍到驻新塍的嘉兴县委罗希明处。后罗希明撤走,组织关系交沈如淙领导。严墓一带的党员由沈英杰负责。

12月,“忠救军”特务队突然到大谢乡逮捕区委书记赵子扬。蔡允中闻讯带着区中队赶来,反扣特务而放走赵子扬。第二天,“忠救军”督察长李应龙亲自赶到三区,威逼交出蔡允中。此时俞清志外出未归,代理区长顾平(原“武抗”会员)主动承担押解任务,途中放走了蔡允中。赵子扬、蔡允中及姚之英经组织安排去苏南解放区(1944年3月,姚之英在锡南被捕牺牲,时任新安区委书记兼区大队长,年仅24岁)。至此,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外来党员全部撤离吴江,大谢支部暂时失去联系,严墓农村党员也都隐伏下来。此时,严墓、坛丘的党组织划归嘉兴县委领导。

第五节 日伪清乡 坚持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巩固其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在1941年6月18日与汪伪政府签订了各得其益的《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规定由日军担任“清乡”中作战及封锁事项,汪伪担任政治工作,伪军、伪保安队、伪警察均由日军指挥调遣,作战和封锁经费各自负担。7月1日,日伪宣布在苏、常、太地区开始第一期“清乡”。同时,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在苏州成立。吴江被列入第二期清乡,伪县政府按照伪省政府的训示,所谓“清乡须从自户清起”,纷纷活动起来,联络全县军警、商、政各机关团体,组织“吴江

协社”。1942年7月,吴江成立了特区署,并划出7个清乡区,委任各区区长。不久,又成立了吴江特别区封锁管理所和保甲户口编查委员会。9月,特区警察局实行新编制,各清乡区分别成立警察署,归总局直辖。10月,日伪又对吴江实行扩展清乡,分别设立大庙港、吴淞、庄前、分水墩、西浜5个大检问所和大咸港、大善桥2个小检问所;在沿太湖的荡(塘)前圩—吴淞—严墓的太史桥划出140多里的封锁线,并修筑了19座碉堡。一场残酷的清乡运动就此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

1942年2月21日,1000余名日军以扫荡“支那兵”为由,分乘100余艘机船,以海军陆战队的小炮艇为前导,在飞机的掩护下,分别袭击芦墟、莘塔、北厍、周庄等地,历时20天之久。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21日晨,1000多日军首先在芦墟南栅登岸,抓了300多人,集中在义兴祥布店场上,10多人被溺死在东古荡。23日,又将72名无辜群众押往张家坟,一个个用刺刀戮死。芦墟这次遇难有200多人。

21日上午,数百名日军蜂拥至莘塔。日军在汉奸的引领下挨家挨户搜查,将所有青壮年分别驱赶到北酱园、南水阁凌民义庄及南栅图坟山三处囚禁。有16名青年被杀于北酱园后田里。关押在南栅的,有32人被杀,然后放火,尸、屋同焚。另有12人被串绑后用机船载至芦墟交界处,推入羊沙坑荡溺死。其余100多人由维持会出面以2000元贿赂翻译,才幸免于难。莘塔枫字村,在这次扫荡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这个仅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就有16名青壮年被杀死,连30多名来吃喜酒、走亲拜年的外村人也同时遭难。2月29日,狂风大雨,100余名日军包围了沈家浜和南庄,将青壮年全部赶到圣帝庙,枪口、刺刀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日军把村民吴金坤吊在大梁上严刑拷打,并用烧红的链头塞入其棉衣领子里,皮焦肉烂,惨叫声声,最后丧心病狂的日军将群众赶到齐膝深的水里,用刺刀捅死17人。莘塔镇及附近的村庄被害群众300多人,烧毁房

屋 300 余间。

日军进犯北厍后，故技重演，一路洗劫，烧杀淫掠。后从柳锦明家荷花池里扒出来的尸体就有 200 多具，据目击者云，死者上身衣服都被剥光。少数人穿长裤，多数只穿一条短裤，而旁边一个池塘里全是衣服。天气虽冷，但是因为尸体多，又挤压在一起，已开始发热腐烂，满池血水。扒上来的底层尸体已无法辨认，家属只能凭其所穿裤子认领，可谓惨极。

在蛇蛟港村，日军还逼迫群众下冰冷的东长荡，捞取所谓发报机和枪支。荡阔水深，风急浪高，人们摸了半天一无所获。20 多名群众当场死于兽兵的屠刀下。在金家湾莲荡里，20 多名村民被押上农船，日军将机船开足马力，向农船拦腰猛撞，船被撞沉，村民纷纷落水，亲友见状急忙划船抢救。日军狂笑，举枪射击，团团血水在荡面泛起，30 多人丧生。

日军兽行数不胜数。除上述以外，还开水浇、沸水煮、用水烧、活埋等等。妇女的厄运更是罄竹难书。在这 20 多天的涂炭中，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精确统计，有案可查的就有 2373 人。

此外，严墓、平望、黎里等地也遭日伪军频频扫荡。

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中，我地下党组织顽强地坚持斗争。1942 年 4 月。根据斗争需要，嘉兴县委沈如淙组建了中共新塍区委，由区委委员毛国荣负责联系严墓党组织。同时，区委书记沈如淙受命来到吴江恢复大谢支部。沈通过顾春泉（顾阿二）找到仲春山，摸清党员情况，然后恢复了支部，仲春山任支部书记，委员有钱福宝、潘天扬、顾春泉，党员有顾阿坤、沈沛乾、沈正华等。他们以大谢乡为基点，在平望、盛泽、南麻、梅堰、震泽等地秘密发展党员，扩大活动范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年底，因日军大清乡，国民党县政府撤至安徽省宁国县云梯镇。1943 年 1 月，“忠救军”嘉兴站接到总部密电，限其在 24 小时内处决俞清志，不得有误。密杀令交到常驻坛丘的李振琪手中。他获悉俞

清志将亲自携带三区田亩交捐的钱款,由武装班护送去后方解交沈立群。但形势紧张,俞不打算去了。于是李振琪申通前任三区助理沈峙山,鼓动俞去后方。1月10日上午,沈邀俞坐船同去严墓,李振琪集合全组人员,在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并派人做眼线,从坛丘一直跟踪到严墓。船一靠岸,沈峙山就借故走开,俞清志走到西汇街上时,遭到突然袭击,拔枪不及,中弹牺牲。解放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43年4月,中共浙西党组织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沈如淙任嘉兴特派员,负责联系沈英杰、盛友鹤,并且领导该地区的工作。青云水家港支部、青云水家港妇女支部和桃源姚浜党小组由沈英杰单线联系;青云茹菇埭支部、青云仁荡坝支部由盛友鹤单线联系;坛丘的党组织由沈如淙直接领导。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归浙西党领导的党员共有49人。

另外,在1943年5月,薛天然受苏中二地委书记章蕴派遣从苏北根据地到震泽开展工作。1944年春节后,薛天然打入伪特工“政治保卫局”,任横扇小组组长,驻大庙港,代号王公馆。他上任后即将原伪特工横扇小组人员全部遣散,邀进步青年龚积桐、凌文华等人一起活动。并在吴县的东山、西山筹建特工小组,使之与大庙港成倚角之势。薛天然在庙港活动20多天,被吴江伪特工传去关了禁闭,获释后去蚌埠活动。薛临行前在震泽布置凌文华、龚积桐等在严墓搞汪伪特工外围组织“江枫分社”,然而未搞成。冬,薛又回到震泽,获悉“忠救军吴嘉湖行动总队”从浙江运动到太湖边,薛利用与该部总队长金家骧(金阿三)的关系,打入该部任政治部副主任,做争取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第六节 淀山湖地区的地下斗争

1941年5月,新成立的中共江南区党委(谭震林为书记)决定把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顾德欢任书记,姜杰、金子明、吕

炳奎为委员。特委机关设上海。特委领导范围自京(南京)沪铁路以南、苏嘉铁路以东、整个沪杭铁路直至杭州湾之间,包括上海市郊九个县(崇明除外)和江苏省昆山县、吴江县及浙江省的平湖、嘉兴、嘉善等县。由于其中隔着黄浦江,又划分为浦东,浦西,浦南,浙东等地区,吴江县属浦西地区。这一大块地方,当时只有浦东有武装,其他十多个县只有党的秘密工作,或正处在从游击战转入秘密工作的调整过程中。

【淀山湖工委的建立和发展】 1941年4月,日军发动了宁绍战役,国民党驻军一触即溃,宁波、余姚、绍兴等地先后沦陷。江南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指示路南特委一方面坚持浦东进行反“清乡”斗争;一方面把浦东党能够掌握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有准备地渡海挺进浙东敌后,协同当地党组织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从6月到9月,浦东党的两支武装力量分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

1941年夏初,中共路南特委决定建立中共淀山湖工委,诸敏为书记,周奋、林岑(林大良)为委员。工委在青浦北门外陈、杨家桥建立,分管昆山南部、青浦西部、吴江东部、松江西部的党组织工作。工委书记诸敏主要负责与吴江县黎里、平望的夏明辉、金佩扬保持联系。

此时,吴江宪兵分遣队情报组(简称“宪特工”)在吴江城县银行内成立,是日军直接掌握的特务组织,隶属“苏州宪兵本部”,不受地方驻军领导。宪特工设思想、情报两个系统。其中思想系统是针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特务活动,方式极为秘密,都以企业名称对外。如芦墟组称“宣德商行”,黎里组称“施承记米行”、盛泽组称“中兴公司”。情报系统经常配合日军下乡扫荡及关卡检查,捕捉百姓,敲诈勒索,抢劫人民财产,并收集游击队的情报。与此同时,吴江县城大同客栈内成立的汪伪吴江特工站也迁至县府街6号,下设侦行股。在震泽、盛泽、同里、平望等地设立情报员。

淀山湖工委正是在日伪加紧对上海外县进行“扫荡”、“清剿”，妄图一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的困难形势下建立的。为了更好地“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淀山湖地区党组织转入隐蔽状态，地方工作亦由公开转入隐蔽。这时，党的组织秘密向吴江平望、黎里发展。夏明辉在黎里镇以“大同烟杂文具店”为掩护，开展工作。同期，顾德欢派遣原青东区中队队长徐友基（即徐永坚，化名李复生）到黎里“大同”商店，以夏明辉朋友的身份住下。徐后去平望以摆摊为职业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岛”已不存在，敌人对上海外县的清乡“扫荡”也开始行动。上海外县我党的地下斗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在此前后，中共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化名朱明之）到吴江县黎里镇领导党的工作。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在上海找党员金佩扬谈话，在场有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顾德欢传达了上级的方针，指出：吴江县地处大三角（京沪杭）和小三角（苏嘉湖）交界处，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要向东、向南、向上海、向太湖和淀山湖前进，吴江是个必须开辟发展的地区。同期，诸敏在松江以香烟店股东身份为掩护，工委机关移到松江景家堰附近的一间民房里，许也萍（陈慧珊）为工委秘书兼交通。工委派金佩扬与人合股从平望到松江开了条航船，以贩运香烟为掩护，搜集情报，摸清水路交通情况，便于对地下党联系和领导。同时，还与苏嘉铁路工人交朋友，了解日军在交通要道平望车站的调动情况。1941年10月，夏明辉在黎里发展了连一祥（丁庠一）入党。尔后，夏明辉离开黎里去浙东游击队（后在日军大扫荡中被捕，夏坚贞不屈，被日军放狼犬活活咬死）。同期，浦东党员张荣生（陈企周）由淀山湖工委派到黎里，以金佩扬香烟摊为联络点，以合做贩运生意为掩护，负责吴江的党工作。

1942年5月，日军向浙西大举进攻。上海外县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

方针,不便于开展群众性的公开活动和武装斗争。到1942年春,四明山一带由于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武装斗争发展很快,有党领导的武装部队1000多人,建立了敌后游击根据地。7月,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区党委,8月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派谭启龙任区党委书记兼浙东游击纵队政委,何克希任司令员,顾德欢任区党委宣传部长,吕炳奎为敌工部长。并从苏中调大批干部去浙东充实各级领导力量。8月,撤销了路南特委,改设中共浦东地委,划归浙东区党委领导。浦东地委机关暂移浙东,姜杰为地委书记,朱亚民、金子明为地委委员。10月,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调浙东工作,委员周奋被派去青东组织武装斗争,林岑接任淀山湖工委书记(一说淀山湖地区县级特派员)。1943年初,林岑化名陈鹤年到吴江,与陈企周、金佩扬等一起在芦墟镇开设“汇丰烟纸店”为掩护,领导淀山湖地区的工作。1943年1月18日,日军以6千之众,水陆并进,猛犯吴江县路西地区。3月,林岑、陈企周、金佩扬第一次去浙东,在镇海向中共浦东地委书记姜杰汇报工作。9月,浦东地委要林岑、陈企周、金佩扬第二次去浙东区党委,芦墟“汇丰”商店关闭,同去的有金掌华、陈棣华。吴江工作由中共青东工委委员洪峰负责,洪到黎里与党员连一祥接上组织关系。

【浦西工委的工作】 1943年底,淀山湖工委与青东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浦西工委。陈正之任书记,陆文杰、洪峰为委员,洪峰负责吴江地区的工作。主要任务是:隐蔽待命,收集接转情报,进行策反工作,着手在浦西地区开辟和恢复游击区,并派出干部去各地开展工作,在斗争中逐步培养积极分子,为党组织的发展输送后备力量。年底,洪峰离开吴江,吴江的工作由徐友基负责领导。

浦西工委建立后,工委把工作重点仍放在青西淀山湖地区。1944年2月,姜杰调浦西工委书记陈正之、浦西工委委员陆文杰和党员李毅(李尚同)到吴江,金佩扬从浙东调回,一起在黎里镇西北栅城隍庙滩的秋禊桥西堍开设饴糖坊为掩护,领导黎里、平望、芦墟、

北厍及松江北部等地党的工作。同期组织一批地下党员以贩运粮糟（饲料）为掩护，与松江北部及青浦西部地区的党组织秘密进行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淞沪地区反清乡斗争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工委由于在斗争中比较注意政策和策略，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惩奸除恶，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在对待顽伪敌人方面也区别情况，分别对待，采用分化瓦解的方法，使许多伪方人员向我靠拢，扩大了统战面。与此同时，原青昆支队的部分骨干也陆续返回青东组织抗日武装，不断主动出击，打击日伪顽势力，粉碎了敌人清乡的阴谋。

1943年5月，在吴江县平望地区搞地下活动的徐友基（徐永坚）奉命到昆南地区活动，他和在那里工作的陈杰等组织一支50多人的抗日队伍，坚持在昆南地区开展武装活动。8月，顾德欢的通讯员王友生从浙东返回青浦组织游击小组，开展武装斗争。浦西地区各方面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后，1944年6月，中共浦西工委决定建立浦西支队，陈正之兼任支队长，徐友基任指导员。10月，陈正之离开吴江去昆山。陆雪林离开吴江去青浦，领导青东8个党支部的工作。吴江工作由金佩扬统一领导。在这期间，吴江地区发展了一批党员。

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恢复和发展，鼓舞了浦西人民抗击日军的信心和决心，为迅速打开该地区的新局面、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七节 在汪伪特工站的隐蔽斗争

1943年春，中共华中局城工部上海学委派遣党员刘建民（化名刘进才）到吴江，打入汪伪政治保卫局苏州支局吴江站情报课，任情报课长，后调吴江站同里组任组长。1944年初，中共党员俞树芳（化名俞林）由华中局城工部上海职委派遣，打入政治保卫局吴江站情报课任“情报编审”；不久，调吴江站同里组为内勤组员；后来又

江站盛泽组任组长。

刘建民、俞树芳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同班同学，于1941年末和翌年初先后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在该校毕业。中共江苏省委所属党组织要求毕业的党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谋求公开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刘建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于1942年秋以公开报考的方式，打入汪伪特工组织特工总部浙赣皖闽四省行营特工训练班，去杭州受训。组织上把刘的党组织关系交给俞树芳联系。1943年春，刘接特工总部命令，调入汪伪政治保卫局苏州支局（又名江苏实验区）吴江站情报课工作（地址在吴江县城县府街6号，对外称“吴江6号”）。

刘、俞在吴江的党组织关系仍由中共上海市委职委系统负责人孟祥熙、钱柏荪直接单线联系。为了便于工作，孟祥熙派党员季沅（女）到吴江联系刘建民，接过组织关系。1945年初，又由中共苏州工委王中一负责单线领导，与吴江党组织不发生关系。苏州工委派党员王立到吴江接上刘、俞的组织关系，每月联系一次。俞、刘把吴江特工站的组织分布和吴江各区的组织情况、有关汪伪吴江警察局特高组的一些情况、吴江各区特工组送来的情报、在江浙交界一带和太湖周围活动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情况以及其他警备部队、特务组织和日军吴江宪兵队的活动等情况，及时提供给党组织。刘建民在任情报课长期间，曾巧取一份敌对我苏南地区进攻的情报资料，工作卓有成效。俞树芳在同里期间，还曾去同川中学代课，接触过一批青年学生，做过一些进步学生的工作。

第八节 配合主力，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形势有了根本好转。英、美加强太平洋战线对日军的攻击。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我国国内的抗战经过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转为局部反攻。

淞沪地区地处上海周围，是日伪顽的必争之地。根据形势发展

的需要,淞沪地区的抗日斗争方针已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转变为恢复扩大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发展武装斗争。工作任务是配合大反攻,夺取大上海。1944年11月,浙东区党委将浦东支队番号公开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同时把浦西的王友生部队改编为淞沪支队崂山部队,把黄友梅部队改编为舟山部队,把徐友基部队改编为黄山部队。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为发展东南各省的抗日斗争和准备战略反攻,重申发展东南的方针,决定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师长粟裕率领渡江南下,打开苏浙皖和浙西等地的局面。一师到达浙西天目山区,全歼顾祝同三个师后,先头部队继续向东挺进,抵长兴、湖州一带。1945年2月5日在长兴槐花坎温塘村召开苏浙军区成立大会,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为了配合作战,使淞沪支队与苏浙军区东进部队会师淀山湖,华中局决定淞沪地委领导中心和主力部队从浦东转移到浦西地区,并要淞沪支队沿淀山湖西进,和浙西大军的东进部队在吴江地区会师。2月17日,顾复生率领淞沪支队先遣部队横渡黄浦江,越过沪杭铁路,到达青东地区。与此同时,淞沪地委书记陈伟达通知金佩扬,要他在吴江东面,以灰色身份出面搞武装活动,扩大在青东的回旋余地。为此,吴江县调整了一些党员的布局,有的被输送去淞沪支队实习,经受锻炼;有的被派去搜集忠救军的情况;有的回家乡农村坚持工作,为开展武装活动作准备。

1945年1月,为开创淞沪地区新的局面,加强淞沪地区党的领导,中共苏中区党委派陈伟达、顾复生到淞沪地区以加强领导,陈伟达担任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治委员,姜杰改任副书记,顾复生为地委委员兼淞沪行政专员,朱亚民为淞沪支队队长,张席珍、曾平、金子明、陈正之为地委委员。淞沪地委确定了今后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把浦江两岸的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开创淞沪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3月,淞沪地委和淞沪支队,奉命从浦东转移到浦西活动。淞沪支队的3支主力衡山大队、泰山大队和华山大队,由陈伟达、朱亚民

率领,向西北顺利越过沪杭铁路,到达青浦观音堂。地委到达浦西地区后,为了便于军事上的统一领导和指导,将原在浦西地区活动的“青昆支队”的番号取消,编为“淞沪支队”番号。同时还改编了崂山、舟山、黄山三支部队。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大发展的需要,淞沪地委在浦西除了充实改编武装力量外,又重新作了工作部署。其中有:地委委员陈正之兼任昆南工委书记,徐友基为委员;金佩扬为吴江县委负责人,负责吴江县及淀山湖西部地区党的工作。同期,地委陈伟达、顾复生、朱亚民指派金佩扬去浙西天目山与苏浙军区联络。金在千金镇见到苏浙军区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清、三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和三纵八支队长陈业棠等,送交了淞沪支队的电台呼号和频率,从而恢复了苏浙军区和淞沪支队一度中断的电讯联络。

在这段时间里,吴江党组织先后发展了唐怡华、吴关龙等 10 人入党,多次派党员去淞沪支队汇报工作,带回《灯塔》、《北辰》、《新华简讯》等进步书刊,扩大党的影响。同期,中共平望支部建立,支书张振海,组织周纪铨,宣传顾其行。

1945 年 8 月 9 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中央决定集结在天目山区的新四军一师迅速行动,要求上海外县发动武装起义。淞沪支队决定与苏浙军区部队会师吴江县震泽一带后一起进军上海。为此,中共淞沪地委委员陈正之转达淞沪支队政委陈伟达、淞沪行署专员顾复生的指示,派金佩扬第二次去浙西。金在湖州南门外一个村边见到新四军一师独立支队杜大公政委,联系上浙西部队。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向天目山根据地发起进攻,新四军一师主力只能折回保卫天目山,会师未能成功。

经过 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传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9 月 11 日,上海地区举行受降仪式,投降的侵华日军指挥官中有吴江军司令官淞井太久郎,还有日军二十七、六十、一三三各师团,独立混成六十

二、八十九等 90 个旅团,共 165000 人。14 日以后开始解除日军武装。

吴江人民得悉抗战胜利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全城鞭炮声大作。人们蜂拥到街上,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全县各地纷纷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组织游行,欢庆胜利。男女老少来到日军驻地,痛骂敌军,掷石子、唾口沫,以泄胸中之愤。日军降下了悬挂在警备队等处的太阳旗,撤去了岗哨,陆续去苏州集中缴械,然后被分批遣送回国。吴江人民收集日伪遗留下的标语、口号、书籍、报纸、通讯杂志、电话和广播器材等,进行管制和处理。各镇日伪组织相继解散。吴江各地人民群众郁积多年的仇恨一下子迸发出来,展开了对伪乡镇长的清算斗争。一些在日伪期间为虎作伥、敲诈勒索百姓的汉奸、乡镇长受到严厉惩罚。盛泽镇枪决了汉奸戚松年;黎里镇枪决了汉奸迮和生;莘塔枪决了汉奸唐长福;芦墟沈龙圣(日伪苏州高等法院院长)被关押;伪县长冯一先、伪第一师军医处长叶百良、吴江日宪密探长胡兆麟、同里江枫社书记周之省等被通缉,日军二三八部队震泽警备队密探组长朱英、伪县保安大队长张伦等以汉奸罪被提起公诉。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扬眉吐气。

在这 8 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吴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历尽艰险,不少有志青年,纷纷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洪流。他们中有:七都乡叶港村孙世实,1936 年下半年在抗日救亡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北平市学联党团领导成员、全国学联负责人、中共湖北省青委领导成员、中共宜昌区委书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训练部部长兼湖北省队队长。1938 年 10 月,孙随《新华日报》从武汉撤退,日机向包租的“新升隆号”轮船轰炸扫射。孙光荣牺牲,年仅 20 岁。松陵镇女青年倪淑英,1937 年冬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冀中公安局秘书副主任、晋察冀公安局秘书主任等职。1943 年 10 月,在河北涞源反扫荡战斗中,身中 8 弹,壮烈牺牲,时年 27 岁。同里镇顾葆恒(戈白章),1937 年在汉口投身革

命,不久担任新四军十八旅政治部组织科长。1942年,随军转移途中病故,时年26岁。

吴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接着又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人民解放事业。

第四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5月)

第八章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组织的调整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但蒋介石企图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调集国民党军队向淞沪支队进犯,竭力阻止新四军解放上海。淞沪地委和支队坚决执行延安总部发出的命令,给蒋军的挑衅以狠狠惩罚,淞沪支队在七宝激战,取得胜利。

8月21日,中共中央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避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决定停止上海武装起义,新四军不再进入京沪沿线城市。据此,吴江县党组织及时停止了迎接新四军过吴江的准备工作。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和日伪勾结,一方面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一方面迅速调集几十万军队,占领战略要地,积极准备内战,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遂形成了日、伪、蒋大合

流,共同对付共产党的局面。蒋介石同时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8月16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文章,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指出:“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而蒋介石要坚持发动内战,制止的唯一办法便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个愿望,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毅然于8月28日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共中央为表示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顾全大局,决定让出苏南、浙江等八个解放区,把驻在苏南的新四军全部撤至长江以北。

正当新四军江南部队准备撤离苏南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调动大批军队抢占上海、南京以后,即派江苏省保安第六纵队、九十四军第五师、新六军第十四师、张少华水上警察部队、国民党七十一师等部先后进驻苏州地区。不久,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接受了驻苏州地区日军第六十师团的投降。此外,还在长江沿江各口岸建筑碉堡12座,阻挠我南北交通联络,设立情报总(分)站32个,刺探我方军情党情,并建立和强化乡镇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以维持其新建的反动政权。与此同时,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东南特务区苏州组派遣原汪特人员到吴江筹建小组。同期,中统京沪区指导员办事处吴江组在吴江城内下塘街设立,中统二路调统室吴江分站在吴江城骆驼桥弄建立。形势十分严峻。

与此同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命祝伯颐为吴江县党部书记长,公开组织,滥发通告,通令全县各区办理国民党党员总报到,指派了8个直属区分部书记。省党部又指令全省各地举办党员总登记。吴江县党部成立党员总清查审核委员会,并筹组县商会、县妇女会、县

农会等反动的所谓民众团体,举行各种集会,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为蒋介石国民党歌功颂德,攻击我党我军,欺骗蒙蔽人民,以售其奸。国民党吴江县政府为强化社会治安,整编了警察局,编组成立民众自卫队。三青团上海支团吴江分团的要员也返回吴江,以三民主义作幌子来诱惑青年,扩大反动组织。先后成立14个区队(其中包括筹备而未成立的3个区队)和11个直属分队,共发展团员690余人,分布在县区乡镇机关、学校、农工商各阶层。那些“接收”大员来到吴江后,乘机大发抗战胜利财,对吴江人民进行强盗式的掠夺。顿时,物价上涨,人心惶惶,市场一片混乱,人民怨声载道,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

第二节 我党政人员的北撤

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少数秘密工作者之外,在最短时间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根据中央指示,中共苏浙区委员会立即布置北撤事宜。9月底,浙东我军约1万人,编成六个支队,在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下,分两批从浙东出发,穿奉贤,绕松江,先后到达青浦观音堂。淞沪支队和已暴露的地方干部共约2千人,整编为北撤大军第一支队。由原淞沪支队参谋长张席珍担任支队长(原淞沪支队长朱亚民在七宝战斗中负伤),陈伟达任政委,陈长胜任参谋长,顾复生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上海党组织将市区已暴露的党员(在上海市区搞工运、学运和武装斗争的地下党骨干)90人,在青浦编成一支上海工人部队,由诸敏任队长,周克任政委,周晓华任副队长,一起随淞沪支队北撤。一时青东地区我大军云集,盛况空前。各地散发、张贴《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向广大群众讲清我党为顾全大局而北撤的道理。在重固召开了北上万人誓师大会,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长胜率上海人民代表团赶到青东观音堂,给淞沪支队和浙东大军送行。中共淞沪地委书记陈伟达在欢送会上作报告,讲明形势,阐述北上的意义,鼓励大家

为革命继续英勇奋战。诸敏代表上海工人部队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周围群众纷纷前来观看革命队伍的风采，依依惜别。淞沪支队随浙东大军一起向浦西人民忍痛告别，按拟定的序列和路线，分水陆两路并肩北撤，并于10月22日全部撤过长江。抵达苏北涟水后，淞沪支队与浦东五支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七团，团长谢忠良，政委邱相田，副团长张席珍，副政委顾复生，参谋长路妙。陈伟达调任一旅政治部主任。

为了有秩序地撤退，中共淞沪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姜杰作了党转入地下的组织准备，并负责向华中局派来接收淞沪地区党工作的王克刚办理移交手续。此时，吴江县党组织向淞沪支队要回了几个非武装人员，留下坚持地下党的工作。其余党员唐怡华、陈映秋、徐家骏、张泳清、颜金清、沈桂生、顾玉生等先后随部队北撤。与此同时，党组织对党员布局作了一些调整，其中有：张振海被派往北库镇摆布摊，开展北库镇上的工作，了解搜集忠救军李德孚部的情况；潘留生、周世林回北库家乡，蒋正铭回嘉善天壬乡老家，赵寿云去车坊，庄盘元去苏州，张振昌回平北乡，周纪铨去平西乡，吕敏之到八坼摆摊，以加强农村工作。

苏南其他地区的党政人员按中央决定，也陆续渡江北撤。同时过江的还有从吴江拉出队伍的忠救军第五团一行300多人，机枪13挺，步枪200余支。该团原系从浙江绍兴驻防到吴江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忠救军淞沪区第五团，团长郑重（刘建）不甘心受排挤，决心脱离国民党。郑重等四人积极商议计划。10月19日下午7时，从吴江东、南、西三门出城，乘大小船只40余艘，每人胸佩符号“东平”二字，向太湖、沿越溪方向而去。后由新四军太湖留守处主任薛永辉、马山区区长张震东等负责收编，送苏北编入新四军序列。当时江苏省省长兼保安司令王懋功曾训令全省围剿拿办，但未能得逞。

第三节 淞沪党组织的调整

中共淞沪地委在领导人陈伟达、顾复生等人北撤后,奉命撤销。10月下旬,华中分局派王克刚、陈伯亮、鞠耐秋三人在上海组成中共淞沪地区工作委员会,王克刚任书记。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领导。淞沪工委统一领导上海近郊各县和江苏吴江、昆山的大部及浙江嘉善、平湖、海盐的部分地区的地下党的工作。

1945年11月,原中共淞沪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姜杰、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和金佩扬、沈小方、林倍(女)等秘密到达嘉善县洪家滩,以准备烧石灰窑的名义为掩护,分析研究了淞沪地区的形势和任务,并在内部开展抗战胜利后的革命前途教育,以树立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心。淞沪工委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淞沪地区各县干部的转移调配工作。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工作方针:整顿组织,建立阵地,长期隐蔽,合法斗争。为适应今后隐蔽工作的特点,对当时党的领导体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武装人员暂时隐蔽起来。对北撤前在原地已经暴露的党的领导干部作了相应调整:沈小方(肖方)调任淀山湖地区特派员,领导吴江地区的党组织。金佩扬调任浦南特派员,陆雪林调任浦东特派员,雷霆调任松江特派员。各地区由特派员负责组织的整顿。姜杰在办理好移交手续后也撤至苏北解放区。

11月底,沈小方(肖方)到吴江负责党的工作,在平望联系上吴江党组织负责人张振海,接上了吴江的关系。同期,中共黎里支部建立,由连一祥(丁庠一)任支部书记。

1946年初,特派员罗希明继续留在浙西,坚持长期隐蔽的地下斗争。这段时期,罗希明要嘉兴特派员沈如淙离开嘉兴城区(沈在城区开米行,准备发展组织,扩大力量),深入吴江县严墓和浙江新塍交界的农村,组织党员,发动群众,选择有利时机,积极开展革命斗

争。

6月,华中分局派出交通员在上海的约定地点与罗希明接上关系。根据党组织指示,罗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局的林枫接上党组织关系。林枫决定把浙东、苏南两条线的地下党关系统一起来。吴江县南部坛丘、严墓、青云、桃源一带的党组织由此统一领导。当时吴江地区有党员沈英杰、盛友鹤等100多人。罗希明为外县工委浙西特派员,沈如淙继续担任嘉兴特派员,负责吴江、嘉兴一带原由他领导的15个党组织。

第四节 翳桑文艺社及其《浅作》

1945年11月,中共黎里支部负责人连一祥到平望向中共淞沪工委淀山湖地区特派员沈小方请示工作,由沈批准建立“翳桑社”,并确定党员丁铎、吴关龙等参加。

“翳桑”的含义是隐蔽居住家乡的意思。“翳桑社”的全称是“翳桑文艺研究社”,是一个以文会友的知识青年文艺团体。实质上,它是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从事文艺活动,团结、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宣传革命,发展党的组织。

同年11月15日,翳桑社的油印文艺刊物《浅作》出版。

1946年2月,党员连一祥、丁铎在黎里塘桥上岸开设文具书报店,掩护上级领导人沈小方在这里领导党的工作。翳桑社就设在店内,以“练习写作,研究文艺”为名,进行党的地下活动。

该社刊物《浅作》,为16开本、20页左右、装订成册的油印本,一个月出一期。每期印80册左右,后期多达120册。每期刊文10余篇。内容有文艺评论、散文、诗歌、小说、木刻等。发表的作品,大多是抒情的,政治色彩不太浓厚。但也有革命性的,暴露黑暗,针砭时弊。1945年11月召开第一次社员会议,选出社长,并进行了分工,由丁铎任社长兼主编,吴关龙为副主编。该社社员,黎里镇上占大多数,盛泽、震泽、横扇、芦墟、八坼、苏州、上海等地也有一些人参加。

从社会职业来看,以青年店员、学生为主,教师、医生也有一些。其中地下党员和发展对象占了相当的比重,一些人入社后加入党的组织。

由于文具书报店不断出售进步书籍,并有地下党员的来往活动,引起国民党吴江县中统室特务的注意,并对文具书报店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黎里区长曾对区公所人员讲:“要注意这个书店,这个书店里一定有共产党。”黎里地下党组织及时发觉了敌人的怀疑,负责人沈小方迅速向上级请示,经中共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批准,沈小方、连一祥于1946年4月8日撤离黎里去青东。丁铎因未暴露,继续留下开店。

1947年初,文具书报店引起了国民党黎里区分部书记钱大雄的注意,认为书报店有“不轨行动”,是“共产党员在黎里的联络站”。2月25日,国民党震泽区长发现“翳桑”期刊,认为《浅作》的内容不满现实,影射国民党苛捐杂税,是共产党的宣传品,遂逮捕了震泽女社员张育英,并押到吴江军事法庭审讯。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对张非法逮捕审讯的报道。因此,丁铎于3月出走外地,文具书报店交给了丁宝忠经营。3月20日,“翳桑社”限于人力物力有限,宣告解散,印发了《解散通告》。

翳桑社历时一年半,成员达六七十人,《浅作》出版了10期。翳桑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反动统治极严的小市镇上,对促进当地文艺的发展和反帝、反封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翳桑社通过它的合法存在和文艺活动,进行了革命的宣传,联系和团结了一批社会知识青年,教育和启发了一些进步青年的觉悟。社员中先后加入地下党的有20人左右。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对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九章

各系统党组织的活动及革命力量的发展

第一节 内战爆发后的吴江形势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冒天下之大不韪,集中160万兵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向全党和解放区广大军民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解放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英勇抗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苏中地区,国民党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兵力,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我大举进犯。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下,集中19个团3万余人,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于7月13日至8月27日,进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在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七战七捷。歼敌53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疯狂气焰。尔后,根据毛主席关于“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求得大量消灭进犯军的有生力量”的战略指导原则,我军主力主动放弃如皋、海安等苏中的一些城镇和地区,逐步向北转移。国民党军队大量进驻京沪铁路沿线,江南形势急剧恶化。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奉蒋介石“督励所属,努力进剿”的“剿匪”密令,采取“突然合围”、“就地搜索”等手段,进行所谓“分进合击”的“分区清剿”,并在国民党统治区网罗地痞流氓,培植特务势力,对人民实行镇压和屠杀。1946年9月,中共淞沪工委派沈小方为浦西特派员,联系青东赵万年(沈平心),准备恢复武装活动。

11月29日那天晚上,赵万年、沈小方根据工委书记张凡的布置,在李浦桥支书朱大刚家会面,商谈在青东恢复武装斗争的事宜。会后,赵万年与沈小方前去党员张新元家住宿,突然被国民党黄渡刑警队20多人包围,赵、沈两人不幸被捕,受到严刑审讯。随即进行大肆搜查,查出地下党埋藏的长枪及党员名册,28位同志先后被捕,赵万年等被枪杀于朱家角镇。青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青东地区武装斗争的恢复工作中断。地下斗争处于艰苦阶段。

9月16日,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设立无锡指挥所。由陈大庆任主任,毛森任参谋长,负责江南地区的“清剿”工作。当月下旬,国民党将江南地区划分为太湖、阳澄、茅山、苏浙皖边等4个“清剿区”。其中太湖清剿区辖吴江、吴县、无锡、宜兴、武进等沿湖各县。各“清剿区”分别召开由所辖各县县长、军事科长等参加的清剿会议,要求各县对清剿任务切实负起责任,限期完成“清剿使命”。随后,各地的清剿活动便全面展开,并不断升级。

10月,中共华中十地委在苏北成立。国民党立即获此消息。我大批人员渡江南下,国民党调集兵力进行堵截围剿,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迅速歼灭,以保障其心脏地区的安全。

同期,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九总队部第一、五大队由苏州进驻吴江县地区、盛泽、黎里、震泽、平望、严墓等地。

12月,国民党伞兵总队调南京整训,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青年军二〇二师接管江南“清剿”事宜,继续对我活动区实行“全面清剿”。国民党利用报刊和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我领导干部和地下党员。强化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互相联保,出具切结,一人违犯,即实行纵横连坐。各集镇驻守保安队、自卫队,在农村设立盘查哨、递步哨,组织巡夜队,收罗地痞流氓组成情报网,以“查户口”为名,搜捕我地下党员。1947年3月11日,陈大庆命令各县县长“尽力搜剿,务于3月底将辖境内潜伏之匪首及其党徒完全歼灭,逾限者以清剿不力,报请严惩。”江南各地一片白色恐怖。吴江虽是富饶的鱼米

之乡,广大人民却深受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和流氓、恶霸的压榨,生活十分贫苦。抓壮丁、逼租税,阶级矛盾极为尖锐。

此时,国民党中训团第二十九总队部奉令从浙江南浔小莲庄移驻吴江县。吴江县保安大队整编为三个中队,有官兵424人,四出“清剿”。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接连发出“清剿详报”,指名通辑从苏北先后来吴江活动的薛如珠等6名新四军干部。尔后,一批国民党军官和汉奸,勾结新四军叛徒吴林枫等,在太湖地区拉起了特务组织——中统太湖工作站,接上了南京中统督察室的关系,办公地点在苏州东善长巷。站主任委派了吴江组组长,借震泽周坊元住宅(后迁震泽下塘五路堂)为办公地点,进行搜集情报等活动。后,中统江苏省室调沈天宝任中统吴江县室主任,下设通讯、调工等9个小组,陆续派出通讯员去各地发展“细胞”(所谓“关系人”),进行特务活动。同期,国防部二厅绥靖总队直属第二中队(三二二部队)建立了吴江组。这是个半公开半军事的职业特务组织。他们敲诈勒索、搜刮钱财,开展便衣情报活动。首都卫戍司令部第二处第三谍报组也派驻了吴江的联络参谋;军统京沪特别站派遣了吴江组组长,准备拉南库自卫队枪支筹组反动武装。国民党省党部限定吴江县在9月底发展国民党员11000名。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吴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没有被敌人所吓倒,坚持在原地隐蔽斗争,争取基本群众。1946年,中共淞沪系统吴江党组织先后发展了凌行可、周双喜、凌肇基等人入党。

第二节 青(浦)吴(江)工委和浦西 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青吴工委的建立】1946年12月,淞沪工委把浦西地区的工作重点移至淀山湖地区,同时加强了党的点线工作。淞沪工委书记张凡通知金亮从嘉定调吴江工作。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在上海中山公园向金亮介绍了吴江地下党的情况。不久,金亮到黎里,由党员丁

铎领到平望,和张振海、顾其行接上关系。1947年2月,金亮经顾其行介绍,由顾的妹夫黄家振陪同,到平望溪西乡顾家扇小学任教,化名刘世和,领导吴江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1947年3月,淞沪工委书记王克刚又派上海铁路系统的党员李华(李松林)到吴江,在平望与金亮接上关系,建立青(浦)吴(江)工委,金亮为书记,李华、张振海为委员。青吴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在青浦县西部和吴江县东部的水网地带筹组一支水上武装,以互相策应,扩大回旋的余地。

青吴工委建立时,李华在金铎镇开盐店。金亮曾几次到盐店与李联系。王克刚与李华也多次到平望匠人湾,同金一起研究搞武装的问题。不久,李华被捕。李释放后,组织上决定送他到浦东游击队去。金亮通知陆文英(陆琪)把李华送到浦东。

1948年初,金亮通过陆文英的关系,对黎里乡下的土匪胡伯龙做争取工作。陈伯亮、王克刚等还在上海约胡谈了一次话,但因胡顽固不化而未成。

经过一年的工作,终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水上武装未能建成。后改在江浙交界的大谢乡筹组一支小武装。

在这期间,党员肖斧(又名丁惠人)从浦东转移到吴江,住坛丘大谢乡乌龙浜党员钱福宝家里,以钱的家庭教师为掩护,参加当地的活动,并配合开展嘉兴、盛泽一带搞武装。

【北厍珍字埭支部的活动】 同期,中共浦东东南区委书记、武工队长秦克强(化名康云),由王克刚派遣,与青吴工委委员李华一起来吴江,并确定了来吴江的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敌人分布、人员、武器装备情况;二是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发展新党员;三是做好群众工作,开辟新地区,积极准备组织武装活动,向太湖地区发展,使苏嘉路西南与青浦打成一片。6月下旬,秦克强、李华一起来到四周是水的北厍沈家港,住在珍字埭水桥头潘留生家,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潘留生。党员分工深入群众,熟悉环境,了解敌情。8月下旬,党支部

以3支短枪为基础,积极开展小武装活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工作范围从黎里东一直到北厍镇,基本群众发展到五六十人,准备出来一起搞武装斗争的有20多人。11月下旬,秦克强到上海,向中共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汇报吴江工作情况。陈告诉秦,青浦情况紧张,部队在敌人扫荡中牺牲了好几位领导同志,嘉兴小武装也出了事,均已停止了武装活动,要北厍暂停武装活动,在吴江做好群众工作,并及时做好党员的发展巩固工作。

【溪西乡隐蔽点的工作】淞沪工委特派员沈小方和黎里党支部书记连一祥于1946年夏撤离吴江地区后,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亲自来吴江领导工作。先是以开航船为名立足了一段时间,后住平望党支部委员顾其行家中,化名胡萍,领导党的工作。为给上级“来人”找好立足点,使其有社会“职业”为掩护,陈伯亮布置顾其行设法在平望建立一些隐蔽点。顾其行为了更好地掩护上级“来人”联系,将蠡斯港的房屋另行出租,特地搬往司前街轮埠楼上寄住,以便接待外来同志住宿。他同时以其丈人的名义,在干家弄“达顺酱油店”内合伙摆个饭菜摊作为接头处。接着,他通过妹夫黄家振在溪西乡办农村小学,建立隐蔽点。平望溪西乡的顾家扇、陈家湾、匠人湾是连在一起的自然村,与溪港、横扇、梅堰三乡交界,北临太湖,河网纵横交错。党组织在这个地方,办起了两所小学,以顾家扇三家村租用的民房和陈家湾猛将庙为校址,以匠人湾刘王庙为教师宿舍,抽调党员当教师,以教师职业作掩护,进行党的地下活动。金亮到吴江后,即去顾家扇小学任教。中共青吴工委建立后,匠人湾的刘王庙就成为领导机关所在地。陈伯亮经常代表上级党组织向金亮传达指示,多次深夜在刘王庙研究工作,学习文件。1947年夏天,陈伯亮还曾在刘王庙养病两个多月。此时,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总队长吴建功由苏北返回浦东前,亦来陈家湾埋伏。淞沪工委副书记王克刚曾特地来匠人湾刘王庙,召集陈伯亮、金亮、李华秘密开了一夜的会议,讨论青吴工委在青浦西面、吴江东面的水网地区筹建一支水上武装问

题。匠人湾隐蔽点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凡是来匠人湾联系工作的同志,都要经过金亮的同意才可领进来。“上级来人”,必须先到顾其行处联系,经顾向金亮报信后,才由金到平望领着去匠人湾。联系研究工作都在外面进行,联络接头点在平望镇西塘街莺湖楼茶楼上。有时还在平望去盛泽、黎里两条路上约时见面,以及时传达上级党的指示,研究地下工作的开展。党内文件都是经过伪装后交换传阅的,工作做得十分保密。在顾家扇小学教书的党员蔡瑛,9月11日在上海因“益新”糖果店联络站出事累及被捕。她沉着坚强,拒不暴露身份,保护了党的组织。上海《大公报》刊登了《被人控告是共党,女教师一度被捉》的消息。陈伯亮从上海赶到平望通知金亮、黄竞之、俞双人等立即撤离匠人湾,隐蔽点安然无恙。在这段时间里,从外地去顾家扇、陈家湾、匠人湾的领导同志有淞沪工委副书记、工委委员、县工委书记、县特派员、游击队大队长,还有一般地下党员,先后有15人之多。在两年多时间里,隐蔽在这里的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的信任。并且勤恳地工作,教学认真,做到完全象个“教书先生”。当地群众认为这些“先生”无架子、肯吃苦,群众热心借给他们生活用具,主动送蔬菜上门。这些“先生”帮群众写信、写对联,和群众相处得很好,使自己有了合法身份的掩护。这个隐蔽点一度成为吴江点线工作的中心基点,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浦西工委时期】 1947年9月,青吴工委扩建为浦西工委,由陆文杰担任书记,李华、金亮、方诚(祝发初)、钟秀为委员。工委分工为:李华负责吴江地区,金亮负责嘉定地区,钟秀负责青西和松江北部,陆文杰和方诚负责青东地区。此时青东地区的武装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淞沪工委决定建立“江南人民反三征总队第一大队”,陆文杰(化名袁天光)任队长,下设五个武装工作队,武装工作人员有方诚、张震言、张学文、范企明、李克明5个队长等七八十人,拥有各种枪支七八十支。活动方式以分散为主,一面组织学习,熟悉情况;一面宣传群众,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税、征粮)斗争。淞沪工委

在浦西地区武装力量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震惊,急忙拼凑“剿匪联合指挥部”,配合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二师,围剿革命武装力量,疯狂搜捕、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片白色恐怖。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反三征总队一大队避实就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向青沪公路地区转移。

此时,为打通太湖地区的通道,淞沪工委副书记王克刚(化名范一平)来到吴江,与党员张玉良、凌雪生(凌雨生)在盛泽镇西荡口开设大隆柴行,王克刚以老板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把柴行作为联络点,同时注意在工人中物色发展对象。同期,金亮在1947年10月撤离平望匠人湾后,在苏州、上海、黎里、盛泽等处活动,仍负责吴江工作。1947年11月至1948春,金亮(化名刘金生)与党员陆琪(陆文英)在严墓镇南街草棚以摆杂货摊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吴江县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1947年先后发展了平静人、张鹤鸣、胡治忠等40人入党。期间,党组织还先后输送了胡治忠、丁宝忠、潘天扬、顾阿坤、许铭、俞双人、张伟道等一些党员去浦东、青东游击队。6月,北厍珍字埂支部建立,书记潘望生。该支部先后发展了周寿林、沈毓麟等17人入党。8月,中共黎里支部建立,书记吴关龙,组织委员沈明德,宣传委员平静人。1948年2月,吴江县桃源李家坝支部建立,书记沈甫章。该支部由青云仁荡坝支部书记盛友鹤负责联系。同期,沈如淙派吴江青云党员沈英杰去桐乡钱家埭,以理发为职业掩护,负责该地党支部工作。

第三节 吴(江)嘉(兴)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吴嘉工委的建立】1947年12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休(又名方修)到上海。上海局外县工委书记张执一指示方休到杭嘉湖地区发展组织,筹建地方武装。1948年1月,中共杭嘉湖工委成立,书记方休,委员罗希明、范精秋。沈如淙仍为嘉兴特派员,受杭嘉湖工

委领导,负责范围仍为吴江、嘉兴交界的那些党支部。

杭嘉湖工委建立后,方休化名方士林到新塍张家浜毛国荣家里,与罗希明、沈如淙等研究如何在两省交界农村开展武装活动等问题。他们一起到吴江县坛丘大谢乡绕了一圈,察看了地理环境,并在乌龙浜党员钱福宝家开了两个通宵的会。会上,专门研究了组织武装斗争、配备武装干部、解决枪支弹药等问题。参加会议的还有肖斧(丁惠人)和大谢乡支部书记仲春山、党员钱福宝。方休认为这里环境条件都很好,农村有党的支部和数百名党员,群众基础较好。又地处江浙两省四县(吴江、吴兴、嘉兴、桐乡)交界,东可呼应青浦,西可回旋到天目山,南可与浙东穿插。方休还表示武装干部可由上级党组织派来,枪支由组织上解决一些,并设法夺取敌人武器。此后,沈如淙和肖斧去上海取枪,经过巧妙安排,避过了敌特军警的搜查,运回武器。罗希明还让沈如淙以县参议员的合法名义(为有利于掩护活动的开展,经党组织的努力和安排,沈如淙于1947年下半年当选为新南乡民代表会主席、嘉兴县参议员),买来了短枪和弹药,为组织游击武装作了准备。期间,罗希明曾多次去上海向方休汇报情况,进一步具体规划工作重心向武装斗争转移。

1948年3月,为加强淞沪杭嘉湖地区的统一领导,上海局外县工委决定将淞沪工委与杭嘉湖工委合并成淞沪杭嘉湖工委。方休任书记,负责杭嘉湖及浦西的工作;王克刚任副书记,负责浦东方面的工作;委员罗希明、范精秋、高山。在外县工委委员王锡珍(又名陈约珥)主持下,在嘉兴南湖烟雨楼茶室召开第一次会议。根据外县工委指示,合并两个工委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领导力量,把浦东的武装向浦西发展,由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负责具体领导淞沪杭嘉湖工委。

第一次工委会议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决定在吴江、嘉兴建立统一领导的党组织——中共吴(江)嘉(兴)工委,统一领导江、浙两省交界地区的党组织。

4月,淞沪杭嘉湖工委具体确定了吴嘉工委的领导人。调浦南特派员金佩扬担任吴嘉工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主要抓筹组武装工作;工委委员沈如淙负责嘉兴方面的工作,并协助金佩扬筹组武装;委员金亮负责吴江方面工作。5月,金佩扬、沈如淙、金亮在嘉兴会合,中共吴嘉工委就此开展具体工作。

【新塍夺枪】 4月中旬,方休与罗希明、沈如淙、毛国荣等在张家浜再次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决定在农历三月十五(4月23日)新塍传统庙会上,乘人多拥挤,突袭敌人。第二天,方休、罗希明去上海向上级汇报工作,本来约定在庙会前返回指导,但到行动前一天还未回。沈如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按原计划组织行动。沈如淙任指挥,毛国荣负责联络和协助,由吴江县坛丘大谢乡党支部党员潘天扬、顾阿坤执行夺枪任务,其他党员掩护。4月23日,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农民拥到新塍赶庙会。潘天扬、顾阿坤按计划袭击了驻新塍镇东岳庙的新北乡国民兵队班长金振声,并缴了他的枪。枪声一响,秩序大乱,国民兵队惊慌失措。潘、顾迅即撤回坛丘大谢乡。数日后,潘天扬思想麻痹,挂枪外露,被大谢乡队副得悉,报告了吴江县反动当局,当局即派人来抓潘、顾两人。大谢乡公所户籍干事胡行文(胡国钧,原中共如皋区委书记,隐蔽吴江)闻讯给了潘、顾两张身份证,使其出走。吴江县政府派一个中队到大谢乡,抓走了党员沈沛乾、顾春泉妻、钱福宝妻等,关押在吴江审讯,顾妻身受重刑。胡行文开始也被抓住,后逃跑,由党员俞双人送到八都党员周凤池处暂住。吴嘉工委一成立就遇到此事,在这危急之际,金佩扬遂安排潘天扬、顾阿坤安全转移去上海浦东隐蔽。不久,潘天扬在青东部队负伤,大队长陆雪林用船把潘载到上海。金佩扬安排潘隐蔽在党员吴阿炳(吴江县梅堰乡庙头人)的阁楼上,由党员陈企周通过上海民船工会医务室余澄怀医生(陈、余为上绕集中营的难友)帮助秘密治疗。后来,潘天扬在上海南汇牺牲。

【武工活动的开展及暂停】 5月12日,方休把已筹集到的两支

枪在虹口三角地小菜场交给了金佩扬,由他携带回嘉兴。方休还让金佩扬13日再去取枪。结果由于叛徒张华夫出卖,罗希明12月在沪被捕。后一日,范精秋被捕。同日,方休也在新闸路西海影戏院旁范精秋寓所弄堂口被捕,被国民党特刑庭判决后送进苏州监狱。淞沪杭嘉湖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上海局外县工委决定,由原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担任淞沪地区浦西特派员,吴嘉工委由陈伯亮直接联系和领导。陈秘密来往于上海、吴江、嘉兴之间,领导吴嘉工委工作。

同期,浦西工委委员钟秀为扩大浦西游击区,重新发展武装斗争,同意松江唐家浜党支部党员以农船贩糖糟为名,往返吴江与天昆之间,以便打通吴江与松江方面的联系。一次遇上国民党警察巡港查船,党员张文岐把警察打到河里单身逃脱,党员王振芳强行脱险,党员徐海楼、吴仁祥遇害。

面对敌人的反动气焰,吴嘉工委组织的运枪活动没有停止,继续进行。金亮在陆琪的帮助下,从浦东游击队运来短枪,交给沈如淙。金佩扬在上海向方休领取短枪两支拿回嘉兴,交沈英杰带给沈如淙。金接着又派俞双人到吴江北厍珍字埂党员潘留生家运来短枪两支交给沈如淙。这样,在吴嘉工委成立前后,党组织积极筹集了开展武装斗争必须的枪杆子,为建立武装队伍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6月底,中共吴嘉工委决定组建一支秘密武装,从地下党员中挑选了10名骨干,配了10支短枪,取名武工队(又名游击小组)。7月1日夜,武工队在新塍东南方石灰桥边的一草棚里成立。为了避免暴露,大家不叫名字,只呼代号。10名队员是沈英杰(代号老大)、顾春泉(老二)、沈如淙(老三)、顾阿坤(老四)、管宝善(老五)、钱福宝(老六)、曹云山(老七)、金佩扬(老八)、张时良(老九)、马传生(老十)。领导人为金佩扬和沈如淙。武工队以对外结拜弟兄形式为掩护,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扩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影响,逐步发展武装,打击敌人,扰乱敌人。武工队员常常白天隐蔽在群众和地下党员

家里,晚上转移住宿地。以组织群众读书、看报等方式,广交朋友,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准备在吴江、嘉兴、桐乡三县范围内搞一些秘密据点,使武装力量进一步向周围发展壮大。吴嘉武工队的成立,使盛泽周围农村和嘉兴新塍一带的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希望,鼓舞了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勇气,同时有力地震慑了敌人。

8月,陈伯亮指示金亮去青东了解斗争情况。金亮离开吴江后,吴江县方面的工作由金佩扬直接负责。9月,青东的武装力量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和内奸出卖,损失严重。一个晚上牺牲5个县级干部,反动政府以1万元大洋赏格通缉陆文杰。吴江地区斗争环境十分险恶。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根据上级指示精神 and 青东斗争的情况,把陆文杰调离青浦到吴江地区工作,并决定停止武装活动。据此,陈伯亮通知吴嘉武工队亦暂停活动。为保存力量、迎接解放,要求把枪支收藏好,已经“脸红”的同志迅速撤离。党员钱福宝受吴江反动当局注意而去上海隐蔽,沈如淙因引起特务注意安排去川沙艾家小学教书隐蔽。金佩扬化名王天叶,以做米商为掩护,在吴江、嘉兴、上海间往来,着重做秘密的策反准备工作。陈伯亮偕同金掌华(金佩扬女儿)住嘉兴新禅寺姜正中家,以开设米行为掩护,作为隐蔽的活动据点。金亮又按陈伯亮的指示去桐乡石门中心小学教书为掩护,并与吴江撤去的党员陈振接上关系,领导桐乡简师党组织开展工作。浦西工委书记、江南人民反三征(征兵、征税、征粮)总队第一大队长陆文杰8月从青东到吴江后,住平望溪西乡猛将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联系党员张振海、俞双人、陈乃元、凌行可、平静人等开展工作。

【盛泽反饥饿斗争】 1948年11月,国民党盛泽区长勾结盛泽米业同业公会会长高压价购进大米,囤积居奇,遂将大批粮食运到上海,以黑市高价抛出,从中大发其财。他们把持了盛泽的米业市场,不顾老百姓死活,每天只供应一小时即挂牌“售完”,而所售出的米也都是霉米、黑米。盛泽镇的人民群众,每天清晨排队抢购,许多人

还买不到米下锅，群众怨声载道。盛泽镇的纺织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酝酿发动罢工夺米斗争。

当时，盛泽纺织工人已有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俞永泉。党员吴永奎已打入丝织工会担任理事。他们在摸清了反动当局黑市贩卖的内幕、了解群众的呼声以后，俞永泉由盛泽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俞双人陪同，向地下党领导人金佩扬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回来后立即组织行动。

第一步行动是由吴永奎带两个工人去找丝织工会会长，要会长一起去和区长谈判。条件是：一、米行平价供应大米，延长供应时间。二、不准将盛泽大米大批外运贩卖。如不答应，即举行罢工。与此同时，团结一部分积极分子进行公开宣传，揭露区长勾结奸商囤积粮食的内幕，发动工人起来罢工。区长知道丝织工人的要求，就事先躲开了，推出镇自卫队大队长、镇警察分局局长两人来谈判，谈判中大队长一再推说盛泽没有米。吴永奎就提出要警察局派警察一起去查。警察局长只好装模作样地派人与工人一起去查米。由于工人事先掌握内情，所以很快在资本家的家中和轮埠楼上查出几百石大米。这一下工人群众情绪激昂，一致要求将查出的大米平价卖给工人。

不料情况发生变化。第二天一早，发觉查出的大米已在一夜之间全部偷运出去。群众怒不可遏。吴永奎带领工人戴福官、杨永生、封金荣等数十人去花园街“盛昌钱庄”找区长算帐。当时钱庄铁门紧闭，大家合力砸门。群情沸腾，人也越聚越多。数百工人一路呼拥到丝织工会找会长，可是会长已逃跑。工人们聚集在场上；振臂高呼：“要吃饭！要罢工！要示威游行！”大家一齐拥出工会来到仲家弄口。金介甫等人首先拥进米业同业公会，将其藏匿的几百石米推堆到大街上让居民搬走，并且把米业同业公会的办公室也砸了。接着百多工人分成两路：一路向西，一路向东，西路由周天宝带头，东路由金介甫带领，他们把盛泽 18 家米行内所藏的大米全部搬到大街上，居民群众得到大米，无不拍手称快。而丝织工人自己，没有一个

去拿米的。大家簇拥在一起呼喊向前挺进。

区长得知情况后，马上带了警察赶到现场。在观音桥、保盛桥上架起机枪，威胁、恐吓工人群众。工人群众怒气冲天，呼喊口号，面对枪口一拥而过。

这一天，盛泽丝织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大显威风，全镇的工人、教员、居民群情沸腾，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们开怀畅谈。盛泽丝织工人反饥饿斗争的胜利，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灭了反动当局的威风，在盛泽镇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通过这次斗争，党组织培养和发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金介甫、封金荣等人入党。

【小小商店】 1949年初，党的地下组织发展迅速。为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经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同意，党员平静人、包一鸣、张淦泉在黎里镇东市合伙开了个“小小商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一直坚持到解放。“小小商店”开设在黎里镇上岸何家浜口，前后两间平房，前面是店堂，后面是宿舍。面街的门口，用“排门板”搭一个摊，靠西的墙上贴着竖写的“小小商店”四个黑字。“小小商店”经营时间不长，但对黎里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却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它既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又是党内聚会活动的场所。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联系工作，传递信息，有了比较固定的地方，也便于寻找。当地同志有事要找支部，也可以到点上来联系。外地同志来联系，也可到店里询问。特别是临近解放的一段时间中，由于工作紧张，需要接触的人多了，从单线扩大到横的关系，有时还要召集二三人或四五人一起开小会研究，“小小商店”的里屋正是很好的活动场所。店堂里对外做生意，党内同志在里间装着闲谈，商量工作。解放前夕，击退胡伯龙匪部的战斗，黎里镇党支部就曾在“小小商店”的里屋分批召开过党员骨干和部分自卫队员的会议，反复多次地作过研究和部署。此时的“小小商店”又仿佛成了党内“司令部”的驻地了。

【地下印刷厂】 中共黎里支部自1947年冬到1949年5月，油印出版了大量的党内文件，发给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党内学习之用。

开始印文件都在黎里镇道南桥“协源米行”后进仓库楼上(黎里党支部委员平静人的卧室)进行。由平静人和党员平征明刻写腊纸,党员平元增、汝贤浩帮助油印和装订。都在晚上秘密进行,常搞到深更半夜,有时直至黎明。1949年初,油印文件的工作转移到黎里镇东栅八角亭旁的“乾丰米行”后进平屋进行。当时购买油墨、腊纸、白纸、书钉等的费用支出,全部由平静人和平征明包下来,不向组织上伸手要钱。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翻印了10多种党内文件,每种四五十份,有的不够了还再版重印。油印的文件,一律装订成32开本的册子。计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党章》、《三个月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双十宣言——新华社社论》、《华东解放战场上的形势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油印的文件,一部分给黎里本地区同志传阅,大部分支援外地,由上级党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取去,供给芦墟、平望、盛泽、嘉兴等地党内同志阅读。

文件的保藏,开始是放在协源仓楼的房顶里。1949年春节后,就把一部分文件放到“小小商店”去,交党员包一鸣负责保藏。在接近解放最紧张的时刻,包一鸣又把文件转移到黎东农村家里,以确保安全。

【党组织的发展】 在吴嘉工委领导下,吴江县党组织发展壮大很快。1948年先后发展了王文达、陈志明、汝贤浩等90人入党。当年,在盛泽镇建立了中共盛泽纺织支部,书记俞永泉,组织委员吴永奎,宣传委员周天宝。1949年初,又先后发展了干勇祥、吴毓骅、张瑞秋等70多人入党。党员主要分布在黎里、平望、芦墟、莘塔、北厍、八坼、严墓等地。此时,盛泽地区由俞双人负责,黎里地区由平静人负责,芦墟地区由吴关龙负责,平望地区由张振海负责,共联系党员190多人。原属浙西系统的严墓、坛丘一带,有青云水家港支部、水家港妇女支部、仁荡坝支部、茹菇埭支部、坛丘大谢支部、桃源李家坝

支部、盛泽灰练坊支部,共有党员 160 多人,由沈英杰、仲春山、盛友鹤等负责联系,沈如淙领导。青云沈英杰还负责联系着桐乡钱家埭支部的 14 名党员。黎里镇地下党员陈振(丁铎)于 1947 年 9 月撤离吴江去桐乡后,在桐乡简师发展党员,经吴嘉工委批准,共发展了姜旭等 44 人入党。

吴嘉工委的党组织还扩展到浙江南浔和吴兴塘北地区。俞双人受金佩扬指示,去南浔、塘北发展党组织。在南浔镇先后发展了傅侃等 8 人入党。在塘北先后发展了秦家书等 23 人入党。轧村与义和均建立了党支部,由胡国钧负责联系。

吴嘉工委所属嘉兴地区有党员 155 人,并建有 9 个党支部。

此外,在吴江、嘉兴另有一些由金佩扬、沈如淙单线联系的党员。

第四节 华中十地委系统党组织的活动

【十地委的成立和南下】新四军北撤后,苏南东路成立中共苏常太、澄锡虞两个中心县委,苏南西路成立丹北中心县委,分别领导留守江南的少数干部和武工人员坚持斗争。

1946 年 9 月 23 日,中共苏中区委员会根据华中分局指示:“为恢复江南工作,开展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建立我党秘密组织及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华中第十地方委员会。十地委所辖范围:北濒长江,南临太湖,西至镇江,东抵上海近郊。苏中区党委决定:十地委以金柯、杨斌、包厚昌、任天石、陈云阁、李中、张志强、康迪、江坚 9 人为委员,前 5 人为常委,金柯为书记。十地委下辖苏常太、澄锡虞等 4 个工委,苏常太工委书记包厚昌,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后为赵建平)。为了领导秘密党员坚持工作,十地委继续实行特派员制。各地先后委派了县、区两级特派员,单线联系地下党员,隐蔽地开展活动。1947 年以后,澄锡虞工委所属的锡澄、沙洲、苏锡三县相继成立工作委员会。

十地委在苏南的工作任务与方针,主要是长期坚持、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争取胜利。贯彻以秘密工作为主、武装斗争为辅的方针，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创造开展秘密活动的条件，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生根，逐步积聚我们的力量，达到长期秘密坚持江南斗争的目的。1947年4月5日，苏中区党委给十地委发出指示信，指出：敌对我进入江南极为注意，正集中力量对付，环境将日见紧张，今后应从思想上彻底转变过去以秘密工作为主、非法斗争为次的方针，而确定完全采取坚持秘密工作的方针，一切工作方式均应适应当地的情况与环境。创造开展秘密活动的条件，领导群众合法斗争，逐步积聚力量，达到长期秘密坚持江南斗争的目的，打破敌人企图用镇压恐怖手段来隔断我党与群众联系之阴谋。

1946年10月，十地委在苏北东台县正式成立，召开地委扩大会议。金柯根据华中分局和苏中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在会上作报告，分析了江南的形势，说明了成立十地委的目的、南下工作的方针。当时还作出了开辟苏南淀山湖地区的决定，指定原沙洲县委副书记焦康寿为开辟工作负责人，并确定地委委员、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负责单线联系领导。各工委在进行学习和讨论的同时，着手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下旬，参加十地委成立大会的干部开始渡江南下。11月23日，包厚昌率领干部和一支精悍的短枪队共20余人，从海门灵甸渡江，与苏常太武工队汇合。澄锡虞地区的干部在李中等率领下，先后到达上海，转入锡澄地区。其他人员，由交通站安排，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分别经上海转移到澄锡虞地区秘密活动。11月，十地委城工部长（后为副书记）杨斌、社会部长任天石南下，在上海建立十地委的机关。12月，金柯渡江到达上海。

【吴江县立足点的开辟】 11月初，焦康寿等北撤干部分批由灵甸港渡江到达上海。1947年2月，原无锡梅北区长吴明（马成）首先来到吴江城内三角井住下。尔后，焦康寿与陈秀中来到吴江县同里镇凌家廊下住下，建立秘密立足点，开展淀山湖地区的工作，以便

在京沪铁路以南扩大回旋余地。紧接着,党员陆志明、李海明(张健)、张根生(蒋一鸣)、陈逢贤(陈阿大)等陆续到达吴江。经组织调配,先后到吴江县工作的党员还有李桐明、陈令仪、朱帆、许丽娟、王彦萍、朱林芳等。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是以吴江县为立足点的。当时除了顾加生等几位在锡剧团里的同志流动在吴江、吴县等地外,开辟工作主要就是在吴江县境内。

十地委的成立和南下,对苏南东路、西路地区的坚持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开展农村秘密党和武工活动,引导城镇的学生、工人斗争,有利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有利于牵制国民党的力量,配合我军正面战场的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外地来新区开辟工作的同志,首先是要想方设法站稳脚跟,以合法的身份住下来,这是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后来到吴江的29位同志,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落脚点,都有一个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有手工技术,有的有医学知识,有的会开机器,没有职业基础的就以小商、小贩、做苦工等职业为掩护分散立足。焦康寿、陈秀中在同里做卖布生意;吴明寓吴江盛家厍以中医为掩护,在“鸿济堂”药店挂牌“中医吴春生”;张根生帮人家开辟水机;陆志明在吴江城里以“算命”为职业;陈阿大在南厍做裁缝;李海明在南厍地主家做长工,并打入自卫队;李桐明、陈令仪在同里卖零头布;钱志芳在同里四乡做白铁匠;许杏仙做菜贩;朱帆在同里摆布摊;倪妙珍卖黄豆芽;陈元章在松陵元昌祥百货店做职工;许丽娟在同里泰篮桥上摆针线摊;唐裕兴在横扇弹棉花;朱林芳在平望周家溪做裁缝;张志明、朱剑波在周家溪开诊所;顾加生、郭城、何枫领导的“锡剧团”,在同里、屯村一带流动演出;王彦萍在三里桥石灰窑柴船上收草;包厚昌当石灰窑“老板”……外来党员落脚后就发展关系,广交朋友,扎下根来,积极进行群众工作,展开秘密工作。

焦康寿到吴江后,十地委委员、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和工委委员

赵建平到松陵、同里检查工作。5月初,焦康寿去上海向李中汇报工作时,十地委书记金柯和副书记杨斌也在那里,当场确定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改由杨斌负责领导。杨斌记下了焦在同里立足点的地址,并约定在5月17日到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马路上见面,汇报情况,商谈工作问题。16日,焦康寿在吴江看到新闻报上刊登一条奇特的消息:“本市蒲石路居民金柯失踪,正向有关方面查询”。焦康寿立即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发出的通知,金柯出事了,决定暂时不去上海。过了几天,焦康寿收到李中化名并用暗语寄来的信,告知金柯、杨斌均已被捕,李中已回苏北,要焦迅速转移。

原来,金柯、杨斌5月14日在上海被捕。第二天李中前往他们的住处,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因未暴露身份,数日后交保释放,即转赴苏北。当时,我地下党通过关系以“人权保障会”名义在报纸上刊登了上述一则声明,使其他人员及时得悉金柯出事,采取应急措施,免遭更大损失。十地委领导的几个工委、县委及其他干部,由于隐蔽苏南农村活动,亦未遭破坏。焦康寿、陈秀中离开吴江去无锡。

6月,华中分局致电苏中区党委,指出:目前十地委与坚持武装主要任务在保存有生力量,取得立足点与免受大损失,因此应注意分散隐蔽转移……今后应着重领导群众的合法斗争,以减轻人民负担,免除骚扰。十地委淀山湖开辟区的同志贯彻上述方针,避开敌人锋芒,采取小型、分散、隐蔽的方式活动,在敌人的“清剿”中保存自己的力量,支持和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他们根据澄锡虞地区农村斗争的多年体会,在敌占区城镇坚持秘密活动的原则,不轻率暴露,以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但在广大的农村,在秘密的基础上,配合开展武工小组的活动,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抗丁、抗税、抗租、护粮”等群众性斗争,增强群众斗争信心,团结基本群众,控制保甲长,分化瓦解敌人的统治。吴江是有名的河网地区,东部湖河纵横,村落散布,活动余地很大,极有利于秘工干部隐蔽和武工组的活动、转移。西部地区公路和塘河并行,把南部地区分隔成两小块,活动余地较

小。因此,来吴江县工作的党员,把开辟工作的重点,放在东部地区,西部以秘工坚持为主。

7月,赵建平任澄锡虞工委书记,焦康寿任工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划归澄锡虞工委负责。焦康寿、陈秀中重返同里镇。十地委常委、军事部长包厚昌要焦康寿负责打通与苏中区党委的联系,吴江地区的工作暂由赵建平兼管,并由吴明临时负责。

11月,澄锡虞工委调无锡县特派员李桐明及党员陈令仪到吴江协助焦康寿开展工作,住同里镇,以职业为掩护。12月下旬,焦康寿从苏北返回同里。

1948年2月,澄锡虞工委调李桐明去锡澄县任特派员,工委委员、组织部长焦康寿和工委委员、副部长沈鲁钊一起在同里和李桐明交接了工作关系。3月,吴明、范青的立足点由吴江城转移到梅堰宝元堂药店,以便进一步了解敌情和熟悉地形。同期,焦康寿、陈秀中调离吴江去苏北华中工委。吴江地区的工作由澄锡虞工委委员、沙洲县工委书记朱帆负责。

4月,吴江开辟区的同志调整布点,开始了秘工、武工两条线斗争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澄锡虞工委书记赵建平派工委政治交通员许丽娟(钱桂仙)到吴江工作。许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在同里镇立足。5月,吴明改名吴九如,转移去周庄天生堂药店,仍以中医职业为掩护。顾加生的“锡剧团”在吴县的郭巷以东地区活动,负责侦察吴县、吴江界河两侧的地形,后活动至甬直、同里、屯村一线。10月,澄锡虞工委委员朱帆从苏州迁居同里,以加强对吴江地区工作的领导。

开辟吴江地区工作的地下党员把贫苦劳动群众作为结交的基本对象,其他方面的人员只要能起作用的也结交,并且对敌人内部也积极开展了工作。工委交通员许丽娟经工委领导同意,在同里认了一个茶馆老板娘为奇娘。这位老板娘的丈夫车子权是国民党党员、同

里镇的自卫队排长,当过巡官。许利用他的社会关系,通过到他的茶馆喝茶的农民,逐步深入到农村活动。

1948年,澄锡虞工委来吴江开辟工作的同志,开始建党工作。在新区进行建党工作,既要注意启发对方的阶级觉悟,又要相互建立较深的感情。工委在吴江的全体党员,在发展工作中坚持了“对象一定要选准,选得不准决不发展”的原则,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认真进行建党工作,先后发展28人入党。其中有:朱帆在三里桥石灰窑工人中发展了吴小根等5人入党,并成立了石灰窑党支部;李海明在南厍自卫队发展了毕华等3人入党;许丽娟在同里、松陵发展了朱斌等4人入党;朱林芳在平望周家溪发展了计秀英等4人入党;陈逢贤在横扇发展了朱阿八等2人入党;顾加生在锡剧团发展了郭城等3人入党;王彦萍在屯村管家浜发展了管富达等4人入党;吴明在药店发展了周维明等2人入党。在基点工作中,全体党员在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扩大党的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较大的作用。他们在搞好基点的基础上,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党员朱斌被派去锡东武工队受训练。不久,从锡东调来了短枪和手榴弹,开始了窑上这个基点的武工活动和训练。朱帆多次与许丽娟等到同里周围农村钱家厍、管家浜、胡豚港、屯村一带活动,认地形、交朋友,以备武工活动开始后跨越吴江、吴县界河两岸秘密宿营和转移。王彦萍、吴阿根等石灰窑上的党员利用柴船,暗藏短枪及手榴弹,以石灰窑收柴人身份为掩护,熟悉周围的河网地形及群众关系,得到农民积极分子的支持。组织的对象,以农村中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受剥削、受压榨重的贫苦农民及部分青年农民为主。党的工作在农民中获得了拥护,不断有一些积极分子靠拢党员。斗争发展方向,逐步地从秘密、隐蔽趋向半公开、公开的农民斗争运动。当然,从武装斗争的要求来说,吴江还只能说是个开始,仅是“小组规模”的尽量隐蔽的武装民运工作(组)活动。

【石灰窑中心基点的建立】 十地委领导机关在上海被破坏后,

苏常太工委与上级的联系暂时中断。7月,因敌情严重和活动区狭小,为保存力量,决定十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苏常太工委书记包厚昌伺机撤离农村,建立外线领导。10月,苏中区党委向包厚昌及苏常太工委发出了指示信,指出当时形势是“我解放军全国性大反攻已经开始”,指示“武工队不应到处暴露”,并明确了“今后苏常太、澄锡虞两个工委统归区党委直接领导,苏常太工委负责人及委员由包决定并告诉我们”。同时,还通知包厚昌去路南工作。包厚昌接到指示信后,即于10月底离开常熟,经苏州转赴吴江,在外线领导苏常太、澄锡虞和吴江地区的斗争。包厚昌在吴江东门外航前街吴明处落脚,同到吴江有包的警卫员唐云清、张永定。

为了使包厚昌在吴江的活动取得合法身份,由吴明出面,以寄兄周柏生(指包厚昌)、王炳生(邻居)、黄云涣(房东)四股集资开办石灰窑,王炳生以窑租为干股。当时物价飞涨,金元券不断贬值,金额以米计算,股金共180石大米。取名为“万丰石灰窑”,窑址就在吴江北门外三里桥东窑港的河道中的一个大墩上。此后,又先后调党员张根生、王彦萍、陈祖良、陈元章等到窑上工作。石灰窑的环境和条件都选择得比较好。张根生是窑上的帐房,平时只有一人在窑上,窑的四面环水,进出必须用船摆渡。窑上另有一个看鸭的老头子,又单独住在一个草棚。外界一时不易注目,十分有利工作的开展。这为包厚昌在吴江指导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建窑后,张根生和王彦萍等就在窑的河南面村庄上发展党员。党员吴剑清家后边有一船棚,这样到窑上去就很方便。这个基点的力量较强,建窑后的工作抓得比较紧,又有群众的保护,不久就弄到了吴江县全图、全县水道系统详图和吴江第三区(盛泽)地图。三里桥石灰窑成为当时活动的一个中心基点。

包厚昌到吴江后,化名周柏生,对外以万丰石灰窑老板出面,领导澄锡虞、苏常太两个工委的工作。许多重要会议在吴江开,不少重大决策在吴江定,吴江一度成了澄锡虞、苏常太两个工委的指挥中

心。吴明也以老板的身份到处活动,到湖州去,推说采购柴草、石头;到震泽、平望、黎里等地去,就说推销石灰、实际上是去观察地形,搜集国民党党政军的组织情况。包厚昌到吴江后,原拟与苏浙皖的钱敏那里取得联系,曾去过杭州,但没有能联系上。为了便利工作的开展,包厚昌还请隔壁老太太教会打麻将。在这段时间里,苏常太、澄锡虞好些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商讨工作和召开会议,都以打麻将这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这个方法效果很好。

11月底,苏常太工委委员钱伯荪从苏北汇报工作返回江南,带回华中工委的指示,向包厚昌作了传达。华中工委要求江南坚持秘密斗争,有条件地发展党组织,在敌军中进行策反,开展城市工作,争取知识分子,建立可靠的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线。12月下旬,焦康寿从苏北返回同里,向包厚昌和澄锡虞工委书记赵建平、工委委员张卓如、朱帆,苏常太工委书记陈刚等,传达华中工委的指示:为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撤销十地委建制,十地委所属各工委由华中工委国统区工作部领导,并要积极准备大军渡江工作。

1948年初,包厚昌在吴江主持召开了有苏常太工委和澄锡虞工委领导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在苏州地区设立秘密机关。2月,包厚昌又在吴江召集会议,着重部署了党的秘密工作,研究了把秘密斗争坚持到底的问题,对党的力量作了充实调整。吴江会议后,又指示城镇秘工打入敌人组织,把面目更加隐蔽起来,使武工队活动更加灵活机动,让敌人的“清剿”屡屡扑空。

3月,根据中共华中工委的指示,包厚昌离开吴江去苏北解放区。

第五节 苏锡吴工委系统在吴江的活动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会议讨论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

高潮》的党内指示。在此之前,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了国统区的工作,作出了加强国统区工作的决定。根据党的指示,大批干部被派往大中城市工作。期间,在抗战时随校迁到四川的武汉大学的一些党员毕业生,利用家庭社会关系,以职业为掩护,到苏南开辟党的工作。

【党在吴江中学的活动】 1945年夏,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倪明与同学刘惕恒等一起,在重庆经新华日报社介绍要去解放区,结果未走成而留在蒋管区,于1946年春回到苏州。倪明通过远房叔叔、吴江中学校长倪承楹的关系,于8月到吴江中学担任训育主任,教全校公民课,兼任高一班的级任教师。同到吴江的有倪明的武大同学刘玉。刘玉在江中教初中英语和女生体育,兼初一班的级任教师。那时倪明、刘玉虽然还未入党,但与党已经有了联系。在苏州教书的中共党员、武大同学范文贤、陈凤箫不时到吴江来与倪、刘一起学习时事政治,讨论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倪、刘以吴江中学为基点,进行革命活动。他们通过广泛接触教师,了解各人的政治倾向,同时向他们介绍当时在大中城市已经比较流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的情况。对学生,通过批阅周记、作文等,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注意发现有正义感、要求进步的同学,以便作为培养的对象。与此同时,倪、刘还经常注意推动面上学生的公开活动,推动他们开展一些班级的自治活动。如举办时政讨论会、辩论会,组织篮球队、歌咏队,以及利用放暑假的机会,组织家在农村的同学进行农村访问等多项活动,活跃学校的气氛。一部分爱好读书的学生,组织起青年读书会,还出版了小报。

1946年底,原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人赖卫民(赖映棠)和党员刘淑文撤离重庆到了上海。1947年1月,赖、刘由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派往苏州、无锡搞城市工作。4月,根据钱瑛指示,刘淑文与苏州的武大学生党员陈邦辛、范文贤组成苏州学委,负责人陈帮辛。并由赖卫民领导开展工作,并由赖与钱瑛直接联系。

1947年7月,倪明、刘玉由范文贤介绍,先后参加共产党。倪、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

1947年9月,高山奉派到苏州接替赖卫民的工作,成立中共苏锡吴工委(又称苏州工委),高山为书记,陈邦辛、范文贤为委员。高山除跟赖联系外,还直接跟钱瑛联系。以后,工委又增补了刘淑文为委员。工委领导苏州、吴江、无锡的一些党员。

在吴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开展地下党工作相当艰苦。党组织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活动方式更加隐蔽,工作更加实在。工作的重点是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

在这段时间里,高山到吴江指导工作就住在倪明家。倪明继续从外地邀请一些进步大学生到吴江中学教书,并在他们中发展党员,以集结革命力量,开展党的工作。1947年暑假后,刘玉离开吴江去武汉大学。工委委员范文贤介绍的原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的胡德瑜(后改名为胡斌)、地下党员陈凤箫介绍的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余名清,同时来吴江中学教书。倪明安排胡斌住在江中附设师范科进步教师的家里(西下塘街2号)。胡斌曾参加过中央大学的“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要求革命的心情十分迫切。1947年9月,倪明请示高山批准,介绍胡斌入党。余名清到吴江后,住在学校女生宿舍,努力开展女教师和女同学的工作。倪明请示高山同意,把余交给胡斌联系。余名清于1948年1月入党。

1947年8月,郑白青由广西来吴江中学任教师(郑1938年春在湖南凤凰县入党,任过中共泸溪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由党组织派往广西开辟工作。来吴江时,郑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郑在吴江中学与胡斌接触频繁,曾一起编印《文艺报》。

胡斌在这段时间里常去倪明家中碰头,交流情况,反映教师和学生动态,研究如何联系群众、做进步学生的思想工作。晚上还常一起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当时倪明主要负责校外和校内上层人物

的工作,胡斌负责校内学生的培养发展工作。胡斌在工作中注意发现要求进步、有正义感的学生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教育,确定建党对象。在这方面,倪明和刘玉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半年,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如高一班的周维新、郑永骏、计重远等,初一班的王寄南、史月娥、王无非等,初三班的陈关孝、沈祖吉、黄强华等同志。

2月初,倪明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紧急撤离吴江。吴江的工作由高山直接联系。高山到吴江中学找胡斌,要他负责吴江县中的地下党工作,并交待他可在县中发展党员。此时,胡斌的工作由高山直接领导,高山不便来吴江时,就由余名清去苏州听取指示,带回吴江。胡斌在这段时间里,主要工作是发展组织,团结培养进步学生,积蓄力量,迎接解放。胡斌根据原先倪明的布置,在县中学生中了解、物色发展对象。胡利用教高、初中物理、化学、兼任初三级任教师和副教导主任的合法身份去接近学生,开展工作。对迫切要求进步的学生,个别谈心,借给进步书刊,提高他们对革命的认识。这一段时间,江中党组织的发展工作进展较快,经高山审查同意,先后发展了初三班的陈关孝、沈祖吉、黄强华,初二班的王寄南、史月娥、王无非入党。

1948年3月,郑白青介绍中共党员何刚(化名何景愉)来吴江,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何原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1947年在复旦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总负责人,因搞学生运动而被开除)。何在江中担任初三班主任,与胡斌默契配合,但何的组织关系仍留上海,由学委负责人浦作直接领导。

1948年8月,胡斌介绍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赵广祥到吴江中学任高中史地教师兼训导员。胡、赵是1947年“五二〇”运动时一起在南京中央大学搞游行示威的工作中认识的。赵来吴江后,与胡住在一起,经常阅读进步书籍,还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

1948年3月,高山因工作需要调离苏州去淞沪工委,工委成员

只剩下陈邦辛一人,后陈邦辛的组织关系由赖卫民转给中共上海市委学委。

1948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张云曾、陶戈辉(陶掌珠)到苏州,与孔令宗一起组成苏州工委,张云曾任书记。

1948年夏,上海局外县工委决定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统一起来,以农村据点为依托开展城市工作,把苏州、无锡打通,协调行动。

10月,经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批准,胡斌介绍赵广祥入党。此时江中的地下党组织,在教师中由胡斌、赵广祥联系,在学生中由陈关孝、王寄南联系,再由他们联系其他学生党员。随后学生党员成立了党支部,选举王寄南为支部书记,陈关孝、史月娥为干事。此后,经赵广祥介绍,薛杰批准,发展了高三学生刘钟淦入党。

1948年12月,高山调胡斌、余名清去无锡工作。吴江中学地下党工作,由赵广祥负责与上级联系。

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影响下,1948年秋,吴江中学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学,向校方提出民主改组学生会的要求。经过斗争,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产生学生自治会,选择进步学生担任自治会的领导人。寄宿生对校方克扣伙食费不满,要求自己管理伙食,校方被迫同意学生自己成立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

【武装策反的准备】 倪明在与校外人士的接触中,注意发现一些明显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并能明白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勇于参加革命的对象,并根据开展工作的需要,由党组织发展入党。

国民党太湖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赵安民就是其中之一。赵担任过国民党陆军十三师少将师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上校参议、苏浙行动委员会太湖别动队司令、吴县县长等职,参加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但平时能与士兵共甘苦、吃咸菜,有“咸菜司令”之称,为人正直。此时遭到国民党排挤,正在吴江家中住闲。

1947年上半年,倪明通过吴江基督教“四维堂”牧师费因笃了解到赵安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不满,思想苦闷,想东山再起搞武

装。倪明为此曾先后向范文贤、高山汇报。高山要倪明接触赵安民，充分交换意见，深入进行考察。赵所谈看法，与我党主张基本一致。接着，高山就以外地进步人士的身份与赵接触，并以赵的老同事的身份为掩护，住在赵家，进一步对赵作考察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教育，发现赵的态度已经明朗，政治上可以信任。高山去上海东新桥请示了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于1948年4月发展赵安民入党。

接着，高山对赵安民作布置，要他作好拉出武装的准备。赵系东太湖河南帮围垦农民的头面人物，原忠救军部分连营干部，太湖边的一些乡长、自卫队长，不少是赵的部下，在东太湖一带影响较大。赵就利用同乡、部属的关系，联络感情，组织群众。当时太湖里湖匪很多，赵安民组织他的部属下太湖，名为打富济贫、打击奸商，实际上是去联络散匪，再予改造，组织武装。至解放时，赵安民已有力地控制了东太湖一带的自卫队武装。

赵安民入党后的组织关系一直由上级党组织负责同志直接单线联系。中共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多次秘密到吴江对赵布置工作。10月，上海局外县工委书记周克（化名胡逸云）也曾秘密到吴江活动，与党员赵安民、费旭初单线联系，传达上级党的有关指示，布置“里应外合，迎接解放”的任务，推动了吴江工作的开展。为配合搞武装，赵安民经上级组织同意，在吴江太湖任苏州抗战遗族学校农场场长，以武装农场工人，组织地下军。1949年1月，上级党组织指示赵打入国民党国防部苏浙皖边区保安纵队第二团（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任团长，以期拉出武装，策应解放军渡江，未遂。赵旋即又去上海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的总部（大西路20号），打入特务训练班听课，成为毛森特派吴江的直接“通讯关系”，大大有利于党组织了解敌人内部情况，搜集情报。

【青年工作的开展】倪明在和校外人士接触中，还发展了费旭初入党。费是倪明的哥哥倪达幼时的同学，早年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校读书,抗战胜利后失业在家。倪明通过哥哥倪达了解到费旭初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对倪的姐姐淑英到延安参加革命十分钦佩、向往。倪明经过与费旭初接触交谈,感到费对时局确有一定的认识,就把他作为一个经常联系的对象。当时为了活跃进吴江中学的气氛,倪明因势利导推动学生成立青年歌咏队,并邀请和鼓励费旭初去教唱歌,费教唱了不少进步向上的好歌曲。其中抗日歌曲有《松花江上》、《太行山上》、《打回老家去》等;民歌有《小白菜》、《康定情歌》、《红河波浪》等,以及在苏州、上海学生中流传较广的讽刺歌曲,如《茶馆小调》、《古怪歌》、《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等。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教唱了一些旗帜鲜明的歌曲,如《你是灯塔》、《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是熔铁匠》等等。费旭初对教唱歌是认真的,且能注意场合、掌握分寸,在青年学生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歌咏队很快发展壮大,以吴江中学为基础,吸收校内外一些学生和青年参加,组织了吴江青年歌咏队。1948年1月,由倪明介绍,高山批准,发展费旭初入党。

吴江的青年工作,很快发展到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学校。吴江中学学生党员陈关孝经组织同意,自1948年下半年起,进省立吴江乡师读书,推动了乡师革命活动的开展。8月,中共党员李枫到吴江乡师任教。李的组织关系原属南方局系统,在吴江期间由上海联系。李枫在吴江配合和支持了吴江乡师革命工作的开展。乡师进步师生办起了小型图书馆,藏有《李有才板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批进步书籍。一些进步学生参加了吴江青年歌咏队。李枫积极鼓励进步学生开展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吴江中学、吴江师范涌现了一批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吴江青年同学会】吴江青年同学会是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王新五所建立的。王新五于1946年5月在复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冬,他因病回吴江家里休养。

根据上海党组织的指示,王新五在健康基本恢复后,即在吴江社

会上开展工作。他首先推动在外地上学的吴江中学毕业生马兴、夏枫等,在暑期中组织“吴江旅外同学会”,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随后,为了扩大影响,进而团结教育校内的学生,将“吴江旅外同学会”扩大为“吴江青年同学会”,吸收吴江中学和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的进步学生参加,同学会的会员人数增至100多人。吴江青年同学会主要开展了下列工作:

一、开办“江友”图书阅览室。“江友”阅览室藏有不少进步书刊,其中有《文萃》、《观察》、《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有《竖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四十一》等苏联文艺小说;有列宁的《怎么办》、李昂言也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解放区见闻录》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有内部阅读的党内刊物《群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进步读物等等。阅览室在学校放假期间,由青年同学会同学轮流值班。平时主要由王新五值班。“江友”书报阅览室对广大社会群众开放,还订有一些当时公开出版的报刊为掩护,如《新闻天地》等。阅览室对进步青年介绍苏联文艺小说,对其中比较了解的青年就推荐他们阅读《解放区见闻录》等读物。对会员中比较可靠的学生,则组织他们在内部阅读党的刊物《群众》。阅览室是王新五用面临吴江中山街的他家的两间空屋设立的,几百册书大部分是王新五拿出来的。解放后在吴江建立县新华书店时,就是利用了“江友”图书阅览室的房屋及设施开业的。

二、出版《江友》油印小报。小报由王新五组织,马兴主编。《江友》结合当时的时事政治形势,揭露反动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刊登《密勒氏评论周报》上的译文或从陕北解放区电台广播中收听记录的有关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还介绍各地高校学生运动的动态,以及吴江青年学生的活动情况等。在胜利捷报频传的时刻,《江友》出了专刊,印发传单、小册子,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广为传递,宣传了革命,鼓舞了斗志。

吴江青年同学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王新五通过办暑期补习班、放电影、搞义卖来筹措的。电影片是由马兴向他母校——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联系取得的。

第六节 丹北党员在同里的活动

【同里支部的建立】 1946年10月,北撤的丹北工委特派员孙瑞成,受上级派遣,返回苏南开展工作。到上海后,由于叛徒出卖,同行的党员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孙瑞成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无法返丹北地区开展工作。

1947年4月,孙瑞成到吴江,通过表兄吴伯荣的关系,在同里镇立足。当时,吴伯荣在同里镇鼎泰南货店工作,孙瑞成去后,即以鼎泰南货店职工的身份为掩护,并改名为孙云峰。尔后,孙瑞成又带党员柴培元、张泽华来同里活动,公开职业是开设新鑫糖果店。

1947年下半年起,孙瑞成开始在同里镇建党。同年冬天,孙瑞成到上海,向原十地委组织部长陈云阁作了汇报。

1949年1月,孙瑞成离开同里时,布置吴伯荣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期,建立了中共同里支部,吴伯荣任支部书记,支部先后发展了14人入党。

【邹月娥惨案】 1947年6月4日夜10时左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九军官总队驻同里中队的军官5人,闯入同里镇西弄女教师邹月娥家,以暴力将邹月娥轮奸致死(邹月娥,时任同里镇南濠弄小学教师,24岁,尚未婚配)。惨案传出后,全镇轰动,全县惊悚,群情激昂,切齿愤慨。中共党员孙瑞成因势利导开展工作。孙布置表兄吴伯荣以同里镇南货业同业公会负责人的身份,在商会中积极活动,并与各界联系,鼓动群众迅速行动,开展斗争,要求严惩凶手。5日,同里镇商会开会,吴伯荣在会上鼓动商界迅速行动,支援学校斗争。

同里镇学界、商界纷纷行动起来,投入抗议斗争。同日,同里镇

5所中小学宣布联合罢课。7日,全镇一致停业、停工、停课,各界联合召开追悼会,并进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为防止军官队凶手溜走,孙瑞成及时对自卫队班长展开工作,要他们查封轮船码头,不准军官队进出。军官队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示威民众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三点要求:一、严惩凶手;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三、所有军官队一律从民房迁出。不达目的,誓不复课、复市。

6月8日,同里镇继续进行“三罢”斗争。下午各界成立“邹月娥惨案后援会”,广泛呼吁,争取同情和支持。《大公报》、《大江南报》、《苏州明报》纷纷刊登惨案经过,报道事态的发展。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10所大学的吴江旅外同学,联合致电吴江县县长,强烈要求缉拿凶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迫使国民党监察院将凶手逮捕法办。6月11日,在吴江对凶犯进行公开审讯,民众达两千多人。同里邹月娥事件的斗争胜利,说明民心不可侮,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第十章

迎接解放的斗争和吴江的解放

第一节 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经过战略决战,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人民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充满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各级党组织和全国人民为此精神振奋。

此时,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十分紧张,大批调动各区区长,频繁调换乡镇长。整建县保警大队、民众自卫队、常备中队,乡镇全部设置班。重新筹备了以严墓、芦墟、横扇3区为中心的联防办事处。并整编了保安团,将县属保警第一、二大队改编成保安团第一、二营,将城区、同里、芦墟3个区11个乡镇的常备班及两个常备中队,改编成保安团的直属部队,设机炮连、搜索排、通讯排、输送排、担架排。将黎里、盛泽、横扇、震泽、严墓5个区27个乡镇常备班改编成保安团。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孙启人一行10余人,由苏昆吴联防指挥官陪同到达吴江,并在吴江乡师大操场检阅官佐士兵1800多人。联勤总司令部第二五二医院奉令调驻吴江同里,随院迁来伤员1000余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直属营奉命调到吴江。省保安第二纵队直属淮阴、淮安两团亦溃退至吴江,驻平望镇。省保安第二总队,改编为第一

旅,驻平望、震泽、梅堰等地。县长卢起勋向省要求拨发七九式子弹 20000 发,六五式子弹 10000 发,步枪 300 支,轻机枪 15 挺。驻盛泽的浙江嵊县交九总队奉命移拨步枪 30 支给盛泽区署。同时,吴江城区实施戒严,晚上 11 时起,各城门一律关闭。

【筹建吴嘉湖独立团】 在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上海局发出指示,党的中心工作是加强情报与策反工作,为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做好准备。此时,吴嘉工委抓紧开展了统战工作。沈如淙及时把嘉兴县参议员刘先正介绍给金佩扬,进而对刘宣传形势,指明前途。刘先正抗战时期曾在浙西独立支队任职,并任国民党王江泾区区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嘉兴县参议员、县农委常务理事。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和乡镇国民兵队和自卫队中有一定的影响。吴嘉工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刘先正在嘉兴的特殊地位,决定争取刘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刘先正积极工作,要求进步,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党的工作提供很多方便。此后,刘协助党安排外地领导同志陆文杰、胡训模等转移到他家隐蔽。1948 年下半年,刘先正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与钱品康一起刻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散发。

这段时间,党组织利用策反工作的基础,抓紧时机,策动起义,筹组武装。金佩扬、沈如淙两人对解放战争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在这个地区建立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成立一个团建制的武装队伍。经商定,由刘先正任队长,沈如淙任政委。武装力量来源,一是以原武工队成员和部分地下党员为骨干;二是动员当地一些青年农民参加;三是对一些乡镇自卫队加紧策反工作,争取他们起义。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沈如淙和刘先正作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4 月初,沈如淙、刘先正与金佩扬派来联络工作的俞双人一起在双桥乡商量策反工作,俞双人传达了金佩扬关于抓紧成立独立团的意见。策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商定后,又作了具体的分工,沈如淙、刘先正、钱品康等密切磋商,抓紧时机,积极活动,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如加强了对乡镇国民兵队和乡镇自卫队的策反起义工作。为加强部队内党的力量,中共吴嘉工委通知坛丘大谢、青云、南麻、梅堰、盛泽等乡镇 25 名党员携带步枪 8 支、短枪 13 支先后到独立团报到。这支刚建立的部队有中共党员 60 余人,还有 50 多名进步学生和工人参加。

1949 年 4 月 19 日,各路队伍 400 余人,携带长、短枪 397 支、轻机枪 4 挺,在江浙交界的新农乡新桥庙会合。该部大部分是起义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沈如淙代表中共吴嘉工委郑重宣布独立团成立。并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团长刘先正、政委沈如淙。又向全体战士进行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独立团宣告成立后,部队即从新桥庙北移至徐家埭暂住,确定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军区直属吴嘉湖独立团”。刻了一枚长方形图章,颁布营、连级干部委任令。吴嘉湖独立团是中共吴嘉工委领导的革命武装。它的建立,有力地争取了乡镇国民兵队、自卫队的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在吴江、嘉兴地区的反动势力,保护了地方安全,减少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对迎接解放作出了一份贡献。

【争取社会上层人士】 1949 年 2 月,陈伯亮另接任务去了杭州。3 月,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杭州市委,林枫任书记,陈伯亮为委员之一。接着,陈伯亮调金亮去杭州,金不再担任吴嘉工委委员。陆雪林亦离开吴江调到杭州搞策反。

各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在全县各地抓紧了对上层人士的教育和控制,使他们为人民做工作。

在吴嘉工委的领导下,抓紧时机开展争取社会上层人士的工作。金佩扬等曾先后对毛海涛、蔡章汉、沈法宪、汝志强、凌志清、周建勋、吴福增、陈德钊、王怒本等当地上层分子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向他们约法三章,晓之以理,要他们维护好社会治安,为人民做有益的事。

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敌人内部开始动摇,一些上层人士顾虑重重,想找出路。对此,地下党组

织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如同里有个乡长,思想动摇,想找关系靠拢地下党,澄锡虞工委的吴江党组织派党员吴剑清、王彦萍直接与他面谈,进行政策教育,指明出路。在他表示诚意的情况下,向他提出了保证我们活动安全、敌人的行动计划要及时汇报等条件,他完全接受,并且切实地做了一些工作。接近解放时,朱帆、王彦萍、吴剑清等在同里乡下活动,一次在青庙庵碰到同里镇自卫团,朱帆等以“乡长朋友”的身份及时脱险。

苏锡吴工委系统党员费旭初通过吴江基督教“四维堂”牧师费因笃和“普益书报社”进行活动,争取各界人士,扩大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在华中一地委联络部领导下,马宁从苏北返回吴江,对吴江县政府军事科长开展工作。

各个党组织在争取上层人士的工作中都能够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开展争取工作,瓦解和动摇敌人,尽量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最反动的少数人。

【控制地方武装】 1949年初,吴江各地控制地方武装的工作深入开展。黎里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平静人和党员凌肇基向黎里区长沈法宪及叶仲廖、杨继生等继续开展工作,先后有10多名党员打入黎里镇工商自卫队。黎西镇由沈明德负责,黎东镇由张淦泉负责,基本上控制了黎里的地方武装。芦苇厍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吴关龙和党员张鹤鸣向芦墟区长汝志强、镇工商自卫队大队副马杰开展工作。盛泽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俞双人和党员张伟道向盛泽民众自卫队队长张阿金、王南峰开展工作,并控制了盛泽镇自卫队;平望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张振海和党员顾其行通过王振欧关系,控制了平望一镇四乡的地方武装;党员周凤池控制了八都乡自卫队武装;党员凌行可控制了周庄乡的自卫队武装。

在吴嘉工委的统一领导下,桐乡县的统战策反工作也抓紧进行。全体党员做好护厂、护校、护仓(粮)的工作,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促使自卫队起义投诚,桐乡全境和平解放。吴嘉工委

的工作还扩展到浙江南浔、塘北地区,发展党组织,并派员打入乡政府,通过策反工作,使该地区的乡镇自卫队为地下党所控制。党员沈彬和江沙掌握了南浔镇自卫队和水警队。党员秦家书等把所控制的塘北武装全部集中在轧村一带。吴江党员周凤池控制的八都乡自卫队也集中于轧村,共有 300 多人。

1949 年 1 月,澄锡虞工委调苏锡工委负责人吴甦到同里接替朱帆,领导吴江工作。吴甦到同里当晚,镇自卫队以查户口为由,将吴扣押。交通员许丽娟通过寄娘周桂英作保获释。吴甦去锡东,吴江工作仍由朱帆负责。

澄锡虞工委吴江开辟区的同志在解放前夕阳,抓紧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策反工作。党员张健在苏北由十地委委员、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派遣,单独渡江南下,化名李海明,打入南库乡自卫队,进行艰苦的策反工作。临近解放时,依靠党员缴了队长的枪,拉出一个班,配合当地解放。李海明在工作过程中,敌人对他曾有所怀疑,把他开除出自卫队。他被开除后,仍一个人坚持留在南库镇上,冒着风险,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策反工作的顺利进行。丹北同里支部的党员,按照党支部的布置,认真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同里镇自卫队员全部集中在镇郊青庙港,武器没有遭到损失。同时保护好镇上的工厂、仓库,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

吴江各个系统的地下党员,在各地都先后展开了对自卫队的策反工作,有效地控制了各地的武装。

【调查敌情社情】 吴江各个系统的党组织还布置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搜集本县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名单、政治经济情况、内部派系情况、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人员、武器装备以及地方知名人士的情况。

吴嘉工委系统党员王胜华打入黎西乡当乡长,掌握全乡情况。张鹤鸣打入汾玉乡任保民代表主席,开展工作;平静人、平流芳被派去当保长,了解黎里镇的敌特动态;凌行可进周庄乡公所,了解敌情,控制武装。工委所属党组织还通过各种渠道筹粮、筹款,做了大量的

工作。

吴嘉工委为防止土匪胡伯龙冒充共产党“接收”震泽镇，布置南浔地下党员沈彬、傅侃，用油印的公开信通知各地提高警惕。地下党员江沙将信件带到震泽邮局分散投寄。

澄锡虞工委党员李海明根据组织布置，找到南浔自卫队的郑新生、吴清新，要他们迅速控制武装，并详细了解南浔至吴江的公路桥梁编号、行车吨位、宽长等。与此同时，党员吴大根被派到同里镇去侦察敌情，全体党员在各地严密监视敌军动态。

此时，中共苏锡吴工委系统的党组织布置青年学生开展对敌情、社情进行系统的调查了解，从各方面汇集敌人的党政军情况，有工厂、学校、医院、银行、仓库以至社会团体等情况，整理后送交上级，为解放军顺利接管提供了资料。此时，马兴已由周昭介绍参加地下青年团，在华中一地委的江南工委联络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上布置马宁回吴江，收集吴江县的党政军情报。党员费旭初在苏州工委的直接单线联系下，搜集情报。“吴江青年同学会”在党员王新五的组织下，写出县城国民党各机关、警察局、保安队的驻地及电话号码，并将粮食仓库等画了地图。还弄到了吴江县银行保险箱的钥匙，把情报和存款及时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统一迎解放的行动】 1949年2月，陈伯亮要金佩扬以吴江芦墟为中心，利用芦墟区长汝志强的关系，负责联系松江胡训模、青浦钟秀、昆山宋学廉、嘉兴沈如淙，开展工作。后来又接到陈伯亮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去苏州接受新任务。工委书记张云曾布置金佩扬到吴江，下太湖去领导赵安民，控制松陵、南浔、八坼、溪港、横扇等地的乡政权及自卫队的1000多人枪。吴嘉工委的关系由此转到苏州工委，由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直接联系。

解放前夕，吴嘉工委要求党员加紧做好工作，并统一部署了各地迎接解放的联络信号，并确定了各地内线接应人员，安排了向导。与此同时，金佩扬和赵安民一起，一个乡一个乡地检查自卫队，登记人

员、枪支,并且进行动员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集中一部分人,破坏了八坼、胜墩附近的几座桥梁和敌人的通讯线路,还集中一部分人靠近吴江城西南角,打冷枪扰乱敌人。

在迎接解放的这段日子里,澄锡虞工委吴江开辟区的地下党员到同里以南朱斌家附近的农村,在农民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解放军即将过江,反对交租、抓丁,反对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剥削,开展保丁、保粮、反剥削斗争。

4月21日下午,朱帆在周家溪和朱林芳商谈迎接解放大军过江的准备工作,深夜回到石灰窑上。第二天,张根生进城查实情况:解放军确已过长江,无锡以西的沪宁线火车已经停驶,苏州敌人已准备南逃。党组织迅速动员窑上所有党员及工人,向周围群众大力宣传解放军已经过江,江南即将解放的胜利喜讯。发动沿途群众立即监视公路、运河,准备应付苏州等地敌人南逃时拉夫抢掠。并立即派人分别通知吴明、李海明、陈阿大、顾加生剧团等到庞山湖农场集中,以便安排行动。4月22日下午4时左右,发现国民党军队沿公路布防。傍晚,大批车船沿公路、运河南下,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及家属。苏州以南的尹山桥、三里桥、八坼大桥等一线,全被敌军占领并封锁;沿途抓船抓夫、抢粮抢物。入夜,党组织带着周围群众,撤退到庞山湖农场暂避。并派人在庞山湖西堤放哨,监视敌人的行动。可是未到深夜,石灰窑已有国民党残兵上去搜索,庞山湖以西农村,均已受到威胁。朱帆、吴明接到工委政治交通员许丽娟交人送来的澄锡虞工委关于与解放军接头的密件,迅速进行了布置。

23日清晨,集中起来的党员和工农群众二三十人,转移到同里南面钱家厍、胡豚港一带宿营。晚上,吴明等从周庄赶去会合,同里镇自卫队一个中队拉到同里以南的青庙庵投诚。李海明等缴了南厍自卫队长的枪,率领二三十人带枪起义,向庞山湖农场靠拢。至26日晚,集合起来的人已达50多人,遂举起了大红旗,开进庞山湖农场办公室,登上农场瞭望塔,解放了庞山湖农场。

苏州市解放后，澄锡虞工委的吴江党组织即和苏州市军管会接上了联系。此时，吴江城内国民党的党政头目都已逃跑，国民党部队一个营（团部驻平望）还在敲诈勒索，掩护败兵残部南逃。地下党组织严密监视敌军动态，警惕敌人作垂死挣扎，坚持以庞山湖农场作基地，解放军不到不进城。

【击退土匪对黎里的袭击】 1948年秋，金佩扬派俞双人（化名王金才），以中共党代表的名义深入胡伯龙匪窝，进行争取工作。嗣后，金佩扬与沈如淙一起找胡伯龙在嘉兴九里汇附近谈话，晓以革命道理，要他弃邪归正，服从共产党领导。但胡伯龙匪性不改，百般阻挠。胡化名“龙天飞”，诡称“苏浙皖边区政府特派京沪杭督导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旅”，为非作歹，结伙抢劫，四出要钱要枪。中共吴嘉工委领导决定与之断绝接触，并向各地党员传达了这一决定。

解放前夕，土匪胡伯龙部诡称共产党，企图“接收”黎里镇。黎里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平静人分批召集党员沈明德、凌肇基、张振松、张淦泉、周双喜、包一鸣在“小小商店”作紧急布置，强调凡是自卫队员立即进入据点，严阵以待。经我地下党的长期工作，我方已经控制了区大队、短枪班、镇工商自卫队、黎东、黎西乡中队等。当时，短枪班在班长杨连生（地下党员）带领下驻守夏家桥区署；党员沈明德、金世楨、干勇祥把守了镇西原日本宪兵队驻地的炮楼；党员张淦泉、黄荣奎守住南港油车；自卫队还担任镇上的巡逻工作。

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夏家桥区署门前响起了一阵枪声，短枪班跃登区署办公楼屋顶，居高临下，猛烈击退匪徒。在南港油车据点，自卫队顽强回击，打得匪徒们仓惶溃败。胡匪又窜到楼下浜口，被区大队击退。西南栅碉堡的自卫队员严守阵地，狠狠回击，打退了妄图两面夹攻的匪徒。驻在东栅煤水滩、梅兰桥一带的县保安队员百把人，还没有被地下党控制，胡匪一进攻，就不战而逃了。战斗持续到晚上八九点钟结束，彻底击溃了胡匪的疯狂进攻。战斗中，击毙

匪徒1人,打伤六七人,活捉1人,缴获枪械多支。胡伯龙在进攻前,准备好一条轮船、几条大木船,停泊在黎里东栅八角亭旁,一俟进攻得逞,即可开进镇里掳掠抢劫。在地下党组织的指挥下,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保护了当地人民的安全,使全镇人民避免了一次劫难。当时国民党黎里区长沈法宪、区大队副孙克勇和镇工商自卫队专职大队副胡绍麟,在地下党的指挥下,为击退胡匪出了力。

胡伯龙一伙在黎里失败后,又窜到盛泽镇活动。盛泽镇地下党通过已掌握的自卫队,积极开展斗争,并组织工人纠察队,把武装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胡匪的阴谋未能得逞。

【开展护校斗争】 1949年2月,上海学委通知浦作将他所联系领导的苏州学生工委的党组织关系,全部移交给中共苏州工委统一领导。薛杰、陈邦辛等参加苏州工委下属的青年区委;工委委员马崇儒兼区委书记,薛杰为副书记。

3月初,中共苏州工委学生区党委副书记薛杰,化名丁柳,到吴江中学与赵广祥联系,还单线向费旭初传达了上级“充实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3月底,在苏州临顿路茶楼上,赵广祥与薛杰第二次接头。薛布置了迎接解放的具体工作,要求在解放大军渡江、国民党崩溃这一重大政治变革中,不盲动,要尽量维持好社会秩序。并要进步师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护校队,保护好学校的财产。薛还正式通知赵,将在吴江的上海党员王新五的组织关系,转给吴江中学党支部,至此两条线会合。但由于当时形势的局限,工作虽统一布置,活动仍分头进行。

此时,党员费旭初组织进步青年深夜收听新华社广播,编写小字报递送,使胜利的消息及时在进步师生中传播。“青年歌咏队”的活动也更加活跃。赵广祥和王新五接上头后,赵常去王住的楼上小房间里,秘密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将收听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全文记录下来,由赵广祥交给王寄南去刻印张贴。同期,赵广祥在吴江南门外油菜田头,召开吴江中学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赵

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要求全体党员做好与自己接近的同学的工作,尽量动员同学不要离开学校,全力保护学校,让学校完整而有秩序地交到人民手中。4月下旬,我解放军已渡江,胜利形势迅猛发展。苏嘉湖公路交通断绝,吴江城里到处住着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为防止过路国民党军队到学校干扰破坏,党组织迅速布置吴江中学和吴江乡师成立学生联合会,把两校的进步师生联合起来,全力保护好学校。两校均组织了护校队,学校大门由护校队员守卫。白天轮流站岗放哨,晚上手执木棒值班,在校内巡逻,以应付外来干扰。与此同时,把新华社广播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用毛笔写成大字布告和油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起贴到县城几条主要街道上,有力地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党员史月娥、王无非等为保障安全,曾将一些进步书籍密藏在石板下面,晚上又转移到校园后面的河浜里。

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振奋人心,青年学生情绪日益高涨。解放前夕,同学们大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的队伍来了》等歌曲,还组织起秧歌队,大扭秧歌舞,迎接新历史时期的到来。

【地下团的活动】 1949年1月,中共太湖县留守处根据华中一地委江南工委的指示,为壮大革命力量、迎接解放,决定在苏州组建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新青团”),并指定团员程伯皋、沈立人进行筹建工作,秘密发展有革命愿望的进步青年入团。2月,沈立人回家乡吴江县芦墟镇,通过九曲弄小学教师宣镜渊、冯培先开展工作。不久,发展青年教师袁荀、陈力及社会青年陈擎天入团。尔后,又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分别发展了夏怡曾、王仲煊、殷安如等人入团,建立了地下团芦墟支部。袁荀为支部书记,陈力、陈擎天为支部委员。接着,团支部又在小学教师和分湖中学初三学生中秘密发展了费多等一批进步青年入团。

后来,为适应工作需要,团支部改为团区委,区委委员除原来三名支委外,又增补夏怡曾、王仲煊、殷安如,袁荀仍为书记。团芦墟区

委共有团员 29 人。

团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及时开展工作。组织团员青年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地下团编印的《新民主报》等文件书刊;组织收听解放区电讯,编印宣传品《民报》,秘密散发;布置内线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团结周围青年,组织学唱解放区革命歌曲;宣传胜利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做好护厂、护校工作,以配合芦墟镇的解放。

第二节 县、区党政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白蒲组编】为了迎接解放,尽快建立新区的人民政权,中共华中工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随军南下,接管国民党各级政府。调集胶东、两淮、盐阜等地的地、县干部,南下如皋白蒲镇,组建中共苏州地委及常熟、太仓、吴江、昆山等县的领导班子,并着手调配区级干部,做好南下后的接收准备工作。

自 1949 年 2 月开始,胶东的南下干部日夜兼程,由胶济路、津浦路到陇海路,经沭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泰州到达白蒲镇。山东和江苏老区的人民情绪高涨,筹军粮、做军鞋,热情组织民工队、担架队、运输队,全力支援解放大军南下。满载粮草和战备物资的车队,浩浩荡荡,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奔向前方。

由胶东、两淮、盐阜调集的干部组成的中共苏州地委及吴江县委领导班子,进驻白蒲集中训练,作好渡江接管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接管的干部队伍基本上是按照接管各县的要求编组的。吴江县的南下干部队伍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中队。3 月 23 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报道,各队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报告,还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学习了济南、昌潍新区工作的经验,学习陈毅司令员署名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布告》，学习《入城纪律守则》以及有关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南下入城的政策和纪律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干部队伍的同志大部分出身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面临着接管城镇的新任务。通过学习城市政策，大家了解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和因城镇的特点而产生的不同于乡村的政策、工作方法和组织方法，还学习了“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方针。吴江中队袁焕（同里人，1946年3月入党，由两淮市派遣参加南下干部队伍）在白蒲向接管吴江的干部介绍了吴江县的详细情况，江南工委还给吴江干部大队送来编印的《吴江材料》，详细介绍地下党收集的有关吴江县国民党党、政、军、警、监狱、交通、商会、银行及学校等情况，为接管工作提供了材料和依据。同时，决定了吴江县、区的干部任职名单，准备南下与吴江地下党会合。接着，又按统一规格刻制了县委、县人民政府、区委、区人民政府的印鉴图记。“吴江县人民政府印”于4月19日正式启用。

【渡江南下】 干部大队每人发一套解放军粗布军装。为了顺利渡江，领导要求干部队伍轻装前进，男同志行李不得超过7斤，女同志行李不得超过5斤，多下来的行李物品一律交留守处保管。渡江日期日益迫近，在4月20日前一两天，干部大队向长江边南移。全体人员都穿了军装，胸前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大家英姿勃勃，纪律严明，轻装前进。一路上经过村庄时，群众夹道迎送，有的还敲锣打鼓，鼓掌欢迎。

4月21日夜，渡江战役的炮声响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湖口的长达千里的长江沿线，千帆竞发，乘风破浪，突击渡江。反动派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顷刻土崩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红旗插上蒋家王朝的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南下干部队伍的渡江时间,由苏南行署统一安排。4月25日下午3时许,长江江面上帆船桅杆林立,数不尽的大小船只载着一批又一批的胜利之师渡江南下。江面上景象十分壮观,人们心情万分激动。第一大队吴江中队的同志,在八圩港乘坐指定的木帆船,顺利到达江阴夏港,第二天踏上去无锡的公路。

4月27日,苏州解放。当日下午,第一大队乘上无车厢的平板火车,从无锡到达浒墅关。因浒关大桥被炸,全体干部下火车沿铁路步行,一直走到苏州,当晚就住宿在火车站的站台上。4月28日,经新民桥、阊门、石路,进驻盘门。在苏州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委书记周克、中共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向吴江县委书记鲁琦等负责同志介绍了吴江县地下党的组织情况。

第三节 吴江全境解放

【地方武装入城】 吴江解放前夕,一批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经过吴江县境,逃往上海。乘车的,坐船的,步行的,没完没了。他们还四出骚扰。驻扎在吴江的国民党一二三军顾锡九部,听到解放军胜利渡江、节节推进的消息,如惊弓之鸟纷纷向东溃退,拉夫抢粮,炸毁桥梁,破坏公路,向地方摊钱摊粮,以图苟延残喘。国民党政府机关要员胆颤心惊,乱作一团。县长卢起勋等隐避平望,准备逃离;土匪四处抢劫,敲诈勒索;市场混乱,物价飞涨;封建势力勾结匪特,乘机造谣;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渴望早日解放。此时,吴江县各个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为迎接解放,控制地方武装,维护社会治安,做了大量的工作。

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在全县各区组织自卫队,名义上是维护地方治安,实际矛头是指向日益活跃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能不能掌握武装为我所用,成了顺利解放吴江全境的关键。金佩扬与赵安民接受下太湖的指令后,一起从苏州到吴江。吴江自卫队长陈德钊,南厓乡长王恕

本,横扇乡长、自卫队长周建勋、吴福增已在等候。金与赵连夜下太湖,至南厍乡下住下,一起生活。东太湖一带的乡长、自卫队长,有不少是赵的部下,赵在太湖一带影响较大。同期,金佩扬调溪港党员陈乃元、盛泽党员张玉良担任交通工作。吴江音乐教师费旭初也来到太湖,随金佩扬、赵安民一起活动。费是1948年1月由中共苏州工委书记高山批准发展入党的。

1949年4月28日晚上11时半,中共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与党员赵安民带领地方武装400余人,从太湖四都村迅速进入县城。金、赵进城后即关闭城门,派武装人员看守好政府、监狱,保护银行、档案、商店、工厂,维护地方治安,其余人员全部登城监视,防止城内外敌人破坏。

【胜利会师】 29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〇团顺利挺进吴江,由北门进入县城松陵镇。当日傍晚,鲁琦带领南下干部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一行93人从苏州盘门出发,晚上9时,从吴江北门进入县城。金佩扬、朱帆等地下党同志与随军南下接管政权的干部队伍胜利会合。地下党组织在城厢保存了8千多石大米,以供军需民用。吴江中学、吴江师范的同学们兴高彩烈,大唱《我们的队伍来了》等革命歌曲,集体跳起了秧歌舞,校园里一派欢乐的气氛。同学们满怀激情,奔向街头,用彩色油光纸书写张贴“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的标语。

5月1日,吴江县城各界人民召开庆祝大会,晚上举行火炬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人民革命的胜利,盼望早日解放全中国。

【保卫震泽】 在震泽镇,民主人士沈求我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安排下,开展了迎接解放的工作。

1948年,民盟成员沈求我根据我党组织布置,回家乡吴江县震泽镇,在下塘东栅以开设“惠农米行”为掩护,开展工作。不久,沈求我即与南浔中学教师徐迟、孙慎接上了关系。徐迟是按照党组织布置于1946年10月回故乡南浔执行任务的。中共党员孙慎(孙学

毅)是由徐迟介绍到南浔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此时,南浔中学有一批进步教师,如林黎元(时任浔中校长)、杨光波、郑明涛等,中共党员还有姚逊、王传义等,校内革命气氛浓烈。1948年1月,南浔中学校友邵家骏从苏北解放区秘密回到南浔,即到南浔中学与徐迟、姚逊、林黎元密谈,筹划迎接解放的事宜,并确定由徐迟负责去上海进行联系,震泽镇与南浔镇毗邻,近在咫尺,两地往来密切,音讯互通。震泽沈求我与浔中徐迟接上关系后,秘密联系不断。沈求我根据急速发展的形势,决定充发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抓紧对震泽镇工商自卫大队开展工作,随时注意自卫队的动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策反工作。沈求我加快试探和接触镇工商自卫大队队长、副大队长,向他们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希望他们识大体,多做与民有利的事,丢掉幻想,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当时震泽商会的一些人,眼看国民党反动政府江河日下,败局已定,担心混乱局面的出现,深感忧虑,急于寻找自己的出路。沈求我抓住时机,加强对商会的联系,团结稳定工商界人士,及时发展了一些工作关系,深入开展工作。1949年2月初,邵家骏从苏州写信给浔中校长林黎元,告知“老板将于4月份来开分店”,暗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4月份渡江南下。徐迟等得悉后,欣喜异常,迅速作了布置。沈求我要镇工商自卫队在解放军到来之前,把队伍全部集中,做好保护地方和安民工作,向解放军投诚,争取震泽镇和平解放,要大家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尽力。镇商会多次开会讨论,充分分析了形势发展,决心主动选择自己的前途,为保障震泽镇的安全出力。镇商会通过各同业公会,动员全镇各行业在解放前夕照常营业,以稳定全镇商界和居民的生活。同时商会筹借资金,保证工商自卫大队的供给费用。工商自卫大队在镇的四栅造了工事,日夜轮流站岗放哨,对镇商会也加固了防御工事,着装守卫。由沈求我负责与南浔保持联络。4月15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紧急召徐迟去沪接受任务。徐迟回来后,即与沈求我联系,传达了指示。沈求我在震泽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以迎接最后胜利时刻的到来。

4月下旬,震泽镇一带形势十分紧张。4月27日,自称“解放军太湖区吴江警备区司令员”的陈大瑶(实为军统国防部保密局吴江专员),与诈称“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吴子丰(吴林枫)一起,带360多人,全副武装,迫不及待要“接收”震泽镇工商自卫队的枪械。在沈求我等的组织下,他们的阴谋很快被镇自卫队识破、挫败,该匪部沿田鸡坝向严墓以北潜逃。4月29日夜,江苏省保安九团闯入震泽镇周围,破坏了镇东栅的公路桥梁,并埋下炸药,还欲闯入镇上抢劫库存的几万石大米。镇工商自卫队坚决进行了阻击,保安团遂慌慌张张地炸掉小桥后逃走。4月30日中午,江苏省水上警察总队司令张少华率部1000余人杀气腾腾地进攻震泽镇,镇工商自卫大队急起阻击,双方激烈交火。水警队久攻不下,只好仓惶转东,洗劫梅堰、平望一角。沈求我于30日下午匆匆赶到南浔中学,与徐迟、孙慎商定:得震统一行动,互相呼应,争取同时解放。那时,已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4月28日抵达湖州。遂决定立即由徐迟、孙慎步行去湖州联系解放军,沈求我留在南浔等候消息。5月1日下午4点半,徐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政治部打来电话,告知已在去湖州途中遇上解放军。解放军同意临时改变行军路线,挺进南浔、震泽。当日夜,忠救军突击挺进队企图进入震泽镇,大队人马被镇自卫队阻在镇外。队长陈晋凤等10多人闯至震泽镇斜桥河工商自卫大队部,胁迫镇自卫队随他们开走,下太湖打游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求我从南浔打来电话,报告已与解放军取得联系的喜讯。沈求我指名陈晋凤听电话,严正警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七军今夜挺进南浔,倘不服从,解放军骑兵将于二十分钟内到达震泽,坚决镇压,决不宽贷。”陈等不敢妄动,遂向严墓逸去。

5月2日下午5时,二十七军八十师整齐威武地开进南浔镇。与此同时,沈求我与该军七十九师二三七团团团长李启明和政治处主任温茂卿取得联系,商谈了震泽镇和平解放问题。沈求我旋即通知震泽镇工商自卫大队长沈天保、大队副陈耕学火速赶到南浔。当天

下午,在南潏镇郊外,由温茂卿主持,接受震泽镇工商自卫大队缴械投降。

5月3日凌晨3时半,震泽镇东洋桥高悬汽灯两盏为号,沈求我等提灯在公路上迎候,震泽镇工商自卫大队全体队员在镇东公路上徒手列队迎接。解放军七十九师二三七团从东洋桥进镇。全镇居民群众、商店职工欢欣鼓舞,争睹解放军风采。

【全县解放】 由于吴江县各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事先周密工作、密切配合,吴江县其余几个大镇紧接着先后顺利解放。

苏州一解放,国民党同里区长得到消息后,派人到庞山湖农场联系,邀请地下党进驻同里镇。党组织及时向区公所通电,约法三章。并派张根生为代表,去同里向区长宣传形势,进行谈判,要他们保护好同里镇的安全,照常开店营业,等待解放和接收。同里区长接受条件,同意投诚,地下党直接控制了同里地方武装。4月30日,以澄锡虞工委地下党员为向导,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〇团以三营为前锋,进驻水乡古镇同里。接着,部队往屯村方向追击匪船,击溃土匪后经苏州去常熟。

黎里地下党负责人平静人与党员周一非等于4月30日赶到吴江,找到金佩扬汇报情况。后带回一批布告和宣传品,由周一非带到八坼,王仲威用小网船运到黎里,凌肇基、包一鸣、周双喜、朱和坤等同志于5月2日深夜突击把布告张贴在黎里大街上,以安定民心,防止胡伯龙匪部再行冒名骚扰。次日清晨,每个贴布告的地方都围满了人群。区大队全体成员佩带红臂章起义,全镇商店挂红旗。黎里在地下党控制下,保护粮食3300多石。

从前线败退下来的一批批国民党军队,沿着京杭大运河仓惶溃逃,沿路抢劫骚扰。地处交通枢纽的平望镇首当其冲,成群的官兵到商店、民宅敲诈勒索,要钱要粮,还到处抓挑夫。镇乡人民怨声载道,翘首盼望早日解放。5月2日夜,国民党江苏省保安队第3营营长张庆连等一伙又猖狂逼缴地方枪支,地下党党组织带着已掌握、控制

的自卫队和武器连夜潜出包围，急避乡间。中共平望支部委员顾其行从太湖四都村受命回平望，即去找黎里镇的平静人、凌肇基、芦墟的吴关龙、张鹤鸣等研究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5月3日上午8时，三野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从庙港抵达震泽镇。同日，八十三师侦察营挺进到平望镇，二十八军副军长肖峰随部同时到达。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平望镇群众鸣爆竹欢迎，大街小巷一片欢腾。我党掌握的自卫队拉回平望，维持社会秩序，修好公路桥梁，引道进军。平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振海和党员戴炳文事先到吴江与县委接上关系，3日傍晚，带领接管平望区的南下干部星夜步行到平望。平望镇保存粮食6600多石。

盛泽镇此时情势复杂，斗争尖锐。国民党顾锡九部一个师溃退到此，向工商界要钱要粮，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反共宣传，到处张贴“通匪、窝匪者，格杀不论”的告示。土匪胡伯龙被黎里地下党识破击退后，又纠集股匪到盛泽四乡抢劫，十分猖獗，并扬言要到盛泽缴枪。中共盛泽纺织支部书记俞永泉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开展护厂活动。工人将被褥带到厂里住宿，镇上的几家工厂都被护卫起来。同时，地下党员还截获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一大批档案。5月2日夜11时，爆炸声不时传来，盛泽附近的苏嘉公路桥被敌人炸断，顾锡九部已向嘉兴溃退。盛泽地下党负责人俞双人与党员周彦生步行去平望联系解放军，在平望竹港桥相遇。二十八军肖峰副军长听取了俞双人的详细汇报。5月4日金佩扬随二十九军政委张藩到达平望。

同日，二十八军八十三师侦察营在教导员门蛮江带领下，由俞双人带路，一举解放了被称为“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盛泽镇。盛泽的红木桥、太平桥上，小学生手拿“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红绿彩旗，高唱《你是灯塔》、《山那边啊，好地方》等革命歌曲。人民喜气洋洋，兴高采烈，拍手争睹子弟兵风采。解放军对镇工商自卫队进行接收缴械。盛泽保存了2600多石大米。当晚部

队下乡，缴了土匪胡伯龙部的枪，并集合了 60 多人开赴湖州收编。

4 日上午，二十八军八十三师“丹阳支队”，由平望地下党员顾其行带路，冒雨徒步进驻被誉为人杰地灵的黎里镇。地下党负责人吴关龙、凌肇基到六里库迎候。区大队全体人员在黎里关帝庙前徒手列队迎接，工商界和群众手执彩旗夹道欢迎，鞭炮声、口号声不断。

5 月 5 日，“丹阳支队”在地下党负责人吴关龙陪同下，进驻春水四围的芦墟镇。此地保存粮谷 7000 多石。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七团先头部队从震泽经严墓、桃源去乌镇、新塍。至此，吴江全境解放。

同日，金佩扬随二十九军政委张藩等军首长到达盛泽，住王家庄。吴嘉湖独立团团团长刘先正、政委沈如淙到盛泽接上关系。张政委决定把独立团改为独立大队。5 月 7 日傍晚，二十九军向嘉兴挺进。

解放期间，吴江县境内解放军过往部队较多，九兵团二十七军、十兵团二十八军的军部曾一度同时设在震泽镇的上、下塘。接着二十军六十师追捕武装股匪也到达震泽镇和庙头一带。公路上大批解放军夜行过境，也有一些部队到镇上过夜休息。住宿的部队大多住在过街廊棚下，天亮即起身清扫地面。人民群众看在眼里，爱在心里，由衷热爱子弟兵。全县一时解放大军云集，吴江人民欢天喜地，运草筹粮，热烈欢迎子弟兵，支援大军追歼逃敌。一星期后，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先后离开吴江，奔赴解放大上海的战场。

同期，由原华中九分区七、八、九团组编的华东警备第八旅，随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之后渡江南下。八团副团长李海珊率领该团二营四、五、六 3 个连进驻吴江县，组建吴江县总队。

吴江县人民政府于 5 月 2 日开始接管国民党党政军机构及金融企业机构。全县接收大米 300 余万斤，金圆券 600 余万元。土地 7000 余亩。5 月 3 日，吴江县人民政府颁发了政字第一号布告，宣告吴江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从此揭开了吴江县新的历史篇章。由于

吴江县有几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所以原先在苏北白蒲确定的干部配备表在任职时情况有所变化。根据4月27日苏南行署训令,上级任命鲁琦为中共吴江县委书记,李前、金佩扬为县委副书记,杨明任吴江县县长,朱帆任副县长。

5月4日起,根据“各按系统,整套接收”方针,开始各项接收工作。

全县设城厢、同里、芦墟、黎里、平望、盛泽、震泽、严墓8个区,配备了各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

5月17日开始,接收乡镇公所。村政权尚未建立,一时仍沿用保甲长征借粮草,支援前线。此时,全县土地亩数为1283537亩。8个区下设12个镇、26个乡、443保、6493甲,人口数为468631人。各级政权机构先后建立,以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 and 剿匪反霸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吴江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征程,为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而努力奋斗。

附录一：综合资料

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共浙西特委系统 吴江情况综合

一、抗战初期吴江县的形势

(1937年7月—1938年4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城西芦沟桥发动了进攻；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

日军入侵的消息传出，吴江各界人士纷纷成立“旅外学生会”、“抗敌后援会”等抗日组织，进行宣传、慰劳和募捐，汇集在镇上的爱国青年尤为热烈。盛泽的“风雨歌咏团”和吴江“怒吼歌咏团”在吴江戏院联合演唱救亡歌曲；县城举办“伤兵医院护理训练班”，负责救护从淞沪战场疏散到吴江的伤员。一时间，抗日救亡运动蓬勃掀起。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部金山卫登陆后，从西南面包围上海。上海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淞沪会战失利。11月12日上海失守。与此同时，日军沿京（南京）沪铁路、苏嘉铁路、平浔公路长驱直入。处在交通线上的城镇无不遭到日军的残暴烧杀、掠掳。吴江主要城镇自1937年11月起相继沦陷，国民党县政府土崩瓦解，县党部迁至震泽滨湖一带游击活动；地方绅士大部分避难于尚未沦陷的严墓四乡；县城内几个民族败类卑躬屈膝充当汉奸，组织“维持会”。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时，其中一些零星部队流落吴江，他们和地方武装各占地域，自称抗日游击队，形成了“群雄”四起的局面。他们中主要有：沿太湖的七都、庙港、横扇、松陵等地的程万军、曹绍文部队；北厍、黎里的郝道生、陈蕴祖、陈邦奎、白子奇部队；江浙边境的赵安民、朱希、汪鹤松部队。尽管他们都挂着抗日的招牌，但内部

成员复杂。

1938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由于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打击和威胁,加上战线延长,财力物力缺乏,在中国的土地上只能把守交通点线及主要城镇。因此,国民党流亡政权才有机会折回原地活动。此时,第三战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委派沈立群为吴江县县长兼抗敌自卫团司令。沈立群受命后,从江西上绕转道上海,会晤了王岳麓、毛啸岑等吴江知名人士,又到黎里碰头国民党区长凌应桢等。9月,成立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别称游击政府),11月定址于严墓西乡章奥村。县政设8个区,配齐区长,但大部分为敌占区,无法就任。

此时,在县城也成立了伪吴江县知事公署(知事朱元直),与严墓的国民党县政府相对抗。

二、争取抗日武装

(1938年4月—1939年12月)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及时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皖南新四军,上海特科情报组和浙西党组织分别派出党员骨干,先后到达吴江,以严墓区为基点开辟工作。

严墓区(现铜罗、青云、桃源一带)位于吴江县的最南部,与浙江重镇新塍、南浔相毗邻。境内大小湖荡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没有公路,交通不便,天然地阻碍了日军的行动。因此,成为很多人避难的场所,国民党县政府也设在严墓,短时期内市场畸形繁荣,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我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为新四军输送力量。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正式建立。是年秋,中共党员庄绍桢(庄真)受邓子恢派遣,从安徽省泾县回太湖边开展工作到在严墓,其任务是物色可靠对象,介绍他们去新四军,

以扩大新四军队伍。经同学张树源介绍，庄绍桢打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担任政工队队长。他利用这一机会，邀请进步青年洪海泉筹组政工队。

此时，县政府刚刚成立，地方上失学、失业青年较多，很快吸收了20多名要求抗日的青年。沈立群为造就地方工作人员，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决定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他自任班主任，但实际工作由庄绍桢负责。庄绍桢公开以新四军的身份向青年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进行人生观教育；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队员们演出。还把从部队带来的进步书刊分发给青年阅读，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大部分学员转为政工队员，由庄绍桢带队到章奥村、严墓、南麻、吴家浜等地进行巡回宣传活动。他们每到一处，都出壁报登消息，并辅以漫画形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期内，庄绍桢发展洪海泉、江月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输送周慰昌、金再祥（金流）、张斌、马文祥等进步青年去新四军。张静贞、陈有民、金衡等青年，在政工队的影响下也投奔了新四军。

2、浙西党组织在朱希、汪鹤松部队的活动。

朱希、汪鹤松部队，原是国民党第13师的一个团，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撤退时奉命断后掩护，与师部失去联系，后编为第三战区江南游击总指挥第一路纵队。朱希任司令，汪鹤松任副司令，活动于安徽宁国一带。1938年3月，运动到乌镇西部，击溃了郭剑石部队后进驻乌镇。该部有中共浙西党组织派进的党员郑衡（郑子平）、徐洁身（徐进）、徐由整、韩昌等。

1938年4月，汪鹤松带领第八大队一百来人、枪，从乌镇进驻吴江严墓区巴家圩。不久又返回原驻地乌镇。因该部战斗力较强，引起日军注目。11月11日，朱希部队在练市钟家墩遭到日军水、陆、空三面夹击而溃败，伤亡甚大，徐由整不幸牺牲，朱希率残部退至寿丰整编。1939年春节后，汪鹤松带一百多人枪再度开来严墓。随来

中共党员有周达明、刘明、韩昌。党员同志用我党的思想教育影响战士,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对敌作战的勇气。不久,取得了桃源阳和桥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4月,周达明奉命调回新四军部队。5月,浙西特委为加强汪鹤松部队党的力量,派徐洁身、郑衡、李志良来该部成立特别支部,徐洁身任特支书记。组织委员刘明,宣传委员韩昌,郑衡任该部政训处主任(负责与浙西特委联系)。政训处下设总务、组织、民运和宣传四个科。

民运科长韩昌,分工负责地方工作。1938年4月,他初到严墓时,就广泛接触严墓四乡的农民群众,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江南游击区民众抗日救国会”。10月,发展沈英杰、徐阿珍(杨虎阿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党小组,韩昌任党小组长。1939年5月成立了严墓区第一个党支部,——东水家港支部。沈英杰任支部书记。

阳和桥袭击日军的胜利,在群众中反响很大,部队很快扩编到2个营。到11月,党组织在部队和地方上已发展党员40多人,其中部队30多人,仅政训处就发展了庄雪英、徐加生、陈慕天、徐惠琴、汪群等5名党员。汪部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深感不安,活动处处遭受阻难。11月,在款项无着的情况下,汪鹤松通过吴江县县长沈立群,要求江南行署提供给养。行署趁机委汪以团长头衔加以收编。党组织对汪的行动多方劝阻无效。年底汪鹤松带部队去溧阳整训,刘明、郑衡回莫干山浙西特委,大部分党员转移浙西,韩昌一人留地方继续开展工作。

3、中共中央特科系统开辟吴江的活动。

1938年4月,根据党“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江南一带的抗日武装,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地方游击队做争取改造工作”的精神,中共上海特科情报负责人徐强、高原委派党员陈显唐(化名丁秉成、老李),到江浙太湖地区开辟开作,争取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丁秉成带了章燕、周奋等4人从上海出发前往浙江赵安民部队,由赵部副司令兼政

治部主任钱康民陪同，在双林与赵安民协商有关安插我人员的问题。然而，赵安民只同意接收丁秉成等俩人。后经钱康民努力，赵安民同意将部下龚圣祥大队的枪支带到太湖里拉队伍。于是，钱康民雇船偕大队长龚圣祥、章燕、堂弟钱荣初一起出发，不断船行至横扇附近，被程万军部的龚国良大队扣押。后来钱康民经金鲁望帮助，几个人才获释放，但武器尽失，此事未成。

1938年秋，丁秉成受命来吴江开辟工作，其任务是：争取改造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由沈月箴当向导，随来的有：刘子荣（大刘）、章燕（小刘）、华大闲（陈正之）、俞哲（周奋）、叶初晓（鲁秋生）、林风；后上海又陆续派施光华（胡光华）、张琼英到吴江，随来的有江军、华荣田、林家春（洪奔）、王振华、沈润泉、吴坤年、吴正大、于大桢、梁林、裘益明、裘吉明、戴松茂等青年工人、店员、学生共20多名。其中张琼英、施光华、华大闲是中共党员，其余皆为“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会员。

沈月箴，平望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通过表兄毛啸岑从柳亚子先生那里找到共产党的关系。1938年9月，经王绍鏊介绍参加了中共上海特科的秘密外围组织——“武抗”。她此次回吴江归丁秉成单线领导，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当上县政府的办事员。施光华、叶初晓、俞哲、华荣田等经民主人士王岳麓帮助，进入县政工队和县常备队。丁秉成、林风通过王绍鏊的关系与程万军部队的副司令曹绍文建立了联系，并与“武抗”在程部的内线倪子璜接头，将林风按插在政训处任总干事，以政训处的下属“青年服务团”为党的活动基点，发展“武抗”会员。

10月，当程部的工作有待深化之际，程万军投靠日军。丁秉成带了林风、施家骅等“武抗”成员从庙港撤至龙泉嘴与县大队中的“武抗”同志会合。丁秉成继续争取曹绍文，鼓励他树立信心重拉队伍，后因曹绍文患严重眼疾去苏州治疗，被程万军发现而软禁，关系中断。丁秉成、林风、大刘、小刘、施家骅及后来的张琼英等通过王岳

麓帮助进入县政工队。丁秉成任政工队指导员。他们利用政工队的合法身份,广交朋友,宣传抗日,积极发展“武抗”会员,为立足吴江开辟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9年3、4月间,丁秉成由施家骅陪同,通过黎里镇毛海涛、朱千智的关系与郝道生建交。经协商郝同意接收“武抗”刘子荣、江军、于大桢、章燕、沈润泉等人编入部队。5月,郝部遭日军突然袭击被打垮,文化教员沈润泉牺牲,其余“武抗”人员撤至严墓政工队。

5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上级指示,中共吴江支部在严墓车家坝建立,丁秉成任书记,组织委员张琼英,宣传委员施光华,并且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兼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张琼英、施光华、刘子荣、华大闲。“武抗”成员编了若干“武抗”小组,他们在党与“武抗”支部的领导下,在政工队和当地青年中发展了一批“武抗”会员。

党支部积极从政治理论上对“武抗”会员进行培训,通过上海党组织秘密运来一批革命书籍,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及进步文艺小说供大家阅读,还以举办时政讨论会、出墙报、演讲、演剧等多种形式,推动了抗日工作的进行。

此外,特科的情报工作很有成效。起初县政府与后方的文件往来都是由通信兵穿越浙江省吴兴、长兴的游击区,步行来往于张渚的国民党江苏省第二区专员公署之间,常常一趟为期累月。沈月箴自告奋勇担任交通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伪装携带文件,经敌区的铁路、公路,越过层层关卡,大大缩短了行文时间。她凭这有利条件,抄录国民党反共绝密文件同有关重要情况资料,并联络在县政府工作的地下党员金大鹏、肖心正综合情况,赶制密信,送往上海情报组,使我党及时掌握战略情报。同时,沈月箴按照丁秉成的意图与金大鹏、肖心正一起,坚持做县自卫队长俞清志的团结教育工作。

郝道生部队被打垮后,争取游击队的工作又一次受挫,丁秉成下

决心要建立一支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5、6月间，丁秉成趁赵安民部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合收编进山的时机，再次通过钱康民从赵部拉出三四十人枪，几经周折，终于创立了“江浙太湖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他们坚持执行党中央“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仅两个多月，部队就发展到100多人，并与当时已东进到达无锡梅村的新四军“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义勇军活动于吴淞、义皋、大钱一带，使国民党反动派深感不安，视丁秉成、钱康民为眼中钉。

是年8月23日，国民党六十二师和吴兴县常备队在苏浙边境吴淞突然包围袭击了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太湖义勇军”损失惨重。丁秉成、钱康民等主要领导人英勇牺牲。目睹者江军回来向施光华、张琼英报告：丁秉成、钱康民中弹后还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齐对日寇！”

丁秉成牺牲后，上级党组织指示由施光华负责将政工队的党员及“武抗”成员分批撤离吴江，回上海待命。不久，这批党员和青年骨干由张琼英、刘子荣负责，转到昆山“联抗”大队工作。受“武抗”影响的四名老政工队员陈子耘、江月芳、徐惠英、谭立中亦随去参加革命队伍。沈月箴撤走后，情报工作交金大鹏、肖心正负责。至冬天，上海特科情报系统在吴江只留下有较好掩护关系的金大鹏、肖心正等少数同志。1940年2月，他们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吴成方接上关系，继续进行情报工作。

三、坚持敌后斗争，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1月——1941年4月）

1940年春，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吴江县知事公署也改称汪伪县政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迫降、诱降，国民党政府执行了分裂、倒退、反共的投降主义路线。县政府内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也日益猖狂。他们监视干扰共产党人和抗日力量的活动，形势

向不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然而浙西和特科的同志在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工队及其严墓农村逐步建立了立足基点。他们利用这一有利因素,坚持敌后斗争,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

1、开辟三区。1940 后初,三区区长张品泉被日军杀害。我党利用沈立群安插培植亲信的意图,推荐思想进步与我党关系密切的爱国青年俞清志当区长,有意识地把政治军事推向靠近敌占区的盛泽附近,打算把三区发展成一个抗日活动的基点。此举虽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但因俞清志是随沈立群来吴江的心腹,最后还是决定委任俞清志为三区区长。俞清志上任后,积极革新区政,不准乡保长为日伪军征粮,违者作汉奸论处;建立情报线,掌握日伪军动态等,收到良好效果。5、6 月间,俞清志率领三区区大队在茅塔村附近伏击了下乡骚乱的日伪军,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从而,鼓舞了队员的抗日信心,得到了百姓的称赞和拥护,开创了三区的新局面。

2、发展地方党组织。1939 年底、1940 年初,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下令各政工队员集中天目山受训,强迫他们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斗争十分激烈。中共吴江县委转入地下活动,县委书记王子达(虞路文)与中共党员庄绍桢取得联系。此后庄绍桢归浙西吴兴县委领导。夏秋,中共党员王化鹏(王听涛)、朱闻礼(曾又余)、陈友群等先后从浙江省政工队转入吴江县政工队,并在瑾下浜建立中共苏浙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朱闻礼,组织委员庄绍桢,宣传委员王化鹏。10 月,庄绍桢、王化鹏通过严墓青年凌文化、邵耕耘(邵哲)、姚之英(姚魁元)、沈步青等创办“严墓青年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进步书刊,出版油印快报《正义》和《严墓新闻》。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凌文化、邵耕耘、姚之英入党。11 月建立严墓镇支部,支部书记王化鹏,组织委员凌文华,宣传委员邵耕耘,青年委员姚之英。

中共党员韩昌,继水家港党支部建立之后,又建立李家浜党支部和水家港妇女支部。1940 年 2、3 月间在三民浜成立严墓区委。5 月,韩昌奉命调回浙西,由沈英杰负责区委工作。8 月,中共党员赵

子扬从浙西调来严墓担任区委书记。赵子扬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发展党员。11月建立茹菇垌支部，支部书记盛友鹤。

1940年10月，中共浙西特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京（南京）杭（杭州）国道为界分为路东特委（又称浙西北特委）和路西特委。吴江县严墓地区党组织归属路东特委领导。11月，路东特委和吴兴县委同设在严墓水家港，由担任小学教师的区委书记赵子扬和开烟纸店的吴兴县委书记史烈青负责掩护特委机关。驻严墓的有特委书记朱辉，吴兴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贝纹和特委交通陈浩天等同志。此时，严墓地区的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

3、出版抗日刊物和创办“税训班”。特科和浙西两个系统的党组织，虽然不发生横的关系，但是，在工作中都以县政府和政工队为依托，相互默契，共同协作，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939年7月，为驳斥汪精卫卖国投降的谬论，教育青年明辨是非，树立抗战必胜信念，进步人士、县税务局长马希仁在我党影响下创办了期刊《敌汽》，肖心正任编辑，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都撰写了抗日救国文章。《敌汽》的出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勒令印刷厂拒绝承印而被迫停刊。1940年6月，改名《义旗》重新出版。马希仁耳闻目睹种种现状，深感国民党作风腐败，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更由于日军的入侵，许多亲朋好友失学、失业、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他想帮助更多青年得到参加抗日的机会。由此萌发开办“税务人员训练班”的念头，以培养一批青年税务员，改善税务人员的素质和解决一些人的生活出路问题。而我地下党则希望通过“税训班”培养抗日力量。因此，党员同志极力怂恿马希仁办好训练班。他们积极活动，招收了20名青年学员，教师大部分由党员担任。课程安排除会计知识外，着重讲解时事政治形势、历史知识。教材的内容完全取材于《上海周报》、延安的《解放周刊》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等革命刊物。开办“税训班”的风声，自然被反共势力获悉，路东凌元培（三

青团吴江负责人)于某日突然来“视察”,向县长兴师问罪,认为“税训班”是共产党活动。为防止不应有的损失,党组织决定缩短训练计划。一个月后,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四乡稽征点,随同地下党员开展民运工作。

4、组织“联村会”。“联村会”是我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组织。1940年冬,中共党员朱闻礼等去严墓农村,与当地党员沈英杰、盛友鹤、沈阿五等一起在算墟、竹里、志和、白区、太洪5个乡,发动青壮年农民,组织“联村会”。沈英杰任干事长,盛友鹤任副干事长,沈阿五任干事。他们办夜校、教唱抗日歌曲、筹划减租减息、为贫苦农民说理撑腰,深得群众拥护。“联村会”共发展会员四百多名。

1941年初,“联村会”上书县政府,要求实行“二五减租”未得通过,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搜捕,“联村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赵子扬、沈英杰等被迫离开严墓,隐蔽活动。3月,沈英杰和邵耕耘由浙西特委书记朱辉介绍,到新四军六师苏南行署干部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沈英杰分配至江防局,邵耕耘去苏北解放区。

5、政工队改组青年工作队(简称“青工队”),党的力量转移到三区。1940年7月起,以凌元培为首的吴江地方顽固势力,与沈立群为权力之争矛盾日益加深。凌元培等刺探县政府内的抗日活动,并且迎接“忠救军”进驻吴江,形势发生了变化。公开以新四军面目出现的政工队长庄绍楨被撤职,政工队被改组为青工队,归县党部领导。由此,浙西同志丧失了立足吴江的基点。为了争取把他们留下来,金大鹏设法担任了青工队长,使政工队原班人马进入青工队。

1940年底、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在三区的青年中曾开展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武装抗日活动。1940年12月12日,发生了到盛泽敌占区击毙汉奸叶冠吾一事(叶冠吾是安清同盟会会长,该会以青帮流氓为骨干,是日军宪兵部队豢养之鹰犬,简称“安清会”)。因俞清志革新区政的行动与原有旧势力逐步发生矛盾,俞清志为了有力打击汉奸的气焰,排除旧势力的干扰,使三区走出一条抗日的路

子,决定除掉叶寇吾。我党组织为了推动俞清志坚持抗日,为了把三区工作抓起来,必要时作为一个活动基点,也全力支持他杀叶。杀叶之举在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连从来不拿枪的人也要求亲自杀敌;接着枪杀日军伍长;击毙伪区长简汉青;袭击盛泽日军据点;拦击汽车上的日伪军等一系活动,搅得敌人心惊胆战。然而,三区的活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2月,中共党员马雨亭(化名蔡允中)从海北工委到路东特委,转至三区大谢乡当事务员。

3月,驻严墓的浙西路东特委和吴兴县委机关,分别撤向浙江的南浔和双林。赵子扬、俞应华、朱乐琴、姚之英等先后去三区,加强了三区的力量。初秋,赵子扬、蔡允中建立大谢支部,支部书记周炳发,组织委员丁少荣,宣传委员沈沛乾。为了改变三区局势和对付猖狂一时的匪盗及日军扫荡,蔡允中等人提了一套各村联防的办法,收到明显效果。农民生活稍得安定。在此基础上,党组织采取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方法联络感情,组织群众办夜校,讲解抗日形势,教育群众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敌人。王化鹏等配合形势创作了《快点组织村联会》、《干一场》、《保家乡》、《消灭鬼子兵》等抗日歌曲。党员还深入农村调查,组织大家学习老区实行“二五减租”的农村政策,在一些乡村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迫使地主、富农同意减租。同时,党员还注意做好统战工作。耐心教育倾向抗日的乡、保长为我党服务。王化鹏曾布置沈步清等结交庄浜的保长,使他做好“联村会”的串联工作,为地下党提供物质上的帮助,遇有敌情通风报信,在后来地下党被迫撤离三区时帮助办理“良民证”。

四、革命遭受挫折,主要力量被迫撤离

(1941年5月——1941年12月)

1941年5月,大批“忠救军”进驻吴江。新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逸芝与“忠救军”紧密勾结,密报县政府内有共产党活动。县长

沈立群颇感紧张,但他为了个人的前途命运又矢口否认。针对这一情况,党组织决定将原青工队员全部撤至三区。金大鹏任区大队副,王化鹏任区指导员,朱闻礼任区分队长,各乡事务员、干事均由党员担任。隐蔽活动的区委书记赵子扬到大谢乡接替蔡允中任乡事务员,蔡允中任区中队指导员。

“忠救军”进入严墓后,开始搜捕共产党人。转入农村活动的庄绍桢,因身带《方志敏、瞿秋白传略》被捕。肖心正因此受牵连。庄绍桢熟悉地形,夜间趁敌不备逃脱。肖心正由沈立群保出。接着严墓镇党支部组织委员凌文华被捕,税务局长马仁希为之觅保。不久,“忠救军”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情况危急,金大鹏、肖心正一面向上海党组织汇报情况,一面向省党部告发县党部书记王逸芝。上海党组织指出,吴江的组织已暴露,必须立即撤回上海。省党部派特派员许宪民到吴江视察,适逢王逸芝敲诈案发,在许宪民建议下王逸芝被撤职。但形势并未缓和。8月,“忠救军”组织了20多人的暗杀行动队。仅20日这天,就有进步青年袁璋、共产党员沈文潮、虞仞千等6人惨遭杀害。肖心正因当晚未回宿营地而幸免。迫于形势恶化,苏浙特支书记朱闻礼决定王化鹏、沈步清去新四军六师,不幸王、沈路遇下乡搜索的日军而被捕。因关押地点不明,党组织无法营救。后沈步清越狱带出王化鹏在火柴盒上的向组织和同志决别的短诗《布谷鸟又叫了》。王化鹏因伤重无法行动被日军杀害。部分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撤离吴江。朱闻礼、陈友群、沈步清、姚慕贞等去新四军六师;金大鹏、肖心正先后去上海。

1941年11月,沈英杰在江防局,因日伪大清乡无法隐蔽而南归,到南浔找到特委书记朱辉,组织关系被介绍到驻新塍的嘉兴县委罗希明处,后罗希明撤走,组织关系交沈如淙领导,严墓一带的党员由沈英杰负责。

12月,由叛徒出卖,“忠救军”特务突然到大谢乡逮捕区委书记赵子扬。蔡允中闻讯带着区中队赶来,反扣特务,放走了赵子扬。第

二天，“忠救军”督察长李应亲自赶到三区，威逼交出蔡允中。此时俞清志外出未归，代理区长顾平（原“武抗”会员）主动承担押解任务，途中放走了蔡允中。赵子扬、蔡允中经组织安排去苏南解放区。至此，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外来党员全部撤离吴江，大谢支部暂时失去联系。严墓农村党员也都隐伏下来。此时，严墓、坛丘的党组织划归嘉兴县委领导。

五、积蓄力量长期隐蔽

（1942年4月——1945年8月）

由于1941年和1942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对革命力量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吴江的革命形势也暂时处于低潮。党组织领导人及本地城镇党员全部撤离，留在严墓区的农民党员大部分是单线联系，只得暂时停止活动。从而党员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外出谋生失去联系、有的被害、少数变节。

1942年4月，根据斗争需要，嘉兴县委沈如淙组建了中共新塍区委（县级党组织），由区委委员毛国荣负责联系严墓区党组织。同时，区委书记沈如淙受命来吴江恢复大谢支部，他通过顾春泉（顾阿二）找到仲春生，摸清党员情况，然后恢复了支部。仲春山任支部书记，委员有钱福宝、潘天扬、顾春泉，党员顾阿坤、沈建华等。他们以大谢为基点，在平望、盛泽、南麻、梅堰、震泽等地秘密发展党员，扩大活动范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43年4月，浙西党组织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沈如淙任嘉兴特派员负责联系沈英杰、盛友鹤，并且领导该地区的工作。青云水家港支部、青云水家港妇女支部和桃源姚浜党小组由沈英杰单线联系；青云茹菇埭支部、青云仁荡坝支部由盛友鹤单线联系；坛丘的党组织由沈如淙直接领导。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归浙西党领导的党员共有49人。

另外,在1943年5月,薛天然受苏中二地委书记章蕴派遣,从苏北根据地来震泽进行活动,由社会部长林修德直接联系,任务是在日伪顽方面搞一个据点。

1944年春节后,薛天然打入伪特工“政治保卫局”,任横扇小组组长,驻大庙港(代号王公馆)。他上任后即将原伪特工“横扇小组”人员全部遣散,邀进步青年龚积桐、凌文华等人一起活动。并在吴县的东山、西山筹建特工小组,使之与大庙港成倚角之势。薛天然在庙港活动20多天,就被吴江伪特工传去关了禁闭,获释后去蚌埠活动。临行前在震泽布置凌文华、龚积桐等在严墓搞汪伪特工外围组织“江枫分社”,然而未搞成。冬,薛又回到震泽,获悉“忠救军吴嘉湖行动总队”从浙江运动到太湖边,薛利用与该部总队长金家骧的关系,打入该部任政治部副主任,做争取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中共淞沪地委(工委)系统 吴江县党组织工作概况

一、抗日战争时期淞沪地区党组织对吴江的开辟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淞沪地区,包括上海市郊九个县(崇明除外)和江苏省昆山县、吴江县的部分地区及浙江省嘉兴、嘉善、平湖、海盐县的一部分。由于其中隔着黄浦江,又划分为浦东、浦西、浦南三块地区,吴江县在浦西地区。抗战时期,上海市周围各县的中共党组织,是由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党员陆续去开辟发展的。1937年5月,党中央派刘晓来上海,负责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10月,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委员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张登(沙文汉),领导上海、江苏和沪杭一带党的工作。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江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2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嘴登陆,12日上海沦陷。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于12月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沙文汉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从1938年春开始,中共江苏省委先后派出数批党员干部到上海外县开辟工作,建立农村党组织。

夏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高原派党员丁秉成(陈显堂)到吴江严墓地区开辟工作,任务是争取改造地方游击队。同来的有施光华、张琼英、陈正之、沈月箴等20多人。

1939年5月,叶飞率领新四军第六团七百余人,从茅山出发,向东挺进,沿用“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番号,成立总指挥部。10月,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1940年5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到东路地区,加强“新江抗”的领导。上海外县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全部由江苏省委移交给

“江抗”东路指挥部领导。经谭震林批准，成立中共青昆嘉中心县委，书记顾德欢，委员顾复生、周达明、谢永康、吕炳奎，统一领导黄浦江以西各县的工作。尔后，青昆嘉中心县委改名为中共淞沪中心县委，仍由顾德欢任书记，增加金子明为委员。工委书记顾德欢仍负责地下党工作，并负责领导和派员去吴江、昆南、松江等地，开展地下党的点线工作。9月，顾德欢派朱家角党员夏明辉（刚从“江抗”司令部参加东路特委训练班回来）去青浦西乡开辟党的秘密点线工作。夏来吴江县平望西塘街“大生”杂货店，会面金佩扬。10月，夏明辉经上级批准，发展金佩扬入党。顾德欢同期在上海找夏明辉和金佩扬谈话，表示对开辟吴江工作的重视。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原驻江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苏南区党委，谭震林兼区党委书记。5月，经谭震林批准，撤销淞沪中心县委，成立中共路南特委。辖京（南京）沪铁路以南、苏嘉铁路以东地区，包括上海市郊县，江苏省的吴江、昆山，以及浙江省的平湖、嘉兴、嘉善等县。特委以顾德欢为书记，姜杰为副书记。特委机关设在上海。在路南特委领导下，6月又成立了中共淀山湖工委，工作范围为松江西北部、青浦西部、吴江东部、昆山南部。书记诸敏、委员周奋、邵恢（邵士清）。不久，邵离去，林岑（林大良）为组织委员，周奋为宣传委员。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敌人对淀山湖地区不断“扫荡”、“清剿”，为了更好地“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淀山湖地区党组织转入隐蔽状态，地方工作亦由公开转入隐蔽斗争。这时，党的组织秘密向吴江平望、黎里发展。夏明辉在金佩扬的帮助下，在黎里立足下来，以“大同文具店”为掩护，开展工作，搜集“忠救军”阮清源部队的建制、人员、枪枝、活动等情况。5月，顾德欢派遣原青东区中队队长徐友基（即徐永坚，化名李复生）来黎里“大同”商店，以夏明辉朋友的身份住下。后去平望以摆摊为职业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岛”已不存在，敌人对上海外县的清乡“扫荡”也开始行动。为了更好地保存上海的党组织和大批党员干部，中央决定江苏省委撤往苏北华中根据地。上海外县的地下斗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段斗争时间里，中共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化名朱明之）来吴江黎里镇，领导党的工作。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在上海找党员金佩扬谈话，在场有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顾德欢传达了上级的方针，指出：吴江县地处大三角（京沪杭）和小三角（苏嘉湖）交界处，具有重要的军事位置。要向东、向南、向上海、向太湖、淀山湖前进，吴江是个必须开辟发展的地区。同期，诸敏在松江以香烟店股东身份为掩护，工委机关设在景家堰附近的一间民房里。金佩扬与人合股从平望到松江开了条航船，以贩运香烟为掩护，搜集情报，摸清水路情况，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与苏嘉铁路工人交朋友，了解日寇在铁道枢纽平望车站的调动情况。10月，夏明辉在黎里发展了迮一祥（丁庠一）入党。尔后，夏明辉离黎去浙东游击队，浦东党员张荣生（陈企周）由淀山湖工委派来黎里，张以金佩扬香烟摊为联络点，合做贩运生意为掩护，负责吴江党的工作。

1941年下半年起，日寇向浙西大举进攻。7月，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区党委，派谭启龙任区党委书记兼浙东游击纵队政委，何克希任司令员，顾德欢调任区党委宣传部长，并从苏中调大批干部去浙东充实各及领导力量。由于上海外县水路交通比较方便，加上谭震林率新四军六师已开赴苏北，因而8月撤销了路南特委，改设中共浦东地委，划归浙江区党委领导。

浦东地委机关暂移浙东，姜杰为地委书记，朱亚民、金子明为地委委员。1942年，上海外县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群众性的公开活动和武装斗争都开展不多。10月，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调浙东工

作，淀山湖工委由林岑接任书记。林岑化名陈鹤年，于1943年初来吴江，负责党的工作。林与陈企周、金佩扬等一起在芦墟开设“汇丰烟纸店”为掩护，领导淀山湖地区的工作。

1943年3月，林岑、陈企周与金佩扬去浙东，向中共浦东地委书记姜杰汇报工作。9月，浦东地委要林岑、陈企周、金佩扬第二次去浙东区党委，芦墟“汇丰”商店关闭。吴江工作由中共青东工委委员洪峰来负责，洪到黎里与迕一祥接上组织关系。1943年底，原来的淀山湖工委与青东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浦西工委，由陈正之任书记，陆雪林、洪峰为委员。党的主要活动，隐蔽待命，收集接转情报，进行策反工作，着手在浦西地区开辟和恢复游击区；并派出干部去各地开展工作，在斗争中逐步培养积极分子。此时，吴江党组织吸收了一批革命青年加入党的组织。年底，洪峰离开吴江，金佩扬已从浙东调回，吴江工作由徐友基负责领导。

1944年2月，姜杰调浦西工委书记陈正之、浦西工委委员陆雪林和党员李毅（李尚同）到吴江，在黎里城隍庙桥堍开设饴塘坊为掩护，领导黎里、平望、芦墟、北厍及松江北部等地党的工作。同期组织一些人以贩运粮糟为掩护，开展松江北部及青西地区党的工作。5月，在平望工作的徐友基（徐永坚）奉命调离吴江。6月，中共浦西工委又建立了淞沪支队，陈正之兼任支队长，徐友基任指导员，领导武装斗争。10月，陈正之离开吴江去昆山，陆雪林离开吴江去青浦。吴江工作由金佩扬统一领导。

1944年下半年开始，解放区战场发动了对日寇的局部反攻。浦西武装经恢复发展，为打开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上海外县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是配合大反攻，夺取大上海。要求各县大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隐蔽的根据地，以便里应外合，顺利地进占和接管上海。11月，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明，政治委员姜杰，参谋长张席珍，政治处主任曾平。此时，浦东地委改名为淞沪地委，书记姜杰。委员：朱亚民、张席珍、

金子明、曾平、陈正之。

1944年、1945年,党组织在吴江地区有很大的发展。先后批准了22人入党。

1945年1月,中共苏中区党委派陈伟达为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治委员,顾复生为淞沪地委委员兼淞沪地区行政专员,朱亚民为地委委员兼淞沪支队长,兼杰为地委副书记。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新四军一师由师长粟裕率领渡江南下,到达浙西天目山区,先头部队向东挺进,已抵长兴、湖州一带,并于1月13日成立了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为了配合作战,使淞沪支队与苏浙军区东进部队会师淀山湖,华中局又决定淞沪地委领导中心和主力部队从浦东转移到浦西,并要淞沪支队沿淀山湖西进,和浙西大军的东进部队在吴江地区会师。2月17日,顾复生率淞沪支队先遣部队横渡黄浦江,到达青浦。与此同时,淞沪地委书记陈伟达通知金佩扬,要他在吴江东面,以灰色身份出面搞武装活动,扩大青东回旋的余地。为此,吴江县调整了一些党员的布局,有的被输送去淞沪支队实习,经受锻炼;有的被派去了解搜集“忠救军”的情况;有的回家乡村村坚持工作,为开展武装活动作准备。

1945年3月,淞沪地委和淞沪支队,奉命从浦东转移到浦西活动。淞沪支队三个主力大队(衡山大队、泰山大队、华山大队)由陈伟达、朱亚民率领,向西北顺利越过沪杭铁路,到达青浦观音堂。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大发展的需要,地委于4月重新作了工作部署,其中有:地委委员陈振之兼任昆南工委书记,徐友基为委员;金佩扬为吴江县党组织负责人,负责吴江县及淀山湖西部地区的党工作。同期,地委陈伟达、顾复生、朱亚民指派金佩扬去浙西天目山联系大军。金在千金镇见到苏浙军区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清、三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和三纵八支队长陈业棠等,送交了淞沪支队的电台呼号和频率,从而恢复了苏浙军区和淞沪大队一度中断的电讯联络。

在这段时间里,吴江党组织多次派党员去松沪支队汇报工作,带

回《灯塔》、《北辰》、《新华简讯》等进步书刊,扩大党的影响。同期,中共平望支部建立,支部书记张振海,组织委员周纪铨,宣传委员顾其行。

1945年8月9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中央决定集结在天目山区的新四军一师迅速行动,要求上海外县发动武装起义,淞沪支队决定与苏浙军区部队会师淀山湖后一起进军上海。为此,地委委员陈正之转达政委陈伟达、专员顾复生的指示,派金佩扬第二次去浙西。金在湖州南门外见到新四军独立支队杜大公政策,联系上浙西部队。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向天目山根据地发起进攻,新四军一师主力折回保卫天目山,会师未能成功。

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为了表示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同意退出苏南、浙东八个解放区,把驻在江南的新四军全部撤至长江以北。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秘密工作者外,全部撤离浙东。9月底,大军编为六个支队,开始北撤。淞沪支队和已暴露的地方干部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张席珍,政委陈伟达,政治处主任顾复生。上海党组织将暴露的党员组成上海工人部队,由周克任政委,诸敏任部队长,一起随淞沪支队北撤。

青东地区一时大军云集,盛况空前。在重固召开了北上万人誓师大会,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刘长胜率上海人民代表团送行。淞沪地委书记陈伟达在大会上作报告。诸敏代表上海工人部队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为了有秩序地撤退,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姜杰作了党转入地下的组织准备,并负责向华中局派来接收淞沪地区党工作的王克刚办理移交手续。吴江县党组织要回了几个非武装人员,留下坚持地下党工作,其余党员随队北撤。

中共淞沪地委此时撤销,上级党很快派干部前来接上关系,党的活动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二、解放战争时期淞沪系统吴江县党组织工作概要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吴江地区党组织的工作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10月至1946年底

1945年10月下旬，中共华中局派王克刚、鞠耐秋、陈伯亮（陈文祥）三同志在上海组成中共淞沪地区工作委员会，王克刚为书记，由中共华东局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领导。1946年2月，华中局城工部派刚从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回来的顾德熙（张凡）担任中共淞沪工委书记，王克刚任副书记，委员陈伯亮、张云曾。同时，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张执一，副书记林枫，委员周克，统一领导上海郊县和苏南、浙东党的工作。淞沪工委划归上海外县工委领导。6月，顾德欢从苏北回来任淞沪工委书记，张凡、王克刚均为副书记。10月，顾德欢调任浙东临委会书记，张凡、王克刚仍为淞沪工委正副书记，陈伯亮、张云曾为委员。

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淞沪工委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整顿组织，建立阵地，长期隐蔽，合法斗争。并按照秘密工作特点，对当时党的领导体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武装斗争暂时隐蔽下来。对北撤前，在原地已经暴露的党领导干部作了相应调整，其中有：沈小方（肖方）调任淀山湖地区特派员（吴江党组织属淀山湖地区），金佩扬调任浦南特派员，陆雪林调任浦东特派员。各地区由特派员负责组织的整顿及组成游击小队进行活动。

1945年12月，肖方来吴江负责党工作，以黎里镇文具书报店为职业掩护。此时各地党员，按组织指示，均以合法身法掩护下来。

1946年初，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党员丁铎、吴关龙出面，进步文艺团体“翳桑社”在黎里成立。出版《浅作》月刊。

1946年春，中共黎里支部建立，由连一祥任支部书记。4月，沈小方书报店的活动，逐渐引起了国民党黎里区党部书记的注意，经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批准，肖方、连一祥于4月6日撤离黎里去青东，吴江工作由陈伯亮直接领导。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淞沪工委领导淞沪地区人民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段时间里,华中局派出交通员到嘉兴联系上原苏南区党委浙西特派员罗希明,罗到上海下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接上党组织关系。林枫决定把浙东、苏南两条线的地下党关系统一起来,吴江南部的坛丘、严墓、青云、桃源等地的党组织由罗希明通过嘉兴特派员沈如淙来领导,当时有党员沈英杰等一百多人。

吴江党组织坚持隐蔽地开展活动,发展组织。1946年,吴江党组织发展了6人入党。

第二阶段:1947年年初至1948年4月

1946年12月,淞沪工委书记张凡通知金亮从嘉定调吴江工作,由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在上海向金亮交接了关系。金亮(化名刘世和)通过平望党员顾其行的关系,1947年2月到平望溪西乡顾家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吴江党的工作。

1947年2月,国民党震泽区长发现翳桑社的期刊《浅作》,认为是共产党的宣传品,逮捕了震泽女社员张育英。为之,党员丁铎出走外地,“翳桑社”不久宣告解散。“翳桑社”历时一年半,成员达六七十人,《浅作》出版了十期。“翳桑社”通过它的合法存在和文艺活动,进行了革命宣传,在黑暗笼罩的小镇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并联系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启发和提高了青年的觉悟,发展了党的组织。

3月,中共上海铁路局党员李华(李松林)由淞沪工委副书记王克刚派来平望与金亮接上关系,成立中共青(浦)吴(江)工委。金亮为工委书记,李华、张振海为委员,由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宣布,地点在平望陈家湾猛将庙。青吴工委的任务是:筹组一支水上武装,以和青东的武装连成一气,互相策应,扩大回旋余地。6月,党员肖斧从浦东转移来新塍,住在吴江县坛丘大谢乡乌龙浜党员钱福宝家里,以钱的家庭教师为掩护,参加当地党的活动,配合嘉兴、盛泽一带搞武装。8月,中共浦东东南区区委书记、武工队长秦克强(化名康云),

为向太湖地区发展武装活动，由王克刚派遣，为吴江特派员，与青吴工委委员李华一起带短枪来吴江，住北厍珍字埂党员潘留生家，建立中共珍字埂支部，书记潘留生。该支部抓紧发展党员，积极准备武装活动；发展了基本群众几十人。1948年2月工委通知停止活动，秦回浦东。

在平望匠人湾顾家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的党员蔡瑛，9月11日在上海因联络站出事累及被捕。陈伯亮从上海赶来平望通知，金亮、黄竞之、俞双人闻讯撤离匠人湾和猛将庙。此时青东地区的武装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淞沪工委决定建立“江南人民反三征总队第一大队”，由陆雪林兼任大队长。活动方式以分散为主，进行“反三征”宣传，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惩办少数反动的敌特人员。在这段时间里，为打通太湖地区的通道，淞沪工委书记王克刚来吴江，与党员张玉良、凌雨山在盛泽西白漾旁开柴行，作为活动联络点。同期，金亮与党员陆琪在严墓南街草棚以摆摊为掩护，开展工作。

1947年8月间，刘伯承率领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发展武装斗争，12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派方休来筹备武装，到坛丘大谢乡乌龙南浜钱福宝家开了一个通宵的会，参加的有中共杭嘉湖特派员罗希明、嘉兴特派员沈如淙和肖斧。他们一起在坛丘大谢乡绕了一圈，察看了地形。方休认为这里环境条件都很好，地处江浙两省四县交界处，东可呼应青浦，西可回旋天目山，南可与浙东穿插。在张家浜还专门研究了搞武装斗争的问题，如何配备武装干部，解决枪支弹药等。

1947年，吴江县党组织先后发展了41人入党。在这期间党组织还先后输送了一些党员去浦东、青东游击队锻炼。

黎里党支部从1947年冬起，大量翻印党的文件，供本地和外地的党员阅读，做了不少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1947年前后这段时间里，吴江党组织通过平望党员顾其行的

关系,在溪西乡办乡校,掩护了不少外来党员同志的工作和活动,其中有不少是上级党组织的负责人。

1948年初,沈如淙派青云党员沈英杰去桐乡钱家埭,以理发为职业掩护,负责党支部工作。2月,中共严墓仁荡坝支部书记盛友鹤负责建立了桃源李家坝支部,书记沈甫章,副书记陆瑞福。同期,沈如淙在肖斧的帮助下,去上海拿来短枪四支。

1948年3月,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决定淞沪工委与杭嘉湖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淞沪杭嘉湖工委。书记方休,副书记王克刚,委员罗希明、范精秋、高山。

第三阶段:1948年4月至1948年底

1948年4月,浦西工作由陈伯亮全面负责。同期,金佩扬从浦南调回,在嘉兴与方休、沈如淙、金亮接上了关系。由方休宣布成立中共吴(江)嘉(兴)工委,书记金佩扬,委员金亮、沈如淙。金亮负责吴江工作,沈如淙负责嘉兴工作,并协助金佩扬搞武装。吴嘉工委的任务是:在吴江、嘉兴两省毗邻地区农村筹组一股武装。

与此同时,有如下几件事情:

(1)4月23日(农历三月半,新滕迎神庙会),由坛丘大谢乡党支部党员顾阿坤、潘天扬出面行动,沈如淙指挥,在东岳庙附近夺走国民兵队班长的一支短枪。

(2)坛丘大谢乡党员潘天扬1948年5月在浦东部队负伤。

(3)方休及时组织了几次运枪工作,参加者有金佩扬、金亮、沈如淙、陆琪、沈英杰、俞双人等。

(4)5月12日、13日,罗希明和方休、范精秋先后在上海被捕,吴嘉工委由陈伯亮直接联系和领导。

(5)5月,松江唐家浜支部党员以借贩糖糟为名,往返黎里与天昆之间,打通吴江与松江的联系。遇国民党警察巡港查船,两名党员脱险,两名党员遇难。

在吴嘉工委这段时间里,主要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

(1)1948年7月1日夜,吴嘉武工队成立,领导人是金佩扬和沈如淙。10个武工队员10支短枪。武工队活动在盛泽、坛丘农村和嘉兴新塍一带,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逐步发展武装。武工队员常常白天隐蔽在群众和地下党员家里,晚上转移宿营地。武工队的成立,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希望,鼓舞了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同时有力地震慑了敌人。

由于青东武装活动牺牲较大,为了保存力量,迎接解放,上海外县工委书记林枫决定停止武装活动。9月初,陈伯亮通知吴嘉武工队暂停活动。

(2)反饥饿斗争。1948年11月,国民党盛泽区长勾结米业同业公会会长,囤积大米,大搞贩运活动,人为地制造盛泽镇的“米荒”灾难。广大工人怨声载道,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中共盛泽纺织支部因势利导,发动工人斗争,罢工罢市。数百工人面对枪口,高呼口号,兵分两路,呼拥前进。通过这次斗争,培养和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入党。

(3)中共沪西工委书记、江南人民反三征总队第一大队长陆雪林(化名李一才),由上海外县工委书记林枫决定,8月从青东调来吴江,住平望溪西乡猛将庙,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

(4)金佩扬派盛泽党员俞双人以中共党代表的身份,深入土匪胡伯龙匪穴,进行联络争取工作。金佩扬、沈如淙在嘉兴北门找胡伯龙谈话,晓以革命道理,要他去邪归正。但胡匪性不改,化名“龙天飞”,四处要钱要枪,工委决定与之断绝关系,并向各地党员传达了这一决定。

(5)党组织及时开展对各地上层分子的工作,搞策反,以集聚力量。通过地下党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控制了黎里镇工商自卫队,一批党员打入自卫队;控制了平望一镇四乡自卫队的人和枪;控制了盛泽镇自卫队武装、芦墟镇工商自卫队武装、八都乡自卫队武装;控制了吴兴县织里、轧村、南浔镇的自卫队武装;控制了桐乡县的

地方武装；还有一些党员按组织布置，担任乡保长，搜集敌特动态，掩护革命活动。

(6) 吴江县党组织 1948 年先后发展了 90 人入党。年底，建立了中共盛泽纺织支部，书记俞永泉，组织委员吴永奎，宣传委员周天宝。

第四阶段：1949 年初至吴江解放

1948 年冬，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做好准备，迎接解放。年度，中共上海外县工委决定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统一起来，以农村据点为依托来开辟城市工作，协调行动。上海局外县工委改由林枫为书记、周克为副书记，陈约珥、丁瑜为委员。外县工委还决定打通苏州、无锡的关系，成立中共苏锡常工委，周克任书记，高山、张云曾为委员。整个苏南地区由周克和丁瑜负责，周克主要抓苏锡常，包括常熟、吴江、江阴；上海郊县由丁瑜负责。同期，成立中共苏州工委，张云曾为书记，陶掌珠（陶戈辉）、孔令宗、马崇儒为委员。

1949 年 3 月，陈伯亮通知陆雪林离开吴江，去杭州搞策反工作。同期，金佩扬接陈伯亮紧急通知，去苏州接受新任务。由周克、张云曾通知金佩扬下太湖去领导原国民党忠教军太湖行动总队少将总队赵安民，控制吴江县松陵、南厍、八坼、溪港、横扇等地的乡政权及自卫队。（此时赵已由中共苏锡工委书记高山发展、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批准入党。）金佩扬同期调溪港党员陈乃元、盛泽党员张玉良担任交通工作，并负责向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汇报、请示。党员费旭初同期奉令亦去东太湖住下。

3 月底，苏锡常工委书记周克过江，去华中局汇报工作，并把他联系的淞沪系统王克刚的关系也作了移交。

在这段时间里，吴嘉湖独立团宣告成立。这是在中共吴嘉工委领导下，经过策反起义，组建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挺进纵队吴嘉湖独立团”。400 多人枪，整编为三

个营、一个警卫连、一个短枪排。团政委沈如淙，团长刘先正。大部分是起义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

解放前夕，吴江党组织加速布置吴嘉工委所属党员做好工作，把已经控制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维护治安，保护人民，配合大军解放。并统一部署了迎接解放的联络信号，各地确定了专人联系，在解放时都顺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各地党员开展了护厂、护镇活动，党组织紧急动员筹粮筹款，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敌人的军事政治情报，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期间，土匪胡伯龙部诈称共产党，企图“劫收”黎里镇，在黎里镇党组织的紧急布置和指挥下，战斗从下午4时开始，直到晚上8时结束，击退胡匪疯狂进攻，保住了黎里镇的武器、粮食、档案等，使全镇人民避免了一场劫难。黎里的地下党员也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4月28日下午，吴江城里国民党顾锡九部全部撤退。晚上11时，金佩扬和赵安民带领自卫队，从吴江西门武装进城，接收了政权。并看守好县政府、监狱，保护了银行、档案、商店、工厂，维护地方治安。次日，在北城楼迎接了从苏州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解放吴江城，与随军南下干部胜利会师。

5月3日，地下党员把吴江解放的布告张贴在黎里镇大街上。次日区大队全体成员佩带红臂章，全镇商店挂红旗，黎里镇在地下党控制下先行解放。4日，迎了解放军十兵团二十八军进镇。5日，二十八军又从黎里到达芦墟镇。

与此同时，土匪胡伯龙一伙又窜进盛泽镇，张贴布告，企图“劫收”盛泽的枪支弹药。党支部发动组织工人纠察队，党员积极向自卫队开展工作，枪弹全部集中，严阵以待，粉碎了胡匪的抢劫阴谋。并截获了一批敌伪档案。5月4日，迎了解放军二十八军八十三师的侦察营进镇。当天，金佩扬随解放军二十九军政委张藩从吴江到盛泽。在盛泽王家庄，由二十九军正式颁发命令，吴嘉湖独立团改

编为独立大队,大队长刘先正,政委沈如淙。金佩扬等随大军于7日挺进嘉兴,接管了政权。并向二十九军张藩政委和第一任嘉兴地委书记钱铭介绍了嘉兴党员的情况。由此,吴嘉工委地下党的同志,全部与解放军接上了关系。从1949年初至解放这四个月里,吴江党组织先后发展了70人入党。

综上所述,中共淞沪地委(工委)系统吴江县党组织的工作和发展,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党组织始终贯彻了“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注意“合法”与“非法”的结合,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全体党员靠对党的无限信赖、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隐蔽下来,生活在广大群众之中,发展了党组织,坚持了点线工作和武装斗争相结合,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解放。

中共华中十地委吴江开辟区简况

中共华中十地委吴江开辟区的工作简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开辟吴江工作时的斗争形势；二是开辟工作的一些主要情况：

一、开辟吴江工作，是当时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为和平建设新中国，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尽最大的努力，同意退出苏南、浙江、皖南等8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长江以北。江南新四军（苏浙军区各部队）遵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于10月下旬陆续渡江北撤。苏南东路成立中共苏常太、澄锡虞两个中心县委，苏南西路成立丹北中心县委，分别领导留守江南的少数干部和武工人员坚持斗争。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空前规模的全国性大内战。苏中军区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七战七捷。

1946年9月，中共苏中区委员会根据华中分局指示，为恢复江南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华中第十地方委员会。十地委所辖地区，北靠长江，南临太湖，西邻镇江，东接上海外县。

华中十地委在苏中区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确定了长期坚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胜利的工作方针，创造开展秘密活动的条件，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生根，逐步积聚力量，达到长期秘密坚持江南斗争的目的。

1946年10月，十地委决定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并决定抽调一批抗日战争期间在江南工作而北撤来苏北的干部，渡江南下去开辟新区。到吴江来的同志，大部分是当时奉令北撤的，这些同志也都是抗日战争期间面目比较“红”的同志。

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是以吴江县为立足点的。根据现在掌

握的资料来看,工作开展主要就是在吴江县境内,当时只有顾加生等几位在锡剧团里的同志,流动在吴江、苏州、吴县等地。开辟新区的工作,困难很多,但全体同志完全采取秘密工作所坚持的方针,展开秘密活动,领导群众合法斗争,达到秘密工作的生根。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了十地委所确定的任务,进入淀山湖地区,进行了新区的开辟工作。

二、开辟工作的一些主要情况

1、领导关系。淀山湖地区的开辟工作是中共华中十地委直接领导的。十地委指定焦康寿为开辟工作的负责人,并确定十地委副书记杨斌负责联系。十地委书记金柯被捕后,经包厚昌、赵建平和焦康寿同志研究,为开展工作的需要,确定淀山湖区由中共澄锡虞工委统一领导。

2、开辟工作的力量组织和干部调配。

负责领导吴江地区工作的同志先后有焦康寿、朱帆(期间,吴苏因到达同里当日即被敌人扣押,次日就离开吴江,所以尚未立足下来。至于他来吴江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现有资料没有统一。吴苏记忆是只此一次;但据朱林芳回忆,1948年冬在平望莺脰湖茶园已和吴接谈工作了,应为两次)。

经组织调配到吴江县工作的同志,从1947年1月至1949年1月,先后共有29人。他们是:焦康寿、吴明、陈秀中、范青、蒋菀贞、陆志明、张健、张根生、陈阿大、顾加生、张志明、李桐明、陈令仪、朱帆、包厚昌、唐云清、张永定、陈元章、陈祖良、朱剑波、许丽娟、王彦萍、唐裕兴、陈毓英、钱志芳、钱杏仙、朱林芳、倪妙珍、吴苏。

还有,李中、赵建平、沈鲁钊、张卓如、陈刚等工委领导同志也曾先后来吴江布置和检查过工作。

3、开展工作的情况。

开辟新区的第一项工作是找关系。以合法的身份住下来,这是

开展工作的首要条件。从外地来吴江的29人,基本上都有个固定的落脚点,而且还都有一个合法身份作掩护。外来同志,有的原来有手工技术,有的有医学知识,有的会开机器,但也有原先没有什么职业基础的,就以小商、小贩、做苦工等职业为掩护。外来党员落脚后就广交朋友,扎下根来,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地下党员把贫苦劳动群众作为结交的基本对象,其他方面的人员只要能起作用的也结交,即使对敌人内部也积极开展了工作。工委交通员许丽娟在同里认了一个寄娘,当吴苏被抓后,由她帮助保释。吴明以医生职业为掩护,有效地开展了基层的工作。包厚昌司令员来吴江,吴明安排包住在房东的家里,并且与房东、邻居在三里桥合股经营石灰窑,为包在吴江指挥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包厚昌到吴江后,两个工委的重要会议在吴江开,许多重要决策在这里定,吴江一度成为澄锡虞、苏常太两个工委的指挥中心。

澄锡虞系统在吴江地区的工作时间虽不长,但搞了不少基点,其中有:吴江城区、南厍(太湖里)、同里镇、钱家厍、胡豚港、周家溪、管家浜、三里桥石灰窑、周庄“天生堂药店”等。这些基点,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朋友结交广泛,并且都先后开展了建党工作。共发展了28名同志入党,其中有:朱帆在石灰窑工人中发展了吴小根等5人入党;李海明在南厍自卫队发展了毕华等3人入党;朱林芳在平望周家溪发展了计秀英等4个农民党员;许丽娟在同里钱家厍、松陵镇镇等地发展了朱斌等4人入党;陈逢贤在横扇发展了朱阿八等2人入党;顾加生在锡剧团发展了郭城等3人入党;王彦萍在屯村管家浜发展了管富达等4人入党;吴明在药店发展了周维明等2人入党。

当然,在工作上也遇到一定的困难,因为人生地不熟,基点建得还不多,而且比较分散。但是,在基点工作中,全体党员在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较大的作用。特别是三里桥石灰窑,这个点是当时活动的中心点,环境和条件都选择得比较好。张根生是石灰窑上的帐房,平时只有一

人在窑上,窑的四周是河,窑墩上只有一个看鸭的老头子,又单独住一个草棚。建窑后,张根生和王彦萍等同志就在窑河南面的村庄上发展党员。党员吴剑清家后边有一船棚,这样到窑上去就很方便。这个基点的力量较强,建窑后的工作抓得又比较紧,后来运来的武器都放在窑上,在窑上开展了武工活动和训练。

坚持武工活动既要有秘密组织,又要有群众保护。三里桥石灰窑之所以能半公开地活动,到1949年春已基本公开活动,就是因为有了党组织、有了群众。

在新区进行建党工作,既要注意启发对方的阶级觉悟,又要相互建立较深的感情。澄锡虞工委在吴江的全体党员,在发展工作中坚持了“对象一定要选准,选得不准决不发展”的原则,认真开展了建党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打入敌人内部搞策反,拉武装。党员李海明打入南厍乡自卫队,他先拜乡长之兄王恕德为先生(老头子),接着就以他的关系打进自卫队。李进自卫队后,在敌人内部发展党员,进行了艰苦的策反工作。临近解放时,依靠党员缴了队长的枪,拉出了自卫队一个武装班,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李海明在工作过程中,敌人对他曾有所怀疑,乡长也对他怀疑,而且把他开除出自卫队。他被开除后,生活极其艰苦,一条破棉被,睡在稻草上,烧只小行灶,讨钱过日子,但仍一个人坚持留在南厍镇上,以自己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冒着极大的风险,克克重重困难,保证了策反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项工作是在搞好基点的基础上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朱帆曾到周家溪去和朱林芳商量过这项工作,决定要努力准备,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武装斗争。由于当时基点星星点点不连片,活动余地小,加上有武工经验的同志不多,所以迅速开展武装活动还有一定的困难。到1948年冬,窑上这个基点武工活动就开始了。运来武器,熟悉地形,进行秘密宿营地的转移,训练了武工活动。当然,从武装斗争的要求来说,吴江还只能说是个开始。

第四项工作是抓紧对上层人士的教育和控制,使他们为人民做工作。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敌人内部开始动摇,一些上层人士顾虑重重,想找出路。对此,地下党同志及时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如同里有个乡长,思想动摇,想找关系靠拢地下党,党组织为了工作的需要,就派党员吴剑清、王彦萍直接与他面谈,进行政策教育,指明出路。在他表示诚意的情况下,向他提出了保证我们活动安全,行动、计划要及时汇报的条件,他完全接受,并且切实地做了一些工作。接近解放时,朱帆、王彦萍、吴剑清等同志带了武装在同里乡下活动,一次在青庙庵碰到同里镇自卫团,朱帆等以“乡长朋友”的身份及时脱险。后来,乡长又及时把枪安全送回给朱帆。

第五项工作是迎接解放。中共华中工委对迎接解放有明确的指示,澄锡虞工委吴江地区迎接解放的工作是按照华中工委的指示进行的。一是保护工厂,保护仓库物资免受损失。如吴江北门外的庞山湖米厂和粮库是规模较大的,对此,党组织及时发动了庞山湖的群众进行保护,使之没有受到损失;二是拉出武装,组织起义。在吴江解放前夕,李海明将南库乡自卫队拉出一个班起义,到庞山湖农场集中;三是与同里区公所通电,约法三章,并派党员张根生去同里镇,当面谈话,直接控制;四是通知集中,朱帆带领全体党员、起义武装及周围群众五十多人,扛了大红旗,开进农场办公室,登上瞭望塔,解放了庞山湖农场。

1949年4月29日,解放军和南下干部抵达吴江,澄锡虞工委系统的同志在北门外热烈欢迎,胜利会师。

中共苏锡吴工委吴江党组织情况概述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取得了节节胜利。1947年2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会议讨论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在此之前,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了国统区的工作,作出了加强国统区工作的决定。根据党的指示,大批干部被派到国统区的城市工作。期间,在抗战时随校迁到四川去的武汉大学的一些党员毕业生,利用家庭社会关系,以职业为掩,到苏南开辟党的工作。

1945年夏,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倪明与同学刘惕恒等一起,在重庆由新华日报社介绍去解放区。结果未走成而留在蒋管区,于1946年春回到苏州。倪明通过远房叔叔、吴江中学校长的关系,于8月到吴江中学担任训育主任,教全校公民课,兼任高一班的级任教师。同来吴江的有倪明的武大同学刘玉(刘玉于1945年夏从重庆去中原解放区,1946年春从中原突围出来,与范文贤一起回到苏州)。刘玉在江中教初中英语和女生体育,兼初一班的级任教师。那时倪明、刘玉虽然还未入党,但与党已经有了联系。在苏州教书的中共党员、武大同学范文贤、陈凤箫,不时到吴江来,与倪、刘一起,学习时事政治,讨论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倪、刘决心以吴江中学为基点,进行革命活动。他们通过广泛接触教师,了解各人的政治思想倾向,同时向他们介绍当时在大中城市已经比较流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的情况。对学生,通过阅看他们的周记、作文等,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注意发现有正义感、要求进步的同学,以便作为培养的对象。与此同时,倪、刘还经常注意推动面上学生的公开活动,推动他们开展一些班级的自治活动,如举办时政讨论会、辩论会,组织音乐会、篮球

队、歌咏队，以及开荒种菜、去农村访问等多项活动，活跃了学校的气氛。一部分爱好读书的学生，组织起青年读书会，还出版了小报。

1946年底，原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人赖映棠（赖卫民）和党员刘叔文撤离重庆到了上海。1947年1月，赖、刘由中共重庆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派来苏州、无锡搞城市工作。此时钱已参加上海局工作，上海局的工作范围扩大到重庆、香港和台湾。4月，根据钱瑛指示，刘叔文与苏州的武大学生党员陈邦辛、范文贤三人组成苏州学委，负责人陈邦辛。由中共上海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赖卫民领导开展工作，由赖跟钱瑛直接联系。

1947年7月暑假期间，倪明、刘玉由范文贤介绍、陈邦辛监督，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倪、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

1947年9月，高山奉派来苏州接替赖卫民的工作，成立中共苏锡吴工委，高山为工委书记，陈邦辛、范文贤为委员。高山除跟赖联系外，还直接跟钱瑛联系。以后，工委又增补了刘叔文为委员。工委领导苏州、吴江、无锡的一些党员。

吴江毗邻苏州，东接上海，西临太湖，苏嘉公路贯穿其中。当时国民党控制很严，市民实行保甲连坐，白色恐怖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地下党工作相当艰苦。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央“短小精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注意活动方式更加隐蔽，力求工作方法更加实在。此时吴江工作的重点是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

在这段时间里，高山来吴江，就住在倪明家。倪明继续从外地邀请一些进步大学生到吴江中学来教书，并在他们中发展党员，以集结革命力量，开展党的工作。1947年暑假后，刘玉离开吴江去武大读经济。工委委员范文贤介绍了原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的胡斌（化名胡德缘），地下党员陈凤箫介绍了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余名清，一起来吴江中学教书。胡斌曾参加过中央大学的“五二〇”学生运动，要求革命的心情十分迫切。1947年9月，倪明请示高山批准，介绍

胡斌入党。余名清到吴江后,住在学校女生宿舍里,迫切要求进步,努力开展女教师和女同学的工作。倪明经请示高山同意,把余交给胡联系(余名清于1948年1月入党)。

1947年8月,郑白清由广西来吴江中学(郑1938年春在湖南凤凰县入党,任过中央泸溪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由党组织派去广西开辟工作。来吴江时郑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郑在江中与胡斌接触频繁,曾一起编印《文艺报》。

胡斌和余名清在这段时间里常去倪明家里碰头,研究工作。晚上还常一起收听解放区的电台的广播。当时倪明主要负责校外和校内上层人物的工作,胡斌负责校内学生的培养发展工作。胡斌在工作中注意发现要求进步、有正义感的学生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教育,确定建党对象。在这方面,倪明和刘玉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半年,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如高一的周维新等、初一的王寄南等、初三的陈关孝等同学。倪明在和校外人士的接触中,注意发现一些明显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并能明白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勇于参加革命的对象。党组织根据开展工作的需要,后来发展了其中两人入党。

一是赵安民。赵曾是国民党太湖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并兼任吴县县长。他还任过国民党陆军十三师少将师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上校参议、苏浙行动委员会太湖别动队司令等,参加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但他平时能与士兵共甘苦、吃咸菜,有“咸菜司令”之称,为人正直廉洁。此时遭到国民党排挤,正在吴江家中闲住。

1947年上半年,倪明通过吴江费因笃了解到赵安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不满,思想苦闷,想东山再起搞武装。倪明为此曾先后向范文贤、高山汇报。高山要倪明从时局、抗战、持久战等方面接触赵安民,充分交换意见,深入进行考察。赵的认识、所谈看法,与我党主张基本一致。接着,高山就以外地进步人士的身份与赵接触,并以老

同事的身份为掩护,住在赵家,进一步对赵作考察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教育,发现赵的态度已经明朗,政治上可以信任。高山去上海东青桥请示了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于1948年4月发展了赵安民入党。

接着,高山对赵安民作了工作布置,要全作好拉武装的准备。赵系河南帮太湖围垦农民的头面人物,原“忠救军”的部属连营干部不少,太湖里那些乡长、自卫队长,不少是赵的部下。赵就利用同乡、部属的关系,联络感情,组织群众。那时太湖里湖匪很多,赵安民组织过他的部属下太湖,名为打富济贫、打击奸商,实际上是去联络散匪,再予改造,组织武装。至解放时,赵安民已有力地控制了东太湖一带的自卫武装。

二是费旭初。费早年在上海音专读书,抗战胜利后,失业在家。倪明通过哥哥倪达了解到费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对倪的姐姐倪淑英到延安参加革命十分钦佩、向往。倪明经过与费旭初接触交谈后,感到费对时局确有一定的认识,就把他作为一个经常联系的对象。当时为了活跃吴江中学的气氛,倪因势利导地推动学生成立青年歌咏队,并邀请和鼓励费旭初去教唱歌。费教唱了不少进步向上的好歌曲,其中抗日歌曲有《松花江上》、《太行山上》、《打回老家去》等,民歌有《小白菜》、《康定情歌》、《红河波浪》等;以及在苏州、上海学生中流传较广的讽刺歌曲,如《茶馆小调》、《古怪歌》、《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等;还有旗帜鲜明的《你是灯塔》、《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是熔铁匠》等等。费旭初教歌很认真,且能注意场合,掌握分寸,在青年学生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歌咏队很快发展壮大,以吴江中学为基地,吸收校内外一些学生和青年,组成吴江青年歌咏队。1947年底,倪明同费旭初谈了入党的问题。1948年1月,由倪明介绍,高山批准,发展了费旭初入党。

2月初,倪明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撤离吴江。这是由于苏工专的党员教师刘惕恒在反对当局开除五个学生的活动中暴露了,苏州城

防指挥部指名要找他。为保护地下党的安全,组织上布置紧急撤离,刘惕恒连夜去上海。而刘在苏工专的职业是由倪明父亲倪获舟(苏工专总务主任)介绍的,为此决定倪明于当天下午紧急离开吴江。吴江的地下党工作,由高山直接联系。

1948年初,高山到吴江中学找胡斌,要胡负责江中的地下党工作,并交代他可在校内发展党员。此时,胡斌的工作由高山直接领导,高山不便来吴江时,就由余名清去苏州听取指示,带回吴江。胡斌在这段时间里,主要工作是发展组织,团结培养进步学生,积蓄力量,迎接解放。胡斌根据原先倪明提出的分工意见,在江中学生中了解、物色发展对象。他利用教物理、化学、兼任初三级任教师和副教导主任的合法身份接近学生,开展工作。对迫切要求进步的学生,个别谈心,借以进步的书籍杂志,培养他们对革命的认识。这一段时间,江中党组织发展工作进展较快,先后发展了初三班的陈关孝、沈祖吉、黄强华,初二班的王寄南、史月娥、王无非入党。

1948年3月,郑白清介绍中共党员何刚(化名何景愉)来吴江,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何原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1944年参加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国学生社”,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后任复旦新民主主义核心小组副书记。1947年在复旦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总负责人,因在校内搞学生运动而被开除)。何在江中与胡斌默契配合,组织班会,出壁报,发现培养学生骨干。但何的组织关系仍留上海,由学委浦作直接领导。

1948年8月,胡斌介绍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赵广祥到吴江中学任高中史地教师兼训导员。胡、赵是1947年“五二〇”运动时一起在南京中央大学搞游行示威工作中认识的(赵在中大已参加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赵来吴江后,与胡住在一起,经常阅读进步书籍,还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人民解放战争的情况。

1948年3月,高山因工作需要调离苏州去淞沪工委,工委成员只剩下陈邦辛一人。后陈邦辛的组织关系由赖映棠转给中共上海市

委学委。至此，原重庆局系统的苏州工委已不再存在。

1948年4月，上海市学委派吴康来苏州与陈邦辛接上关系，并负责指导工作。8月，在吴康主持下，宣布由陈邦辛、孙增因、薛杰三人成立一个党组织，当时未确定什么名称（一说是“苏州工委”，一说是“苏州青年工委”，另一说是“苏州学委”）。该组织直属上海学委领导，由陈邦辛负责，吴康为上级领导人。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该组织在大专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中积极开展学生工作，并创造条件，陆续安排从上海撤到苏州隐蔽的同志。

1948年1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张云曾、陶掌珠（陈戈辉）来苏州，与孔令宗一起组成中共苏州工委，张云曾任书记。

1948年夏，上海外县工委决定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统一起来，以农村据点为依托来开展城市工作，把苏州、无锡打通，协调行动。为此，在苏州成立中共苏锡常委，周克兼任书记，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和无锡工委书记高山为委员。

9月初，上海学委浦作负责领导苏州学生工作。10月，上海学委会又派张渝民来苏，在浦作主持下，正式成立苏州学生工作委员会，张渝民任工委书记，陈邦辛为副书记，薛杰、孙增因为委员。年底，张渝民奉调回沪，苏州学生工委由孙增因临时负责。同期，中共党员李枫来吴江乡师任教。李的党关系原属中共南方局系统，在江期间的组织关系由上海联系。李枫在吴江，配合和支持了吴江乡师革命工作的开展。

10月，经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批准，胡斌介绍了赵广祥入党。此时江中的地下党组织，在教师中由胡斌、赵广祥联系。在学生中由陈关孝、王寄南联系，再由他们联系其他学生党员。随后，学生党员成立了党支部，选举王寄南为支部书记、陈关孝、史月娥为干事。

同期，中共苏锡常工委书记周克（化名胡逸云）也曾秘密来吴江活动，与党员赵安民、费旭初单线联系，传达上级党的有关指示，布置“里应外合，迎接解放”的任务，推动了吴江工作的开展。

1948年12月,高山调胡斌、余名清去无锡工作。吴江中学地下党工作,由赵广祥负责向上级联系。

赵安民入党后的组织关系一直由上级党组织负责同志直接单线联系。中共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多次秘密来吴江对赵布置工作。为配合搞武装,赵安民经上级组织同意,在吴江太湖任苏州抗战遗族学校农场场长,以武装农场工人,组织地下军。1949年1月,上级党组织指示赵打入国民党国防部苏浙皖边区保安纵队第二团(国防青年救国团)任团长,以期拉出武装,策应解放军渡江,后未遂。旋即,又去上海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的总部(大西路20号),打入特务训练班听课,成为毛森特派吴江的直接“通讯关系”,及时为党了解敌人内部情况,搜集和提供情报。

1949年2月,为迎接解放,学校地下党由苏南学联线调整为地区单线联系。上海学委通知浦作将他所联系领导的苏州学生工委的党组织关系,全部移交给中共苏州工委统一领导。苏州学生工委的全部党员关系(约82人)由薛杰移交给苏州工委。薛杰、陈邦辛等参加苏州工委下设的青年区委,工委委员马崇儒兼区委书记,薛杰为副书记。此后苏州学生工作便在苏州工委青年区委领导下进行。

3月初,中共苏州工委学生区委副书记薛杰,化名丁柳,来吴江中学与赵广祥联系,还单线向费旭初传达了上级“充实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3月底,在苏州临顿路春江茶馆楼上,赵广祥与薛杰第二次接头。薛布置了迎接解放的具体工作,要求在解放大军渡江、国民党崩溃这一重大政治变革中,不盲动,要尽量维持好社会秩序。并要进步师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护校队,保护好学校的财产。在这次碰头会上,薛还正式通知赵,将在吴江的上海党员王新五的组织关系,转给吴江中学党支部。

王新五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1946年5月在复旦加入共产党。1946年冬,因病回吴江家里休养,组织关系仍由上海党直接联系。1948年夏,王新五的健康基本恢复,根据上海党

组织的指示,在吴江社会上开展工作。他首先推动在外地升学的江中毕业生马兴、夏枫等,在暑期中组织“吴江旅外同学会”,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随后,为了扩大影响,进而团结教育校内的学生,将“吴江旅外同学会”扩大为“吴江青年同学会”,吸收吴江中学和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的进步学生参加,同学会的会员人数增至一百多人。吴江青年同学会主要开展了下列工作:

一、开办“江友”图书阅览室。“江友”阅览室藏有不少进步书刊,其中有《文萃》、《观察》、《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有《竖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文艺小说;有《大众哲学》和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物;有列宁的《怎么办》、李昂吉也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解放区见闻录》等;有内部阅读的党内刊物《群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他还有苏联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进步读物等等。阅览室在学校放假期间,由青年同学轮流值班。平时主要由王新五值班。“江友”书报阅览室对广大群众开放,还订有一些当时公开出版的报刊为掩护。阅览室对进步青年介绍苏联文艺小说,对其中比较了解的青年就推荐他们阅读《解放区见闻》等读物。对会员中比较可靠的学生,则组织他们内部阅读党的刊物《群众》。阅览室是王新五用面临吴江中山街的他家的两间空房设立的,几百册图书大部分是王新五拿出来的。解放后在吴江刚建立县新华书店时,就是利用了“江友”图书阅览室的房屋及设施开业的。

二、出版《江友》油印小报,小报由王新五组织,马兴主编。《江友》结合当时的时政形势,揭露反动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刊登《密勒氏评论周报》上的译文或从陕北解放区电台广播中听到有关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还介绍了各地高校学生运动的动态,及吴江青年学生的活动情况等。在那胜利捷报频传的时刻,《江友》出版专刊,印发传单和小册子,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传递。

吴江青年同学会的活动经费由王新五牵头,主要是通过办暑期补习班、放电影、搞义卖来筹集的。电影是由马兴向他母校——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联系取得的(马兴于1947年与苏州社教学院地下党员周昭接上联系,1948年6月马宁通过马兴去苏北“江南工委”)。

1949年3月,苏州工委青年区委副书记薛杰根据青年区委书记马崇儒的布置,来吴江见面王新五,通知将他的上海党组织关系转给吴江中学赵广祥。但当时活动仍是分头进行的。

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影响下,吴江中学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学,对校方提出了民主改组学生会的要求。经过斗争,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产生学生自治会,选举进步学生担任自治会的领导。寄宿生对克扣伙食不满,要求自己管理。党员学生一起投入。校方被迫同意学生自己成立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在这段时间里,吴江涌现了一批学生运动积极分子。4月,经赵广祥介绍,薛杰批准,江中支部发展了高三学生刘钟淦入党。

吴江中学学生党员陈关孝经组织同意,自1948年下半年起,进吴江乡师读书,推动了乡师革命活动的开展。乡师范进步师生办起了小型图书馆,藏有《李有才板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批进步书籍。一些进步学生参加了吴江青年歌咏队。此时,由上海转移来吴师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枫积极鼓励进步学生站起来,开展活动。进步学生举办全校性的墙报期刊,还利用学校克扣学生公粮一事,组织部分同学,深夜到食堂和公告处,张贴了10张揭发国民党贪污丑行的大字报。在王新五和“青年同学会”的布置下,学生还开展了社会调查,了解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等。

此时,马兴已由周昭介绍参加地下青年团,在中共江南工委的联络部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上曾布置马宁回吴江,对吴江县政府军事科科长开展工作。

党员费旭初在苏州工委的单线联系下,组织进步学生深夜收听新华社广播,编写小字报递送,使胜利消息及时在进步师生中传播。

“青年歌咏队”的活动也更加活跃、扎实地开展。

4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书记林枫、副书记周克决定调中共吴（江）嘉（兴）工委书记金佩扬到苏州工委，由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直接联系。金下太湖领导赵安民，以秘密控制东太湖一带的地方武装和吴江县部分乡镇自卫队。中共苏州工委同时通知费旭初下太湖住下，随金佩扬、赵安民一起活动。

赵广祥和王新五接上头后，赵常到王的楼上房间里，秘密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将收听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全文记录下来，由赵广祥交给王寄南去刻印张贴。同期，赵广祥在吴江南门外油菜田头，召开江中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赵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要求全体党员做好自己接近的同学的工作，尽量动员同学不要离开学校，合力保护学校，让学校完整而有秩序地接收到人民手中。

4月下旬，解放军已渡江，胜利形势迅猛发展。苏嘉湖公路交通断绝，吴江城里到处住着溃逃的国民党军队。党组织迅速布置吴江中学和吴江乡师成立学生联合会，把两校的进步师生联合起来，全力保护好学校，配合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吴江的工作。两校均组织了护校守备队。学校大门有护校队员守卫，白天轮流站岗放哨，晚上手执木棒值班，在校内巡逻。与此同时，把新华社广播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用毛笔写成大字布告，和油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起贴到县城几条主要街道上，有力地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党员史月娥、王无非等为保证安全，曾将进步书籍密藏在石板下面，晚上又转移到校园后面的河浜里。“吴江青年同学会”在王新五的组织下，在深夜电筒光下，写出县城国民党各机关、警察局、保安队的驻地及电话号码，并把粮食仓库等画了地图，还搞到了吴江县银行保险箱的钥匙，把情报和存款及时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同学们情绪高昂，大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的队伍来了”！还组织起身歌队，大扭秧歌舞，迎接

新历史时期的到来。4月28日晚上11时,金佩扬与赵安民一起率领吴江县的部分地方武装起义,从西门进城,接收了政权。

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挺进吴江城,随军南下的干部队伍同时抵达。赵广祥于当晚向中共吴江县委鲁琦书记移交了吴江中学党支部所属的党员关系,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中共丹北同里支部情况记略

原中共丹北工委特派员孙瑞成，于1945年北撤。1946年10月底，受中共华中十地委丹北工委书记赵文豹派遣来苏南。行至上海，同行的丹北党员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特务密捕密放。孙瑞成受牵连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无法返回丹北地区开展工作。1947年4月，孙瑞成决定到吴江，通过在同里的表兄吴伯荣的关系，在同里镇落脚。当时，吴伯荣在同里鼎泰南货店工作。孙瑞成去后，即以鼎泰南货店职工的身份为掩护，并改名为孙云峰。

不久，孙瑞成又带党员柴培之、张执华来同里活动，公开职业是开设新鑫糖果店。

1947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29军官总队驻同里中队的军官周天泉等5人，将同里南濠弄小学女教师邹月娥轮奸致死。惨案发生后，孙瑞成通过吴伯荣，发动群众开展斗争。5日，同里镇商会开会，吴伯荣鼓励商界支援学校斗争。7日，全镇实行罢市、罢工、罢课，声势浩大。并对自卫队班长展开工作，要他们查封轮船码头，不让军官队出走。最后迫使国民党当局将凶手逮捕法办。

1947年冬天，孙瑞成到上海，找到新十地委书记、原十地委组织部长陈云阁，作了汇报。陈说将他的关系转到苏常太工委去。

1947年下半年，孙瑞成开始在同里建党，先后发展了吴伯荣等14人入党。

1949年1月，孙瑞成离开同里时，布置吴伯荣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迎接解放。并要求吴伯荣立即建立党支部，由吴任支部书记，负责同里支部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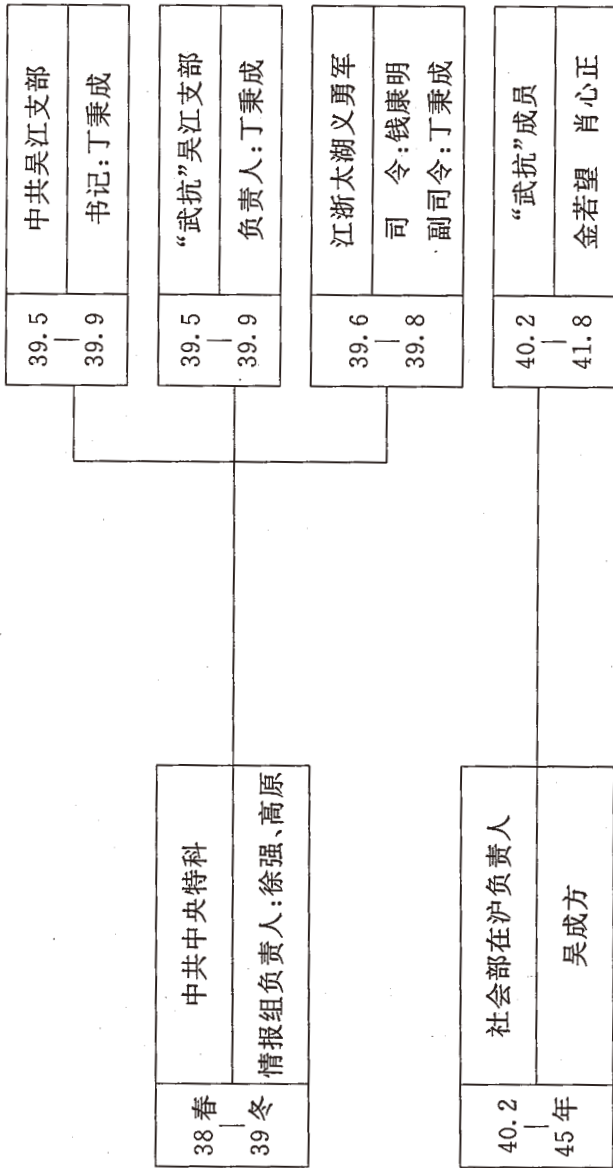
解放前夕，孙瑞成在通信中指示吴伯荣，要设法保存好同里镇自卫队的武器。吴伯荣及时开展了对自卫队教官的工作，要他保护好自卫队的枪支弹药，把自卫队员全部集中在镇郊的青庙庵。同里自

卫队的武器没有遭到损失。全体党员按照党支部的布置,认真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

吴江县各系统党组织关系隶属表

中共中央特科系统的吴江党组织关系隶属表

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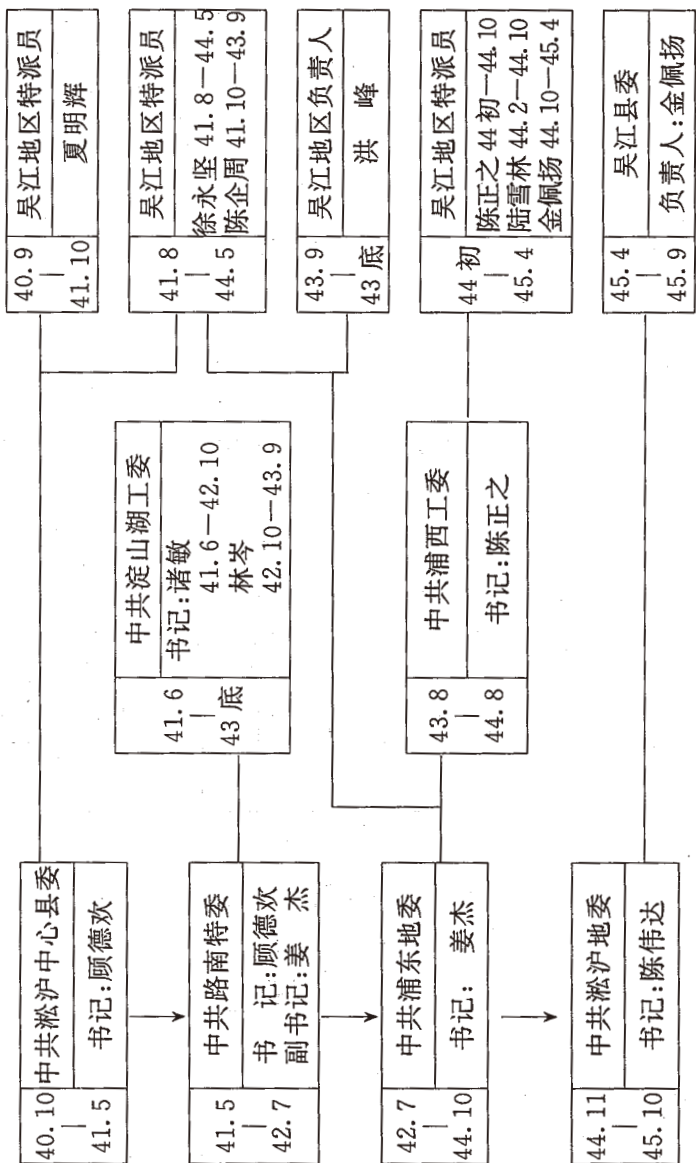


中共浙西特委系统的吴江党组织关系隶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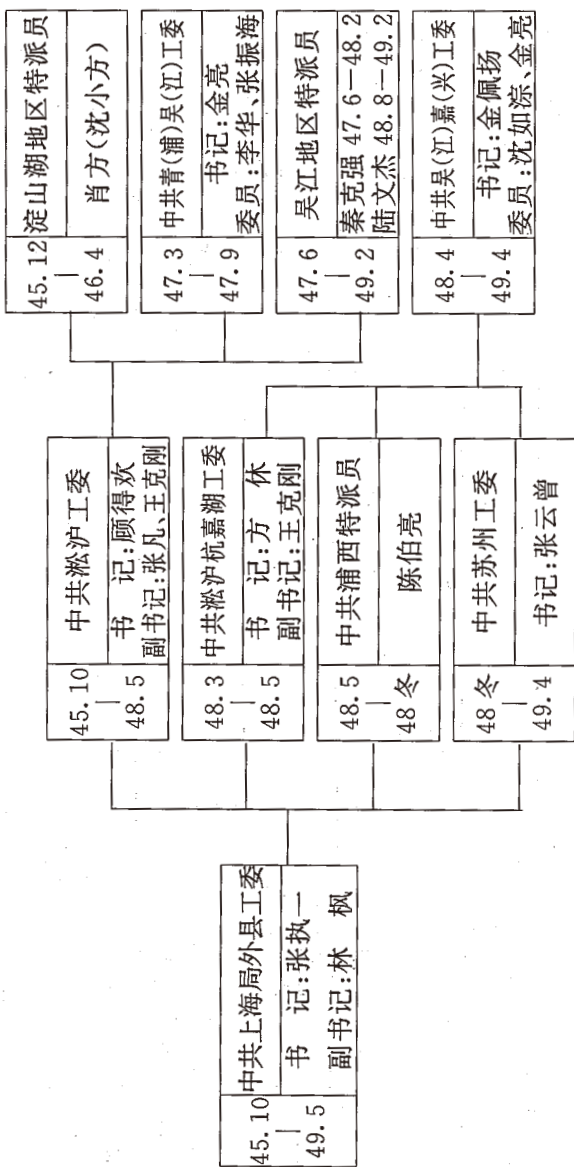
表二

39.5 — 39.12	汪鹤松部队特别支部 书记:徐进 组织:刘明 宣传:韩昌	青云水家港支部 书记:沈英杰	39.5 — 49.4
40初 — 41初	吴兴县委 书记:王子达(前) 汤池(后)	水家港妇女支部 书记:沈彩珍	40.5 — 49.4
41初 — 42.4	吴兴县委 书记:史列青 副书记:贝纹(兼组织) 宣传:赵金城	南李家浜支部 书记:张宝其	40.7 — 41.12
41.9 — 42.4	嘉兴县委 书记:罗希明	茹菇垞支部 书记:沈阿五	40.11 — 49.4
43.4 — 48.5	浙西特派员 罗希明	严墓镇支部 书记:王化鹏	40.11 — 41.5
48.4 — 49.4	吴(江)嘉(兴)工委 书记:金佩扬	青云仁荡坝支部 书记:盛友鹤	40.12 — 49.4
40秋 — 41.6	苏浙特别支部 书记:朱闻礼	桃源李家坝支部 书记:沈甫章	48.春 — 49.4
40.7 — 41.12	严墓区委 书记:赵子扬	坛丘大谢支部 书记:周炳发	40.秋 — 41.底
42.4 — 43.4	新塍区委 书记:沈如淙	坛丘大谢支部 书记:仲春山(前) 钱福宝(中) 仲春山(后)	42.4 — 49.4
43.4 — 46夏秋	嘉兴特派员 沈如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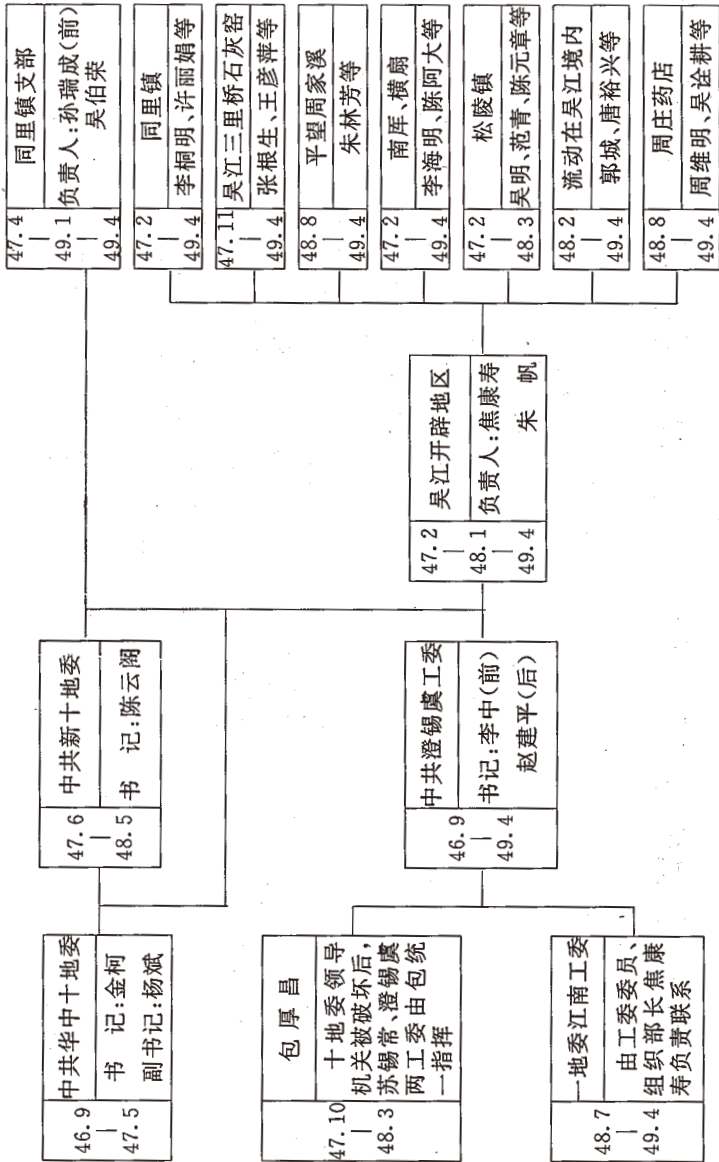
表三 中共淞沪地委(工委)系统的吴江党组织关系隶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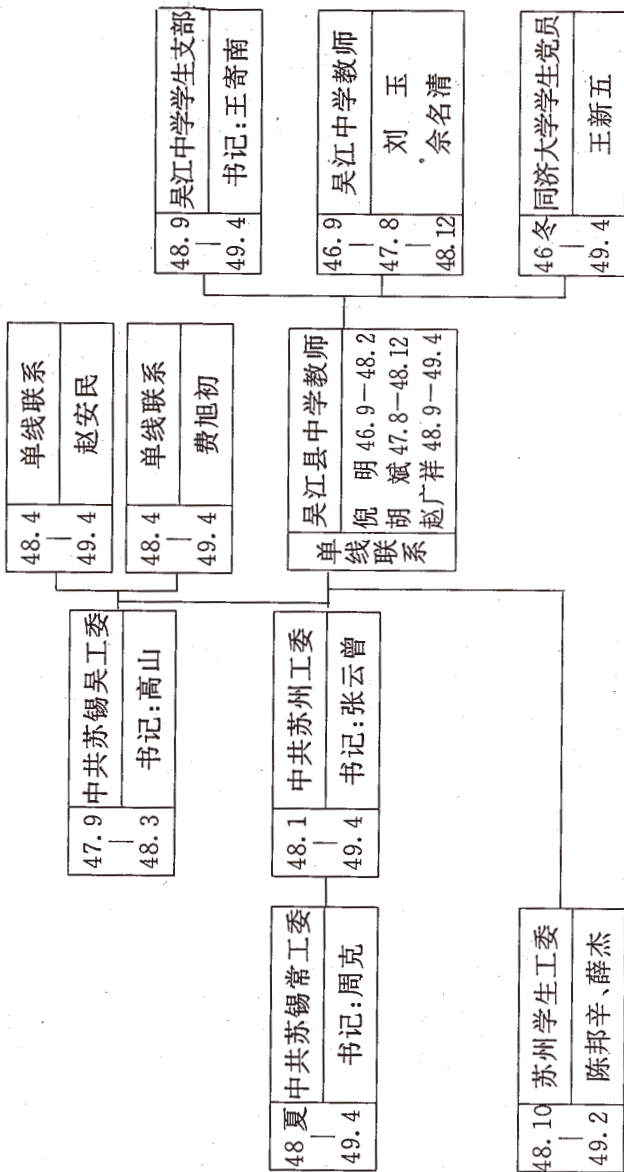
(接上页)



表四 中共华中十地委系统的吴江党组织关系隶属表



表五 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苏锡吴工委系统的吴江党组织关系隶属表



吴江县党员人数统计表

表六

历史时期	年份	早期	浙西特委系统	中央特科系统	淞沪地(工)委系统	城工部系统	十地委系统	苏锡吴系统	丹北工委系统	合计
大革命时期	1923年	1								1
	1925年	5								5
	1927年	7								7
土地革命时期	1929年	4								4
	1932年	7								7
	1937年	2								2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		7	4						11
	1940年		49	6	2					57
	1942年		63	2	7					72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		84		29	2				115
	1946年				121		5	2		128
	1947年				161		15	4	3	183
解放战争时期	1948年				251		23	12	10	296
	1949年4月				378		38	14	17	447

附录二：大事记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1919年

5月上中旬 “五四”运动爆发后,吴江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闻讯群情激愤,吴江各地群众集会,参加者多达万余人。吴江学校相继罢课,学生涌向街头及乡村宣传演讲,查抄焚毁日货。

5月27日 吴江中学为“国耻纪念”举行通电罢课,与苏州学生会一致行动。

5月31日 苏州学生联合会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召开第四次常会,由派赴上海、无锡、吴江三处的代表报告各界进行斗争的经过。

6月5日 吴江一万多男女群众召开大会,声援“六·三”上海工人罢工运动。

1921年

年初 从小在盛泽镇外婆家长大、后又家寓盛泽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邵力子,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邵入党后,不时回吴江县宣传革命。

1922年

5月 吴江县影响颇大的“黎里市民公社”成立。

1923 年

4月1日 柳亚子与里人毛啸岑等64人创办《新黎里》半月刊，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吴江各地人士闻风响应，此后冠以“新”字号之盛泽、莘塔、震泽、平望、同里、严墓、吴江、周庄等报刊相继出现。

5月16日 吴江报纸大幅报导吴江各界团体举行“国耻纪念”活动。同里镇丽则女学师生召开反对“二十一条”大会，声讨日军侵华罪恶行，宣誓不买日货。

5月 为芦墟分湖先哲祠迁址事，柳亚子等受到同邑陆氏挑衅。陆以柳自称“列宁私淑弟子”为证据，指柳为“过激党”、“潜蓄异谋”，密告至江苏省政府，柳几遭不测，《新黎里》报为之停刊数月。柳亚子与里中人士奋力抗争，事解。9月，分湖先哲祠迁回故址。

7月16日 《新盛泽》创刊。办报宗旨为“扫除一切阻挡事业发展的障碍，提倡新思潮；鼓舞民众士气，反抗妖魔鬼怪，改革旧社会，为民求幸福。”

10月 柳亚子与叶楚伦、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成立“新南社”，廖仲恺、何香凝、沈雁冰等参加。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下，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学团体。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为第一届编辑主任。

11月15日 《大分湖》创刊。发刊词说：“用严密的笔墨，为民请命，与子同仇，鼓吹新思想，对行政教育的腐败、土豪恶棍的横姿，都应切实监督，严正讨伐，此为办本报的唯一宗旨。”

11月26日 有震泽、严墓、横扇、平望、梅堰、吴淞、五都等区的10校校长共51人，给省厅去电，发表《吴江县震属七区各校罢教宣言书》，并成立了联合会，罢课两星期余。同期震泽初中闹学潮，罢课两次。

1924 年

年初 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此后参

加党务,在吴江及江苏一带组党,积极活动。柳公开宣称:“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什维克之主义”,自题“独拜弥天马克思。”

邵力子也委派家住吴江县的复旦大学学生党员假期回家乡秘密发展国民党员。

2月16日 柳亚子在《新黎里》报发表文章《列宁和孙先生》。

4月15日 盛泽镇绸业罢市,绸行相继闭门,机户工人暴动,苏州陆军1个排前往镇压。

5月 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派柳亚子回吴江组织吴江县党部。

7月16日 《新黎里》报刊登中共党员陈望道给“南社”社长柳亚子的信。

7月 吴江县先后成立城区、同里、黎里、盛泽、平望5个国民党区党部,13个区分部。

8月24日 国民党吴江县党部于盛泽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柳亚子、张应春、杨剑秋等。中共党员侯绍裘、邵力子和朱季恂、邵季昂来盛演讲。选举柳亚子为执行委员会常委。县党部下设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

同日 吴江各区学界特请邵力子、朱季恂、邵季昂、柳亚子在盛泽演讲。柳讲《中华革命史》、朱讲《政党与国家》、邵讲《中产阶级与国家之关系》,演讲约2小时。是日到会有黎里、严墓、平望、八坼、震泽和城区的学界人士。

12月16日 由柳亚子发起成立“江苏民治建设会”,并发布宣言。

1925年

1月1日 改《大分湖》为《新莘塔》,期数续前由16期始。该报主张:“本良心,为主义,上之如教育行政,下之如民间疾痛,不厌麻烦,为怕强暴,把社会上种种奇形怪状尽量度披露,将暮夜里一般魍

魅，囊括扫除之，利用那笔锋墨阵，杀开一条血路来。”

5月1日 《新震泽》报创刊，刊登共青团员陈味芝撰写的《劳动者快快团结起来吧》文章。

5月3日 吴江县在黎里镇隆重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毛啸岑致开会词，大会主席柳亚子介绍孙中山的历史，张应春任司仪，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发表演说。16日，《新黎里》报出版《吴江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特刊》，在一版刊登了侯绍裘的演说词，题为《如何竟孙先生之功》。

5月16日 柳亚子在《新黎里特刊》刊登祭孙中山先生挽联：

“树弱小民族解放先声，列宁而还，公真健者；

与帝国主义奋斗毕生，斯人已往，谁其嗣之。

党员柳亚子”

5月17日 柳亚子、张应春在黎里出席第四区分部会议，柳为临时主席，补选张应春为执行委员。

5月 吴江县横扇第一小学教师傅缉光由中共党员、团中央委员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6月初 上海“五卅”惨案传来，吴江各地群情震骇，迅速掀起了浩大的声援活动。各镇乡集会游行，发动募捐，通电支持，并采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黎里镇组织了宣讲队，深入基层群众中，散发传单，宣传演讲；松陵镇学生演剧筹款，支援上海工人；震泽初级中学、省立一师吴江分校、吴江县中学等十余所学校的近千名学生集会游行，震泽八都村全体农民通电全国；同里二铭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印刷爱国传单分发各商店，并张贴桥头巷口；吴江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纷纷召开会议，确定数项援沪办法，成立各界声援上海后援会。6月底，平望、黎里、莘塔等市民隆重集会游行，公祭被帝国主义惨杀的诸烈士。平望学校停课一天，各公法团体停止办公一天，商界休业三小时，以示哀悼。黎里镇学校罢课、手工业工人罢工、三千多人臂缠黑纱参加公祭，各商店均挂“打倒帝国主义”、“毋忘五卅，坚持到底”的

白色纸旗,游行群众沿途大呼口号,声震瓦屋,道旁观者无不肃然起敬。苏州工业学校宣传团专程到同里,演讲上海惨案经过,并游行散发传单。上海学生联合会邀请苏州新舞台全体剧员到吴江、同里义务演出,筹款救济上海惨案之失业工人。

6月3日下午 第四区党部在县立四高校开会,出席有柳亚子、张应傩、毛啸岑等13人。讨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决议由柳、张、毛等五人组成演讲队,向市民演讲宣传,当晚即在夜校举行第一场演讲。

6月5日 成立“上海五卅惨案严墓后援会,出席者138人。16日,发表宣言。

6月13日 震泽丝业公学教职员和学生一面游行演讲,一面就地募捐,共募得大洋253元,小洋701角,铜元4068枚,解至全国学生总会,接济罢工工人,并致函表示慰问。震泽15个团体的2000余人游行,手执白旗,高呼口号。并召开民众大会。

6月21日 《新盛泽》报第四版刊登中共党员杨之华在吴江的讲演稿,题为《在最近政治状况下党员应如何工作》。

同日 由柳亚子、毛啸岑主持,在盛泽第一校召开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备会。7月上旬在盛泽东庙书厅正式成立。

6月30日 在黎里召开公祭被帝国主义惨杀烈士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臂缠黑纱。会后2000多人游行示威,沿途大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同期,张应春在葫芦兜率领学生组织别动队,在乡村游行示威,宣传演讲。

7月1日 张应春在黎里发表讲演,题为《怎样可补救我们年长失学的妇女们》。

同日 《新黎里》发表《吴江、吴县、周庄乡援助五卅惨案会宣言》。同时刊登“暑假妇女学校开学消息”,并刊登“招生简章附录”。公推张应春为主任教师。

7月初 黎里外交后援会多次向广州革命政府和报馆发出电

文,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国土等主张。并继续组织演讲队到处演讲,散发传单。柳亚子、张应春、毛啸岑等带领人员进行募捐工作。当时黎里 260 多个单位和个人,共捐大洋 338 元,小洋 95 角,钱 40 文。

7 月 10 日 盛泽外交后援会在东庙书厅召开成立大会,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唤醒同胞”为宗旨,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7 月 14 日 在黎里四公校召开国民党吴江县第二次全县代表大会。会议决定设立妇女运动部、青年运动部、农民运动部、工人运动部。15 日晚,县党部举行提灯示威活动。党员敲锣击鼓,到茶肆公开演讲,民众蜂拥而往。15-19 日举办了夏令讲学会。讲师有中共党员侯绍裘、沈雁冰、杨贤江、王一知、姜长林、董亦湘等。他们的讲题有:

侯绍裘:《五卅惨案与中国工农党》

《教育界之切身问题》

沈雁冰:《最近国际间之政治状况》

杨贤江:《青年问题》

王一知:《妇女问题》

姜长林:《我们怎样站到民间去》

董亦湘:《民族主义》

柳亚子:《苏曼殊之我见》

朱季恂:《革命口号及其方法》

张仲友:《甘地主义与中国》

邵纪昂:《中国工农历史的使命》

每日听课者甚多,有不少外地人也前来听讲。

7 月 26 日 同里青年雪耻会成立。

8 月 2 日,吴江青年学生会发表宣言,声援五卅运动。

8 月 23 日 松江、铜山、吴江等 13 县利用通讯的方法选举出朱季恂、侯绍裘、刘重民、戴盆天、张应春、柳亚子、董亦湘、黄竞西、宛希

俨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发员,姜长林、高尔柏等为侯补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其中侯绍裘、戴益天、刘重民、姜长林、高尔柏等均为共产党员。各县、市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亦大多为共产党员。

8月24日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召开成立大会,推定北厍张应春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盛泽杨明暄为妇女部副部长。

9月11日 《新盛泽》报为悼念廖仲恺先生,在第二版发表社论,题为《反共产?反革命!》。

10月20日 《新严墓》报创刊,并发表“宗旨是打倒帝国,打倒军阀!”的文章。

10月 北厍张应春在上海由中共党员侯绍裘、姜长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月 国民党吴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于震泽丝业公学召开,并在丝业公学举行廖仲恺追悼大会。公学创办人杨剑秋和柳亚子登坛讲演,中共党员姜长林、张应春出席。

以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全力以赴投入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的反帝怒潮。他们中有松江朱季恂、吴江柳亚子等左派,还有松江侯绍裘、吴江张应春等中共党员。基层的国民党组织和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亲密无间地战斗在第一线。如吴江国民党三区二分部(盛泽镇),在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全力投入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11月1日 《新黎里》报发表朱季恂的《追廖仲恺先生声中的呐喊》和中共党员姜长林《追廖先生》的文章。

11月26日 《新黎里》报发表毛啸岑的《进化——退化——赤化》和共青团员傅缉光的《无系统地随意谈谈国民党》的文章。

11月30日 《震属市乡公报》(第85期)发表特讯:“本县第四区(黎里区)小学教员开展要求加薪运动。”

11月 中共浙江绍兴特支甲组(大学)党员凌云(陈味芝)离绍

兴回家乡震泽镇活动。

12月5日 黎里糖坊工人因百货昂贵、生活艰难，要求加薪以维持生计，集会万年楼茶社，讨论罢工。

12月16日 共青团员傅缉光在《新黎里》报发表文章《怎样唤起民众？》。

12月20日 吴江县第四区（黎里）小学教员发表加薪运动宣言。

12月23日 中共党员陈味芝，按原化名凌云，从震泽丝业公学写信给中央，对“责令从速发展组织”的指示，表示“愿作工作”，并要中央不断通告。

12月25日 震泽丝业公学举行云南起义纪念会，中共党员陈味芝在会上发表了“要建设中国，要组织起来”的演说。当日即成立了吴江县学生联合会筹委会。

同日上午 吴江中学全校师生集会大礼堂，由薛公侠等演说，详述共产党之履历、孙中山之革命史等。

12月 严墓镇南货业伙友为维持生活，议决加薪运动，并发表宣言：“工人农民立刻觉悟起来，树起光明灿烂的旗帜，打倒反动势力！跟着前辈向前去，杀开一条血路来。”

11月、12月 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执委会连续4次召开会议，对“西山会议”表示义愤，决定开除附和党员的党籍。

是年 江阴学生徐江萍（时用名徐逸凡），在苏州第一师范分校（吴江）读书，带头参加了声援“五卅”的革命斗争。为探讨新思想，6个江阴学生组织起江阴同乡会分会，开始与在澄的同学通信联系，经常寄来《新江阴报》，内夹《星光旬刊》，有中共党员孙逸群组织的“农民促进会”章程，徐填写了入会申请表。

1926年

1月1日 中共党员张应春在《新黎里》报发表题为《对本区女

同胞的几句话》文章。

同日 在震泽丝业公学礼堂召开学生会成立大会。

同日 《盛泾》报元旦增刊,发表中共党员王若真《现今妇女及此后应有的觉悟》一文。《新盛泽》刊登中共党员杨之华《在最近政治状况下党员应如何工作》。《新严墓》刊登王若真《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点的结果》。吴江各地的报纸上还刊登了沈雁冰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杨贤江的《五卅惨案之意》。

同日 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在平望八慵园得真堂召开第四次全县代表大会。江苏省党部代表,中共党员萧楚女、姜长林、陈味芝和共青团员傅缉光等出席了会议。

1月1日-19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侯绍裘、刘重民、张应春等5人作为江苏省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柳亚子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月4日 中共党员陈味芝从震泽写信给中央,告知在县代大会上提议案5个,通过4个。并请求开展学生运动的方针。

1月8日 中共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在吴江检查工作期间,写信给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赞扬横扇第一小学教师傅缉光“阶级性极深,对于主义信仰甚至”;称赞震泽丝业公学陈味芝极力革命,与“我们的同志一样”。要中央立即去信联系。

1月15日 《盛泾报》第四版发表中共党员萧楚女在吴江的演讲稿全文。

1月17日 陈味芝再从震泽写信给中央,告知学生会已正式成立,并举办了演讲会。还就发展党员介绍组织关系问题作了请示。

1月27日 陈味芝又从震泽发信给中央,告知吴江县民校工作情况,并附去《震泽国民党对于时局的宣言》。

2月 柳亚子、张应春、毛啸岑由嘉兴赴上海参加江苏省各市县党部联席会议。

是月 《新震泽》报发表中共党员陈味芝《学说被人信仰及反对

的原因》的文章。

是月 柳亚子在上海举办“寒假训练班”，中共党员陈味芝、杨之华和傅缉光自吴去沪与会，并摄影留念。

3月8日 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部长、中共党员张应春主编和出版的《吴江妇女》在上海创刊。办刊宗旨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礼教，要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创刊号上张应春发表了《国际妇女与吴江妇女》的文章。共出版五期。期间，张应春先后被中共江浙区委任命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济难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3月12日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南京夫子庙贡院召开了孙中山先生逝世1周年紀念会。妇女部长、中共党员张应春登台演讲，阐述国民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段祺瑞的卖国政策作了猛烈的抨击，号召妇女起来为国民革命和妇女解放而奋斗。会后在夫子庙贡院组织示威游行，张应春手执“拥护国民会议”的旗帜，走在女同志队伍的最前面。

同日 侯绍裘与柳亚子等率领江苏省党部代表由沪到南京出席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但“丧事筹备处”已为国民党右派操纵，他们雇用流氓打手占据会场，高喊反动口号。党领导国民党左派和进步群众，坚决进行反击。侯绍裘为保护柳亚子与女同志转移，遭到毒打。

3月 为消除“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吴江县党部派员赴各区召集农民演讲，宣传三民主义，力图把组织推向农工商各界。

是月 上海各界举行声援“三一八”惨案群众集会，张应春作慷慨激昂演讲，许多听众感动泪下。

4月5日 张应春等欢迎中共党员杨之华、瞿秋白到吴江集会并留影。

同日上午 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在同里镇侍御坊举行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下午召集第五次全县代表大会。柳亚子和中共党员侯

绍裘、杨之华、瞿秋白、张应春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演讲，侯讲《反动派的历史》、杨讲《妇女与政治》、瞿秋白讲《中国妇女与国民党》。

4月8日 《吴江妇女》第二期上，刊登了张应春两篇文章：《悼北京为爱国惨死的烈士》、《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女同胞起来奋斗，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在红色的血泊里找到光明的道路，建立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

5月8日 第三期《吴江妇女》刊有中共党员杨之华的讲演稿《怎样才能达到妇女解放》及《妇女运动的主力军》等文章。

5月9日 盛泽镇各界为不平等的“二十一条”举行国耻纪念会，各学校、团体齐集东社庙广场，发表演说，整队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5月11日 中共江浙区委决定派张应春到南京、徐州、苏州指导党的工作。

5月 吴江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

6月1日 盛泽踹坊业因米珠薪桂，生活艰难，公议加价。

6月8日 《吴江妇女》第四期，刊有张应春的《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五卅”》和《革命和妇女》、《妇女与政治》等文章。

7月1日 《南麻报》发表《国耻感言》，号召“爱国同胞，万众一心，贵有决心，共谋抵抗”。

7月8日 《吴江妇女》第五期，刊有《省党部妇女部反对军阀摧残女权宣言》、《妇女运动决议案》及高尔松的《妇女与政治》等。

7月20日 《新严墓》第8号刊登中共党员王若真的讲演稿《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点的结果》。并发表题为《迫击炮》的文章，指出：“什么叫新？老实说，就是革命！我们要救中国，只有实行国民革命，我们了解中国有国民革命的必要，有国民革命的可能；口号便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方法便是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8月20日 盛泽“外交后援会”举办演讲会，主讲者有：

杨贤江：《五卅惨案之意》

沈雁冰：《帝国主义侵略方式》

邵纪昂：《国民会议》

杨之华：《在最近政治状况下党员应如何工作》

徐蔚南宣读了孙中山遗嘱。

8月 国民党吴江县党部设立青年妇女部，叶心田为青年妇女部部长。

12月26日 八拆镇的省水警5队拉夫捉船事件，酿成罢市风潮，商店纷纷闭门罢市。

1926年 吴江夏锦涛(夏帮基)在日本东京由童长容、金则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夏锦涛到中共苏州县委工作，负责搞农民运动。1930年奉调中共沪宁特委工作。1937年，又去桂东组织湘南游击队。)

是年 同里王绍鏊到吴江乡村师范主讲土地革命。(1933年，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毁家纾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6月被蒋介石逮捕，至“七·七”抗战爆发被营救出狱。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小组，并参加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

年末 黎里蒯世曛在复旦大学加入国民党左派，回黎里后，与中共党员张应春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年底 吴江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组长费清、组员费霍、费孝通。

1927

1月15日 吴江松陵人钱刚(钱涤根)被军阀孙传芳逮捕，次日杀害于上海，年仅40岁。时由中央党部委任为江苏国民革命军总指挥。

2月16日 中共上海区委举行改选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张应春当选为妇女运动委员和中国济难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2月28日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第二连由平望到达黎里镇，驻西栅宁绍会馆。

2月 黎里毛啸岑(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在上海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月10日始 北伐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各连相踵至芦墟镇。14日，先遣司令李明扬至。

3月12日 在上海莫利爱路(香山路)孙中山故居举行孙先生逝世纪念，毛啸岑随侯绍裘同去环龙路(南昌路)44号打砸西山会议派的巢穴，侯被西山派殴伤咯血。

3月13日 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由平望到黎里，赴各要隘视察防线。后两次在泖泾弄先锋营操场举行纪念大会。

3月18日下午4时 北伐革命军先遣别动队一大队抵达吴江。全城市民，隆重欢迎。3月19日黎明，国民革命军在师长严重带领下，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3个团相继开到吴江。军队驻北门外三里桥一带，师部住爱德女校。师政治部主任邝廓和几个科长、秘书均为中共党员。吴江县党部招待军士，举行联欢会。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政治部党务科长陈士鼎邀集吴江各界代表83人开会，宣布吴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委员杨天骥为主席。工农商学妇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各行业工会相继成立。是日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到会3000多人。3月20日中午起，二十一师在严师长指挥下，在吴瓜泾桥与鲁军第一、第三混成团激战，至21日凌晨3时战斗结束，北伐革命军大胜。

3月19日 中央江浙区委召开特务委员会会议，确定柳亚子、侯绍裘为江苏政委委员。

3月 上海工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喜讯传到吴江，黎里镇在泖泾弄先锋营操场举行群众集会庆祝，有3000人参加集会。大会开了3个小时。

4月1日 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在县城举行第6次代表大会。

4月9日 蒋介石雇用流氓捣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毛啸岑和张曙时被暴徒捆绑。

4月10日晚 中共南京地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地委委员以及省、市党部和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出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会场被侦缉队包围,10人被捕。3天后,谢文锦、侯绍裘、张应春、刘重民等惨遭敌人秘密杀害。吴江籍女共产党员张应春年仅26岁。

省党部被捣毁后,毛啸岑遵照侯绍裘临别嘱咐:“转回家乡,团结同志,保持力量”,回吴江乡师教书,组织武装,进行倒蒋活动。

5月8日夜 蒋介石指派驻苏第十独立旅旅长张镇部去黎里镇搜捕柳亚子,柳幸匿“复壁”始免难。

同日 吴江城隍庙举行“反吴讨奉”大会。

“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戴盆天秘密隐蔽在吴江县黎里镇沈家港。

6月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特派员来吴江清党。吴江县党部七委员之一吴锡圭(震泽张家浜人)因鼓吹革命,并藏有镰刀红旗而被捕,死于上海漕河泾监狱。

是月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改为吴县县委,周学熙为书记,县委机关设在张家巷26号小楼上。

共青团苏州特别支部改建为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陈铿书记;机关设仓米巷2号。

7月 中共江苏省委派赵霖(即帅朝霖,化名陈文华,到苏州组织中共苏州县委,下辖吴县、吴江、常熟。10月,吴县县委并入苏州县委,赵霖任书记,周学熙、高祖文、姚绩安、黄香芹为县委委员。出版《每日新闻》刊物,进行宣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 - 1937年7月)

1927年

10月 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各县党组织及工作概况》的报告中说,在“四一二”被破坏或与省委失去联系的各地党组织中,有吴江等11个县成立中共独立支部。

12月15日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江苏农兵运动之第三次计划》中说:“吴江、金坛二地原有党组织,近已消失。”

1928年

1月1日 中共江苏省委的《江苏各县暴动计划》中说:“吴江实须设法发展组织。”

春 中共江苏省委派王觉新接替赵霖任苏州县委书记。随后又陆续派高飞、夏帮基(吴江人)等参加县委工作。苏州县委下设城北、城南和吴西三个区委,领导开展工运、知识分子和农运工作。

7月 中共江苏省委为加强江南各县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京沪线特委,统一领导镇江、无锡、常熟、吴县、吴江、昆山等县,特委机关设常州,后转移到苏州。原省委巡视员高士贤为书记。吴江县夏帮基调苏常特委工作。

8月 原中共苏州县委书记周学熙由中共苏州平江区委书记傅缉光介绍来黎里小学任训育主任。

是月 莘塔陈孟豪在吴江乡师闹学潮,被开除学籍。(1931年下半年,陈去上海参加宣传工作。1937年曾两度与中共上海浦东中心县委发生工作关系。1945年去解放区工作。)

12月下旬 同里区北乡东圩农民陆加金组织农民积极抗租,被县政府拘押。

1929年

1月 中共尹山农民支部书记王兆杰,在庞山湖一带发动农民进行抗租运动,并带领几十个农民去南京告状,中央农业部被迫在庞山湖地区减租。

是年 在江浙交界的我县算墟庙、虹桥、三民浜一带农村爆发了王××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浙江南浔、乌镇的地主武装联合进行血腥镇压。

1930年

4月 中共淞浦特委委员顾桂龙受党派遣,与中共金山县委书记翁明哲一起来吴江县盛泽镇进行革命活动。在盛泽旅馆联系工作时,因头叛徒密告被捕。后顾桂龙在松江英勇就义。

5月 农民武装“天下第一军”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发展到江浙两省8个县境(金山、平湖、吴江、嘉兴、嘉善、青浦、松江、奉贤),当时曾用过“松沪游击队”名称。(该武装队伍于1929年12月正式组成,以贫苦盐民、农民为主,拥有2000余名士卒。)

8月 邓演达将1927年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毛啸岑为该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在毛啸岑、刘焯(吴江乡师毕业,由毛介绍加入第三党,并参加邓的第一届干训班)等人的秘密组织工作下,第三党组织在松陵、黎里等地发展,仅吴江乡师一校就发展青年学生70多人参加,全校四个年级设四个小组,并建立了第三党吴江乡师支部。马列著作等秘密书刊在同学中广为传播。该支部积极从事倒蒋工作,并去农村搞武装活动。

1931年

7月 “第三党”在吴江城内举行全县代表大会，主张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打倒蒋介石，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

9月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吴江，激起各界群众的强烈愤慨，纷纷成立反日救国会，召开群众大会。吴江县各界举行反日救国民众大会，会议议决：准备实力抗日，抵制日货等。

是月 “九一八”事变后，吴江乡师、吴江中学师生在吴江城关进行游行示威，学生振臂高呼抗日救亡口号，号召商界和群众抵制日货，散发油印传单，出版《突击》、《灯塔》、《革命行动》、《旭光》等刊物。

11月 “第三党”总干事邓演达被枪杀于南京，毛啸岑受命离开乡师，该党吴江乡师支部即停止活动。

1932年

2月4日 第一批由各界抗日救国会征集的近千袋饼干、白米、酱菜等食物、药品，慰送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线的十九路军将士。

3月18日 吴江各界联合召开东北沦亡半周年纪念大会。

3月20日 盛泽旅外学士举行小学同学抗日救国演讲竞赛会，出席演讲者32人，与会五六百人。

5月7日 吴江各界举行国耻纪念会。

5月27日 吴江派员赴苏州参加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书写匾额“为国捐躯”一块，印制宣传品10000张，在苏州散发。

是月 严墓、横扇、庙港、震泽等地，发生农民聚众抢米事件，饥民达16000多人。

冬 中共涟水县工委书记刘淇生来吴江县警察局以文书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刘通过党员薛玉美、徐平羽与党组织发生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刘淇生与吴其超一起，团结进步青年易静初、史

复及吴江乡师进步学生赵乃元、徐德润、杨源时等,组织秘密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革命,在校内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进行兵运工作,掩护、照顾和接济被捕的共产党员。

1933年

9月21日 肉业公会因请求屠税局减税,该局非但不允,反欲增税,双方谈判无结果,肉业代表赴省请愿,并决定全县罢市。

是年 同里费巩在浙江大学积极支持学生反对校方无理开除爱国学生胡乔木等的正义斗争。

是年 吴江各区因欠交田租而被关押的佃农达3000多人。

1934年

7月 吴江县震泽镇四乡农民因久旱饥荒,发生抢米风潮,农民蜂起,人数多达数千人。

10月上旬 由于物价昂贵,生活艰难,盛泽踹坊业全体工人罢工,事态逐渐扩大。工人代表徒步到吴江请愿,向当局提出解决问题的四项条件。

10月28日 县教育会马祥甫等5人,为教育经费打折发放,赴省请愿。

10月 震泽池塘桥小学教导主任张冠今(沈静观,海门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中共海门县委领导成员),与近乡东庄桥小学教师朱碧元(朱振池,1928年加入共产党),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因叛徒出卖,被中统吴江县室特务逮捕。张被关押在吴江看守所,朱被押解去苏州反省院。

是月 吴江、昆山等地农民爆发闹荒风潮,省府派兵前来镇压。

11月4日 上午10时,县税征所长等,闯入严墓枫桥堍福泰兴烟纸号店堂,无故寻衅,非法敲诈,肆口谩骂,举拳殴打,全镇商界闻讯,舆论哗然,群情愤激,纷纷闭门罢市,以示抵抗,事态日趋扩大。

11月23日 梅堰镇发生售烟纠纷,驻平望的江苏省保安队派兵赴梅,激起公愤,全镇罢市。

11月 盛泽三民电机丝绸厂因厂方停机搞整顿,引起工人不满,厂方遭工人包围。

1935年

1月27日 吴江县平望镇被国民党区公所关押的佃户300余人举行暴动,捣毁了关押佃户的栅门,群集在国民党区公所门前广场,抗议反动政府无理拘押佃农的暴行。后为首的7个农民被当局逮捕解送到县。

同期 桃源北长浜、杏红桥一带农民聚众向地主“借粮”,有几百人之众。

7月29日 盛泽镇全市米业因对营税局和公安局不满,群情激愤,清晨起全镇统一罢市,全镇各行业六七百人,涌至分局门首,并群起捣毁了营税局。

9月21日 承包震泽新开河工程的三达公司欠河工工资,千百工人从平望等地涌至震泽区公所。震泽全镇商号,亦均卷入漩涡,闭门罢市。

12月27日 苏州东吴大学学生百余人,分5个大队前往常熟、昆山、吴江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1935年冬-1937年春 吴江北下塘沈毅(沈炳康)、陆先引、杨若鸿、刘之奇等6人组织“读书会”,成立“大众社”、出版“大众报”,宣传抗日救国,并进行义卖演出。1937年春遭特务破坏,沈、陆等仓卒离开吴江。

1936年

3月9日 40余农民,手持旗帜到吴江请愿,强烈抗议庞山湖实验场进一步筑堤围垦,封闭十字港、长条港,禁止船只往来,县政府强

行驱散请愿群众，逮捕3人。

10月29日 同里镇推出教师代表顾冠英等7人，赴教育局请愿，要求速将拖欠两月薪水付清。

秋 吴江七都叶港村孙世实在清华大学由蒋南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北京市学联常委、党团领导成员、全国学联负责人、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成员、中共宜昌区委书记、湖北省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1938年10月，孙与中共四川省委负责同志钱瑛一起随《新华日报》社乘“升隆号”轮船撤退。22日，日机沿长江追炸，扫射投弹，孙因抢救同志，光荣牺牲，年仅20岁）。

1937年

1月16日 吴江县各界在公园中山堂为钱刚（钱涤根）烈士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公祭钱烈士殉难十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

7月 “七七”事变后，吴江各界集会，成立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明令讨敌抗战到底。

8月 “吴江160读书会”、“风雨歌唱团”、“吴江怒吼歌咏团”成员在吴江戏院举行歌咏救亡活动。

“八一三”后，全县民众挖防空洞及修筑防御工事。日机在庞山湖、黎里九龙乡、南厍投掷炸弹。吴江县中西医师联合成立救护委员会，举办“伤兵医院护理训练班”，救护疏散到吴江的伤病员。

9月 南京国立剧专教授侯鸣皋,约邀苏州实验剧团的韦布、曹孟浪等同志,组成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来吴江、同里、八坼、黎里、平望、盛泽、芦墟、周庄等地巡回演出,进行抗日宣传。

10月12日 日机2架在平望投弹9枚,炸毁房屋40多间,炸死居民18人。

10月26日 日机在芦墟三白荡用机枪扫射挖战壕的民众。

11月14日 平望沦陷。日军大肆焚烧,大火直烧3天3夜,700多间房屋化为瓦砾,财物劫一空,400多名来不及避难的居民全被枪杀。19日,日军在盛泽烧杀抢。日军在震泽先后放火烧毁商店130多家,房屋200多间。平望、震泽制丝所先后被焚毁。日军窜入芦墟,杀害正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士兵、水警、民众等50多人。第二天开到黎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数十人。11月,吴江县全境沦陷。

11月中旬 吴江公路沿线的城镇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淞沪战役撤退下来的零星部队及吴江地方武装,各占地域,组成多种游击队。沿太湖(七都、庙港、横扇、菀坪等地)有程万军、曹绍纹部队;北厍、黎里有郝道生、陈祖荫、陈阿有部队;严墓和新塍一带有朱希、汪鹤松部队;东太湖江浙边境有赵安民部队。

冬 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从上海大场撤退至皖南时,营长朱希受命组建十三师游击队并被委任为司令,汪鹤松为副司令。游击队约有200多人枪,号称“孝(丰)、安(吉)、长(兴)、吴(兴)”军游击队。

冬 松陵镇女青年倪淑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冀中公安局副秘书长、晋察冀公安局秘书主任。1943年在反扫荡战斗中身中8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938年

1月16日 芦墟尤家港发生游击战,300多日军进驻芦墟,焚烧东西尤家港。

1月 千余日军驻芦墟一星期,强住民房,各户遭劫,损失不能

统计。

2月 千余日军抵莘塔,又分抵各乡村扫荡,妇女惨状尤烈。

3月28日 吴江汪伪维新政府成立。

4月 中共上海特科情报组负责人徐强、高原派党员丁秉成(陈显堂)到江浙太湖地区开辟工作。任务是争取转化地方武装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是月 国民党军队独立四十五旅从浙江余姚渡海北来,分驻吴江、青浦、嘉善、平湖4县,参予四县政治。

夏秋 丁秉成受命来吴江开辟工作(由平望沈月箴当向导)。随来有:刘子荣(大刘)、章燕(小刘)、华大闲(陈正之)、俞哲(周奋)、叶初晓(鲁秋生)、林枫。后又从上海陆续派来张琼英、施光华(何光华)、林家春(洪奔)、王振华等,前后共有20多人。其中丁秉成、张琼英、施光华、华大闲、沈月箴是党员,余皆为“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成员(“武抗”为中共上海特科的外围组织)。丁秉成通过民主人士王岳麓(国民党县政府财政科科长),使“武抗”同志打入国民党县政府政工队,少数同志打入县政府常备队。王并在经济上秘密提供支援。

7月1日 日伪军分3路入侵严墓,烧杀掳掠。

7月 日军到芦墟镇大扫荡,烧毁商店46家,房屋近百间。日军放硫磺弹,焚毁同里罗星洲房屋余间。

是月 汪鹤松带领第八大队100多人枪,进驻吴江严墓区巴家埭。该部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政训处民运科长韩昌,在严墓区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江南游击区民众抗日救国会”。

8月 中共党员朱广运从江阴来吴江县梅堰太平桥,组织“苏浙抗日行动委员会”。11月被捕,被杀害在盛泽圆明寺,埋葬在太平桥鲢皮湾。

10月 游击司令程万军把部队拉进苏州日军据点,副司令曹绍纹不愿去而居住庙港。施家骅曾多次陪同丁秉成对曹绍纹开展工

作。

10月15日 韩昌在严墓东水家港发展第一个党员沈英杰,并建立第一个党小组,组长韩昌。

秋 中共党员庄绍楨由邓子恢派遣从安徽省泾县回太湖边开展工作,任务是团结抗日,为新四军输送力量。庄打入吴江县政府,任政工队长。

秋 吴江县政府青年干部训练班在严墓蔡家浜成立,招收各地去严墓的青年20余人。

冬 朱希、汪鹤松部队中的刘明由周达明(新四军军部派来)和徐洁身(浙东党组织派来)介绍重新入党。

是年 震泽、平望沿公路的桑树被日军砍伐殆尽。芦墟、严墓、横扇等电气厂惨遭日军破坏,无法发电。

1939年

2月 中共浙西特委成立,书记顾玉良,组织委员朱辉、宣传委员徐进(徐洁身)、妇女委员张之华、青年委员黄炎。我县西南部地区属浙西特委领导。

2月 曹绍纹患眼疾从庙港去苏州诊治,被程万军发觉软禁。后来曹转回,丁秉成与他终止关系。

3-4月 丁秉成结交郝道生(当时活动在北厍、黎里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的大队长),由施家骅陪同做争取转化工作。

春 朱希派副司令汪鹤松带100多人枪再次来吴江严墓,随来党员有周达明、刘明、韩昌3人。周达明担任汪部作战参谋。

4月 周达明奉命离开汪鹤松部队。

是月 汪鹤松部队在桃源阳和桥击毁日军汽艇两艘,击毙日伪兵近30名。

5月 中共浙西特委派党员郑衡(郑恒)、徐洁身、李志良加强汪部的力量,与政训处党员韩昌、刘明一起,成立部队特别支部,特支书

记徐洁身、组织委员刘明、宣传委员韩昌。

是月 郝道生部队在黎里遭日军突然袭击,部队被打堪垮。

是月 中共吴江支部在严墓车家坝建立。支部书记丁秉成、组织委员张琼英、宣传委员施光华。同时,还建立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吴江支部,支部负责人丁秉成,委员张琼英、施光华、华大闲、刘子荣。在这前后陆续发展了施家骅、金大鹏(金若望)、肖心正、顾平、肖国正为“武抗”成员。

是月 东水家港支部成立。支部书记沈英杰,组织委员沈四宝,宣传委员沈二娜。

是月 丁秉成、钱康民共同组建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政委兼副司令。

夏 日军在震泽镇开会,吴江县政工队员陈家驹用一枚自制定时炸弹袭击了会场。后陈被人出卖,壮烈牺牲在南浔南栅苏露标南石。

7月7日 抗日期刊《敌忾》创刊,由肖心正任编辑。因遭国民党反动派敌视,仅出一期即被迫停刊。

7-8月 由于阳和桥袭击日军的胜利,汪鹤松部队迅速发展,扩大到两个营的兵力。

8月23日 国民党62师和吴兴县常备队在江浙边界向我太湖抗日义勇军突然袭击。义勇军损失惨重,领导人丁秉成、钱康民等英勇牺牲。

9月 “武抗”人员开始撤回上海。大部分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昆山联抗大队。沈月箴去上海。至冬天,上海党组织在吴江仅留下金大鹏、肖心正等少数同志。

10月 国民党陆军独立四十五旅七三五团陈耀宗部在芦墟、莘塔间与日军遭遇,激战数小时,击毙日军20多人。

是月 日军进袭芦墟,以4门大炮向市内轰击100余炮,配以机枪扫射。

秋 庄绍桢介绍震泽周慰昌、严基金再祥、南浔张斌等人去新四军。

11月 中共党组织在汪鹤松部队和严墓地区已发展党员40多名。

12月15日 由岫山部五六百人,在芦墟镇南尤家港拦截日军运输船,打死日军多名,俘获5名。

年底 汪鹤松部队去溧阳整训,我党劝阻无效。刘明、郑恒等去莫干山中共浙西特委。

1940年

年初 中共吴兴县委书记王子达来吴江,与庄绍桢取得联系。从此,庄由浙西特委、吴兴县委领导。

1月22日 日军吴江县警备队进攻田岫山部,田部死伤200余人,被俘16人。

2月 金大鹏、肖心正等与上海吴成方(社会部在沪负责人)接上关系,继续进行情报工作。

2-3月 中共严墓区委在三民浜成立。韩昌任区委书记。

5月 韩昌奉命调回浙西,区委工作由沈英杰负责。

是月 日军纠集大部队焚烧芦墟赵田村、白巨斗、苏家港、洋沙坑、南尹、灶江等村,6村一片火光,白巨斗全村仅余1屋。莘塔焚4村,204户,杀70多人,难民896人;芦墟焚2村,94户,死伤24人,灾民423人。

6月 1939年出版过的《敌忾》改刊为《义旗》,在严墓重新出版,由肖心正、马希仁任编辑。

是月 中共东水家港妇女支部成立。书记沈彩珍,宣传委员沈富珍,组织委员水长英,由严墓区委沈英杰负责联系。

7月 东水家港温吞浜党小组建立,沈英杰参加会议。同期,赵子扬(化名杨有源、王士烈)由韩昌介绍来严墓任区委书记。

夏秋 中共党员王化鹏、朱闻礼(曾又余)等先后从浙江省政工作队转入吴江县政工作队,并在青云瑾下浜建立中共苏浙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朱闻礼,组织委员庄绍楨,宣传委员王化鹏(王听涛)。

9月6日 吴江地方武装及游击队4股力量,攻打汪伪“绥靖队”。

9月 青云八字荡建立党小组,沈英杰参加会议。

是月 中共党员夏明辉,由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派遣,去青浦西乡开辟党的秘密战线工作,来吴江平房“大生”杂货店,会面金佩扬。这是中共淞沪系统党组织在我县召开工作的地点。

10月 夏明辉经上级批准,发展金佩扬入党。同期,中共淞沪中心县委书记顾德欢在上海找夏明辉和金佩扬谈话,表示对开辟吴江工作的重视。

是月 南麻汤家村寿鸿去新四军四师参加革命(她先后任淮北交通总局副局长、华野留守处妇干队长,后病故德州,安葬在烈士陵园。时年29岁)。

是月 中共坛丘大谢乡支部成立。支部书记周炳发,组织委员丁少荣,宣传委员沈沛乾。

是月 党员庄绍楨、王化鹏在严墓镇南街创办“青年读书会”,参加者有二三十人。

11月 中共茹菇埭支部成立。书记沈阿五,组织委员沈龙宝,宣传委员沈宝生。

是月 中共严墓镇支部成立。书记王化鹏,组织委员凌文华,宣传委员邵耕耘(邵哲),青年委员姚之英(姚达)。

11月 中共党员金大鹏、王化鹏、庄绍楨等通过县政府税务局局长马希仁,利用办税务人员训练班的机会,在瑾下浜培训了一批民运工作者,教师大多由中共党员担任。

12月 中共仁荡坝支部建立。赵子扬代表严墓区委参加会议,支书记盛友鹤、委员沈阿大、沈阿宝。

是月 浙西特委以京杭国道为界,分为路东,路西特委。浙西路东特委,又叫浙西北特委。严墓地区属浙西路东特委领导(书记朱辉)。

是月 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机关、中共吴兴县委机关同驻严墓水家港(至1941年3月,浙西路东特委机关迁至南浔镇,吴兴县委机关迁至双林镇)。

是月 县政府政工队改为县青年工作队,庄绍楨被撤换后转入地下活动。

12月12日夜 金大鹏、俞清志、沈文潮和区队副潘逸溪潜到盛泽镇安清同盟会会长叶冠吾家,处决汉奸叶冠吾。

冬 严墓区各村在建立救国会的基础上,在阳和桥的桃园召开了五乡联村会成立大会(五乡是:竹里、算墟、志和、白区、太洪)。党员沈英杰任干事长,党员盛友鹤任副干事长,党员沈阿五任干事。联村会共有400多人。实行减租减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年底 中共吴兴县委易人:书记史列青,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贝纹,宣传部长赵金城。

1941年

年初 联村会上书县政府要求实行“二五减租”,未得通过,却遭国民党政府搜捕。赵子扬、沈英杰等人隐蔽活动。3月,浙西路东特委书记朱辉介绍沈英杰去新四军六师,沈在民政训练班学习后由六师师部分配去江防局工作。

年初 党员夏明辉与爱人陈棣华一起来黎里住下,以开设“大同”文具店为掩护。同期,金佩扬通过国民党县政府第四区区汝志强,了解搜集“忠救军”(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队的建制、人员、枪支和活动情况。

1月29日 县常备队长张貽翼与沈步青等,在梅堰袭击日军军车,打死打伤日军5人,夺了两支枪和几枚日式手榴弹。

1月 江南第三专区(该区辖吴江、苏州、昆山、青浦、松江)专员阮清源(袁亚承)率领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第三团1000余人推进吴嘉三角地区,驻芦墟、莘塔、北厍一带(1942年,忠义救国军番号改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忠义救国军,阮清源任总指挥)。

2月26日 三区俞清志(盛泽区长)与沈文潮击毙盛泽汪伪区长简汉青。

2月 党员蔡允中(即马雨亭)从中共海北工委来浙西路东特委,转至三区大谢乡当事务员。

3月下旬 庄绍桢遭遇“忠救军”特务,由于身边带有方志敏与瞿秋白的书籍而被捕。后因熟悉地形脱身,离开吴江。

4月 中共嘉兴县委成立,书记罗希明。严墓区委归嘉兴县委领导。

5月初 中共严墓镇党支部成员凌文华被捕,后保释。王化鹏、沈步青被捕。后,沈越狱,王被日军杀害。

5月 青东党员徐友纪(徐永坚、化名李复生)由组织派遣来吴江,在平望以水果店伙计为职业掩护,后去盛泽在苏嘉铁路沿线活动。

6月 蔡允中、姚之英等在大射乡、胜塘乡一带组织兄弟会、姐妹会,会员有七八十人,组长由党员担任。

7月上旬 吴江县被列入第二期清乡,伪省主席高冠吾训示:“清乡须从自户清起。”

8月20日 沈文潮、虞仞千被“忠救军”抓去,秘密杀害于马腰。

8月 中共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化名朱明之)来黎里,领导淀山湖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同期,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在上海找党员金佩扬谈话,在场有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顾德欢传达了上级的方针,指出:吴江县地处大三角(京、沪、杭)、小三角(苏、嘉、湖)交界处,开辟太湖通道,吴江县具有重要的军事位置,是一个必须开辟发展的地区。当时淀山湖地区部队的口号是:“开辟淀山湖,穿过吴

江,打通太湖,迎接浙西大军东进。”

10月13日 连一祥在黎里由夏明辉介绍入党。11月,夏离开去浙东游击纵队。

11月 日军在十一圩大扫荡,沈英杰与组织失去联系。沈到南浔找到浙西路东特委书记朱辉,由朱辉介绍到新塍镇东栅烟纸店联系上嘉兴县委书记罗希明,由罗领导工作(1943年4月罗希明调走,将沈英杰的关系介绍给新塍区委书记沈如淙,直至解放)。

12月 中共严墓区委书记赵子扬被“忠救军”特务逮捕,党员蔡允中闻讯带区中队反扣了特务,赵子扬出走新塍。十天后,蔡允中被抓,在代理区长顾平的帮助下,蔡逃离虎口去新塍。

是月 浦东党员张荣生(陈企周)由淀山湖工委来黎里,负责吴江地下党工作。

1942年

2月16日 同里区长周石泓被日军警备队逮捕杀害。

2月 日军在芦、莘、库、周地区进行扫荡,历时20天之久,日军在芦墟焚烧九曲弄小学。23日,将72名无辜百姓押至张家坟,逐一用刺刀戳死。在莘塔被害群众300多人,烧毁房屋300余间,枫字村成为寡妇村。在北库一个池塘里扒出尸体就有200多具。这次扫荡被杀害的群众有案可查的就有2373人。

春 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撤销,合并到太滬地委,受苏南区党委领导。太滬地委书记陈立平,组织部长朱辉(后改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委员孙章禄。严墓地区属太滬地委领导。

春 金佩扬派党员张法林打入黎里区大队开展情报工作,了解区大队长的情况。

4月 中共新塍区委书记沈如淙来坛丘恢复大谢乡支部。支部书记仲春山(后钱福宝,又仲春山),委员潘天阳、顾春泉。

7月 新四军十八旅政治部组织科长戈白章(即顾葆恒,同里镇

人),随师部转移途中病故,时年20岁。

10月 中共淀山湖工委书记诸敏调往浙东,林大良(林岑),接替工委书记。林于1943年初来吴江,在芦墟与党员金佩扬、张荣生、潘留生一起,以开设“汇丰”烟纸店为掩护,负责地下党工作。

1943年

年初 为了摸清水路情况,以便开展武装活动,金佩扬组织开“松江-朱家角-芦墟-黎里-平望”的航船,搜集情报。还利铁路,从松江到平望贩运香烟,与铁路工人交朋友,了解日军在平望铁路车站的调动情况。

1月12日 主张抗日、思想进步的三区区长俞清志,被“忠救军”特工枪杀在严墓镇西汇,年仅27岁(解放后,由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月 日军震泽警备队,在公园内残杀民众10余人。

是月 日军对严墓地区进行大扫荡,国民党县政府从严墓撤到安徽宁国县云梯镇。

4月 中共浙西党组织改为特派员制,嘉兴特派员沈如淙负责吴江地区的工作。至抗战胜利,系浙西党组织领导的吴江县共产党员有84人。

春 林岑、金佩扬、陈企周第一次去浙东四明山,向中共浦东地委书记姜杰汇报请示工作。

春 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学委派遣党员刘建民(化名刘进才)来吴江,打入汪伪政治保卫局苏州支局吴江站情报课,后调吴江站同里组任组长。

5月 薛天然受中共苏中二地委书记章蕴派遣,从苏北来震泽活动,由二地委社会部长林修德负责联系。薛打入特工站,任横扇组组长,驻大庙港。不久又打入金家骧部任政治部副主任,直至抗战胜利。

8月6-16日 日军封锁湖港“剿匪”、“清乡”。

9月 芦墟镇“汇丰”商店关闭,林岑、金佩扬、张荣生、金掌华、陈棣华第二次去中共浙东区党委。

年底 中共淀山湖工委与青东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浦西工委,由陈正之任书记,陆雪林、洪峰为委员。后洪峰离开吴江,吴江工作由徐友纪(徐永坚)负责。

1944年

2月 中共浦东地委书记姜杰决定中共浦西工委书记陈正之(化名华逸民)与浦西工委委员陆文杰(陆雪林)来吴江搞武装,在黎里镇城隍庙堍开始糖坊作掩护。

春 中共党员俞树芳(化名俞林)由中共江苏省委上海职委派遭,打入汪伪政治保卫局吴江站情报课任“情报编审”。不久,调同里组为内勤组员,后又去盛泽组任组长。俞树芳和刘建民的党组织关系,由中共苏州工委王中一负责联系。

5月 徐友纪离开吴江去昆南。

8月 陈正之离开吴江去昆山。

10月 黎里党员沈明德根据金佩扬布置,派党员赵寿云、张仁敢等多次去青东支队政治处汇报工作,带来《灯塔》等进步书刊。

11月 陆文杰离开吴江去青浦。吴江工作由金佩扬负责。

冬 吴江地下党负责人金佩扬根据淞沪地委的指示,调整了30余名党员的布局。有的被输送去淞沪支队实习,经受锻炼;有的被派去了解搜集忠救军的情况;有的回家乡农村开展工作,为武装活动准备。

是年 中共平望支部建立。书记张振海,组织委员周纪铨,宣传委员顾其行。

1945 年

3月5日 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吴江县同里镇人)被国民党特务密捕,后在渣滓洞惨遭杀害。

4月 中共淞沪地委陈伟达、顾复生、朱亚民指派金佩扬去浙西天目山联系大军。金在浙西见到了苏浙军区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清、三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送交了淞沪支队的电台呼号和频率,从而恢复了苏浙军区和淞沪支队一度中断的电讯联络。

5月 金佩扬派张振海两次去淞沪支队汇报工作。第一交向淞沪地委专员顾复生汇报,第二次地委组织部长陈正之汇报,并听取了淞沪支队政委陈伟达的指示。

8月16日 打入吴江汪伪特工站的上海地下党员刘建民、俞树芳被调去苏州“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东部特务区”,离开吴江,旋又进上海宪兵司令部。

8月 日军投降,为执行华中局关于苏浙军区粟裕大军会同淞沪支队武装解放上海的决定,中共浦西工委书记陈正之转达淞沪地委陈伟达政委的指示,派金佩扬第二次去天目山,会面独立支队杜大公政委,联系上浙西部队(进攻上海的行动,至8月21日由中央电令终止)。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5月)

1945 年

10月10日 吴江城区民众,在城隍庙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10月19日下午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忠义救国军淞沪

区第五团团团长郑重(刘建)率领第二营和特务连的全体官兵300多人,击毙营长王德燔,在吴江城起义。傍晚7时,吴江密布哨兵,禁止通行。起义官兵分东、南、北三门出城,向太湖、沿越溪方向而去,有大小船只40余艘,每人胸佩符号“东平”二字。下太湖后,由中共太湖县留守处薛永辉、张震东负责收编,后送苏北加入新四军。

当时江苏省长兼保安司令王懋功曾训令全省围剿拿办。

10月 中共淞沪地委与浙东大军一起北撤。王克刚、陈文祥(陈伯亮)、鞠耐秋3同志接收留下的关系,成立中共淞沪工作委员会,王克刚任书记。

是月 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进步文艺团体“翳桑文艺社”在黎里成立,党员丁铎为社长。出版《浅作》月刊共10期。成员先后达六七十人,历时一年半。通过文艺活动,联系和团结不少进步青年,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党。

11月 淞沪工委派肖方(沈小方)为淀山湖地区特派员,接替金佩扬负责吴江地下党工作。肖与党员连一祥(丁庠一)在黎里合开文具书报店为掩护,开展工作。吴江县当时属该系统的地下党员有沈明德、张振海、吴关龙等20多人。

1946年

年初 肖方书报店的活动,逐渐引起国民党黎里区党部的注意,经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批准,肖方、连一祥于4月6日撤离黎里去青东。吴江工作由陈伯亮直接领导。

3月 同里教师因教育局拖欠公粮,举行罢教停课、索薪斗争。

春 中共黎里支部建立,连一祥任书记。

春 中共党员王绍鏊回家乡同里镇,到中学向全校师生作演讲。

8月 武汉大学法学院历史系学生倪明、经济系学生刘玉根据中共重庆南方局的指示,来蒋管区开辟工作。倪明到吴江中学任训育主任,刘玉任英语教员(倪明、刘玉后由中共苏州工委委员范文

贤、陈邦辛介绍入党)。

夏秋 苏南区党委浙西特派员罗希明的关系划归上海局外县工委领导,由外委会副书记林枫直接联系。吴江南部坛丘、严墓、青云、桃源等地的党组织由罗希明通过嘉兴特派员沈如淙来领导。当时党员有沈英杰、钱福宝、仲春山、盛友鹤等 100 多人。

10 月 华中十地委决定原沙州县委副书记焦康寿返回苏南负责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

是月 国民党设立“太湖清剿区”,辖吴江、吴县、宜兴等沿湖各县。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九总队第一、第五大队从苏州进驻吴江城区、盛泽、黎里、震泽、平望、严墓。

12 月 淞沪工委书记张凡通知金亮(化名刘世和)从嘉定调吴江工作,由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在上海中山公园交接关系。金到平望溪西乡顾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地下党工作。

是月 原澄锡虞工委武工队训练班指导员陆志明由苏北渡江来吴江,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

冬 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党员王新五,因病回吴江休养后,在吴江组织“吴江旅外同学会”,举办“江友图书阅览室”,组织进步青年出版油印小报《江友》。

是年 中共淞沪工委所属吴江县党组织,经上级领导批准,先后发展了周双喜、凌行可等 15 人入党。

1947 年

1 月 原无锡梅北区区区长吴明和党员范青,来吴江盛家厍,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

2 月 8 日 震泽镇失业的丝业工人起来斗争,当局派自卫队和警察武装镇压。200 多丝业工人怒不可遏,捣毁厂内织机进行罢工,结队游行,声援失业工人。

2月25日 国民党震泽区以共党嫌疑逮捕了翳桑社女社员张育英,党员丁铎为之出走外地,后转移去桐乡。翳桑社不久宣告解散。

2月 焦康寿和党员陈秀中以布商为职业掩护来同里镇立足,负责吴江开辟区党的工作。

是月 华中十地委委员兼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在苏北派遣公安局巡官、共产党员张健单独渡江南下,来吴江争取太湖的武装力量。张化名李海明,打入南厍乡自卫队,开展工作。

是月 青云水家港支部书记沈英杰去桐乡钱家埭,以理发为职业掩护,负责该地党支部工作(有党员14人)。

3月18日 国民党中训团第二十九总队部奉令从浙江南浔移驻吴江县。

3月 淞沪工委调浦东党员蔡瑛(化名蔡毓英)来吴江工作,住平望匠人湾,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

是月 中共上海铁路局党员李华(李松林)由淞沪工委书记王克刚派遣来平望,与金亮接上关系,成立中共青(浦)吴(江)工委,金亮为书记,李华、张振海为委员。由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宣布,地点在平望溪西乡陈家湾猛将庙。青吴工委的任务是:筹组一支水上武装,以和青东的武装连成一气,互相策应,扩大回旋余地。

春 中共如皋区委书记胡国钧(化名胡行文)经组织同意来江南暂避,到坛丘大谢乡公所以户籍干事为掩护。

4月 原无锡党支部书记张根生(蒋一鸣)受华中十地委派遣来吴江,在南厍乡立足,以机船工为掩护,开展工作。无锡党员陈逢贤(陈阿大)从苏北来吴江,以职业为掩护,活动于南厍、苑坪、八坼等乡镇,开展工作。

是月 中共浦南工委委员黄竞之来平望,住溪西乡匠人湾。

是月 中共丹北工委特派员孙瑞成,因一起南下的党员被密捕而失去联系。孙通过同里鼎泰南货店表兄吴伯荣的关系,以该店职

工为掩护，在同里镇立足。

5月初 十地委委员、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来吴江，工委委员赵建平亦由苏州到吴江，在吴明处听取了陆志明的汇报，并去同里镇焦康寿处研究工作。同月，焦康寿去上海向李中请示工作，十地委书记金柯、副书记杨斌在场，会上确定开辟淀山湖地区工作由杨斌负责领导。

5月上旬 江南办事处派党员顾加生、王辉渡江南下，组织剧团来淀山湖地区，到吴江同里、屯村一带活动。中旬，顾与澄锡虞工委接上关系，由工委交通员钱茂德负责联系。

5月12日 盛泽炼坊业、电织业、轴纺业、豆腐业等1000余名职工，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5月下旬 因十地委书记金柯被捕，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指示焦康寿迅速转移，焦和陈秀中离开吴江去无锡。

6月4日夜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九军官总队驻同里中队的军官5人，将同里南濠弄小学女教师邹月娥轮奸致死。

惨案传出，全镇惊骇。同里镇1000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要求严惩凶手。各界隆重举行追悼会，并成立了“惨案后援会”，派代表到县政府请愿。清华等十所大学的吴江旅外同学会致电声援，《大公报》等几家大报连日报导事态发展。

国民党监察院迫于压力，逮捕了凶手，在吴江公审后转国防部办理。

6月22日 中共浦东东南区区委书记、武工队长秦克强（化名康云），为向太湖地区发展武装活动，由淞沪工委副书记王克刚派遣，与青吴工委委员李华一起带短枪来吴江，住北厍珍字埂党员潘留生家。建立中共珍字埂支部，书记潘留生。该支部先后发展周寿林、沈毓麟等17人入党，并积极开发武装活动，后发展基本群众几十人。

夏 淞沪工委特派员肖斧为配合淀山湖地区搞武装，来坛丘大谢乡党员钱福宝家，以家庭教师为掩护，开展工作。

7月 赵建平任澄锡虞工委书记,吴江地区负责人焦康寿被任命为澄锡虞工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划归澄锡虞工委负责。

8月 中共黎里支部建立。书记吴关龙,组织委员沈明德,宣传委员平静人。

8月底 为便于领导淀山湖地区的工作,焦康寿、陈秀中重返同里镇。

9月11日 在平望匠人湾顾扇小学以教师为职业掩护的党员蔡瑛在上海被捕,但蔡拒不暴露身份,即被保出。《大公报》刊登《被人指告是共党、女教员一度被捉》的消息。陈伯亮、金亮、黄竞之、俞双人等闻讯撤离匠人湾和猛将庙。

9月 中共苏锡吴工委成立,书记高山。高山来吴江,住党员倪明家。

是月 黎里党员陈振(丁铎)撤离吴江去桐乡。后在桐乡简师发展姜旭等44人入党。

9月底 十地委常委包厚昌要焦康寿负责打通与苏中区党委的联系,吴江地区的工作暂由赵建平兼管,并由吴明临时负责。

秋 失业在家的音乐教师费旭初在党员倪明的布置下,以江中部分学生为基础,吸收乡师学生和校外青年,成立“吴江青年歌咏队”,教唱革命歌曲,并进行公开演出。还组织进步学生收听陕北电台广播,编写传单(后由倪明介绍、高山批准发展费旭初入党)。

10月 中共苏中区党委致信十地委常委包厚昌,决定澄锡虞、苏常太两个工委均由包厚昌负责领导。接着,包厚昌来吴江指导工作,在城内吴明处落脚。同来吴江的有包的警卫员唐云清、张永定。

是月 为打通太湖地区的通道,中共淞沪工委书记王克刚、浦东工委委员吴建功与地下党员张玉良、凌雪生(凌雨山)在盛泽西白漾旁开柴行,作为活动掩护点。

11月 金亮(化名刘金生)与陆琪(陆文英)转移去严墓镇南

街，以设摊掩护工作。

是月 澄锡虞工委调无锡县特派员李桐明及党员陈令仪来吴江协助焦康寿开展工作，住同里镇，以职业为掩护。同期，澄锡虞工委书记赵建平派无锡县党员陈元章到吴江配合吴明工作，先在鸿济堂药店，后转元昌祥百货店立足。

12月 中共苏锡吴工委书记高山来吴江，考察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太湖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赵安民。后经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批准，发展赵安民入党，并由高山直接单线联系。

12月下旬 焦康寿从苏北返回同里，向包厚昌和澄锡虞工委书记赵建平、工委委员张卓如、朱帆，苏常太工委书记陈刚等，传达华中工委的指示：为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撤销十地委建制，十地委所属各工委由华中工委国统区工作部领导。并要积极准备大军渡江工作。

冬 中共黎里支部先后翻印装订了十多种党内文件，送各地党员传阅。

是年 中共淞沪工委吴江县地下党组织，经上级领导批准，先后发展了平静人、张鹤鸣等41人入党。

1947年前后 通过平望党员顾其行的关系，在溪西乡顾家扇、陈家湾办乡校，掩护了不少外来党员。他们中有淞沪工委副书记王克刚、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浦东工委委员吴建功、梅北地区负责人祝歧耕、浦南工委委员黄竞之、沪西工委书记陆雪林、工委委员李华等。

1947—1948年间 吴江先后输送了胡治忠、丁宝忠等10多名党员去青东游击队。

1948年

1月23日 青吴工委委员李华被敌人释放（李于1947年12月4日在上海被捕）。王克刚决定由金亮负责送李华去浦东游击队，金

亮派陆琪送去。

1月 中共杭嘉湖工委书记方休(化名王西林)来吴江筹备武装,在坛丘乌龙浜党员钱福宝家开会,在场有浙西特派员罗希明、嘉兴特派员沈如淙和肖斧。专门研究了在两省交界农村开展武装活动问题。会后一起察看了大谢乡的地形。

是月 为掩护十地常委,军事部长包厚昌来吴江指挥工作,吴明与房东黄云焕、邻居王炳生合股在吴江三里桥开设万丰石灰窑。后调党员张根生、陈祖良、王彦萍、陈元章、张永定到窑上工作。该窑成为澄锡虞工委吴江地区的中心活动基点。地下党员利用租用的柴船,以收柴为掩护,熟悉周围的地形及群众情况。

2月7日 澄锡虞工委调李桐明去锡澄县任特派员,工委委员、组织部长焦康寿和工委委员、副部长沈鲁钊一起在同里和李桐明交接了工作关系。

2月 江中党员教师倪明紧急撤离吴江,江中党的工作交由党员教师胡德瑒(胡斌)负责。中共苏锡吴工委书记高山来吴江与胡斌接上关系。

是月 为开展武装活动作准备,金佩扬布置党员颜金清去芦墟搞来短枪1支、子弹16发,送到平望“泰丰蜡烛店”,交给党员张振海。

是月 丹北党员孙瑞成先后在同里镇发展了吴伯荣等4人入党。

是月 澄锡虞工委调无锡陈祖良来吴江,先在三里桥石灰窑,后去同里镇(陈4月在吴江入党)。

是月 无锡党员朱剑波,根据澄锡虞工委指示,从吴县来吴江南库立足,后到平望周家溪住下。

是月 中共严基仁荡坝支部书记盛友鹤负责建立桃源李家坝党支部,书记沈甫章。

3月 根据中共华中工委的指示,澄锡虞工委书记赵建平派工

委政治交通员许丽娟到吴江送信,要包厚昌离吴江去苏中解放区。焦康寿、陈秀中同时调离吴江去苏北华中工委。吴江地区的工作由澄锡虞工委委员、沙洲县工委书记朱帆负责。

是月 为加强吴江地区的工作,澄锡虞工委派原吴县交通站站长王彦萍(郭泉生)来吴江开展活动,先在南厓立足,后转到石灰窑住下。

澄锡虞工委调无锡县党员唐裕兴、陈毓英来吴江活动,在同里落脚(6月转北厓小李港,12月去横扇)。

是月 为进一步开辟吴江地区的工作,党员吴明、范青的立足点由吴江城转移到梅堰宝元堂药店,仍以行医为掩护。

是月 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决定淞沪工委与杭嘉湖工委合并,成立淞沪杭嘉湖工委。书记方休,副书记王克刚,委员罗希明、范精秋、高山。

4月23日 农历3月15日,新滕迎神庙会。为开展武装活动,中共淞沪杭嘉湖工委书记方休决定去新滕夺枪。由沈如淙指挥,坛丘大谢乡党员顾阿坤、潘天扬出面行动。在东岳庙附近,枪打新滕国民兵队班长,夺走了短枪一支。吴江县政府派一个中队到大谢乡抓人,抓走了沈沛乾、顾克泉妻、钱福宝妻等,关押到县里审讯。胡国钧也因此而暴露,到八都暂住,后去轧村开展建党工作。

4月 王克刚根据淞沪杭嘉湖工委第一次会议关于在嘉兴、吴江建立吴嘉工委的决定,调浦南特派员金佩扬任吴嘉工委书记,沈如淙、金亮为工委委员。金佩扬负责全面领导,主要抓筹组武装工作,金亮负责吴江工作,沈如淙负责嘉兴工作,并协助金佩扬搞武装。5月,吴嘉工委开展具体工作。

是月 方休布置金亮从浦东游击队运枪。由王克刚联系好浦东交枪的时间、地点、暗号,由陆琪去浦东公路交接,金亮带到嘉兴交给沈如淙。

是月 澄锡虞工委书记赵建平派工委政治交通员许丽娟(钱桂

仙)到吴江工作。许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在同里镇立足。工委书记赵建平两次到同里布置工作。

是月 澄锡虞工委调苏锡地区交通站长钱志芳、党员钱杏仙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到吴江开展工作。

5月11日 金佩扬到上海虹口三角地小菜场,从工委书记方休那里拿到两支短枪,坐火车带回嘉兴,交沈英杰带给沈如淙。

5月 中共沪西工委委员钟秀为发展浦西武装,打通吴江与松江的联系,组织松江唐家浜支部党员,以船贩运糖糟为名,往返吴江与天昆之间。一次遇国民党警察巡港查船,两名党员脱险,两名党员遇害。

是月 党员吴明、范青的立足点又东移至周庄镇,在“天生堂药店”行医为掩护,以了解和熟悉淀山湖一带的地形和敌情。

是月 俞双人受金佩扬指示去浙江南浔、塘北开展工作。后发展傅侃、秦家书等31人入党,并在轧村与义和建立了党支部。

6月 党员陈元章由“元昌祥”百货店调到石灰窑活动。

是月 金佩扬派盛泽党员俞双人到北厍党员潘留生处取两支短枪到新腾。

7月1日夜 在吴嘉工委领导下,在新腾、坛丘一带农村成立了一支武装工作队。10名武工队员10支短枪。武工队活动在附近的几个乡里。

8月15日 在地下党的组织下,盛泽爆发了反饥饿斗争。国民党盛泽区长勾结米业公会会长,囤积居奇粮食,偷运走私,人为制造“米荒”灾难。中共盛泽纺织支部因势利导,发动工人斗争,罢工罢市。区长派自卫队镇压,民情激昂,数百工人面对枪口呼拥前进,一起把盛泽米行偷藏大米全部抄出,群众拍手称快。

8月 原中共梅北区交通站负责人朱林芳,从苏北调来吴江工作,到平望周家溪立足,以缝纫为职业掩护,开展工作。

是月 中共沪西工委书记、江南人民反三征总队第一大队长陆

雪林(化名李一才)来吴江开展工作,住平望溪西乡猛将庙小学。

是月 为开展吴江地区的武工活动,澄锡虞工委给吴江调武器,党员吴阿根等在石灰窑进行秘密训练。

是月 苏锡吴工委书记高山调离,学校地下党由学联线调整为地区单线联系。吴江中学地下党由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直接领导。张于9月来吴江,与费旭初、赵安民和江中胡斌接上单线关系。同期,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周克化名“胡逸云”来吴江活动。

9月16日 上午10时,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路经吴江,时值吴江发生打死乡师附小教员命案,死者亲属拦车告状,呈递冤书。

9月 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派盛泽党员俞双人(化名王金才)打入土匪胡伯龙部队,进行争取联络工作。后金佩扬找胡伯龙在嘉兴北门谈话,晓以革命道理,但胡匪性不改,即割断关系。

是月 吴江中学学生党员成立党支部,王寄南为支部书记,陈关孝、史月娥为支部干事。

10月 澄锡虞工委委员朱帆从苏州迁居同里,以加强对吴江地区工作的领导。

朱与地下党员多次到同里镇附近农村察看地形,熟悉水陆交通路线,以备开展秘工、武工两条线的斗争。

11月11日起 吴江城区实施戒严,各城门夜间11时一律关闭。

11月下旬 吴江各所中学教职员工人不敷出,生活困苦,决定总请假,以示对当局抗议。

11月 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通知吴江中学党员教师胡斌,余名清调无锡工作,江中地下党工作交党员教师赵广祥负责。

冬 为警告敌人、粉碎谣言,澄锡虞工委联络员工阿土从苏北运来一批《新华日报》、党的文件、我军胜利消息的传单,到苏州交给交通员许丽娟。许带至吴江同里,一部分给吴江党员杨秀云,由杨在县城张贴。

冬 打入南厍自卫队的中共党员李海明,因活动引起乡长怀疑而被开除。李仍坚持在南厍镇上活动,继续对自卫队员开展策反工作。

年底 在中共吴嘉工委的布置下,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对各地上层分子的策反工作。

通过地下党的工作,先后控制了黎里镇工商自卫队,一批党员打入自卫队;控制了平望一镇四乡自卫队的人和枪;控制了盛泽镇自卫队武装、芦墟镇自卫队武装、八都乡自卫队武装;控制了吴兴县南浔镇、织里、轧村的自卫队武装;控制了桐乡县的地方武装;还有一些党员担任乡保长,搜集敌特动态。

年底 为培养武工活动的骨干,朱帆派党员朱斌去苏锡工委武工组锻炼。

年底 党员王彦萍对同里乡长开展工作;党员许桂仙对同里镇自卫队巡长开展工作。

是年 澄锡虞工委派来吴江开辟工作的同志,开始建党工作。其中有:朱帆在石灰窑工人中发展了吴小根等5人入党,并成立了石灰窑党支部;顾加生在剧团先后发展了郭城等3人入党;朱林芳在周家溪发展了计秀英等4人入党;王彦萍在管家浜发展了管富达等4人入党;李海明在南厍自卫队发展了毕华等3人入党;陈逢贤在横扇发展了朱阿八等2人入党;吴明在药店发展了周维明等2人入党。

是年 中共吴嘉工委所属吴江党组织先后发展了俞永泉,王文达等90人入党。

是年 建立了中共盛泽纺织支部。书记俞永泉,组织委员吴永奎,宣传委员周天宝。

1949年

年初 经吴嘉工委领导同意,党员平静人、包一鸣、张淦泉在黎里镇开设“小小商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1月 丹北员孙瑞成离开同里，党工作移交吴伯荣负责，吴为支部书记，有党员邹执中等12人。

1月底 澄锡虞工委调苏锡工委负责人吴苏来同里接替朱帆领导吴江工作。当晚镇自卫队以查户口为名，将吴扣押。后通过许丽娟在同里的干亲关系，吴于次日获释。澄锡虞中心县委决定调吴苏去锡东，吴江地下党工作仍由朱帆负责。

是月 在中共太湖工委的领导下，苏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沈立人，接受工委领导指示，来吴江县发展地下团组织。至解放前夕，在芦墟发展了29人加入“新青团”，建立了团支部，后改组为团区委。

2月 苏州工委委员马崇儒根据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的布置，派青年区委副书记薛杰（化名丁泖）来吴江与费旭初、赵广祥、王新五接上关系，传达了上级“保存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

3月上旬 国民党省保安团第二纵队两个团，溃退来吴江，驻平望镇。

3月下旬 驻守盛泽的浙江嵊县交九总队，奉令移拨步枪给盛泽区署。

3月下旬 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兼苏锡常工委书记周克和苏锡常工委委员兼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紧急调金佩扬下太湖，去领导原国民党忠救军太湖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赵安民（此时赵已入党），控制城厢、南厍、八坼、溪港、横扇、庙港等地的乡政权及自卫队武装，党员张玉良、陈乃元同期调去担任交通工作。

3月 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杭州市委，林枫为书记，陈伯亮任委员，金亮、陆雪林同期被调去工作。

是月 朱帆通知朱林芳，联系车坊、郭巷一带顾加生等的基本群众关系，作为武工活动开展后秘密转移的宿营地。

是月 党员朱林芳根据上级指示，去坛丘善骏乡接收枪支。由于土匪胡伯龙伪造番号而未遂。

是月,苏州工委书记张云曾约赵广祥在苏州临顿路春江茶室布置工作,并把上海党员王新五的关系交给赵广祥。赵回吴江后,在西门外油菜田召开支部会,传达苏州工委的指示。

4月初 朱帆、王彦萍、吴阿根等人暗藏短枪及手榴弹,到吴江、吴县界河两岸,以石灰窑收柴人为掩护,熟悉周围的河网地形及群众关系,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抗丁抗粮抗租,得到农民积极分子的拥护。后转移至同里镇周围活动。

4月上旬 国民党省保安第二总队(改编为第一旅)驻防平望、震泽、梅堰等地。

4月19日 经过吴嘉工委长时间的组织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挺进纵队吴嘉湖独立团”在新塍新庙桥成立。团政委沈如淙,团长刘先正,编为3个营、1个警卫连、1个短枪排,有400多人,大部分是起义人员,多数是农民。吴江县南部有部分农民党员参加。

4月中旬 在地下党的布置下,吴江中学和吴江乡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进步学生组织护校守备队,站岗放哨,巡逻守卫,保护学校安全。

4月中旬 金佩扬布置吴嘉工委所属党员,做好工作,迎接解放,并统一部署了各地迎接解放的联络信号。

4月21日 朱帆与朱林芳在平望周家溪部署迎接吴江解放的准备工作,朱帆深夜赶回石灰窑,派张根生进吴江城查实情况。

4月22日 澄锡虞工委书记赵建平派工委交通员许丽娟从无锡祝塘赶到苏州,传达工委给吴江朱帆、吴明的紧急通知,告知解放军接头的有关事宜。许到苏州后,把秘藏通知的火柴盒交徐若浓转送吴江。

同日 朱帆带领全体党员、石灰窑同志及周围群众,转移到庞山湖农场集中。发动群众,监视公路、运河,对付苏州等地敌人南逃时的拉夫抢掠。吴明、范青、陈逢贤、顾加生等同志同时到庞山湖农场集中活动。

4月23日 党员李海明领导南厍自卫队全体队员举枪起义,部队到庞山湖农场会师。

同日 集合在庞山湖农场的党员和群众30多人转移到同里以南朱斌村上宿营,公开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民运工作队出现。晚上,吴明、范青从周庄赶来会合。

4月24日 党员吴大根被派去同里镇侦察敌情,与自卫队中队长建立了联系,后该中队拉到同里青庙庵投诚。

4月26日晚 集中起来的党员、群众和起义武装达50多人,扛了红旗,一进了庞山湖农场办公室,登上农场瞭望塔,解放了庞山湖农场。

4月下旬 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破坏县境内夹浦、皋腰等五大河上的公路桥。

4月下旬 土匪胡伯龙假冒共产党,企图“接收”黎里镇。黎里镇自卫队在地下党的指挥下,击退了胡匪的疯狂进攻,战斗达3个多小时。

4月28日 派张根生去同里镇与区长谈判,要他维持秩序,保护好同里镇的安全,等待解放。区长接受条件,表示投诚。

同日 晚上11时,金佩扬与赵安民带领自卫队从吴江西门武装进城,接收政权,看守政府、监狱,保护银行、档案、商店、工厂,维护地方治安。次日,在北城楼迎接从苏州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〇团解放吴江城。

4月29日 清晨,吴江北门外庞山湖农场仓库急电汇报,粮食有遭劫的危险。朱帆等向苏州军管会请示后,全体党员和自卫队员从农场跑步到北门仓库,保护了粮仓安全。

上午10时,解放军进入吴江,朱帆等澄锡虞系统的全体同志,在北门外和大军胜利会师。随军南下的干部队伍亦于晚上9时抵达吴江县城。当晚,吴江中学赵广祥向中共吴江县委书记鲁琦移交了江中支部所属的党员关系。

4月30日 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〇团小分队进驻同里镇。

同日 震泽镇沈求我(民盟成员)到南浔,商定派人去湖州联系解放军。解放军第二十七军为之改变行军路线,七十九师二三七团于5月3日凌晨3时挺进震泽镇。沈求我与镇工商自卫队在东栅大桥挂汽灯两盏,列队迎接大军进镇。

此前,沈求我于1949年初与南浔中学中共党员孙慎和徐迟接上关系,对震泽镇自卫队开展工作,争取地方武装,维护社会治安。前后多次粉碎了太湖水警、省保安九团、省水警局、“忠救军”突击挺进队等企图对震泽镇的抢劫,保护了震泽库存的几万石大米。

5月1日下午 吴江召开各界人民庆祝大会,欢庆解放,并举行大游行。

5月3日上午 解放军第二十八军侦察营解放平望镇。

同日 吴江县人民政府颁发政字第一号布告,宣布吴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就职。

5月4日 土匪胡伯龙在盛泽镇贴出布告,企图“接收”盛泽的枪枝弹药。党组织及时揭露胡匪阴谋,枪弹全部集中,迎接从平望来的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侦察营。

同日 解放军第二十八军侦察营“丹阳支队”解放黎里镇。

5月5日 “丹阳支队”进驻芦墟镇。

5月7日 金佩扬随解放军第二十九军政委张蕃从吴江县城到盛泽,会同俞双人、刘先正、沈如淙一起去嘉兴,接管了政权。金佩扬向张政委和第一任嘉兴地委书记钱铭介绍了嘉兴地下党的情况。由此,吴嘉工委地下党的同志,全部与解放军接上了关系。

从1949年初至解放,经吴嘉工委批准,先后发展了干勇祥、屠善祥等70人入党。

5月17日开始 接收乡镇公所。全县8个区,下设12个镇、26个乡、443保,6493甲,人口为468600多人。

附录三：回忆录

我在大革命中

毛啸岑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

1924年初，我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后的国民党。柳亚子、朱季恂和侯绍裘等人共同负责筹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省党部委员中，有侯绍裘、张应春、戴盆天、刘重民、黄竞西等共产党员。柳亚子、张曙时等均是奉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他们与西山会议派作坚决斗争，我的思想是完全跟柳亚子走的。我参与筹组吴江县党部，将《新黎里》报作为宣传工具。以《新黎里》报为中心，全县涌现了《新吴江》、《新黎里》、《新平望》、《新盛泽》、《新震泽》、《新莘塔》等报，除宣扬三民主义外，也登载进步文稿。赠阅范围远及海外华侨，土豪劣绅为之侧目。劣绅陆佩芸据此向军阀齐燮元控告宣传共产，《新黎里》被勒令停刊。三月以后设法复刊，由我出面任主编，柳亚子以YT为笔名发表文章。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西山会议派公然反动。我们以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与西山会议派作坚决斗争。在孙传芳的铁蹄下，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县代表大会；并举办夏令讲习会，请沈雁冰、杨之华、侯绍裘、陈望道、姜长林、肖楚女等来黎里主讲；还举行过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会，由吴江中学的军乐队大吹大擂地作示威宣传游行。我个人曾几次参加江苏省活动分子大会，多次受到革命教育。

1926年以后,我在侯绍裘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帮助教育下,经常在工作中锻炼和考验自己,同时对共产党员增加好感,也增加了我对共产党的向心力。这一年,陆佩芸又向军阀孙传芳控告。孙密令吴江县署:“该毛啸岑一再宣传共产党,是非安份之徒,应即严拿究办,以正国法……”同学陆士铭在县署工作,急急相告,得以免脱,亡命上海。绍裘同志派我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担任文书科长,用暨南大学教课收入维持生活来源。1926年12月,国民党接办《神州日报》,我担任一部份编辑工作。1927年春,报被查封,我几乎被军阀孙传芳的刽子手李宝璋抓住。之后,我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直至1927年4月9日省党部被反动派捣毁为止。

由于孙传芳的悬赏通缉,我曾搬了几次家,最后搬到马当路崇一里3号,和侯绍裘的家(萨坡赛路)接近。他经常来我家,除教育外,还了解生活情况。我曾几次向侯绍裘同志说过,我要参加共产党。我当时为什么这样迫切要求入党呢?首先是鉴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反动、破坏革命,从黄埔军校起一直到各级地方到处活动。特别是1926年底,蒋介石以南昌的总司令部为中心,与汉口的国民党左派中心相对抗;其次,1926年柳亚子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委员会,看穿蒋介石的真面目,痛骂蒋氏,拂袖北返。他曾对我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汪精卫搞的鬼,廖仲恺先生的被刺是党内外反动派的阴谋。我认为,这个新军阀不除,北伐就是胜利了,革命还是没有成功;再次,我对共产党人的勇敢热情和严密的组织性,起了爱慕之心,深深觉得要革命成功,一定要共产党来领导。由于强烈革命热情的驱使,我由衷地发出要求入党的心愿。

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间,侯绍裘同志给我很大温暖,对我思想影响很大。另外由中共党员阿马同志给我训练了一些革命工作的技术。因此,我参与了一些地下党同志交办的工作。在他们领导下,我曾动员上海南京路、浙江路的商店罢市。我不因看到当时同志有被李宝璋大刀队的惨杀而停止工作,我仍在反对军阀的社会团体

中发挥党团作用。我曾随侯绍裘同志参加了1927年3月12日与西山会议派的搏斗。由于有了领导,有了方向,我在工作中没有考虑过被捕和牺牲,而是热情奔放,勇往直前。

1927年2月的一个夜晚,侯绍裘同志在我家亭子间内着重地对我说:“已同意你加入共产党。”当时我的感奋之情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带着感激的心情,问了绍裘同志应怎样来完成这一入党手续,他回答说:“会给你办妥的。”之后,北伐军已迫近沪宁杭三角地带,彼此分头工作。以后我俩虽碰到过,但因绍裘同志工作紧张,很劳累;我的工作每天也在18小时以上,所以没有机会再与绍裘同志谈入党后的组织关系。这之后,我们又分开工作,直到绍裘同志被害为止。

1927年2月中旬,绍裘同志出发到沪宁沿线活动,我留在上海。3月12日在莫利爱路(现名香山路)孙中山先生故居内举行逝世纪念时,绍裘同志才从外埠赶回。那天,我和大众跟随他一同去砸环龙路(现名南昌路)44号西山会议派巢穴时,他被西山会议派殴伤咯血。

3月中旬,北伐军到松江。我奉江苏省政府命(当时武汉中央委派张曙时、侯绍裘、戴益天、高尔柏等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厅长),至太仓接应北伐军,并暂任县长。结果白崇禧派了刘焦源担任县长,我即回沪。(3月20日,我回到上海)不久,北伐军已到新龙华,上海工人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国民党省党部奉命迁南京。侯绍裘同志先期动身。我以秘书长身份率部专车赴宁。沿途各大城市纷纷组织迎送,2日夜才抵南京。到站时,已有数万人在夹道迎接,沿途高呼“拥护三大政策”等口号。我们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合址办公,与反动派展开了激烈斗争。

1927年4月某日,蒋介石抵南京。我们事先分析,研究对策,在侯绍裘同志领导下进行斗争。4月9日,蒋雇用流氓捣毁国民党省市党部,有多人被捕和牺牲。我和张曙时被暴徒用绳索捆绑,拖出大

门,经至五马街附近遇胡琦得释(胡是武汉来的,是时身穿少将军服,持枪强迫流氓释放)。我和侯绍裘同志取得联系后,动员召集群众大会,要求惩办凶手、索回被抓同志。10日上午在会议即将召开时,据报告,暴徒要暗杀侯绍裘同志。大家劝他暂避,他越墙而去。临走时候执我手郑重关照:如斗争失败,必须转回家乡,保存力量。不料从此一别,便成永诀(后来知道,绍裘同志在南京被捕后,与张应春、许金源等被反动派乱刀刺死后投入秦淮河中)。

“四一二”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我即离沪到吴江活动。5月9日,我正在吴江城隍庙召开反英讨奉群众大会时,反动政府派张镇来抓我,得到同志们的掩护,匿居盛泽我妻家中。两个月后,风声稍平,潜赴上海,寻找关系。因平望街荣阳里党的机关已被破坏,黄竞西同志已牺牲、刘重民同志亦在南京殉难,其余同志星散,接不上线,我又回到盛泽妻家。后至吴江乡村师范当教员,参加江苏省革命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在谭平山、邓演达领导下,号召反蒋。

(毛啸岑同志解放后任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公私合营上海银行副经理等职,1976年2月病故)

吴江乡师读书会的一些情况

杨源时

1933年1月,共产党员刘淇生来到吴江,在吴江乡师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刘淇生,江苏涟水县人,1928年入党,因反对立三路线遭到排斥,于1932年冬到吴江,隐蔽在国民党县公安局当一名小职员,从事党的活动。

先简要叙述一下当时吴江乡师的情况。吴江乡师的前身为苏州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分校及省立苏州中学乡村师范,1932年归江苏省教育厅管辖,更名为省立吴江乡村师范,与黄渡、栖霞、洛社、界首齐名。学生来自全省各地,教学水平比较高。校长唐昌言、教导主任毛啸岑都是省三师毕业,与柳亚子、陈去病、金松岑等交往,具有爱国民主思想。毛啸岑参加过大革命,担任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当时,江苏省党部委员有三分之二是中共党员,他一直在党员侯绍裘同志领导下工作,并由侯介绍入党,未及办入党手续,侯就牺牲了。我1930年考入乡师时,毛不常在校,经常在外地活动。他名义上是公民教员,但从不上公民课,而是对我们宣讲孙中山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他特别具体而又生动地给我们讲了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汪精卫叛变、南昌武装起义,以及共产党在江西建立苏区、建立红军、消灭地主分田地等等情况,给予我们深刻的民主革命教育。1930年八、九月间,以邓演达为首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称第三党,即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毛啸岑是这个党的重要骨干。在他领导下,第三党在吴江乡师有一个很强大的支部,历届班级的主要骨干50多人都参加了。我也于1930年12月加入了这个党。我们班的党小组有7人,当时第三党提出的“继续孙中山的革命”、“打倒蒋介石的专

制独裁政策、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等等政治主张，我是十分拥护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党提出“停止内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主张，更得到党员及大部分群众的拥护。我们在校内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我们在革命实践中也得到了锻炼。第三党没有自己的理论书籍，但党组织指示我们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小组讨论中，对剩余价值及阶级斗争问题引起争论。当时第三党认为苏维埃政权是“独裁政权”等错误观点，对我们思想上也有一些消极影响。

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枪杀于南京。我们在校内张贴了宋庆龄的声明，声明揭露了蒋介石谋杀邓的罪行，宣称“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号召“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毛于此时正式离开学校，大约1932年上半年，乡师内的第三党支部停止活动。

我们学校早就存在着多种政治思潮。校内没有国民党组织，但国民党的思想是公开宣传的。大礼堂上挂着“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的对联，不许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这些宣传在较多同学中是没有市场的。校内有共产主义思潮，他们拥护苏联，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我们对托洛斯基思潮也进行了议论。有一位同学对我说，托洛斯基提出不断革命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攻击中共是农民党，我当时对这种理论还搞不清楚。其实在我们学校里没有发现共产党和托派的组织。

我离开第三党以后，急切地寻找新的政治出路。就在这时候，刘淇生来到我们中间。

我下一级有个同学叫赵乃源，东台人，因从事进步活动不容于界

首乡师，转学来吴师。他来吴江后，仍然四出活动，认识了刘，然后他介绍高一班同学徐德润认识，徐又介绍我与刘认识。在刘淇生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读书会的性质和任务，刘对徐说过，是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类似真理同盟性质的组织。

徐德润，常熟人，我是江阴人。两人籍贯名义上不同，实际上我们都住在扬子江边一块沙地上。自古以来，都叫这块土地为沙洲，我们是沙洲人。江阴县最早的党员、1927年“四一二”后牺牲的著名烈士孙逊群（孙选），1929年牺牲的茅学瑾都是我们沙洲人，且离我们家很近。我们两人从小就盼望能实现孙、茅从事的革命事业。徐德润亦曾参加第三党，脱离第三党后，我们两人都相约要寻找共产党。刘淇生的出现，给予我们很大的希望。

据徐德润说，刘淇生到吴江后，结交了几位朋友。一位是吴其超，湖北人，其时在县政府任司法录事。吴的父亲吴煜恒与董必武熟悉，其时在苏州高等法院任高级法官。吴其超住处秘密藏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还有党内刊物。第二位是易静初，湖南人，参加过广州暴动，后撤退到海陆丰，其时正在吴江保安队任中队长。第三位是史翊美，武进县人，其时亦在县府任文书。这三个人政治思想上都比较进步。吴其超、易静初当时是否与共产党有某种联系，不清楚。他们两人都支持刘淇生的工作，我校赵乃源就是经易介绍给刘淇生的。当刘淇生决定在吴江乡师组织读书会开展党的工作时，吴其超全力支持，愿意拿出他的藏书供读书会阅读。

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严重，江苏各地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刘淇生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党县政府的职员、驻军及吴江乡师学生中从事党的活动，是十分危险的。为保证安全，他完全采取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他先与赵乃源、徐德润保持联系，我是徐毕业前才与他发生个别联系的。一般读书会会员都不认识他，甚至根本不知有刘淇生其人。我们约定在城内公园梅林内会见，如碰不到，即以纸条卷好

放在预先约定的梅林残垣的小洞中。这个办法，始终没有被人发现过。在吸收会员方面，刘根据我校情况比较复杂，提出应从比较进步、一直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员中，个别地吸收入会。人会虽不须填表，但一定要经过小组讨论、读书会通过。我校四个班级，除一年级外，其余三个年级都建立了小组。四年级除徐德润外，有王寿生、陈孟豪（吴江人，因思想进步，从事革命活动，已被校开除，他是从家乡莘塔赶来参加的）、郑怀瑾（女，后名归青田，常熟人）等；三年级有我、蒋耀生、刘炯等；二年级有赵乃源、樊修德、张侠等。史翊美亦参加在内，全部读书会会员大约在十五人左右。

读书会的第一个任务是阅读马列主义，明确共产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书由刘秘密传递给我们，由我们带回小组分发给每一个会员，限期读完。现在还记得的有《唯物史观解释》、《街头哲学》、《共产主义 ABC》、《斯大林论反对派》、河上肇的《经济学》、《布尔雪维克什志》、《红旗周报》以及苏联小说《士敏土》等等。班小组不定期秘密集会（大多在校外），讨论学习及工作问题。在我们会员中间，由于自身认识上限制，特别是受第三党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在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承认剩余价值理论，赞成耕者有其田，但怀疑阶级斗争，认为与事无补，反而对工农不利；有许多同学曾幻想邓演达能发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推翻蒋介石，建立农工平民政权。我们在阅读马列主义后，就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专题讨论。记得夏日的的一个晚上，在刘淇生主持下，我们读书会的全体会员，曾秘密集会于曹王庙内，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世界观问题及革命道路问题。许多同志在发言中，着重地批判了宿命论思想，初步认识到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到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取得革命胜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走共产主义道路。在理论学习上，刘淇生以理论联系实际的丰富知识，给予我们最有力的指导。他向我们介绍苏联及江西苏区的情况，使我们大开眼界，澄清了许多糊涂思想。会员中以徐德润的理论水平最

高，他常在会议上作辅导性总结性发言。那时我们办了一个刊物名《绿波》，是16开本的铅印刊物，定期刊载学生创作的小说、诗歌、漫画、抗日救国等理论性文章，宣传进步思想。徐德润还曾以“齐登”的笔名在学生自治会的会刊上发表过一篇读社会主义的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在学生中影响比较大。

1933年上半年，学校新聘的一位教师利用上课及与学生接触的机会，竭力宣扬“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国家主义派的理论，有一些学生跟着他走。我们向刘淇生作了汇报，在刘的领导下，我们团结广大学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国家主义派所提口号的实质是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是国民党的走狗和帮凶。他的理论破产了。我们还发动同学对他罢考。由于站不住脚，暑假期间他就离开了。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九一八”以后，我们学校就开始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读书会成立后，刘淇生指示我们把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主要的工作。徐德润、樊修德、张侠及我都是学生自治委员会的干部。我们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组织同学到街头、轮船码头、茶馆、酒肆宣传抗日，号召抵制日货，使用国货。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收回东北。我们在同学中批判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错误主张。我们抓住学校1930年入学考试作文试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论”的题目，在学生中宣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我们还举行了两天游艺会，将募得的120元支援东北的马占山义勇军。当时我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吴江起了先锋作用。

1932年下半年，江苏省政府在镇江举行全省童子军大露营。吴江乡师校长唐昌言是童子军创始人之一，我校按童子军序列为63团，在省内有一定地位。这次露营，我和徐德润等都参加了。露营期间，不知是哪个学校的革命学生，于夜间散发了一些革命传单。我们读书会的同志也写了“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民主政治”、“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等革命传单在营地散发。国民党省

政府就派出军警来营地加紧戒备并进行搜索。这时,在一次比赛中因裁判不公,我团比分被压低,引起全国童子军的公愤,就拥进江苏省政府要求公平处理。国民党污蔑我们“大闹省政府”,大概因为我校一直存在进步活动,加上镇江发生的事,唐昌言校长于1933年夏被免职,一些正义的进步的教师全都离校。调来的校长及我班班主任都是反动分子。初上讲台,满口马列主义,不久就露出真面目,大吹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的反动论调。在刘淇生领导下,我们联合大多数同学,配合社会上声援唐昌言的一股势力,在校内外开展了挽留老校长、驱逐新校长的斗争。斗争失败了,我受到警告。

1933年暑假,徐德润、王寿生等毕业离开了学校。我升入四年级。由于反动势力执掌学校,进步活动受到压抑,我们工作的困难增多。但我们读书会仍然在刘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不过活动方式更加隐蔽。这年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发动政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读书会的同志们十分兴奋,认为国内形势正在起变化,但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情况不清楚,要求刘淇生亲自给我们讲讲。这时,徐德润从他当教师的地点黎里回到吴江,经他筹备,在城内北塘街的连升客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徐德润、陈孟豪、王寿生和我等十余人。刘淇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这次福建事变是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发动的一次政变,不管他的政治纲领如何,对于推动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有积极意义。他主张中国工农红军与福建地方政府联合起来,预计国内外形势将起很大变化,要我们精神上有所准备。他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刘淇生在吴江还做了许多工作。他与吴其超、史翊美一起,接济过狱中的共产党员。一位名樊溅(湖北英山人,与吴其超同乡,在上海被捕,出狱后来吴江,在刘处住了半年);一位叫汪赋纯(后改名为汪虎臣,即江干臣。入狱判决后拟送反省院。吴其超、刘淇生设法将

其转到吴江看守所关押。由他们经常照顾接济并供给他书报杂志。解放后任北京农业展览馆党委书记。)这些情况,徐德润了解,我也知道一些。

1933、1934年,江苏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吴江已没有党的组织。刘淇生离开涟水时约定接关系的线索几次未能接上,他原计划在我们中间建党,暂时也不能进行。徐德润、陈孟豪为了找寻党的组织,也多次到上海。陈孟豪在党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并被逮捕坐过牢。徐德润也参加党外围组织的工作,但未能解决党籍问题。1934年夏我毕业离校,刘淇生不久亦离去,吴江乡师的读书会即停止活动。

吴江乡师读书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最大的收获是使我们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迈开了一大步。她播下的种子到处开花。徐德润在黎里按乡师读书会的原则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有50多名教师参加。除学习马列主义外,还发行《大众生活》、《永生》等进步刊物,传播从上海买到的党的刊物。陈孟豪在莘塔组织了一个流动图书馆,出借左翼文艺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蒋耀生、刘焯、刘炯、陈树英(1931年毕业,原第三党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及我在武进县南宅镇对当地反动分子、区长进行了斗争。上述许多同志及在南京市工作的张鹏举(泰兴人,1932年毕业,原第三党员,信仰共产主义)、樊修德和我,都在不同地区参加了党领导的救国会的活动。1936年,蒋耀生、刘焯、刘炯、陈树英等因参加救国会被捕,陈树英、周文琴(女,1933年毕业,信仰共产主义)夫妇被迫远走南洋。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张鹏举、王寿生、徐德润、陈孟豪、归青田(女)、蒋耀生还有受过我们教育或影响的相当一批人,先后参加革命,实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志愿。张鹏举,1947年在苏北解放区任泰兴县长时,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被俘,英勇不屈,光荣牺牲,是江苏省著名的烈士。吴其超1938年从陕北南下安徽工作,亦不幸被国民党杀害,陈树英在五十年代曾作为泰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来过中国。史翊美

南下后在中共武进县委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调四川搞工业,任成都无线电厂厂长,前年(1986年)因病逝世。陈孟豪、归青田夫妇,在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1957年均被错划为右派,遣返吴江莘塔老家,夫妇先后含冤去世,1979年党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刘淇生原国家一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现已离休在北京。

(杨源时同志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武抗”和吴江政工队

施光华

1938年冬,我从新四军江抗政治部奉调回上海,在丁秉成(陈显堂)同志领导下,进行团结培训抗日青年工作。丁秉成和我多次接触后,先于我到达吴江。我于1939年初由沈月箴和另一位男同志带路,持假良民证,从上海乘火车到苏州,再从苏州换乘木船到黎里附近的一个水村。我在那里第一次和刘志荣等七八个上海下乡的同志见面,也见到一个混迹旧军伍的老刘,他负责教大家做队列动作,有时手里还拿着削过的竹片之类的东西,代替指挥刀比划。刘志荣等同志和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亲同手足。大家还利用休息时间,到田头挖荠菜,边说笑边包馄饨。不多久,我们到严墓车家坝和丁秉成会面,同时见到了施家骅、庄绍桢等同志和当地一些男女青年。庄利用社会关系向国民党吴江县政府要求,经准许成立了吴江县政工队,庄任队长。丁秉成带领我们参加政工队之后,实际上政工队主要领导人丁秉成。不久,从上海又零零星星下来几个青年,丁的爱人张琼英也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从上海下乡。当时政工队有上海下乡的近20人、当地男女青年10来人,共30人左右,住在车家坝一个庙里。政工队成为培训抗日青年骨干的阵地和对外联系的基点。丁秉成经常带个别青年在外联系游击队和做抗日统战工作。我们在政工队,一面组织学习、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一面等候联系游击队,待条件成熟时转入武装工作。

车家坝离太湖不远,周围有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常备队和朱希、汪鹤松部队、郝道生部队等抗日游击队。庄绍桢从新四军回到家乡,做扩军工作,并带回一支短枪。他和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是不愿和我们一起过党组织生活。当时我们互相间不易了解底细,也不能勉强

他,只能保持党外合作的关系。程万军、曹绍文部队有丁秉成派去的林风(南德钦)在工作,林风名义上是政训处总干事,施家骅同志就是他从该部队培养发展的“武抗”会员。林时常来政工队,直接向丁秉成汇报情况,不久他因亲人病重,请假回家乡后,中断了党组织的关系。朱希、汪鹤松部队有浙西党组织派去的郑恒同志,任政训处主任。郑恒是四川人,曾到政工队作过个别访问。因为当时环境条件不可能了解到他是我党同志。我曾向丁秉成汇报:我在家乡浙江平阳粟裕、刘英同志举办的“闽浙边红军救亡干部学校”听过几位外地人讲课,其中就有这位郑恒老师讲授哲学。他不认识我,我也不知他与我党是什么关系,不知他怎么会从浙南转到吴江来。丁秉成表示,没有接到上海党组织指示,搞不清郑的来路。因林风回家了,丁的主要精力放在钱康民部队,也就没有再做朱、汪部的联系工作。刘志荣、江军、于大桢、小刘(章燕)、沈润泉等同志,由丁秉成派到郝道生部工作。后因郝部被日寇击溃沈润泉牺牲,他们只好撤回政工队。吴江县政府常备队队长张树源和庄绍桢关系较好,主张坚决抗日,他的胞妹张静贞(烈士)当时也是政工队队员,因此他让丁秉成派叶初晓、俞哲(周奋)、小华(华荣田)进去“当兵”,直接掌握两挺轻机枪。由于以上一些联系或合作的关系,也由于当时当地国民党上层分子尚处于既不积极抗日、又未坚决反共的状态,所以政工队能在车家坝一住几个月,并且还可以经常向周围驻军和群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有的同志还分工到附近农村在青年男女中组织小规模抗日宣传、减租减息、办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等活动。

1939年夏某天,丁秉成从太湖边回来,在车家坝河浜旁秘密向张琼英和我介绍他在外联系游击队的情况。他说:胡谿、义皋、大钱一带有一支四五十人的抗日游击队,队长叫钱康民,思想进步,今后可从政工队分批输送骨干去那里工作。这次见面时,丁宣布成立秘密党支部,他自任书记,张琼英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当时只有我们三个党员,大华(陈振之)是党员,但不知何故,丁始终未向张

琼英和我介绍过。我们讨论,下一步可先发展刘志荣、叶初晓、施家骅等为党员。在此同时,丁秉成还主持成立了秘密的“武抗”支部,由丁秉成、张琼英、我、刘志荣和陈振之五人组成“武抗”支委。在政工队期间,上海下乡的同志绝大多数发展为“武抗”会员。“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到达无锡地区。我们得知消息后,丁秉成即派小俞(周奋)持密信回家乡。小俞在无锡梅村见到了“江抗”负责同志叶飞和吴焜、何克希。他向叶飞等领导人汇报了吴江情况,带回叶飞口头指示:待主力继续东进或回师时让丁秉成带吴江武装去会师。小俞十分兴奋地向我们汇报了亲眼看见主力部队的情景。并说“江抗”主要负责人叶琛,真姓名叫叶飞。我是从“江抗”调出来的,刚从家乡到上海时,第一个直接领导人就是何克希,调离“江抗”,也是根据何克希的口述向上海党组织汇报有关情况的。所以,小俞介绍在无锡的所见所闻,我感到特别振奋。其他同志也都很兴奋,骨干分子都盼望丁秉成返回钱康民部队后能很快组织我们进去抓武装工作。

老刘在吴江时间不久,表面上看似是和丁秉成个人之间关系不融合,“合不来”,实质上他并非坚决抗日和坚信我党。上海党组织为了调解他和丁的关系,在大家转入政工队工作之前,就把他调回上海,转到昆山陶一球部。因此,他未参加政工队。据了解,他在昆山部队拉帮结派,企图不良,后被调离昆山并切断了和我党的关系。

我们在政工队期间,还曾接受过沈月箴、金大鹏、肖心正同志转来的抗日情报,有时连夜组织力量,按秘密方法书写,派刘志荣送上海。一次,沈、金、肖送来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秘件,我们立即抄送上海党组织。在转送这类资料时,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本性深感愤慨,为党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也进一步增强。记得时隔不久,从上海传来延安电讯,新华社揭露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反动组织、秘密颁布反共文件,证实我们抄送党组织的情报内容无讹。虽然不敢说延安消息来源为何处,但是大家觉得为党组织提供了有用情报,精神上得到了很大鼓舞和鞭策。

刘志荣、施家骅等同志根据丁秉成同志的指示,常外出联系某些统战对象,如赵安民等,联系一些拥护我党抗日主张并向往解放区的当地青年,使他们各自选择时机奔赴苏北、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随同丁秉成外出的小王急急忙忙回车家坝向我们汇报:丁秉成和“太湖抗日义勇军”司令钱康民带部队在吴淞活动,与浙西国民党顽固派部队遭遇,部队被打散,丁、钱当场牺牲。这个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们一面安慰张琼英并逐步向队员做思想工作,一面立即派刘志荣携带密信回上海。他很快从上海带回高原同志的密信。高原指示,要我负责首先派人护送张琼英母子回上海,然后分批将上海下乡的同志撤回去。吴江抗日青年愿和我们一起转移的,也可分别保持联系,待机行动。张琼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意志坚强,接到噩耗时虽然极度悲痛,但非常理智。她和我们共同研究行动计划,还和我一起同庄绍楨交谈。庄对此次受挫深表惋惜,对愿和我们一起转移工作的当地男女队员也很赞成,因他本人自有组织关系,不能和我们同行。最后我由施家骅陪同,在他老家住了两天,到苏州见了个别原为丁秉成直接联系的统战对象,然后回上海。

在上海,高原同志多次来看望安慰张琼英,并直接听取我的汇报。大约住了半个月,我被派往启东、崇明联系游击队工作。张琼英、刘志荣等20多位从吴江撤回上海的同志和几位自愿跟随的吴江政工队男女队员,全部转移到昆山陶一球部队。“东方不亮西方亮”。1939年岁末,张琼英、刘志荣从昆山回上海找党组织,汇报揭发老刘的政治野心,我恰巧也从崇明回上海找党组织,我们喜出望外地相遇在一个小饭铺里。本来他们不了解我去何处,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我正因找不到高原而焦急,见到张、刘十分欣慰。那时我们才知道,上海特科领导人老金(徐强)、高原等被调离上海受审查,“武抗”解散了,只能找一位老缪同志联系。张琼英、刘志荣遵照党的指示,为团结陶一球同志,巩固和发展昆山人民武装做出了成绩。

1940年初,我调回常熟“江抗”东路政治部。当年春,昆山部队整编为“江抗第三支队第一中队”,三支队拉到东路司令部会合时,我又见到了许多在吴江朝夕相处的战友。刘志荣、施家骅是在丁秉成牺牲前入党的,其他绝大多数同志到昆山后也陆续入党。整编后的一中队与二中队在大风湾反扫荡中,打得英勇顽强,给了敌寇以迎头痛击。江军同志为了掩护战友的转移,捂住被击穿拖出的肠子,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从吴江转移到新四军江抗的同志,先后有江军、俞哲、林家春、陈子耘、张静贞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武抗”在吴江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地下党员王绍鳌、民主人士王岳麓的关系进入县政府和政工队的。丁秉成长期在上海负责秘密工作,对党无限忠诚,对干部群众谆谆教诲,但因缺乏武装工作经验,对敌情、友情估计不足,在吴江基本上仍沿用白区“单线领导,个别接触”的工作方法。特科“武抗”不幸又遭误会解散。因此,党在吴江直接抓武装的工作被迫结束。吴江的情报工作骨干,个别的和我们同时撤回上海直接归潘汉年领导,有的仍留原地坚持。统战工作关系移交党的浙西特委领导。

(施光华同志离休前系总政南京政治学院训练部顾问)

抗战初期特科在吴江的活动

施家骅

在回顾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上海党的特科及其外围组织“武抗”（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在吴江开展工作的概况之前，先说说我是怎样参加“武抗”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于7月7日和8月13日相继在北京芦沟桥和上海两地发动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自此，日寇开始了对我国长达8年之久的全面侵略战争，妄图灭亡我国。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保卫祖国的号召下，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持久的全面抗战。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抗战不久就溃退下来，日寇便沿着沪宁铁路、苏（州）嘉（兴）铁路和平（望）湖（州）公路长驱直入。处在交通线上的城镇无不遭到日寇的残暴烧杀、奸淫掳掠。我们全家从震泽镇逃到太湖边的陆家港（今属庙港）避难，我原先在震泽中学读书，也被迫停学。翌年，即1938年6月，我参加了活动于太湖边上的程万军、曹绍文抗日游击队的战地青年服务团，做抗日宣传工作。战地青年服务团是属政训处领导的。当时政训处的总干事林风是“武抗”的成员，由上海党的特科派到程、曹游击队做争取转化工作，林风经常主动地同服务团的青年接触，也常找我个别谈心，使我逐步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不久我便由林风介绍，丁秉成（中共吴江支部及“武抗”吴江支部的书记）监督，参加了“武抗”组织举行的秘密宣誓仪式，被正式接纳为“武抗”成员。从此我就在丁秉成领导下，在开辟吴江地区的工作中做交通联络工作，直到奉命转移去东路江抗部队（后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所属的昆山联抗大队，才离开吴江。

现追记特科及“武抗”在吴江活动概况于下：

“武抗”是中共上海党特科的秘密外围组织。在进步的工人、店

员、学生、知识分子中吸收会员。另外对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政治上较为开明、思想上较为进步的地方知名人士作个别联系和吸收。“武抗”组织是严密的,要求也很严格,入会要宣誓,每月交纳会费,要严守纪律,服从组织,保守机密,坚决执行交给的任务。特科及“武抗”在吴江的活动,大概开始于1938年春,到1939年冬停止活动。前后一年半多时间,在艰难的条件下做了不少工作。

第一,关于建立中共吴江支部和“武抗”吴江支部。

1938年春,上海党的特科派丁秉成来吴江地区领导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搞武装,做争取杂牌游击队的工作,从而使该地区成为真正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较早随丁秉成从上海来吴江的有刘子荣(大刘)、沈月箴、章燕(小刘)、施光华(胡光华)、华大闲(陈正之)、俞哲(周奋)、叶初晓(鲁秋生)、林风(后脱离),后又陆续从上海派来张琼英、江军、华荣田、林家春(洪奔)、王振华、于大桢、梁醒、裘益明、裘吉明等青年工人、店员、学生,前后共二十多人。其中丁秉成、张琼英、施光华、华大闲、沈月箴是党员,其余皆为“武抗”成员。经上海党组织的指示,1939年春在吴江严墓(铜罗)的车家坝正式建立了中共吴江支部,支部书记丁秉成,组织委员张琼英,宣传委员施光华。并且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武抗”吴江支部,支部负责人丁秉成、张琼英、施光华、华大闲、刘子荣。“武抗”成员编了若干小组,按时过组织生活。我们这些“武抗”的青年成员,初步受到了党的教育,迫切要求进步,因此无论学习或工作,都非常自觉和认真。

第二,关于特科及“武抗”在吴江的活动。

1938年,重点做争取程万军、曹绍文游击队的工作。那时西自吴淞、七都、东至横扇一带有一个抗日游击队,司令程万军、副司令曹绍文。程万军是淞沪抗战中溃退下来的,在太湖边乘机收容散兵游勇,当了游击队的司令。曹绍文是吴江地方人,原籍湖南,移来太湖开垦湖田而发家致富,在湖南帮里是有声望的人。他在湖南人中拉起了一支队伍,同程万军部合并当了副司令。丁秉成由上海党组织

通过统战关系的介绍,同曹绍文建立了关系,直接做曹绍文的争取工作。又通过曹绍文把林风安插到程、曹部队的政训处担任总干事,并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在政训处所属的战地青年服务团中对一些抗日热情较高的青年做工作。目的是在这些青年中培养能接受“武抗”领导的人,为进一步开展工作作力量上的准备。正当在程、曹部队的工作有待深化之际,程万军竟无耻地投靠了日寇,于1938年10月把部队拉进苏州日寇据点,当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当时曹绍文还有点爱国心,不愿去做汉奸,居住庙港。丁秉成同志仍继续做他的工作,鼓励他树立信心,重建抗日队伍。我曾多次陪同丁秉成到曹绍文家,也单独替丁秉成送信给曹并带回其复函。1939年2月,曹绍文患眼病去苏州诊治,被程万军发觉软禁,而后曹也转向了。我们同曹绍文的关系就此终止。

1939年,特科及“武抗”在吴江活动的主要目标还是放在搞武装上。

一、利用县政工队为特科及“武抗”开展工作的立足点和训练“武抗”成员的场所。丁秉成通过进步民主人士王岳麓的帮助,使我们“武抗”的同志得以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政工队,这样在吴江开展工作就有了一个立足点。王岳麓是吴江县城人,系有名望的士绅,当时任国民党吴江县政府的财政科长。丁秉成和他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知道丁秉成是共产党派来吴江工作的,不但给予工作上的方便,而且提供经济的秘密支持。丁秉成、施光华等领导同志积极从政治上、理论上对“武抗”成员进行培养和提高,并请求上海党组织秘密运来一批革命书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有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和苏联文艺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组织阅读讨论,出刊墙报,进行个别思想教育。所有这些对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为以后坚决跟共产党干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还按时过“武抗”小组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培养和增强了组织纪律观念,为

党培养和充实了一批新鲜血液。在吴江工作过的这一批“武抗”成员,在1939年和1940年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陆续成为党的干部。“武抗”还做政工队老队员的团结教育工作。我们在撤离吴江转移去昆山地区工作时,就有陈子耘(吴江铜罗人,1941年任新四军6师52团4连政治指导员,在江南反清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江月芳、徐慧英、谭立中等老队员跟我们一起参加了革命队伍。

二、打入常备队做士兵工作。丁秉成通过王岳麓的疏通,派了若干“武抗”成员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的两个常备队。表面上当士兵、班长或文书,实际上以此为掩护,在士兵中交朋友,做争取工作,等到时机成熟就把这些部队变为我们党掌握的真正的抗日队伍。现在能记起的到这两个常备队去做工作的有叶初晓(鲁秋生)、俞哲(周奋)、华荣田等。

三、争取活动在黎里周围的郝道生部队。日寇侵占吴江后,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均设有据点。黎里镇因为不在铁路、公路上,日寇尚未设据点。当时在黎里与北厍一带有个独立的抗日游击队。大队长郝道生是东北人,他的队伍里有一部分人原先是东北军的,从上海溃败下来流散到黎里。郝就以东北老乡为亲信,收集散兵,吸收当地人参加,拉起了这支二百来人的队伍,得到黎里两个士绅毛海涛、朱智千的支持和筹集粮款给养。1938年3月,上海党组织指示和介绍了毛海涛、朱智千这两个统战关系,丁秉成即到黎里同他们两人联系,结交了郝道生,并且得到郝的允许,派章燕、刘子荣、江军、于大桢到郝部工作。我曾数次陪同丁秉成去黎里,在毛海涛和朱智千家中,同郝道生会面,丁秉成直接做好郝的工作。1939年5月我又陪丁秉成从严墓乘航船去黎里,上岸后发现日寇,我们两人马上转到毛海涛家。下午4时许日寇撤走。经了解郝道生部队被日寇袭击,伤亡很大,从此郝道生的部队垮掉。

四、1939年5月,丁秉成同钱康民共同组建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是吴江县城人,辛亥革命烈士钱涤根先生的长子,大革命时期

就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钱康民在吴兴县双林的赵安民部队里担任政训处主任。上海党的特科同他建立了密切关系，丁秉成受党的委托直接同钱康民联系。1939年5月，乘赵安民部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拉到山里收编之机，钱康民接受了丁秉成的意见，从赵安民部拉出三四十人枪，组织了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命名为“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活动在苏浙太湖边的吴淞至义皋、大钱一带。至7月，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一百来人。正待继续发展壮大之际，发生了令人极其愤慨和悲痛的事件。这就是1939年7月，国民党的62师和吴兴县常备队，在吴淞向我们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进行突然袭击，终因力量悬殊太大，我们这支队伍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丁秉成、钱康民英勇牺牲。据当时在现场幸免于难的目睹者江军同志汇报，丁秉成、钱康民高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起对准日本鬼子”。这充分表明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的愤怒抨击和控诉。出事的第3天，我同小王（名字忘了）两人去当地了解情况，牺牲同志尸体已由当地群众掩埋了。钱康民、丁秉成和秘书的3口棺材葬在吴淞和汤淞间的乱坟堆。我亲眼看过，东西北三面是桑地，南面是一条路，3口棺材自东朝西并排放着。

五、进行抗日宣传和开展群众工作。为了在时机成熟时把这一地区转变为真正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特科及“武抗”也重视广泛联系群众，积极利用政工队的有利条件，组织“武抗”成员向群众进行宣传，采取演讲、教唱抗日进步歌曲、办识字班、演出短剧、话报剧等多种方式。记得一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施光华扮演卖艺“老头”，谈莉扮演“女儿”，我扮演青年观众“阿根”。演到卖艺女儿唱“松花江上”时，因思念已沦落在日寇铁蹄下的家乡而悲痛泣不成声，“老头”怕观众不高兴帮场，无奈拿起鞭子打“女儿”，“阿根”高呼“放下你的鞭子”从观众中跳上前去扭住“老头”，不让他打“女儿”的时候，群众还当是真的，感动地齐声呼喊：“不要打她！”“不要打她”！除

此,还派了“武抗”成员去严墓镇上做青年工作,并派“武抗”成员以帮助乡长做抗日宣传教育工作的名义,到好几个乡去同农民群众进行交朋友工作,以便建立一些群众基础,为将来的发展做准备。

此外,通过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关系沈月箴收集情报。她当时在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担任交通员,时常去第三战区送、取秘密文件。我们利用她在吴江县政府、县党部的社会关系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了解到国民党“限共、防共、反共”的活动情况,并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

丁秉成牺牲后,我们在政工队的活动也开始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因此,张琼英、施光华同志派刘子荣去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今后行动方针。经上海党组织指示,在吴江工作的“武抗”成员全部撤回上海接受新的任务。1939年8、9月,分批离开吴江去上海。后大部分同志被派到东路江抗部队所属的昆山联抗大队工作。施光华和我离开吴江时间稍晚一些,转移到太湖边陆家港我家中,等待上海新派来的同志接头。后接到通知去上海,施光华分配去东路江抗部队工作,我则去昆山联抗大队工作。特科于抗战初期为开辟苏、浙太湖地区(吴江县、吴兴县),建立抗日武装,在错综复杂的情况和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但成效不大,最后建立起来的一支武装部队也遭受了挫折。这由于开辟吴江(及吴兴)地区工作的同志缺乏部队工作经验,对敌情、“友情”没有足够的估计,偏重于做上层工作,对于基层士兵做扎实深细的工作注重不够,所以上层人士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工作就不能有效地继续下去。在自己建立起一支武装部队后,又缺乏对敌情、“友情”的掌握,竟遭到突然围攻。教训是深刻沉痛的。但是,在吴江培养了一批爱国家、爱人民,追求真理,有革命理想和勇于献身的青年骨干,他们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受到了初步的实际锻炼。奉命转移到昆山之后,昆山游击队的工作取得了成效,可说是此处不亮彼处亮。

1939年冬,上海党的特科及其外围组织“武抗”在吴江的活动停

止了。但后来知道,从抗日战争初直到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之前,我们在吴江的地下活动从未停止过。

(施家骅同志离休前系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副政委)

吴江纪事

金若望

(一)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吴江和各地一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镇上的青年纷纷上街宣传抗日,情绪十分高昂。

11月5日那天,浙江方向传来一阵阵排炮声,敌机盘旋上空,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的中国守军被迫仓惶撤退。从青浦、松江、嘉善方向来的逃难船,首尾相接,穿过黎里市河向西逃跑。我镇也出现逃难高峰,橹声彻夜不绝,充满灾难临头的恐怖气氛。仅一个星期,兴旺的的大街就千家闭户,四无人声,满目凄凉。13日,日军进占平望,几天后吴江全境沦陷。

1938年夏,盛泽人沈立群由第三战区顾祝同委派为吴江沦陷区县长。他从江西经上海下乡,联络潜伏在农村里的老区长及地方头面人物,在严墓(今铜罗)建立了县政府。他本人初流动于黎里一带农村,后借助62师及朱希部队的力量得以立足于严墓。

1938年秋,共产党的情报部门从上海派“武抗”人员下乡,打入县政府开展工作。我在1938年秋经沈月箴(沈月珍)介绍,参加“武抗”,踏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秋、1939年夏,我先后同丁秉成、何光华(施光华)见面谈话。那时我只知道搞情报活动,想不到从此就在党的情报部门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1938年我在黎里搞抗日宣传,1939年夏,我才到路西严墓。不久,就发生了丁秉成牺牲的不幸事件。“武抗”上海同志随即撤走,沈月箴也去上海。她通知我和肖心正留在吴江,等候上海来联系。至1940年初,我同上海吴成方(中共社会部在沪负责人)接上关系,由他批准入党。及至1945年,我被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

汉年)直接调往淮南根据地工作。经过华中局组织部审查,批准我自1938年秋参加“武抗”之日起参加共产党。

(二)

我到严墓的时候,县政府在路西已立足半年了。为了取得有利于活动的职务,我于同年冬得到机会去山丫桥,打入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冷欣指挥部的“特种工作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取得了该部上尉情报员之合法身份,被派回吴江(至1940年夏辞去该职)。于是,我在吴江就成为国民党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不受县政府管辖,行动上得到不少便利,掩护条件比较好。

1940年初,我和肖心正(1941年经吴成方批准入党)都在吴成方领导下独立工作。同上级的联系是不定期的,而且有事都要到上海去碰头,不象当地有领导人那样方便。上级只作原则性的指示,所有具体活动只有两个人商量去办。综合起来大体做了四方面工作:(1)继续收集反共密件、电令;(2)统战工作;(3)推动青年武装抗日,团结对敌;(4)在反共高潮来到前后,对浙西地下党作一些掩护和协作活动。

在我接手情报工作的时候,县政府的“交通”已另派别人担任,不能象沈月箴那样直接取得文件,但是我们利用沈文潮(县长之侄,与肖心正是亲戚)担任“总收发”,把住文件进出口的机会,仍旧得到一切需要的国民党上级的密件。经过密写,寄往上海秘密通讯处或亲自送交领导人吴成方。记得有一件是“中统”关于普遍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这文件甚长,不便密写,只得将抄件装入纪念册封面内带去上海。吴成方表示很有价值,说要送到延安去。

有一次,吴成方交给我一张“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捐款收据,要我送到吴江城内。收据是吴绍鏊写的,我在1939年上半年,与王见过几面。日子久了,沈文潮对我们取阅国民党来文中的密件有所察觉。他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干共产党活动,要求领他到上海去同

我的上级见面。我就嘱他把那张小条子送进城里。后来我得到上级同意，于阴历8月间带沈去见了吴成方，回来后沈就参加了情报工作。

“皖南事变”爆发前，送出的最后一份情报是关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限定新四军北撤路线的密令，大意是“飭令各地严加监视，如发现新四军不遵循此路线行动者，作违抗军令论，各地驻军必须立即发动袭击”。不久，国民党派忠义救国军从广德进入吴江一带的沦陷区，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转入对付“忠救军”的活动。

(三)

县政府政工队队长庄绍楨在严墓，以从新四军回来的身份，在青年中动员参军。“武抗”施光华等一行就打入队里活动。同年秋，他们撤离后，来了一批浙西青年，填补了政工队空缺。政工队一贯自成“小天地”，民主空气相当浓厚，不少人高唱《延安颂》和苏联《祖国进行曲》。

马希仁是税务局长，要求加强抗日宣传，由他局里支钱，发动办刊物。1939年先办《敌忾》（只1期），1940年6月续办《义旗》（共6期），由马希仁和肖心正分期编辑。两刊载有丁秉成和浙西王化鹏、姚逊等人的文章。马希仁、沈月箴、肖心正和我也有几篇。内容侧重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精神，实际上是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

1940年秋，上级传达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要求我们在吴江发动更多青年投入抗日斗争。我们设法联合政工队，在镇上演戏、大唱进步歌曲，冲破了沉闷空气，受到抗日青年的欢迎。然而此举由于青年的集中和联合行动，遭到国民党注目。在他们经验中，凡是青年集中行动的时候，一定有共产党的活动。何况我们那些歌曲和剧本都带着点红色。

时隔不久，政工队又在镇上召开“二五减租”座谈会，宣传减租

减息,参加者有县政府、县党部、严墓区政府及本镇青年各界代表。会上县党部代表提出反对意见,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地方士绅和国民党县党部纷纷攻击政工队搞异党活动,庄绍桢就成为一大目标。

总之,从1940年夏续办《义旗》——举办联合抗日宣传活动——发展到“二五减租”座谈会,激起一阵宣传热浪,而且大有一浪接一浪的气势,对推动青年抗日斗志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酝酿,吴江路东、路西两派地方势力趁机发起“倒沈(县长)”活动。他们叫嚷“县政府里有共产党活动”,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空气。

县长沈立群深感紧张,他面临被告发“容纳异党分子”而受查办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再再申言,在他的县政府内没有发现共产党活动,只把引起风波的原因归到公开过新四军身份的庄绍桢。到10月间,传闻天目山浙西行署有吴江“黑名单”之说。江南行署又下令撤销苏南各县政府所属政工队,改为青工队(青年工作队),属县党部领导。于是庄绍桢被撤职,政工队被解散。

(四)

1940年11月,庄绍桢被撤职以后,“黑名单”之风似乎已经过去。我们又举办了“税训班”。

这个班由马希仁发起。他想帮助更多失业青年得到参加抗日的机会,施以政治训练,结业后可充实税务局的力量。我表示全力支持,争取实现之。我同青工队(原政工队)浙西方面的朱闻礼、王化鹏商量,聘他们为教师,得到他们全力支持。大概双方的想法不谋而合,都想通过训练灌输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求民主、求进步的意识,讲课内容有时事政治形势、历史知识和会计知识。教材的内容完全取于《上海周报》、延安的《解放周刊》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等革命刊物。这是我们以马希仁出面和浙西方面的联合行动。如果把青年学员算在一起,其规模要比1940年秋那次联合演出,更为集中、更为

突出。

开办“税训班”的风声，自然被吴江的反共势力获悉。路东凌元培（当时任三青团上海区团吴江分团负责人）突然来严墓实地“视察”，向县长兴师问罪，认为“税训班”是共产党的活动。于是，我们才提前结束，前后共办了约一个月，学员都分入税务局。

（五）

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在“皖南事变”前后吴江青年中曾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这种小规模武装活动，是同争取俞清志的工作结合进行的。

俞清志是县长沈立群从上饶带来的唯一青年军事骨干。1939年时，俞任常备中队长，沈月箴曾做过俞的工作，她临别时要我们继续争取之。1940年3月，通过肖心正的推荐，俞得任三区（盛泽）区长之职，此后一直同我们来往密切。他上任不久，曾在茅塔打了一次敌伪军，并积极革新区政。他的革新行动同原有旧势力逐步发生矛盾。

1940年12月，发生了到盛泽敌占区击毙汉奸叶冠吾一事。叶冠吾何许人？他是吴江县安清同盟会会长。该会以青帮流氓为骨干，是日军宪兵部队豢养之鹰犬，简称“安清会”。三区旧势力中沈峙山等人同叶久有联系、暗通声气。这些人想凭借他们同盛泽汪伪方面建立的关系网，利用俞清志缺乏经验，达到控制实权的目的。俞为了扫除障碍，曾经同我密议干掉他们，后来因考虑各方面关系未予实现。这件事大概只有我知道，我过去没有说过。所以俞要杀叶的原因，决非单纯地为了取得“协饷”，而是为了它的三区走出一条抗日的路子，即切实打击汉奸，设法排除旧势力的干扰。当初，他有打开三区局面的个性。

我们全力支持他下决心杀叶，是为了推动他坚持抗日。只有在团结抗日的道路上，才能达到争取他，并把三区抓起来之目的。我们

准备把三区作为一个基点,搞好他的小部队,必要时可转移到那里去。8、9月间,我到上海向领导人汇报了俞清志部队的情况,认为有条件争取之,并要求上海派来有经验的政治军事干部,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工作。上级曾同意派某某人下乡,后因形势变化没有实现。

俞于12月12日派人去盛泽。在原计划中,我不参加杀叶,但那天我同沈文潮去坛丘找俞了解落实情况,发现派出的力量不够,于是三人赶去盛泽。夜7时许,由许永蓼领我们到毛家弄,俞、沈两人把门,我与潘逸溪上楼,对叶各开一枪,将叶当场击毙。从进门到脱离现场,前后不过一分钟光景。

杀叶之举在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影响,连从来不拿枪的人也要求亲自杀敌。1月23日,县政府办事员朱见华单独潜入盛泽,竟在闹市中举枪向一名日军伍长射击,自己则走火受伤。2月26日,俞清志又到盛泽,从容踏进伪区公所,当众击毙了区长简汗清。在日军严守的据点中,接连发生日伪汉奸被杀的事件,使敌人惊恐不安。县政府内的青年为此受到鼓舞。张贻翼在日军扫荡逼近时,不顾敌众我寡,提一挺自动步枪,迎敌阻击,掩护我们转移。后又去梅堰,带了六七个青年在公路上伏击有日寇的车辆,取得了胜利战果。在那一段时间里,青年中的抗日行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出现了193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如果吴江的反共高潮来得不那么快,青年的武装抗日活动必将开拓一个发展的局面。

可是刚刚掀起一阵浪花,转眼间就被进驻的“忠救军”压下去。而在我们被迫撤离后,朱见华深感苦闷,贫病交迫,失去生存的希望,竟于一个风雨之夜投河自尽了。

(六)

我对浙西地下党派来吴江活动的朱闻礼、王化鹏等人,是从合办“税训班”时才稍为熟悉。在庄绍楨被撤职,政工队被解散的时候,我为了争取把他们留下来,设法担任了青工队长。他们原班人马进

入了青工队。当然我们双方因在政治上不了解底细，仍旧相互猜测。已经被撤职的庄绍楨，还特地来找我摸底，说他想找共产党，问我有没有“关系”。估计这是浙西方面派他来试探的。税训班结束，形势逐渐恶化，我向他们通报情况，说明必须缩小目标的原因，他们也同意全体转移到三区去。

在那情况下，俞清志敢于接纳原政工队和受怀疑的外地青年，确实担了风险。这些青年被分配到三区各单位：朱闻礼担任部队教官（或分队长），王化鹏教唱歌，蔡允中在区公所内，他们又在农民中活动。我也以区大队副之职进入三区，同肖心正暂时分开。从人员分布情况来看，三区一度成为地下党隐蔽活动的场所，可惜当初我们同浙西两条线不能沟通，不可能推心置腹地共同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力量。

3、4月间，“忠救军”大批涌入吴江、青浦，日伪军频频扫荡三区。5月，王化鹏与沈步青被捕。沈从吴江日军拘留所逃出，王化鹏则被移到上海日本军法庭，死于南京汪伪监所。他在狱中的化名叫王经纶。

(七)

自1941年初，“忠救军”进入吴江后，农村里设有暗哨。至4月，庄绍楨携带《方志敏、瞿秋白传》一书，被步哨查到，而遭扣押，后脱逃。肖心正受牵连而被传讯，后经县长保释，才把肖领回来。那时，县党部书记长王逸芝刚刚到任，要彻查吴江异党活动。他扣押了凌文化（浙西发展的党员），而且硬说县政府青年中有共产分子，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那些青年同我们一道痛骂顽固分子，恨不得要干掉他们几个以泄心头之愤。

凌文化被扣后，经过马希仁奔走得以保出。可是马从前办刊物、办税训班，这次又出头露面为凌事出力，更被反动分子视为可疑人物。为此，马希仁被宣布停职。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以上三件

大事,揭开了吴江反共高潮的帷幕。浙西诸人才主动向我们了解情况、商议对策,形势迫使双方把命运联结在一起了。

在紧急关头,我去上海向吴成方请示汇报。吴要我们赶快撤离,叫我别再回去,让肖心正也来上海。第二天,肖却派了张贻翼赶来,叫我立即回去,说有急事相商。我也顾不得再向上级请示,就随他回严墓,被直接领到庄浜马希仁家。

那天,有肖心正、俞清志、张贻翼、朱闻礼、凌文化、沈文潮等10余人,借马希仁做生日之名聚集商议。马之胞弟马希贤也来了。原来,在我到上海去汇报的二、三日内,他们已决定干掉王逸芝等5个顽固分子,并打算印发传单,向民众说明因受国民党迫害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俞、张二人曾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任务,连马希贤也要求亲自动手。

有人坚决主张搞暴动,而且起好了一个名称,就叫“吴江暴动”!俞清志也很激动,他虽然身为区长,感到有被“忠救军”杀害之危险,四面受敌,没有出路,一度萌发只有投“江抗”之想法。我对此计划提出异议,因上级已明确指出立即撤退,能留则留,不能留则走。大家商量下来都同意作罢。

深夜,众人散去。只留我和朱闻礼、凌文化等人作为两条线上的代表,第一次“内部”商议,又一次谈到该不该“暴动”的问题,一直谈到天亮才统一了思想。在充满悲愤而又紧迫的时刻,大家流露了同志般的深沉感情。未了双方摊牌,说明大家有“组织关系”。又谈妥,凡是可带走的青年,双方各自带走,他们的全部路费向肖心正领取等办法。庄浜这次通宵会谈,也是我们同浙西方面分别的最后一次谈话。

(八)

庄浜开会后,还发生了国民党省党部视察许宪民(女,苏州人,战前就认识沈立群)到吴江来调查王逸芝的问题。早在马希仁被停

职时，肖心正曾发电报促许来设法挽回，争取让马复职。许以前来过吴江好几次，同我们比较熟悉，同马希仁关系甚好。当1940年秋盛传有黑名单，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她曾表示同情青年的抗日要求。所以这回她一到严墓，我们和马等数人便向她“告状”了。某日，我在马希仁家同他们俩人饮酒到深夜，最后只剩她和我。许流露同情共产党的情绪，说她的胞兄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的事。初我还怀疑她别有用心。但后来王逸芝果然被撤职了。这是我在吴江所接触的事实，说明在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

1941年5月，我离开吴江到上海。肖心正也撤来与我同住。8月中，他因未了帐目需要清理，又回严墓去。个把星期后我接到他的来信，惊悉“忠救军”在吴江制造一次特大血案。经过情况是：肖回严墓农村住了7天，曾到镇上露过面。此时，“忠救军”决定谋杀肖心正。8月20日上午，“忠救军”先秘密逮捕税务局青年袁璋，肖心正上街得悉此讯曾设法营救、无效。傍晚他步行回农村，半路上听到枪声，就退回镇上借宿。当夜12时左右，“忠救军”便衣多人突入瑾下浜（肖在农村之住地）捉肖，逼问同住的沈文潮、虞仞千，他俩坚决不吐露肖到镇上去的真情，被“忠救军”捆绑捉去。天亮，勤务员出来报讯，肖就离开严墓转移去黎里老家。他的信就是从黎里发来的。

8月20日一天内，“忠救军”一连串杀了6人，其中3人是县政府谍报人员。沈文潮、虞仞千、袁璋3人被“忠救军”秘密绑架到马腰附近的桑林中杀害。文潮是盛泽人，华记绸厂学徒出身，在情报活动和杀叶等工作方面都很积极，牺牲时年26岁。虞仞千是嘉兴新塍人，到吴江后协助肖心正做会计工作，在我们联系下表现积极，牺牲时年方20周岁。他俩是我们安排留在吴江继续做情报工作的，先后经我介绍由吴成方批准入党。袁璋是南浔人，税训班学员，是抗日青年中的积极分子，他在镇上因阅读《上海周报》被“忠救军”暗探发现而被捕，牺牲时也只有20多岁。

此外,在庄浜开会不久,马希贤也被“忠救军”秘密杀害于商榻,同时被害者还有他的同事方克明。马希贤是受国民党三战区冷欣指挥部参谋处的派遣,在同里镇汪伪部队中搞策反,同我们友好相处。当马希仁涉有共产党嫌疑而被停职时,他曾出头找县党部王逸芝说理提过意见,在庄浜碰头时,又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他是主张团结抗日的爱国知识青年。最后被“忠救军”暗杀的,就是俞清志。诱杀他的人,便是当年他想除掉而没有除掉的沈峙山(此人解放后已被镇压)。

以上是皖南事变之后,“忠救军”在我们家乡的血腥屠杀——“吴江惨案”。

吴江工作,在我们这条线上是由“武抗”开辟起来的,当时的领导人丁秉成最早牺牲了。在上海同志撤走后,我在路西的两年中,又有好多同志和青年朋友相继牺牲。他们的血流在家乡的土地上,尸骨无存。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我们曾经朝夕相处,打成一片。为了不湮没他们的生前事迹,特略予介绍。

(金若望同志离休前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我在吴江走上革命道路

刘 明

我在吴江有过两段经历：

一、1933年在吴江第一次入党

1933年夏天，我从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毕业，分配到吴江县黎里区当小学教师，因去得太早，分配到哪个学校还未定下来，暂时住在黎里小学。一到宿舍就遇到半年前被学校开除的同学赵乃源，赵是江苏省东台县人，1932年春从苏北海州地区乡师转学到吴江乡师，比我低一班，只读了一年就被学校开除了。我们两人在一起约20天左右，因整天无事，无所不谈。当时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派到这地区来工作的，便要求他介绍我参加共产党，他满口答允，并要我把自己的历史情况向他作了详细介绍。有否办过其它什么手续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后来他和我谈，说我现在已是共产党员了，以后什么事和他一人联系，当时我被分配到莘塔区龙泾小学教书，同赵见面的机会较少，约好每月通信一次。这年12月中下旬，他来信要我在元旦之前一定要赶到吴江县城。我按时赶到城里，找到约好的旅馆，见到赵乃源。他告诉我说：“元旦这天上海有人来报告形势。”我们住的房间里除了赵乃源外，还有陈孟豪（吴江人）、张俊友、徐××（常熟人）3人。他们都是黎里区教书的同学，比我早一天就来了。

陈孟豪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大约在1931年底因思想激进被学校开除。这次见面，都很高兴。他曾向我介绍离开学校以后的简单经过。据说一次党派他到华北去工作，好象是到保定，要他把头发都剃光等，他还上海附近几个地方工作过。

元旦这天上午，有一位在吴江县公安局工作的人也来了。这个人当时我知道他的姓，名字不知道，现在连姓也忘了，他在公安局做

什么工作不清楚,是穿便衣的。中午他和陈孟豪、赵乃源3人到汽车站接上级来的人,不料等了两天都未接到。后来由在公安局工作的那人谈了一下。他说上级没有人来,不再等了。我们自己研究一下工作,谈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主要是他和陈、赵3人谈的,开始在我们房间里谈,后来他和陈又到另外地方去谈,隔一天我们就分头回去了。我回去路过黎里镇时,赵告诉我他准备到苏区去,问我同去否?(据说只要到福建就可以从十九路军防地直通苏区)我说:“好的,不过要积点路费后才能去”,因赵是没有钱的,那次在城里的旅馆住宿费全部是我支付的。我回到龙泾小学约半个月,就接到赵乃源的来信说:“家书已至(指党的通知),要他立即回去,叫我寄点路费给他。”并说他如不能来,以后会有人来找我的,当时我认为他可能调上海工作,寒假中我到黎里镇才听说他到苏区去了。

寒假我回靖江。因为我小学里的老师华国望在母校担任校长,一定要我回靖江去教书,我同意了。在1934年春假中(那时学校清明节前有四天假期),我到吴江莘塔拿行李时,曾到陈孟豪家中去过(距黎里不到十里)。据陈讲:“赵本人是不会来的,他走后未有人来联系过。”并说,徐钧铨(同班同学,吴江人,在哪个学校教书已忘记)不久前也去找他等。最后,陈告诉我,等赵派人来联系时会通知我的。以后我回去路过吴江城又到公安局去找元旦在城里见到的那人,也没找到。因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做什么工作,又不敢多问。后来,曾给陈孟豪写过几封信,他也复过我两封信,都说未有人联系等,就这样中断了关系。

1937年夏天,我经吴江乡师校长唐昌言的介绍,又重新到吴江县教书。原想再去找一下陈孟豪,问清楚这件事,不料11月间,这地区就沦陷了。我也停止教书,在严墓乡下住了下来。第二年春天,朱希带了一百多人到乌镇来打游击,于是,我就参加了他的部队。

二、1939 年在吴江严墓汪鹤松部队

朱希原是国民党第 13 师一个营长,1937 年冬,该师从上海大场撤退时,朱部奉命掩护,后撤到皖南,因找不到师部,便和连长汪鹤松带了 100 多人,到浙西沦陷区来打游击。1938 年秋,朱部在乌镇一带已发展到 2000 多人(有九个直属大队和三个团),不料 11 月 11 日在练市附近的钟家墩被日军包围打垮了。后来朱希收集残部撤退到后方孝丰,只剩 400 多人。我 1938 年 12 月在孝丰由周达明(新四军派来的)和徐洁身二人介绍重新入党。

朱希到孝丰后,曾到金华去找过浙江省主席黄绍雄,想争取一个独立番号,再到沦陷区来。因人枪太少,国民党对他的面目有怀疑,没有达到目的。后来眼看留在后方的部队就要被人编去(已点编过),为了留个后路,便派副司令汪鹤松带了 100 多人枪,在 1939 年春节时偷偷地离开后方,重新进入沦陷区活动,周达明和我随汪部到了吴江严墓。这时汪部仍用“江南第一挺进队第一路指挥部”的名义。当时在汪部的共产党员,只有周达明、韩昌和我 3 人,韩昌是 1938 年秋在朱部由徐由整、徐洁身帮他恢复党的关系的。周达明(周和康)担任作战参谋,韩昌和我在政训处担任科长,政训处主任原来是徐洁身,因他留在后方部队里没有来,暂由姚逊担任副主任,姚是在 1940 年才入党的。这时党的会议都是由周达明召集。记得曾在一次会议上专门研究过政训处的工作,决定把在农村中组织抗日救国会,作为政训处的主要工作之一。

周达明因部队官兵都知道他是新四军派来的,他又一直穿着新四军发的灰色棉军服,为了防止发生意外,3 月份调回新四军去。5 月,徐洁身、郑衡(子平)、李志良三人来了。郑衡到汪部后,徐洁身把政训处主任让给了他,处下面设四个科,徐洁身兼总务科长、韩昌是民运科长,我是组训科长,宣传科长谢锡恩(群众)。这时,我们在党内成立特支,特支书记是徐洁身(徐进),我担任组织委员,韩昌担任宣传委员。郑衡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懂得多一些(据说他是在

国民党军校被捕,抗战时出狱的),当时汪鹤松对他很敬重。政训处的工作自从他来了以后,大有起色。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民运科仍是在农村中发展抗日救国会组织,曾在那个地区发展好几百个救国会会员,都填了申请书,发了会员证;组训科主要是负责部队里的政治教育,营连都派了政治指导员,连队每星期至少有两节政治课,内容着重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那时我兼第一营营指导员,第二营营指导员是马希贤(进步群众);宣传方面,主要编辑一份《铁血》刊物,大约共出了10期,还出过几个专号。我记得第1期是“反托专号”。后来还出过“悼念钟家墩死难烈士”专号。

汪鹤松到严墓地区时,为了扩大影响,3、4月份曾在南北阳和桥击毁过日军汽艇一艘,艇上的鬼子和翻译约六七人全部被打死。因汽艇后面还有两艘大轮船,载满日军从乌镇开来,于是部队只好撤退,结果后面来的日寇,把我们部队设埋伏的村子全部烧光,但以后从乌镇到南浔这条河道,日军的汽艇就再未来过。

经过这次战斗,汪部的名声传开了,部队也迅速扩大起来。1939年7、8月间,已经扩大两个营的兵力(其中二营一部分是吴江县编过来的)。这时,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大约是9、10月开始,他们从各方面对我们部队施加压力。首先在部队周围乡保长会议上,公开宣传说:“汪部的番号是冒充的”。说我们组织的“抗日救国会是非法的”,并说,“这地区没有国民党正式编制的部队,一律不允许存在”等。甚至还秘密逮捕我们外出工作的同志,被捕的几个人都是进步群众。例如,我们二营一个连指导员严正奇,郑衡派他到南浔附近去侦察敌情,中途被他们秘密逮捕,关了20多天。后来,我到62师某团去交涉,他们才帮写证明信,让下属单位释放。

同时,有的地方部队也同我们争夺税收,使部队给养无法解决。10月初,汪鹤松通过国民党吴江县县长沈立群,向国民党苏南行署反映。苏南行署保安司令知道这情况后,立即派人来谈判,谈好给养全部归他们负担,收编后部队仍在原地区活动,番号为“苏南行署保安

第三团”，编为第一和第二两营。

汪部开始改成团的编制时(约9月份),郑衡兼团指导员。因苏南行署把政训处的经费取消了,我们便要求汪鹤松发给我们团营连指导员的薪金,拿来组成一个随军工作队,负责原政训处的工作。到11月初,我们在汪部已发展党员约40名(不包括在地方上发展的党员),其中在政训处发展了5人,即庄雪英、汪群、徐加生、陈慕天、徐慧琴等人。在部队除第一营营参谋王德奎(安徽宁国人)和二营四连长刘在周(吴江严墓人)之外,其它都是第一营的班长和战士。第一连约有党员10人,党小组长周志泉(杭嘉湖地区人);第二连党员16人,党小组长吴保国(湖北人);第三连约有党员7人,党小组长姓名记不起来了。这时徐洁身(浙西特委宣传部长)因事离开部队,郑衡通知我担任特支书记,李志良担任组织委员,王德奎担任宣传委员,地方上的党员是由韩昌负责的。我只记得当时在地方上也发展了十几个党员,至于哪些党员,我不清楚。

12月中下旬,苏南行署突然派人来通知汪鹤松,要把第一营和团部调到苏南溧阳去整训,第二营仍在原地活动。他们在排以上干部会上宣布通知时,一方面以商量口气要大家讨论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又以扣发军饷来威胁,即如“暂时不去,暂时也不能发军饷”等等。汪鹤松本来是一个拥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游击队长,开始他对我们的工作和意见很重视,主要是为了发展巩固他的部队,同时也因当时受朱希领导。后来国民党行署正式委他当了团长,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接到苏南行署来的通知后,根本听不进下级的意见,坚决要把这支部队带到国民党苏南行署去。当时有个团副沈纯轩(我们有些意见是通过他向汪提的),因对汪劝阻无效,愤然离开部队。

在第一营要调离这地区时,我和连里几个党小组长意见是要把部队拉出来,因这个营的班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为此事曾向郑衡请示过两次,郑说:“他已向上级请示,因去联系的人没有联系上。”并说:他自己已受监视走不开,时间太急了。(当时在部队干部

中宣布调令到出发时间约一星期到十天)。最后,郑衡决定要我随第一营到苏南去,说他迟几天就来,让他调一位党员连指导员到第二营去,我随部队到了苏南溧阳。

因为我们当时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认识不足,部队开到溧阳后不久,国民党苏南行署保安司令部就把团营连指导员全部派下来了,各级军事干部也派了副职,这样汪鹤松也无办法,只好发路费要我们离开。

我因等不到郑衡来,只好向留在那里的几个党小组长布置了一下工作,离开汪部去找郑衡,途中与郑相遇。郑告诉我,自我离开后,他和徐洁身等人曾把第二营带到太湖边上去活动过,因与日寇相遇,我们掌握的这个连的连长刘在周和指导员李志良都牺牲了。其余部队被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收回去了。这样,郑衡只好把随军工作队解散,和营长陈奇(参加过“民先”未入党)离开部队。以后我和郑衡回到莫干山浙西特委。我把经过情况向特委组织部长朱辉汇报。朱要我再到溧阳去把部队拉出来,我和郑衡考虑,那里离新四军部队活动地区很远,又是国民党的后方统治区,到那里去拉部队没有把握。于是朱辉就叫我到宁国去把里面的党员移交给原来的特支宣传王德奎,派我到另外地区去工作。

(刘明同志离休前系浙江省林业厅干部)

我的回忆

沈如淙

我是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我在吴江工作的简要经过，回忆如下，有出入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一、党在吴江的工作与斗争

1939年—1940年，严墓、双林一带，我党的活动比较活跃。刘明（刘汝琏）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又是我的领导人，他是1939年底、1940年初来新塍工作的。1941年调去海北工委。罗希明是1941年2月来的，罗的化名叫刘吟。来了不久，大谢乡党支部出了问题，王士烈、蔡允中来新塍找罗希明。当时我们在新塍有两爿店作为联络点：一是同泰兴糖果店。二是毛国荣的顺泰烟什食品摊。我与老王、老蔡不发生关系，曾见过一面。1941年初冬，老王、老蔡从大谢乡来新塍，与罗希明碰头后撤走，后来才知道他俩是在大谢乡站不住脚才撤走的。蔡是打入区中队的，王以当小学教师作掩护。他们因为在农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而暴露了。“忠救军”情报组派人来抓王士烈，蔡允中反派区中队把情报组的人抓了，最后不得不撤走。因此，那里的党组织和党员一时失去了领导和联系。

沈小娜是1941年春天到新塍把关系交给我的。严墓农村的党支部和党小组一直由沈小娜负责联系。当时在严墓工作的还有诸文娟（1939年入党），老王、老蔡出事不久，诸文娟到苏南，还去过苏北，重新回来时党籍没有了。

浙西的领导人，开始顾玉良为浙西特委书记，朱辉是组织部长。1940年后，浙西特委分为路东、路西两个特委，朱辉是路东的特委书记，住在南浔。当时，我们那里是嘉崇桐工委、后来为嘉桐工委、嘉兴县委、新塍区委、嘉兴特派员、吴嘉工委。吴江部分地区党的工作一

直是我负责联系的。

二、大谢乡党支部的恢复和发展

我到大谢发生关系是1942年夏,具体时间记不清了。1940年9、10月浙江的抗日形势日渐恶化,黄绍雄宣布撤销省政工队。12月,日伪占驻新塍镇。接着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反共浪潮来了,这样我们在新塍不能活动了。省政工队宣布撤销后,根据党的指示,原省政工队里的共产党员,除部分(已红了的)调离外,大部要争取就地隐蔽,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根据这一精神,为了应付形势变化,扩大党的队伍和力量,刘明同志要我完成二个任务:一、在农村找所比较隐蔽的住房,住到农村去,开辟农村工作;二、争取在国民党新塍区署里担任教育指导员,到乡村小学教书,以利于秘密开展农村工作。我原在新塍镇上教书,所以要争取到新塍区里去当教育指导员,既有一定条件,又不是容易的事情。为此,事先与刘明商量好,争取到教育指导员职务后,我不在区署里跟着他们流动,而要以指导员兼康和桥小学校长身份,立足在康和桥,目的是便于独立开展活动。依靠统战关系,经过1月左右的活动,如愿实现了目的要求。在争取工作中,我发现塘北乡一带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叫杭州湾工作站,后改名为嘉兴工作站。这个发现有利于我们在工作中防范敌人。

1942年初夏,罗希明同志撤离前,组织上要我去大谢联系、恢复党的组织。这时,大谢出事已半年有余,空气已经冷下来了。我怎样去联系的呢?组织上告诉我,通过王世明到赵一传家,再由赵一传同我到顾春泉(顾阿二)的家里,他俩是亲戚关系。顾阿二隔壁是仲春山,就通过仲春山把大谢乡党支部恢复起来,支部书记是仲春山,其他有顾春泉、顾阿坤、潘天扬、沈沛乾、钱福宝、沈振华、董来法、罗金林、俞金良等人。以后仲春山在南塘、溪南、坛丘、震泽、盛泽等地发展了顾鹤亭、徐金良等许多党员。1947到1948年,仲春山又发展了庾心泉等同志入党,那边没有单独建立支部。大谢乡的党支部一直

保持下来，没有发生其他事变。但发展的党员名字记不全了。

三、肖斧、老方来开展武装活动

1947年夏，肖斧（罗希明的关系）来了，先住在毛国荣那里，后来以家庭教师的面目住在钱福宝家里。年底，组织上派王西林（即方休）来，他是个白面书生，吸板烟斗，据说是淀山湖来筹备武装的。老方来时，肖斧还没走，在钱福宝家里开过一个会议，首先了解情况，随后提出了搞武装的事。我们是要求搞武装斗争的，还带着他们跑了一圈，看了地形，都认为这个地区很好，苏浙边界地带有好几个县可以联系，东、南、西、北都有回旋余地，就决定在这一带搞武装。当时我们还提出搞武装斗争没有枪支、缺乏干部、没有经验等。他说，先由组织上想办法解决一些枪，以后自己搞发展，要干部也可以配来。记得后来去上海拿过几次枪。第一次是叫毛国荣去上海，在一个戏院门口，接头暗号是什么老烟斗，结果没有接上关系。沈小娜好象也去过，因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户口查得紧，枪不能进上海，放在浦东。第三次是我去的，肖斧送我进北站，将四五支短枪放在旅行袋里，进站交给我。上了火车，把袋放在车厢一角，我坐在对角，眼睛看得见，万一搜查我可以不承认。如果不搜查，下车再拿。肖斧没有同车回来，又据说来过，以后调走。筹备武装一事研究得很详细，准备先搞一百个联络点。展开秘密活动，以后再成立公开的游击武装。在没有一百个联点之前，先搞秘密武装活动。还研究过，没有经验可以锻炼，通过一些活动，采取混水摸鱼的办法搞敌人的枪支，弄到一支算一支。所以，后来决定在农历3月15日新滕迎庙会时，去夺国民党自卫队的枪。夺枪是老罗、老方一起研究的，大约在3月初十边，研究好后，老方、老罗去上海，我们作准备，等老罗、老方来后行动。

四、新滕夺枪

农历3月15日，新滕庙会。事前，我们作了详细研究和准备，同

仲春山商量好,人员从大谢乡支部抽来,由顾阿坤、潘天扬两人动手,让钱福定在家不要外出。行动定在香恢桥附近,以香恢桥茶店作为联络指挥点,组织几个同志作监察,要求行动后1分钟内撤出香恢弄,尽量不要暴露,敌人不发觉不要开枪。如果敌人抵抗允许开枪。3月14日,老方、老罗没有来,大家决定仍按原计划行动。25日,潘、顾进镇,在东岳庙边肉店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国民党自卫队的班长(老兵痞)。潘、顾就动手缴枪,他反抗,即对他打了一枪,没死,那个家伙还喊抓土匪。情况紧迫,即把他推倒,潘、顾夹在人群中撤退。自卫队有便衣在场,枪一响当然发觉,因为人多,看不清,也不好开枪,只是追上去。潘、顾上来龙桥时,张鹏飞部队下乡催收捐欠粮的十多人要用机枪扫射,幸而机枪打不出。过了来龙桥,正碰上伪保长,潘、顾即对他作了交待,不准讲出来,否则当心脑袋。二人安全回到大谢乡。后来几天未发现异常情况,我也疏忽了,没有及时去大谢作进一步安排,我们没有隐蔽好。潘、顾带着枪跑来跑去,被乡队副发现,因敲竹杠未成,就把情况报到县里。将近傍晚,县里派了一个中队到大谢乡公所要胡国钧(隐蔽的苏北党员)带路去顾春泉那个村庄。胡国钧、顾春泉在场头一起逃跑,县中队急向弄堂里开枪,但没有击中。便抓走了顾春泉的妻子、沈沛乾、乡长、保长。潘天扬、顾阿坤因离开得早,没有被抓去。后金佩扬介绍他们去中共青东支队,通行证是乡公所胡国钧开的。钱福宝躲在屋顶墙角里逃过一劫,后他去上海大陆银行亲戚那里隐蔽了一段时间。被抓的人押到县里关了好多天,二嫂嫂表现很好,受了刑始终不讲,一口咬定:女人家不晓得共产党什么的。乡队副问她谁到新滕去缴枪的?二嫂嫂说:你队部的事,你队副都不晓得,我一个女人家怎么晓得。乡队副被反责的哑口无言。伪乡长也没说什么。结果是花钱保出来的。虽然出了点事,但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党员和群众,教训也是有的。

正是新滕夺枪前后,罗希明在上海被捕,老罗、老方被捕的消息是海北一个同志叫祝岐耕来通知我的。不久金佩扬来了。在此以前

我和金佩扬不发生关系，我把筹备武装的情况讲了一下，金说：“继续进行”。我很高兴，钱福宝、顾阿坤都回来了，潘天阳在青东反清剿作战中负伤，在九里湾养伤。正式成立游击小组是1948年7月1日，大约活动了两个月，因青东大部队受到上海国民党警备区的进攻，人员、干部有损失，活动停止了。金佩扬来通知说：“嘉兴武装活动也要停止，已暴露目标而不能就地坚持的同志，由组织安排调走；能就地隐蔽的尽量隐蔽。钱福宝跟金佩扬走，沈英杰到桐乡钱家埭，我去上海川沙县，由姓乔的同志介绍在一所学校当教师，时间是1948年9月。在那里住了一个学期，第二年春节后，记得是年初七，组织上通知我回嘉兴家中等候，没几天，金佩扬来了，他交待我继续搞武装活动。那时三大战役已结束，要我们迅速搞一个团，迎接大军过江。

五、关于吴嘉工委和湖嘉吴独立团

我记忆成立吴嘉工委是1948年5、6月，具体要问问金亮。成立吴嘉工委时金佩扬、金亮一起来的，是金佩扬宣布的，记得在我家里（也许是金亮记得对，是在上海赓安旅馆）。成立后金亮还给我们两支枪。我在九里湾与陈伯亮接触过一次，过了一夜，有两个姓陈的。成立吴嘉工委的情况记得是金佩扬第三次来我处宣布的。第一次是罗希明被捕后来接关系，第二次是隔了没几天，来处理顾阿坤、潘天扬的离开问题，第三次是成立吴嘉工委。

1949年初，组织上要我们搞一个团迎接大军渡江。并且讲，已同刘先正商量过了，叫刘先正任团长，我当政委，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挺进支队吴嘉湖独立团”。力量三个方面：1、自己地下党武装；2、基本群众；3、周围可以争取的乡镇自卫队和枪。意思是要控制武装，防止敌人捣乱，迎接大军渡江。我们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把王江泾、新塍、双桥等乡镇的国民党枪支拿了过来；汤连成、金选臣等也都策反过来了。4月19日，独立团在徐家埭正式成立。我们地

下党一个连(开头叫警卫连)单独活动,金先臣任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俞金水一个营,吴永高一个营,沈大为一个营,总共4个营一个连,他们都是刘先正安排的。我们部队强调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派了共产党员进去担任政工、联络员。部队命名是在3、4月份,金佩扬同志离开了,当时是个紧要关头,主要是等待联系,解放大军快要过江了。独立团成立后,就开展对敌(溃敌)作战,组织若干个战斗小组,时间虽短,战斗战利收获不小,使敌人更加恐慌,加速了敌军的溃败。当时,上海新闻报刊出了:“嘉兴、新塍一带已发现土共活动”的消息。

解放前夕,俞金水的营拦截货船私分财物以及在南汇镇抢劫商店。解放后,解放军在整编时,严明军纪,将他们缴械,追查处理了。

1949年8月,几个隐藏在第三连里的坏人勾通土匪,在双桥搞武装叛变。叛徒一排长张阿福被处决,叛匪扬兆贞在1952年被捕枪决。三连发生叛变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开始剿匪。8月底,我去省委党校学习。嘉兴解放后不久,吴江县的党员关系划到吴江,桐乡县的党员关系转到桐乡。从此,中共吴嘉工委完成了它地下工作斗争的光荣历史使命。

(沈如淙同志离休前系嘉兴市政协主席)

回忆我的革命活动

沈英杰

1938年4月，汪鹤松部队驻扎着青云巴家抖。该部政训处主任郑恒和民运科长韩昌，都是中共浙西党组织派进的党员。他们经常深入农村，向老百姓宣传抗日。不久，组织成立了“江南游击区民众抗日救国会”，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并担任小组长。“救国会”成员，每人发一会员证，凭该证治病不要钱，晚上哨兵可以放行。

韩昌同志经常到我家来，找我谈心，谈抗日，谈中国人不做亡国奴。有一次，他说：“蒋介石不抗日，汪精卫做汉奸，不顾中国人民吃苦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最抗日。”问我：“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我说：“共产党好。”又问我：“既然共产党好，为什么不去找共产党？”我说：“如果知道哪里有共产党，我马上去参加。”

1938年10月15日，我由韩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成立党小组，韩昌任小组长。同时明确了当前的任务：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秘密发展党员、保守党的机密等。1939年5月，在韩昌同志主持下，东水家港党支部成立，我任支部书记。1940年2、3月，严墓区委成立会在三民浜召开，韩昌任区长。4、5月，韩昌离开吴江。临行前，他来我家，要我负责区委工作，叮嘱我好好工作，不要后退。革命事业是光荣的。当时，我以剃头职业为掩护，挑着剃头担走东乡、串西乡，进行联系和活动。

1940年7、8月间，杨永源（赵子扬）同志经韩昌介绍来找我联系，由他接替韩任区委书记。9、10月间的一天早上，听说日本人要进严墓镇扫荡，杨永源同志对我说：“到严墓镇去发传单。”我又叫了沈四宝和杨永源3人从东水家港出发到严墓，在昌绿茶馆店吃茶商量，看到西面凤桥头有很多匪军，身穿便衣，挂着驳壳枪走动。北街

三仙弄到风桥头，人特别多。我们决定分二路行动：我和杨永源向东，沈四宝向西，然后在风桥头会合。这时街上有人喊叫“日本人就要进镇了。”顿时，匪军混在老百姓中间向南、北两个方向乱逃，商店也纷纷打烊。我们也马上起身发传单，第一张就放在茶馆里，上、下店门对发，每个摊头一张，在接近风桥时，我们看到桥顶有日本哨兵，又转身向北面三仙弄到东北方面继续发传单，再向南找沈四宝，3人在风桥北堍碰头。走到西汇小米店门口，十几个日军追过来，我们拐进米店脱了险。回去时经大德塘桥，路上听到桥西的哨兵对镇上的日军开了一枪，日军回击了几十枪，子弹从我们头顶飞过，等枪声一停我们就走。日军赶到大塘桥上，东张西望没有发现什么，就回镇上去了。

11、12月，县政工队到村上宣传抗日，组织群众。中共浙西党员朱文礼借政工队的名成立“联村会”，在东杨和桥桃园房屋里，召开“联村会”成立大会，我被任命为干事长，副干事长是盛友鹤。“联村会”成立不久，朱文礼等同志帮“联村会”拟了公文，要求县政府批准当年“二五减租”。县长进退两难借故躲到后方。不久，秘书周宗洛（县党部常委）要捉严墓的地下党，我在青云不能住了。1941年3月，我到南浔找到浙西特委书记朱辉，由他介绍到新四军六师谭震林处，在保安司令部民政训练班学习1月左右，而后分配到江防局去十一圩港做税务工作。后来又各政区海沙区收粮工作队。

听说10月1日日军要清乡，于是江防局在9月25日左右撤到苏北。10月20日左右因日军没有出动，便又回到苏南。不到半月，日伪军大批出动到处清乡，我们的联络地点也住下了日军。10月底，我回原地找组织关系。路上遇到陈慕凡同行到上海，转到嘉兴、濮院、乌镇找到浙西特委书记朱辉，汇报了北边情况，因朱辉同志第二天要离开这里，他介绍我到新塍镇东栅小烟纸店找罗希明接组织关系，不到半个月，罗希明离开新塍，我的关系又转给沈如淙同志。

1943年10月初，严墓区政府派伪乡长水学春通知乡下剃头的

都去严墓登记,实际上要组织荆头的做小汉奸。10月7日,水学春第三次叫我去登记。我被扣住,他们说我有二支长枪,一支短枪(后来知道是伪保长张阿五报告的)。3天后水学春把我保出来。张阿五又到算墟庙日本警备队报告,说我有枪。近夜,乡长告诉我说:“今天有两个兵来过,问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告诉他们出去做生意了。他们叫你明天到严墓去。”晚饭后,我向沈如淙作了汇报。他让我到新滕康和桥小学找吴祖思先生,去避一避风头。几天后回家,水学春看到我说:“你胆子太小,那天密探组的二人被我说了一顿。”我说:“这种事很难说,他们这些人不讲理。”

1945年5月,为了接近群众,我到志和乡公所当了3个月乡丁。掌握了本乡百姓情况、群众关系、乡保长情况后,就辞退了这差使。在这期间,我还利用矛盾,通过分队长打了张阿五。

1946年5月,水学春向我透露,上面要征收第3次军公粮。当时水学春与保长、乡长、区长都有矛盾。因他曾被西面队伍捉去过,出掉一批米才回来。这批米他要乡里出,另外两个乡长不同意,他又找区长吴雄,吴当时不理睬,因此水学春要利用这次收粮来出气。我就利用他们的矛盾,借水学春的名义发动群众抗征。我对他们说:“明天晚上,一户一个到沃家桥庙里开会。”这次会议决定到严墓区里找区长,把有关情况反映到区政府。结果区里用“区长今天不来”的办法作了敷衍。从严墓回来后,我通知晚上再开大会,全乡九保,每户一人,只有乡保长家不通知。正在我和水学春点名统计数字时,志和乡乡长刘明宝派人到庙里来了解情况,说这是共产党暴动,并马上到区排部调兵,捉走了23人。那天下午,刘明宝已叫人写了公文,告沈小娜私通新四军,组织共产党暴动,连夜送到区政府。第二天早饭后,我带领群众在沃家桥庙里集中。乡丁“断头领”和生对我说:“不要去严墓了,乡里告了你,公文是我送的。”(我做乡丁时同他关系很好,所以给我透信。)但我们还是去了,并且得了军公粮被迫停止征收的胜利。这次行动,事先没有通知下面的党员,主要是为了防

止过多暴露政治面目,发生事故;也因时间紧迫,没有请示上级,事后向领导汇报经过情况。

1948年5、6月的一天傍晚,在沈如淙家门口,我第一次与金佩扬见面。沈如淙要我第二天一早乘轮船去上海拿枪。在船上看到金佩扬、钱福宝也在。到上海后,金、钱和我,还有一个姓王的,在北站大旅馆二楼开了个房间。金佩扬和王出去,约九点金佩扬回来,要我明天头班火车回嘉兴,然后去新塍通知沈如淙去嘉兴。6月,沈如淙让我去嘉兴拿枪,关照我在城里小桥下茶店里先付钱、后吃茶,等有人给了东西就走。还没出村,就听说三塔有国民党匪军搜查,有钱拿钱,没钱拿东西。我路过三塔没有看到匪军,直往茶馆。不多时,金佩扬来交给我一个方纸包,里面是一身短衫,中间裹两支枪,好象先生从城里洗澡回来。走到建国路南面,碰到两个青年逛街,我跟着他们走,直到西大营门口,我就往西丽桥南,转弯望见三塔,河中一只船上有十几个国民党匪军,沿河路边还有30多个匪军东张西望。我想只能往前走,要胆大心细,就踱着方步,观察他们的动作,顺利地回到目的地,把枪交给沈如淙。

1948年7月1日游击小组在新塍东南面石灰桥边草棚成立,领导人金佩扬、沈如淙。任务是:开展游击战,扩大活动范围,以嘉兴铁路东至乍浦,西到山里,西北到南浔、震泽、太湖等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为了防止暴露身份,战士只叫老大、老二、老三……。后来准备分游击小组,向西发展。金佩扬指示我把严墓西面的旧关系接起来。我便与桃源姚浜戴四娜、北长浜钱永良、青云南李家浜张宝其等人取得联系。结果回队时金佩扬说上面有指示叫游击队疏散,第二天就各走各的。不久,嘉兴县党部要抓沈如淙。沈对我说:“你没有暴露,还要坚持活动。”他要我与塘南米字桥附近的张阿福、濮院豆腐阿二、乌镇张日乾、民合乡钱家埭、沈富荣等人联系,在严墓西面等地开展工作。

约1949年3月,形势好转。那里,区政府人员听说解放军快来

了都想逃跑,思想混乱。敌人内部矛盾日益严重,表面还好,心里恨不得给你一颗子弹。吴雄和水学春矛盾激烈。因水学春被西面队伍扣押拿出几石米,最后是吴雄帮助解决的,这次吴雄以此为“本钱”向水学春借钱未成,两人产生了磨擦。这情况都是听水学春讲的。我和沈四宝、沈阿五决定:利用在敌人内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想法除掉严墓区区长吴雄。就这样,我们通过水的关系,最后干掉了吴雄。

解放前夕,沈如淙留我在部队工作(驻新滕),解放军部队开进新滕后,叫我与解放军联系。因金佩扬在盛泽,我到新滕联系不上。沈如淙又派人到盛泽接上关系,叫我们驻新滕镇。第3天,嘉兴解放,我们开到嘉兴,驻在三塔庙,后驻栅堰桥堍,改编为“吴嘉湖独立大队”。我任7中队长。三天后,部队出发到濮院镇又到王店镇、凤桥等地。不久,又改编为“浙江军区嘉兴独立营”。我任一连连长,副连长沙新民,指导员胡国钧,管理排长陈慕凡。一天沈如淙来信,要我把地下党员名单报县委,我到严墓把名单交盛友鹤送吴江。1949年7、8月,省军区在杭州办参谋训练班,我被抽去学习,同去的还有钱福宝。

(沈英杰同志离休前在青云电灌站工作。)

浙东、浙西之行

金佩扬

1943年8月,上级领导要我们去浙东。我们关掉了芦墟的“汇丰”杂货店,一行五人从宁波进入山区,开始接触到一个新的世界。

浙东是我党敌后根据地之一,南北两侧十多个县总称为四明山区。有以谭启龙为区党委书记、何克希为司令的浙东新四军纵队;有自己的修械所、弹药厂、被服厂、印刷厂、后方医院。但敌人也很多。各县有日军、伪军驻守;四周的忠救军、地方保安队经常来抢粮干扰。所以我们要经常运动,打击敌人的破坏,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

按中共路南特委副书记姜杰的决定,金掌华到政治部政工队当队员,陈企周到区党委党训班学习,我到司令部教导队受训,林大良调浦南工作,陈棣华另行分配工作。区党委负责人还为我们化了名:企周叫张生,我叫金杨,掌华年令小、个子又不高,就叫小鬼。

我一到教导队,大队长蔡群凡、副队长唐炎、中队长徐志达、中队副夏岱等,都非常热情。他们大多是上海一带人,或是在淀山湖地区工作过的,所以我感到很亲切。徐中队长要我到他中队的的一个班里当战士。刚开始,我连一支步枪都背不动;子弹袋束在腰里肚子痛;最怕夜行军,路七高八低,要靠前面战士拉着走,活象个瞎子,但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锻炼,很快就克服了。

我受到教育和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党的理论时事学习。顾德欢是区党委成员兼宣传部长,主持出版丛书、报纸,还帮助我们联系实际学习和掌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星星之火”等理论。我看到工农战士,自己订的不等边的学习本子,非常漂亮;他们的记录,字迹端正清秀,有的还会速写,我十分羡慕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

2. 政治军事民主。凡有战斗情况，何克希司令员报告动员，对为什么要战斗、自卫，如何打法及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都讲得一清二楚，让大家讨论，形成高度统一。10月，我参加在横坎头召开的司令部直属机关党代会。首长提出一个讨论题：英美在什么时候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我在陈教导员小组参加讨论，很有启发。我以“英美对于苏德交战的态度是想坐收渔翁之利！一旦出现明显胜负时，英美为夺取胜利果实而将立即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体会，被推在大会汇报。

3. 有意义的文体活动。除了掷弹、射击、球类比赛外，司令部直属机关和部分主力部队还在10月10日这天晚上，在余姚城东南面大山丛中举行火炬大游行，每人一个火把，形成无数条火龙，漫山遍野，歌声嘹亮，十分壮观，日本鬼子龟缩在城里不敢吭声。

4. 艰难的物质生活。我当班长时，来了位温州同志。一天晚饭后他还忙着挑水、做清洁工作，半夜忽然上吐下泻，驻地离后方医院很远，附近只有医疗小组，没有特效药，天亮就死了。教导队为他开追悼会，队长致了悼词。原来他是温州城里的地下党员，白天住地洞，晚上出来工作，足足有三年，多艰苦啊！一次早上出操跑步，我丢了一只吃饭的塘瓷碗。当时伙房没储备，附近又无老百姓可借。因吃饭有时间规定，同志们争着借碗给我，我坚持等先吃好的同志借碗给我。后来，我在伙房找到一节毛竹筒，用来当碗，口子小，吃时真困难。11月，山区的天气已很冷了，大家还只穿一、二套单军衣。因敌人封锁和经济困难，棉衣只能一小批一小批地发，男同志推给女同志，干部让给战士，党员让给群众，最后先解决伤员，这情景十分动人。我们人多屋子小，睡起来大家挤得紧紧的。天冷又要同稻草打交道，容易生虱子，衬衣要常洗，破得快，补得不能补时，就长裤改短裤、衬衫改背心，最后拉成面条打草鞋。每人每月就发二十双草鞋费，这就是当时的供给制。一次听谭政委讲：主力长征后，他被组织上留在江西大山里打游击，反动派把老百姓迁离山区，实行堡垒政

策,使我们失去群众依靠,有时不仅没有衣穿、没饭吃,而且连水也喝不到,他就吃过自己的小便来解渴。

5. 群众工作。我们这期教导队结束,姜杰来信要我再进一期党训班。我与企周跟负责人谢非到宁波近郊鄞县开展新区群众工作。到那里因不同地方党发生关系,没有任何依靠,要大家做好老百姓工作,求得生根立足。我们在活动中处处注意群众纪律,关系有了好转。一天我们约保长请群众晚上到一个破庙里开个会,讲明来意。晚上到会场一看,来的人不少,还有穿长袍的(是上海亨得利钟表店的店员),他们诚心希望了解党的政策,我们就认真解释什么叫“二五改租”、“三三制政权”、工商业政策及国内、国际形势,一直到深夜,他们听后较满意,还纷纷请我们到家去作客。

下一天,我们同企周到一个保。我到保长家,见他和儿子在忙着打扫屋子,桌上还有麻将牌,我问来了什么人,他说是我们部队让搞的,我说不,我们部队不赌钱。我忙到村口,看到企周已往回走,情知有变,我也赶快往回跑。翻过一个山头,两人碰了头,才知企周因麻痹而走进了敌人步哨线,皮夹子被搜走了,幸而文件未暴露。我们立即报告了自己的部队,带他们去追击,吃掉了敌人一个尾巴。这天晚上,我们住地特别热闹,老百姓赞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好,还送来了咸菜芋头慰劳我们。

6. 浙东刘胡兰。一天上午,我同企周正在一间小屋里印制宣传品,忽然从后窗爬进来一位姑娘,她向我们指指前门,我们从门缝向外一看,大吃一惊,只见十多个鬼子,头戴钢盔,上了刺刀,正坐在地上休息。她迅速帮我们藏好东西,又带我们从后窗跳出,钻进一个小树林,脱了险。她非常机智勇敢,可名也未留就走了。浙东新四军军史上有一段记载: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同志(女)在1944年2月,掩护群众,被国民党浙保二团杀害于樟树,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是浙东著名的刘胡兰式的烈士。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樟村救我们脱离日寇危险的那个同志就是李敏。年底,又一次反顽自卫战要开始了,

因身份暴露，我撤退到余姚县办事处朱之光处。不久接到姜杰来信，要我回吴江。

1945年4月，中共淞沪地委书记陈伟达、专员顾复生和支队长朱亚民三人，当面交给我一个任务，同时给了我一张密写的牛皮纸，要我去浙西找东进的新四军粟裕部队。

因不知道我大军已到什么地方，只能一段路、一段路向西打听，见机行事。我先到南浔，同亲戚谢家春商量。谢就找一个朋友，推说我是黎里开饴糖坊的老板，因一船饴糖装到浙西已有数月，连船带人信息全无，所以出来寻船寻人。托他将我介绍给西面的朋友，好一路寻找。这位朋友就写了信，让我到练市找一染坊老板。这位老板较热情，留宿留饭，还派人到各大酱园打听饴糖船消息，但又担心镇上忠救军查户口，就催我离开。我只好在第二天一早上了去新市的航船。在船上，我担心新市没有熟人不好办，在同身旁乘客闲谈中，得知一乘客也是开糖坊的，并表示愿意接待我和帮助打听消息。一天下来，他说新市没有这只船，又说菱湖是个大镇，酱园较多，船可能在那里。第二天他又介绍我上了他朋友去菱湖的船。路上，我远远看见一个小镇，就问是不是菱湖？ he说是千金镇。快靠近时，我对他说，让我上去看看，我的船会不会在这里。上岸后，正巧看见六、七个士兵在买肉，灰布军装很整洁，态度又和善，短枪都用红绸包着。我来回观察了二趟，吃准了他们是新四军，就上前招呼他们并说要见他们的首长。战士听了后，也不放我走了，带着我下了乡，并一站一站往里送。在一个稻场上我看到六七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也在注视我。走近了，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来干什么？我说从上海来，要找首长。他们把我领进屋并自我介绍，原来他们是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清、三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三纵八支队支队长陈业棠……。我把牛皮纸交给他们，经化验，纸上写的浙东、青东电台联系密码。这样，浙东、浙西和青东的电台都可联系上了。他们高兴得与我紧紧握手，热烈拥抱，我也有说不出的高兴。韩主任让我与他同吃

同住,不要随便外出露面,还要我当向导,东进会师淀山湖,夺取大上海。我看到主力部队战士都很年轻,军容十分整齐,有机枪、大炮等轻重武器,还有高头大马的骑兵,真神气!我随部队从千金到洛舍、菱湖。一天,韩主任对我说,中央决定他们北撤,要我一路小心回青东。

1945年,在日本投降那一天下午,我在昆南华山大队陈振之那里,他告诉我地委来电,要我立即第二次去浙西联系大军,由张泳清陪我从昆南步行到苏州城外张浦过夜。

晚上路不好走,在一条大河的堤岸上,没看见有个缺口,我脚踏空,身体向河里倒,张泳清在身后一把拉住了我,我的一只脚扭伤了。泳清背着我赶到目的地,已是深夜了。第二天,又搭农民的粪船,进了苏州城,再乘车回到黎里家。下一天,就从平望向西进发。在梅堰,遇到一批“忠救军”,向汽车打枪,要我们下车接受检查。结果,我的一只皮夹给搜去,连脚上一双布鞋也给他们穿去了。真是一伙土匪!我只得借钱买了双草鞋,过震泽,到南浔,乘车到湖州。

在湖州,我找到认识的一帮平望牛贩。他们问我这样乱还来干什么?我讲趁乱来好买牛做生意。那时,日寇、和平军死守湖州城,城外已是新四军。可城里没有牛,他们又不敢去。我就找了一个胆子较大的余阿四,为了壮他们的胆便说:“城外牛便宜好买能发财,而且新四军也不管生意人。”于是,我们一早偷偷地叫了一只小船,避开了敌哨,摇到了乡下。上午十时左右,我看到村边有步哨。上去一看,是自己部队。我就对他们说要见首长。他们也把我一站一站往里送,见到了浙西新四军独立支队政委杜大公和吴兴县长郎玉麟,完成了联系任务。几天后,部队奉命北撤,我又一次一人回到青东,向顾复生专员作了汇报。

(金佩扬同志离休前任江苏省丝绸工业公司顾问)

在吴江工作的前后经过

金 亮

我们是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活动，一定要执地好党的白区工作政策。当时毛主席有这样几句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我们在吴江期间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

我接触吴江地下党是1946年12月，在吴江工作共约一年半时间，1948年后与吴江疏远一点，最重要的一段是1947年初到1948年春。

1946年冬，组织上因我不能再回嘉定工作，决定调我到吴江工作，这是淞沪工委书记张凡通知我的。约在1947年1月间，先作了准备。领导上（陈伯亮）在上海中山公园向我介绍了吴江地下党的情况，并介绍我认识了丁铎。不久，我就去黎里看丁铎，由他领我到平望和张振海、顾其行接上关系。张、顾告诉我，已为我安排了一个教师的社会职业，待春节过后，就可去开学。这样，我就于1947年春节过后，带了行李去平望。经顾其行的介绍，认识了顾的未婚妹夫黄家振。由黄陪我到溪西乡顾家扇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我化名刘世和，后因当地还要办一所小学，王克刚派蔡瑛来教书，她改名蔡毓文。后蔡调浦东工作，我就叫盛泽地下党员俞双人来接替。

陈伯亮曾来我住处养过病，王克刚、李华也来我住处研究过工作。

1947年10月间，陈伯亮来通知我，蔡瑛在上海被捕，要我即离开匠人湾。我离开匠人湾后，在苏州、常熟、上海、黎里、盛泽等处流动，仍负责吴江工作。后在1947年11月到1948年春，经凌雪生（凌雨山）介绍，与陆文英（陆琪）二人在严墓摆杂货摊做生意，摊设在严墓南街上一个草棚里。我当时化名刘金生。

我到吴江后,在淞沪工委领导下,建立过青(浦)吴(江)工作委员会。由我和张振海、李华三人组成,我任书记。它的任务是在青浦县西部和吴江县东部的水网地带筹组一支水上武装,建成后可以和青(浦)东观音堂一带的武装联成一气,互相策应,扩大回旋的余地。

当时李华在青浦西乡金泽镇开盐店。我经领导上介绍,于1947年4、5月间到金泽他的盐店里去与他联系。后来他与王克刚几次到平望或匠人湾来,同我一起研究搞武装的问题。1947年12月,李华被捕,放他出来后,领导上决定把李华送到浦东游击队去。王克刚把这个送李华的任务,要我叫陆文英去完成。陆按照指示的办法,把李华送到了浦东,交给了交通员带去。

1948年初,我曾通过陆文英的关系,对黎里乡下的土匪胡伯龙做过工作,陈伯亮、王克刚和我、陆文英在上海约胡谈过一次,但因胡顽固不化而未成。

经过一年的工作,终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这支水上武装未能建成。于是,领导上别作打算,想在江浙交界的吴江与嘉兴两县的新塍和盛泽附近农村大谢乡筹组一支小武装。这就是建立吴嘉工委的原因。

1948年春,王克刚,陈伯亮代表上级党组织通知金佩扬、沈如淙和我三人(连同他们共五人),在上海某旅馆开会,这个旅馆的房间是由沈如淙去定的,他当时有合法身份,我们四人都没有合法身份。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决定成立吴(江)嘉(兴)工作委员会。由金佩扬、沈如淙和我三人组成,金佩扬任书记。

二、在吴江和嘉兴边界地区,即新塍与盛泽附近农村中筹组一支小武装。

三、讨论到武器的来源问题,原则上要从敌人手里去缴获,但是要缴敌人的枪,自己最好先要有一两支枪。于是王克刚提出,从浦东武装部队中去运几枝短枪来,这个运枪的任务交给我负责。

四、佩扬、如淙和我三人约定了以后碰头的办法。具体情形已记不清,总的印象是在嘉兴的茶馆店里(如近水台和望湖楼等处)或火车站,作为茶客或候车的旅客,以掩蔽敌人的耳目。

这次会议之后,在上级领导(一位叫“老方”的)具体指导下,我们积极设计运枪的方法。后来,我与陆文英从浦东游击队那里运过一次枪,有两三支短枪(手枪、驳壳枪)。我从上海带到嘉兴,交给沈如淙。到1949年吴江、嘉兴解放前夕,在金佩扬、沈如淙(我已调到杭州)的领导下,吴嘉工委为迎接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我在吴江工作期间的上级领导人是淞沪工委的王克刚和陈伯亮,王克刚先,陈伯亮后,中间有两个老方,与我联系过几次。其中一个老方,解放后我碰到过,叫方晓,现在北京工作。另一位一直不知他的姓名和下落。现在晓得叫方休,那时是中共淞沪杭嘉湖工委的书记。

我初到吴江时党员约有二三十人。大多是店员,分布在黎里、平望、盛泽等镇上。那时没有支部、小组等有形的组织形式,一般都是单线联系。后经俞双人、吴关龙、平静人、张振海等在盛泽、黎里、平望等地努力发展,党员就增多起来。

当时吸收新党员的工作,一般是这样的:先由介绍人对发展对象作较长时间的观察了解,政治上是否可靠,再作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以了解他有否入党要求。如他表明要求入党,然后正式和他谈,介绍他入党。同时向联系人报告,经过上级批准,才算是个党员。一般无预备期。当时入党手续是简化的,一般是不写自传和入党志愿书等书面材料,也无宣誓等仪式。新党员入党后,仍有介绍人单线联系,一起过组织生活。我向上级汇报发展新党员的入党问题,一般都是批准的,我自己只做过俞永泉的发展工作,因为当时想在盛泽丝织工人中开展工作,而他是一个失业的丝织工人,是俞双人的哥哥,经俞双人介绍后,我与他一起做了工作。

另外,我觉得吴江党的发展,与“翳桑社”有很大关系,它是有功

绩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吴江党究竟有哪些成绩?我概括为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武装。从盛泽乡下的大谢到嘉兴乡下的新塍,建立了一支小武装,成为吴嘉工委的核心力量,这是一个成绩。

第二、发展了组织。为党积蓄了力量,输送了干部,如俞双人、吴关龙、张振海、张鹤鸣、平静人等。这对迎接解放和政权建设,都有贡献。

还有统战工作,也是壮大党的力量。如黄家振,他晓得我们办学校是假的,我们是共产党,他已看出了,非但不暴露,还帮助我们安排社会职业掩护。

第三、向浦东游击队输送了一些人力。介绍去的有陆琪、许铭、丁铎、俞双人、颜金清等。

第四、做了些宣传工作。如“土地法大纲”,抄在极薄极薄的一小卷纸上,陈伯亮将其带给我,我放在牙膏里带到黎里,然后传开去。这文件我记得给张鹤鸣看过。其它还有一些文件和重要文章也是这样。

第五、掩护了同志。如在匠人湾、陈家湾,我们接待过党的领导同志吴建功、陈伯亮、黄兢之等。这些同志都“红”了,别的地方不能去。还有王克刚,1948年春曾来盛泽西白漾开柴行,我派张玉良、凌雪生去协助他,做他的助手。

大体上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肯定我们的成绩。我在吴江工作一年半时间,除李华、蔡瑛在上海被捕外,我们这个系统里的地下党员,我没有听到过发生被捕等事情。我于1948年8月,离开吴江去桐乡。我走后,吴江工作由领导上交给金佩扬负责的。

(金亮同志离休前系杭州教育学院院长)

我为开展武装斗争来吴江

秦克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党为了争取国共和谈，实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动让出江南八省，命令江南的部队和已公开身份的同志都撤到江北。但在上海外县还留下一部分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有组织、有领导地隐蔽下来。中共淞沪工委领导着外县地下的工作。1946年6月24日，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为了挽救败局，发动全面内战，集中兵力大肆向长江以北进攻。同时，在后方实行苛捐杂税，强抽壮丁，到处欺压人民。浦东人民同全国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掀起“反抽丁、反征粮、反征税”斗争的高潮。在“反三征”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群众迫切要求共产党组织一支人民武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我党根据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和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1946年10月前后，浦东塘东区与东南区建立小型武装工作队。同年年底，中共淞沪工委的领导张凡、陈伯亮等同志，先后来到浦东建立一支武装部队，即“护丁总队”。群众普遍反映，共产党“五支队”又回来了！群众积极分子迫切要求参加自己的部队，经过四、五个月的发展，护丁总队已发展到一百余人的武装力量。敌人集中大批兵力，要在浦东进行一次清乡、大扫荡。为了保持我党的有生力量，决定将部队由张凡同志带领，向浙东挺进，在浙东建立根据地。同时抽出一部分同志兵分两路，一路有杜林带领留在浦东，继续开展小型武装活动，一路有陆文杰带领，奔向浦西地区发展武装活动。

1947年5月中旬，我奉组织之命，奔向青浦。陆文杰先分配我在青东工作。我在青东一个月左右，领导上又通知我去部队。说有别的任务。我们组织性很强，不论什么任务，只要领导上说了，就服

从命令听指挥,决不讨价还价。我到部队后,政委王克刚告诉我,说有别的任务,明天会有人对我讲的。第二天上午,有一位从上海来的,王政委作了介绍,要我跟他去工作,别的不讲什么。下午我就随他去上海,一路上边走边讲,相互介绍,我才知道他叫李华。李向我谈了工作去向,知道自己不再回青东工作了。因此,我把离开的那天日子,牢牢地记在脑海中,那天是1947年6月22日。那时,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牺牲自己的一切。家庭的困难,是一件小事,我家里只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家里贫困,有当地支部的党员照顾我母亲。我在敌人刑罚下都没有屈服,难道为家庭的小事就后退吗?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就在这样的处境下出来工作。那天晚上我们到上海,约定了晚上11时去外白渡桥东边乘轮船。我到上海老西门姐夫的木匠工场,不多一回,来了一位蔡同志找我(当时在秘密情况下,对领导上是不问名字的),他要我一起出去走马路,在路上他布置了我去吴江的三项任务:第一,了解那里的敌人分布、人员、武器装备的情况;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发展新党员;第三,做好群众工作,开辟新地区,积极准备组织武装活动,向太湖地区发展,使苏嘉区同青浦打成一片。他说,任务是重的,要慢慢来,不能急,今后有条件,还可派人来一起工作。我们两人在西藏路分开,我还在马路上兜了一圈。10点,李华来了,两人慢慢地走到外白渡桥,我们上了船,船上的人很多。在开船前,敌人上船检查,看有否身份证,带的东西也搜查过。轮船开到下半夜,在金泽镇停下来,敌人又上船搜查。23日上午8点左右,轮船到了黎里,岸上两侧站满了警察和自卫队,对上岸旅客,检查身份证,每人身上都要摸过。我们上岸后,从街上向东走去。李华在茶馆前面一条河里喊了只小船,我们二人坐了小船,到四周是水的沈家港珍字埂上岸,这就是党员潘留生住的水桥头。潘留生的母亲拿出一盆堆得满满的咸菜,一碗红茶。老妈妈问我姓什么,我当时已化名叫康云,他们就叫我康先生。晚上我同李华睡在一起,当夜我们三人开了一个

会，潘留生介绍了情况，李华谈了今后工作的意见，会议开到12点。第二天早上，李华吃过早饭，回上海去了。我就一人留下了解熟悉情况。过了三天后，我同潘留生商量，召开一个支部会议，该支部的四个党员，潘留生是支部书记，党员有周寿林、周王金、周世林。三位同志住在一个宅子里，只是周世林离珍字埂西北有二三里路。第一次支部会因周王金去黎里，就是我和潘留生、周寿林、周世林四人在周寿林家中开的。会议内容三条：（1）把我来的目的与任务告诉大家，是要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活动。（2）了解乡政府与自卫队的装备情况。（3）了解群众的思想，对开展武装活动的看法。会上，同志们认为国民党比日本鬼子还难弄，地方上地痞流氓多，活动比较困难。我说困难是有的，但只要我们接近群众，在群众中打下基础，困难是能克服的。我还布置了任务，让大家深入接近群众和了解敌情。当时，我的身份是公开的，是共产党派到该地区工作的。我在珍字埂首先熟悉了一批人。该地方湖荡围绕，进出要用船。我为熟悉环境，让小妹潘新宝用小船送我出去与周世林取得联系。有时看到周寿林去北厍、黎里等地，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了解情况。晚上，我和潘留生家附近的群众一起乘凉，就启发他们的觉悟，宣传革命的道理，这样群众很快同我接近了。周寿林还陪我到黎里东面徐福有那里去开展活动。

到8月上旬，我通过一个月左右的工作，熟悉了不少群众，也摸清了很多情况，说明我在那边能生存下去。为此，我决定去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一次情况。我到上海后，联络地点是在河南路浜路口，有一个旧货摊，那摊头上的人叫金和尚。联络暗号是：“我托你买的衣服，是否买到了？”对号是：“大人的还是小人的？”答号是：“是大人。”他笑笑拿出一件衣服来，叫我穿穿看是否合身。此时，他才偷偷地对我讲：“下午1点钟，在八仙桥西面水果店门口等。”下午我在八仙桥找到了小金，他又名“小宁波”。他领我到外滩公园碰头了那位姓蔡的同志，我向他汇报了吴江的情况。他接着布置我一个任务，

要我去平望镇上找一位卖馄饨的同志,以了解太湖地区的情况。他交代我在平望的联络暗号是:“我从上海来,买碗小包馄饨,我是来望望舅舅的,还要找一个表兄。”对号是:“你是做啥的?”我说:“是在跑单帮。”对方说,“姑娘是否好?”答号是:“身体很好”还说那位同志家住平望镇上东西向的一座石桥的北面,在茶馆店附近,桥西有烟纸店,桥东有点心店。

蔡同志并且要我在珍字埂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目的要向苏嘉路西面和太湖地区发展工作。并嘱我去平望后把联系了解的情况,在下旬再到上海作一次汇报。

这样,我就火速返回珍字埂,立即同潘留生商量,研究了去平望的路线。想让潘新宝送,她说也没有去过平望,就叫她送过沈家港桥南,我就一个人去徐福有家中。再让徐福有送我到黎里西面离平望镇二三里路的地方,让徐回家,我一人去平望镇上。我向南走到小石桥附近,先到烟纸店问讯,他们说这几天没有看见那个卖小馄饨的,店里的人还以为我要吃馄饨呢!我说不是,我是要找一个朋友。他们都说不看见,他住在什么地方,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平望镇的街上来回找了三四次,还是问不到这个人。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只能返回珍字埂。

在珍字埂,我经常找一些同志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准备及时把积极分子发展入党。我找了潘连生、潘新宝、潘金芳、费记生等谈话,不久先后发展了他们入党。

隔了一星期后,我又第二次去平望镇,设法找那位卖小馄饨的联络员,但是依然没有找到。8月下旬,我就去了上海,找到李华,汇报了情况。李决定,我与他连夜返回珍字埂。晚上在外白渡桥上船,李华手里拿了一包书,他告诉我内有两支短枪。外边再用报纸包上。我们一上船,就把这包东西放在仓内顶头的架子上,我们二人坐在里边靠机房的地方。不多一会,有位妇女抱了一个小孩,手拎一大包裹,她把包裹也放在上面架子上,把我们的东西压在下面。轮船开

前，敌人上船搜查，把妇女的包裹还打开看了一下，每个旅客的身份证也都查了一下。敌人走后，轮船就开了。半夜以后，轮船开到淀山湖畔的金泽镇，有客人上下船，敌人又上船搜查一次，船再开。早上8点左右，轮船开到黎里，码头上站着警察和自卫队10多人，凡上岸的人和东西都搜查过。我先上岸，敌人检查后向东慢慢晃去。李华在后面，隔开我六七个人后上岸。他上岸时，左手拿着一包书，右手拿着身份证。走到敌人面前，他双手一举，敌人在他身上一摸，又把身份证看了一下，放行了。好险！总算没事，他也向东来了。我们走到东市梢茶馆里，坐了一会，观察了一下，接着去喊了一只小船。我们乘小船到珍字埂，那夜李华也住潘留生家中。晚上三人开会，潘留生把原来放在家中的一支三号盒枪拿出来，我们把三支短枪都擦了一遍。李华要我积极筹备小武装活动，他准备去青浦再要一个人来同我一起工作。并约定与他9月下旬在上海碰头。

我在北厍搞武装活动过程中，有周寿林提议，让朱坤余、潘金芳出面搞武装，集中了10多人，我们决定去缴一个乡的自卫队武装，活动经费，发通知请乡公所帮助解决。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还不大，准备再开辟新地区。

9月下旬，我去上海找到了李华，他叫我去青浦领一个人。我就到青东火烧庙联络站，找到了部队，王克刚政委（中共淞沪工委副书记）也在，我把吴江的工作汇报了一下。王政委说，你要武装同志暂时没有，部队一时也抽不出人员，只有一个新来的张××，给你吧！他原先在国民党张文奎部队里，熟悉武器，打仗很勇敢，张在抗日期间，在淀山湖打过游击。这样我就把张××领到吴江珍字埂，他化名叫王火青，简称“小王”。他到吴江后，工作同我一起搞，很积极，胆子也大。我们的工作从黎里东一直到北厍镇，基本群众发展到五六十人。准备出来一起搞武装斗争的人有20余人。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把徐金娜、潘金荣、沈毓麟、潘玉生等同志介绍入党。小王在徐福有那边商量，认为东乡自卫队的武器可以去缴，当时我没有同意。因

为我觉得如果先去缴枪,形势一定要紧张,我们就无法活动,“兔子不能吃窝边草”。与此同时,我们还研究了如何开展经济工作。当时小王曾提出了过份的要求,因为他有一个祖母,要靠他生活。我对他做了不少工作,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一直有疙瘩。后来,我同周寿林、潘留生一起开了一个会,大家认为小王参加我们部队,不能多考虑个人的生活,为防止影响情绪而出事,经研究决定把他送回青浦。当时我的一张身份证洗衣洗掉了,不能用了。同朱坤余商量后,向徐福有借了张身份证,贴上我的照片,用铜板敲成硬印。

我在11月中旬把小王送回青浦去,从黎里乘轮船到金泽上岸,再乘汽车到十七号桥下车,向北走到观音堂镇。碰到一位认识的群众,他告诉我们这里形势很紧张,北面还有敌人。因此我们商量后,小王向西走,是一条小路;我同那位群众向东南小路走,他送我到汽车站。我到上海老地方住宿,还到老地方去联系,找到“小宁波”小金,他告诉我,陈伯亮(中共淞沪工委委员)在上海,并约我下午三点钟到哈同公园门口会见。我按时到达,不多一回,陈伯亮也来了,我们二人在马路边上边走边谈。首先我汇报一下情况,陈伯亮告诉我青浦情况很紧张,嘉兴的小武装也出了事,要我暂停搞武装活动,并在吴江做好群众工作,做好党的发展巩固工作。他要我再到平望去一下,设法找到那位联络员,叫他送我到苏嘉路西去工作。并说以后需要搞武装活动时,会来通知我的。他还给了我10元生活费。

我按照领导的指示,火速返回吴江。我先到徐福有家中过夜,此时期徐已被发展入党,我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接着又到平望去找了一趟,但还是没有能找到那个卖馄饨的联络员。我回到珍字埂,叫潘留生、周世林两人来开会,传达了上级指示,研究工作。会上决定让朱坤余打入到黎里自卫队去,以了解情况和控制武器,周寿林还介绍朱坤余入了党。后来潘留生告诉我,李其生已知道我的情况,要我直接找他谈一下。我同老潘一起去,结果他表示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后来是否发展了李其生入党,这要问老潘,因为我已忘了。

同时周寿林又发展了几位同志入党。我还在珍字埂做了一些党的发展工作,前后发展新党员有10余名。我在吴江县珍字埂也听到了我们的部队在青浦敌人扫荡中牺牲了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消息,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受到一些影响。我为了能搞清实际情况及平望联系的事,决定再去上海一次。我与老潘研究,决定先把三支短枪藏起来,用油擦好后,两人在晚上把武装藏到老潘家东南角坟山屋里。

我于1948年5月6日去上海找党组织,在上海找到了王克刚政委,他约我下午5点到泥城桥点心店碰头。我同小金(小宁波)到泥城点心店吃面时,王克刚与李华也进店吃面了。此时,外面又进来了四个人,坐在门口桌子上。王克刚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盯梢,面也没有吃,就离开该店。我同小金也立即离开,李华在该店不动,照常吃面,我后来才知道李华是刚出狱。我们走在马路上,王克刚又约我明天下午三点半在嘉兴火车站西南茶馆楼下碰头。我第二天上午在上海西站上火车,到嘉兴只有一点钟。到三点多去茶楼等候,一直等到五点钟,不见人来。我对嘉兴情况不熟悉,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就离开嘉兴回上海。在上海又找不到小金,我就返回浦东去找领导。在浦东东南区找到了沈肖方(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在汇报情况后,组织上希望把我留在浦东。5月16日,王克刚也来浦东了,决定我留在浦东东南区工作。为此,我离开了吴江珍字埂,当时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对吴江的工作,匆忙之中没有向珍字埂党支部作移交。

现在我了解到,那位蔡志论,又名蔡辉、蔡悲鸿,当时是在上海静安寺亚细亚食品店联络站。就是平望那位卖小馄饨的同志,至今仍下落不明。

(秦克强同志离休前系上海市南汇县供销社副主任)

当年曾有那么一个隐蔽点

俞双人 陈乃元

在吴江县平望镇的西北角,离镇十二月华里的地方,坐落着三个小村,一个顾家扇,一个陈家湾,中间隔着一个匠人湾,这是连贯在一起的自然村庄。解放前,这里有二百多户农民,以耕地、养蚕为业,属平望区的溪西乡与溪港、横扇、梅堰三乡的交界地。它北临太湖,河网纵横交错,桑树遍地林立,没有一家小店和学校。它对外闭塞,农民偶尔摇船上街做些卖买,是一个陌生人不易来到且又十分僻静的地方。1947年初,中共吴江地下党组织在这个地方,建立隐蔽点,办起了两所小学,抽调党员担任教师。在解放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以教书作掩护,进行党的地下活动,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现在那个角落几乎被遗忘了,对当时的情况,我们只能忆及点滴,以供参考。

(一)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在它盘踞的中心京沪杭一带,一方面强制推行保甲制度,联保切结,常清查户口。另一方面在各地轮埠、车站、交通要道设卡稽查来往旅商,窥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再是在其统治区内的情报站、谍报组等各种特务组织结网,暗探密布,特别横行,妄图用高压手段来对付我们党在白区内的革命活动。对待敌人如稍有麻痹大意,就有“失踪”、追捕的危险,乃至危害组织和个人。所以党的地下工作者必须严守秘密工作纪律,开展活动首要的是有个立足点,让敌人无可捉摸。我们就可利用敌之薄弱环节,发展地下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的新四军奉命全部北撤,上级党指示江南党组织要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地下党淞沪工委对所属组织,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从组织上作了调整。我

县地下党领导金佩扬因工作需要，调去浦南工作。1946年春，中共淞沪工委派来沈小芳（肖方）负责领导工作，沈化名陆依萍，与地下党员丁铎在黎里镇东桥堍开设文具书报店为掩护。由于肖方是浦东人，口音是外路，不久就引起国民党黎里区分部书记钱大雄的注意，钱经常去书报店翻书，查问怀疑，他扬言陆依萍的姓名是假的。由于沈来黎里是连一样介绍来的，连是黎里人，他了解钱的身份，警觉了敌人的言行。即向中共淞沪工委领导作了汇报，陈伯亮决定沈和连不宜在黎里活动，即于1946年夏天撤离了吴江地区。陈伯亮就亲自来吴江领导工作，先是以开航船为名立足了一段时间，后住平望地下党员顾其行家中，化名胡萍，经常来来去去。为了不使陈露面太多而暴露，中共淞沪工委又决定派位负责人来吴江领导工作，但须记取黎里开店方式不妥的教训。要为“上级来人”先找好立足，使其有正确的社会“职业”，陈伯亮亲自布置顾其行去完成这一任务。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他出生在平望，长期埋伏在商会，主要工作是搞掩护活动。1946年他特地在平望找了三个职业，除在商会作职员外，又打入镇公所当办事员，还在平望电厂当抄表员。他利用职业之便，摸清了平望镇上住户的各种情况，人头相当熟悉。对平望镇上的多种消息灵通，能及时洞察敌人的活动。他为了能够更好地掩护“上级来人”联系，将蠡斯港的房屋另行出租，特地搬往司前街轮埠楼上寄住，以便招待来人住宿。他同时以丈人的名义在干家弄“达顺酱园”内合伙摆一个饭菜摊，以吃饭为名作接头处。其行的爱人和小姨就担任一些联络任务。顾其行搞掩护工作很出色、很能干，在他接受上级党的“找社会职业”的任务后，不到一个月就顺利解决了。他通过自己妹夫黄家振在溪西乡顾家扇办了所农村小学，安插自己同志任教，建立隐蔽点。黄家振是平望溪西乡人，在平望镇从事小教工作，经常与其行接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黄欣然接受代找“职业”的任务后，就积极出面，疏通了溪西乡乡长，并且以乡国民代表主席身份召开代表大会，以本乡无学校为由，急需办农村小学；议

定每保每学期出二担米,筹集学校经费,购做课桌凳。以三家扇的三家村租用的民房为校址,聘请教师,并以匠人湾刘王庙为教师宿舍,雇看庙老太帮助“先生”烧饭。这为当地群众解决了子弟就学难的事情,群众高兴、拥护。所以不到半个月时间,靠了当地群众的热心支持,办学工作一一妥善地解决了。在1947年春节后不久,中共淞沪工委派来了金亮同志,化名刘世和,来到顾其行处,由顾介绍给黄家振。两天后,黄雇了一只小船,亲自陪同,名义是送上海光华大学的老同学、好朋友去顾家扇小学任教。黄除了安排好“刘先生”的膳宿事宜外,还向当地人士介绍熟悉。不久学校上课了,学生有五十人左右,一只教室共四个年级,复式上课。由于“刘先生”本来是教育内行,对农村熟悉,对教育业务熟悉,学校办得有头有绪。当地群众对学校感到满意,反映黄先生请来的“刘先生”是正规先生,学堂一办就像样。乡长看到顾家扇小学办得快又办得好,即主动要求黄家振在陈家湾再办一所。经过金亮研究,由黄家振出面,在陈家湾猛将庙很快又办起一所农村小学,也有五十多个学生,也是四年级复式单级教学。经请示中共淞沪工委书记王克刚,派来了蔡瑛(化名为蔡毓英)任教。蔡在猛将庙任教两月余,即由组织上调去浦东任交通工作。金亮又指调俞双人(化名俞国钊)接替蔡瑛去任教。1947年9月,俞调平西乡公所任事务员,淞沪工委又派黄竞之(化名黄文英)代替俞去任教。金亮来吴江后,以两所小学为隐蔽点,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联系党员,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地下工作又有了新的起点。

(二)

金亮于1947年初来吴江,他的身份是特派员。1947年春夏之间,建立了中共青吴工委(即青浦、吴江地下党工作委员会),金亮任书记,李华、张振海为委员。匠人湾的刘王庙就成为领导机关所在地,陈伯亮先为中共淞沪工委委员,后为浦西特派员,经常代表上级党组织向金亮传达指示,陈和金二人多次在刘王庙深夜研究工作,学

习文件。1947年夏天,陈伯亮因病还曾在刘王庙养病二个多月。同期,吴建功奉命从苏北返回江南,待去浦东任江南人民反征总队司令而在此埋伏,吴建功化名吕彬生,以俞双人的表叔之名同住陈家湾朱金宝家中,约有20多天。夜晚时,陈伯亮来到陈家湾与吴建功会见,单独秘密商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有一次,王克刚特来匠人湾刘王庙,召集陈伯亮、金亮、李华(张振海因故未到),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开了一夜的会议,讨论青吴工委在青浦西面、吴江东面的水网地区筹建一支水上武装问题。这个隐蔽点,之所以能太平安全,没有引起当地怀疑,就是因为这些埋伏同志都能按照党的指示在那里做到完全象个“教书先生”,勤恳地工作,教学不马虎。他们在当地群众中不搞地下活动,不宣传,不发展党的组织。利用早晨或放学时间,与当地群众搞得很热络,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认为这些“先生”一见就熟,无架子,肯吃苦又规矩。如缺少生活用具床板、凳子、桌子等,当地群众热心主动借给,吃的蔬菜也是热情送上门。我们的同志就帮他们写信、写对联,和群众相处得很好,这就使自己有个更合法的掩护。匠人湾住址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凡是来匠人湾的同志,都要经过金亮的同意才可领进来。“上级来人”,必须先到顾其行处联系,经顾向金亮报信后,才由金到平望领着去匠人湾。对吴江的其他党员同志一律不引入,联系研究工作都在外面进行,联络点是平望镇上西塘街莺湖楼茶楼上。约期碰头,规定在吃茶时用茶壶对准台角就接头,如茶壶咀对准自己胸脯就不接。其次是在平望去盛泽、黎里两条公路上约时碰见,用这样的方法传达贯彻上级党的指示,研究地下工作的活动。如当时布置学习的党内文件有:《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件》、《三个月的总结》、《论联合政府》、《灯塔丛书》等,都是经过伪装后在外地交换传阅的。所以吴江地下党的同志就完全不知“老刘”的真名叫金亮,知道住址的不知他的真名与身份,知其身份却不知他的住址,工作做得十分保密。即使在1947年9月发生党员蔡瑛的上海被捕事件,涉及到匠人

湾,也没有出过“毛病”。蔡瑛任浦东交通工作时,由于她在上海的住址被人泄露,在沪突然被捕。上海《大公报》登载了这段消息,组织上当时一时弄不清被捕原因,又恐牵连到匠人湾。为不受意外损失,陈伯亮从上海赶来匠人湾,通知金亮和黄竞之立即撤离。这时两所小学刚刚开学,时间紧迫,来不及安排停课和请假,就悄悄地离开了匠人湾。因为学校停课,一男一女教师突然不知去向,这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当作一件新闻传开了。群众议论纷纷,但众议亦不了了之,没人追究此事。蔡瑛被捕后,由于敌人得不到任何证据,经组织上营救出狱,完全无事。但金亮和黄竞之组织上决定不能再返原地,改派其他同志去继续任教,坚持这一隐蔽点。

(三)

黄竞之离开匠人湾即调去浦东工作,金亮转移到严墓,与陆文英摆一个百货摊作为立足点,继续领导吴江地下工作。原来的两所小学,一所由黄家振另聘陈乃元代课,另一所等待地下党组织派人去任教,10月,金亮又调俞双人去工作。俞去陈家湾教书,与陈乃元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了解陈乃元是进步青年,迫切寻找党,有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后来发展了陈入党。11月,俞又被组织上调去浦东武装部队工作,金亮就另派凌行可去代替任教。当时陈乃元的主要工作是去溪港自卫队搞策反,凌行可的主要工作是去黎里自卫队搞策反。陈和凌两人在匠人湾与当地群众关系搞得很好。隐蔽点的工作也搞得很好。1948年9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指派陆文杰来吴江,化名李一才(李曾任青浦工委书记、浦西特派员和江南人民反征总队第一大队长)。李来吴江一是打埋伏,二是准备来搞武装工作。由陈伯亮交待后,由俞双人与陈乃元安排陆在匠人湾作代课教师。陆在那里和陈乃元、凌行可还有一个农民党员朱金官成立了党支部,陆为书记。1949年2月,陆又由组织上调去杭州工作,凌行可调回黎里。中共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指调张玉良去陈家湾任教,他们的

主要任务是在外搞武装策反工作，回到匠人湾隐蔽。1949年3月，张伟道调盛泽镇去工作，陈乃元、张玉良由金佩扬通知下太湖，参加赵安民的武装部队，在金佩扬的身边工作，一起解放吴江城，这个隐蔽点的历史使命才始告结束。现在回想起来，顾家扇、陈家湾、匠人湾及两所小学的所在地，两年多时间里，自始至终做好隐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从外地去的地下党同志，有地委书记、有地委委员、有特派员、有县工委书记、有地下武装的游击总队司令、大队长，也有一般地下党员，去过那里的党员有13人之多。而当地群众却一无所知，即使吴江地下党同志也大部分不知道平望还有那么一个隐蔽点！这个隐蔽点实际上成了一段时间点线工作的中心基点，作用是不小的。

（俞双人同志离休前系常熟市总工会副主席，陈乃元同志离休前系震泽外贸站党支部书记）

党的地下印刷厂和秘密联络点

平静人

党的地下印刷厂

中共黎里支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极严的情况下,自1947年冬到1949年5月止,办了一个地下印刷厂,并设有分厂。油印出版了大量的党内文件,发给本地区和其它地区党内学习之用。现据我记忆所及,写述下来,作为史料的星星点点吧。

党内学习的需要

解放前,党的工作和学习都是秘密进行的。党支部在组织地下工作同志学习时,由于缺乏党内文件,困难不小。

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联系工作时,带来一些文件。由于携带的困难,每种只有一本,转辗传阅费时多,读到的人少。针对学习材料稀少僧多的情况,在1947年冬,我们大胆设想,自己翻印文件,以解决这一矛盾。经研究,支部书记吴关龙完全赞成,当时上海党领导刘世和(现名金亮)亦同意,于是就办起地下印刷厂来了。

自己办“陋厂”

所谓印刷厂,是从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供应来讲,象个小的厂子。由这个小厂生产一些精神产品,来供给党内消费者的学习需要而已。它不是真正有个厂子,从场所、工人、设备来看,一点也没有工厂的样子。

干党的地下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上的一切活动经费,完全要靠党员自己去设法解决。据我所知,我在黎里地下工作期间,上级党是没有给过支部分文经费的。所以印刷厂的开办及投入生产所需的一切费用,就要参与工作的同志设法解决。因此,我们只能本着因陋

就简的原则搞起来。

首先要有车间，就把卧房当作车间。住宿和工作都在一间房里，很方便。刻写腊纸、印刷、装订都在晚上秘密进行，常搞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接近黎明才歇手。完成任务了，就倒在床上睡觉，不用拖着疲倦的身躯走到外面去。由于卧房是在房子的后进，又比较僻静，来人不便，对保密有利。1947年冬开始，印文件都在黎里镇道南桥协源米行后进仓库楼上我的卧室里搞的。协源行房子共三进，第一进是单间沿街的店面楼房，第二进是双间平房仓库，第三进是两间正屋带一间厢屋的楼房，楼下为仓库，楼上外房是空的，内房是我的卧室。与我有组织关系的同志，如吴关龙、张鹤鸣、平流芳、周双喜等同志，都曾到我房里来谈过工作。上级党领导刘世和同志，曾在我处住宿过几次，我俩常共榻谈论到深宵。这些活动，都没有被人发觉过。我住的西邻是画铅照的郑家，一到晚上，他家楼上常有客人来，搓麻将“辟辟啪啪”的打牌声和说笑声异常热闹。在同一时间里，我们正好紧张地从事秘密的油印工作。1949年初，由于我的工作忙不过来，就把油印文件的工作转移到黎里镇东栅八角亭旁的“乾丰米行”平证明那里，设了个“分厂”，由他负责油印工作。平证明在乾丰行里担任司帐，住宿在行里，他的卧房是一小间平屋，也是一个人住。这房间是米行的后进，靠隔壁地藏殿的放生池边，与米糠仓库连在一起，有后门通往地藏殿。前面与行的门面有门可关断，因此比较隐蔽、安全。一旦发生了事情，亦有退路。

其次是工人，由党员自己动手。印刷厂共有四人参加。我和平证明，都是新文艺作品的业余爱好者，曾在1944年夏，效学文艺刊物《浅作》那样，会同几个学习文艺写作的亲友，刊印了一份名为《野草》的油印文艺册子，出了一辑就因故停止了。为了出《野草》，我们就买起钢板、铁笔，学刻腊纸。我也曾代“翳桑社”的《浅作》月刊，刻写过部分腊纸，因此这方面稍有点基础。党内文件的翻印，就由我与证明分担刻写腊纸的工作。我写的是长仿宋体，平证明写的是正体。

但为了紧缩刻写时间,也常杜造一些易于识辩的简体字,如“革命”写成“廿叩”,国家的“国”只写一个方框“口”,“党”写成“T”……等等,有些党内同志称这为“解放字”。乾丰行的职工平元增和汝贤浩,帮助做油印、装订等工作。协源仓楼上,是我和平证明二人干的;乾丰池舍是平证明和平元增、汝贤浩三人一起搞的。

再是印刷工具。钢板、铁笔、订书机和部分誊写腊纸,是办《野草》时余留下来的,不用钱买。印刷不用油印机,只买把刷帚。把油墨涂在一块旧玻璃上,用刷帚来刷印。纸张大部分是利用乾丰行的旧空白帐簿纸,其中有的是印有红格或蓝格的“荆川纸”,有的是略带黄色的“元书纸”。后来,旧空白帐簿纸用完了,就购买白报纸来印。所有购买油墨、腊纸、白纸、书钉等费用支出,全部由我和平证明二人包下来。不向组织上伸手要钱,也不在其他同志中筹款。

总之,地下印刷厂的条件虽然很差,但参与工作的同志以满腔革命热情,开“常夜班”,以夜当日,不顾危险,不计得失,认真紧张地劳动,及时把“产品”生产出来,供给党内学习需要。

品种、产品和去向

从1947年冬到黎里解放的一年多时间里,地下印刷厂翻印了十多种党内文件,每种四五十份,有的不够了再版刻印。油印成的文件,一律装订成32开本的册子。现在尚可记忆起来的,有如下几种: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现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装订成上下册;

《中国土地法大纲》,刻印二次;

《中国共产党党章》,刻印二次;

《三个月的总结》(1946年10月1日,现刊《毛选》第四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年10月10日,现刊《毛选》第四卷),刻印二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现刊《毛选》第

四卷)；

《双十宣言——新华社社论》；

《华东解放战场上的形势分析》；

《中国解放军布告》(通称“入城布告”，1949年4月25日，现刊《毛选》第四卷)。

当时油印的文件，一部分是给黎里本地区同志传阅的，相当一部分是支援外地的，由上级党来联系的同志取去，供给芦墟、平望、盛泽、嘉兴等地区党内同志阅读的。

保藏和传递

地下印刷厂生产的文件数量较多，保藏是个很困难的问题，要求既安全、又不使文件受潮或被鼠虫咬蛀。开始都放在我的卧室(协源仓楼)的房顶里，即正间和厢楼交界的“龙阁”处。因这地方有两层椽子，慢砖与盖瓦之间有相当的空隙处，只要把慢砖移开二块，就可把成包的文件放进去，再把慢砖铺好，在楼室走动的人是不易察觉的。但也遇过一场虚惊。大约在1948年的上半年吧，那时我还在西北栅城隍庙滩下“和丰米行”任司帐。一天上午，突然听到镇上发生火警的消息，立即打听，知是南港道南桥堍的竹行失火。这家竹行就靠近我住的仓楼。顿时使我吓了一跳，房子烧掉且不说，如秘藏的党内文件给救火人员揭开屋面发现，那就大暴露了。于是我连忙奔回去，从下岸向镇东走。到道南桥时，桥堍已有水龙在救火，人通不过去。我只能回头转登塘桥，从上岸走，经汝家桥兜抄过去。到协源的仓楼下，平流芳早比我先到了，正在焦急地等候着我的来到。他知道我这里存有不少党内文件，但不知放在何处，无法抢救。我一到，二人就赶上楼室，把藏在屋顶里的文件全部取出，另找地方藏好，并看守着。后来，熊熊烈火终于被消防队和群众扑灭了，只烧掉了竹行一家。我的住房未遭到损失，文件再放回原处。1949年春节后，党的联络点“小小商店”开设了，这时自印的文件也陆续增多，就把一

部分文件放到“小小商店”去，交由包一鸣负责保藏。他把文件藏在里屋一只翻转的水缸下面，缸底上面放一只烧饭的“行灶”，这样就不易被人翻动发觉。在接近解放最紧张的时刻，他又把文件从“小小商店”转移到农村家里，确保了文件的安全，不受损失。

文件的递送、转移，危险和困难就更大。需要费尽心机做好伪装掩护，还要善于灵活应付突然产生的险情。记得有次上级党领导人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从上海带来，是6张16开薄如蝉翼的拷贝纸，写着密密麻麻的细字，卷紧成手指大小的一节，外面用包香烟的锡纸裹扎好，嵌入挤剩一半的牙膏壳里，塞在毛巾袋中带来的。有一次，刘世和要我把一些油印文件送到平望交给他，约好在西塘街莺湖楼茶馆（现在的鸯湖饭馆所在）楼上碰头交付。这次，我先到镇西紫阳观糖果店买了两包送客人的栗酥，把一包的十只栗酥换成文件，照原样包好，又把另一包真的栗酥叠放在上面，一起扎牢拎在手里，使人看到象去做客人的样子。而且，我乘轮船到平望。一看时间尚早，就拎着包扎到汽车站兜了一圈，才到莺湖楼茶楼上泡茶喝。我把“栗酥”丢在桌子上，独自喝茶，眺望鸯湖荡漾的水波景色。不久，刘世和来了，二人就边喝茶、边谈工作。分别时，这二包真假栗酥，就由刘世和很自然地拎着走了。

1949年，在传送、转移文件中，有两次遇到过险情，都逢凶化吉，安全度过。一次是汝贤浩经办的。他当时是乾丰米行的小学徒，人很小，象个大小孩样子。一天晚上，他帮助平证明把文件油印好了，次日他把文件包扎好，要送到上岸万云台茶馆交给吴关龙（中共芦墟地区负责人）。汝拿了这包文件走出米行门，向西上西小桥时，国民党县保安队的岗哨（保安队连部设在官塘上煤水滩）误以为汝又去解款，把这包文件当作钞票拦路抢去。后被汝大喊大吵地闹了一阵，夺了回来，向镇内奔跑才脱了险。事后分析，这些保安队员常驻八角亭一带，时常到米行里白相，与行里的职工都面熟了。这个站岗小兵，可能是看到汝的孩子样，故意开个玩笑来吓唬汝的。但幸亏这

兵没有打开包看，否则要暴露庐山真面目哩！另一次是在这年的4月上半月，形势日益紧张，为安全起见，决定把藏在镇上的文件转移到农村去，由包一鸣负责，拿到黎东乡王字浜的家中隐藏起来。但到包的家里，那时要从傅家浜底走，经西林港有座小桥，桥上有县保安队的岗哨检查。我们把文件放在一只木板肥皂箱内，面上放一层肥皂，让木箱盖板露一点缝隙，可以从缝中窥见面层的真肥皂。叫包一鸣再买点油酱小菜，打扮成农民上街的模样，把一箱“肥皂”拿回去。不出所料，经过小石桥时，受到岗哨的检查，哨兵问：“箱里是什么东西？”包说是肥皂，他看了看箱缝里的肥皂，接着问：“为什么买这么多肥皂？”包说是村上几家合买的，买整箱可批发价，钱便宜一点。哨兵犹豫一下就放走了。包当时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如果这个兵打开箱来看，或把“肥皂”硬扣留下来，肯定要拆穿西洋景的。他把文件带到王字浜的家里后，藏到鸡棚里遮盖好，直到黎里解放后才拿回镇上来。

1949年5月，黎里解放。党的地下印刷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剩余下来的油印文件，交给黎里区委一部分，我自己保存了几整套，以作纪念。1959年3月中旬，我在吴江县委工业部工作时，苏州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有位女同志，持介绍信来找我，要征集我党黎里地下工作时的油印文物。我就让她自己到黎里我的老家去翻寻，结果取去了一全套油印文件，还有印文件用的滚筒、油墨罐等。1983年3月20日，我到苏州东北街历史博物馆参观“捐献文物陈列室”时，发现黎里地下工作时由我刻写的油印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赫然陈列在橱窗里。

党的秘密联络点——“小小商店”

在白区搞党的地下工作，首先碰到的是生命安全问题。其次是社会职业问题。那时干党的地下工作，一切都要自己去解决，社会职业要自己去找谋，活动费用要自己设法凑付。有的同志卖屋典衣，破

产干革命。从1948年下半年起,直至解放,我与上级领导同志联系工作时,总是到外地按期赴约,每去嘉兴碰头一次,住一宵,差旅费就要花上五斗米钱。到上海去联系工作,化费就更多了。

为了隐蔽掩护,需要有个存身之处。外来工作的同志要有个落脚点,当地同志也要个联络点,便于联系工作。

淞沪系统党的地下组织,在黎里镇上,曾先后搞过几个落脚点和联络点。1941年初,中共淞沪中心县委特派员夏明辉到黎里来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在金佩扬住的西王家弄口开了另“大同文具店”,作为一个落脚点,夏在黎里发展了党的组织,打下了党的工作基础。到这年的冬季,“大同”店址,改由金佩扬的爱人和姨妹摆香烟摊,作为一个联络点。1944年初,中共浦西工委书记陈振之到黎里,在西北栅城隍庙滩的秋楔桥西堍开了一家小饴糖坊,陈为老板,他爱人李尚同为会计,陆雪林当小师父,金佩扬做跑街,开展革命工作。

1949年春节后,由于党的地下工作需要,我与包一鸣、张淦泉三同志在黎里镇上岸何家浜口合伙开了另“小小商店”,作为党的联络点,一直坚持到解放。下面把这一联络点的始末情况说一说,以存史实。

“小小商店”的前因

1948年上半年,我在黎里城隍庙滩和丰米行任司帐时,与行内职工包一鸣,为有利地下工作开辟新的活动,乘同事酝酿脱离之机,就参加他们的合伙经营,一起离开和丰行。在西北栅清风桥堍隔壁开设了“益农米行”,张淦泉作为外股加入,我仍任司帐。在党的地下工作方面,我与包都比在“和丰”时灵便得多。包一鸣经常下午到隔壁洋房里的朱家“叉麻将”,借此了解这个当过便衣队长的恶霸的活动情况。此时,我出去与党内同志的联系也频繁了。但是由于“益农”的地段偏僻,“排门板”整天地紧关着,出入要穿过洋房大门而走边门的。有人来找我们,颇不便当。另外,这期间在西北栅一

带,工作开展得不够理想。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党的地下组织发展迅速,为有利于地下工作的开展,我与包一鸣、张淦泉三个党员商量决定,益农米行经营到年底退股,春节后,到镇东去开爿小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打算,经向当时的上级党组织——吴(江)嘉(兴)工委书记金佩扬汇报,获得同意。过了1949年的春节就正式行动起来了。于是“小小商店”诞生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有点议论,说我与包大生意(指米行)不做,倒做起小生意来了。我们只好这样解释:“现在局势动荡不安,做大生意担的风险大,小生意比较保险。”实质上,我们这一行动,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但在当时自然不能明说的。

“小小商店”的经营

“小小商店”开设在黎里镇上岸何家浜口靠西第三家店面处,东壁贴邻是陈姓的灯笼店,浜口是爿屠姓的弹花店,小滩对面是陆家的纸扎店,小小商店的店房原是张淦泉开的铁匠店,张的铁店合并经营后,房子空关已有一、二年了。前后共二间平房,前面是店堂,后面是宿舍,小小商店租用后,作为党内的活动场所。房屋比较破旧,全是泥地,且坎坷不平。本着因陋就简的原则,我们自己动手平整地坪,并铺上了砖,刷白了墙壁。“店堂内设备也很简陋,面街的门口,用“排门板”搭一个摊,借来一只旧货架放在靠西墙边,一只旧的小柜台纵摆在东首进口口,里面还摆了一张破帐桌。商店的招牌,由我用一张白纸,竖写“小小商店”名,表示开店做点小生意而已,不引人注意,便于我们的活动。

商店的资金,一共只有30石米钱,包一鸣、张淦泉和我三人分担,每人出资10石米钱。参加营业的人员,仅我和包一鸣两人,我任司帐兼营业员,包为营业员兼进货员。张淦泉只是股东老板,不算店内工作人员,但常来店里帮忙;有时我与包外出了,他就代看店做生意。

小小商店的经营范围,纯以另售。货源部分向镇西石皮弄口的紫阳观糖果店批来,部分是向上海方面进货。亦可委托航船按采购单代进,运输也很便当,很及时。

店开后,顾客是上街农民和镇上熟人居多,营业尚佳。收入正好维持店里的开支,好得我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做生意不是以赚大钱为目的,而是在于掩护地下工作的活动而已。

“小小商店”的成果

“小小商店”在1949年春节后开张。黎里镇5月4日解放后,我就离店脱产参加区人民政府工作。由包一鸣一人坚持卖底货,到7月份也清底货关店,包也脱产参加工作。小小商店前后历时半年光景。

小小商店的范围虽小,店命亦不长,但它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对黎里地区党的地下斗争,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它既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又是党内聚会活动的场所,在解放前夕与土匪胡伯龙部的战斗中,又是一个党内司令部的驻地。

联络点是很重要的。有了联络点,上级党派人来联系工作、传递信息,就有个比较固定的地方,便于寻找联系。当地的同志有事来找支部,也可以到点上来联系。外地同志来问讯,知情者也可到联络点一询。记得在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已开始渡江,形势日紧,党支部与上级党的正常联络已经中断。根据上级党交付的临解放时的任务,党支部发挥了独立作战的能力,率领全体党员进行紧张的工作。这时,上级党领导金佩扬两次派人来找我,都是寻到小小商店来的。第一次是托蔡章汉的小儿子到小小商店来找我,交给我一只空的香烟壳子,说是金佩扬特地要他送给我的。我接过香烟壳子,马上到宿舍里,拆开一看,背面没有写字,就用显影药水涂上,但密写还是显示不出来。当时我心里非常焦急,不知道上级党有什么紧急指示。隔了二三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小小商店倚着柜台闲观时,忽然看见

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男子，在小小商店门前徘徊了二三次，好象在寻找店家的样子，但又不过来问讯。我觉得这人有点面熟，经过思索想起来了：去年夏天我到嘉兴一家茶楼上喝茶，等候与金佩扬接关系时，此人也在那里一个人喝茶等人，后来他被盛泽党员俞双人唤去的，显然他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就走出店门，到街心主动去招呼他，用肩一碰，问他寻找哪一家商店？他说找小小商店。我指指墙上贴着的颇不惹眼的店招牌纸，告诉他小小商店就是我们这片店。我又问他要去看啥人？他说找平静人，我说本人就是。于是马上领他到店堂后屋去交谈。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顾其行，原在平望工作，现带家眷到黎里来了。住在镇西升禄斋南货店隔壁弄堂里。接着他说明了来意。金佩扬正带了部队在太湖边活动，要我马上到那里去碰头，只要到溪港乡公所找陆秘书问一下，就可以寻到老金的。我得此信后，就请八坼的周一非陪同（因周在溪港做过医生），抓紧作溪港之行。结果走了三次，才通过八坼，步行到溪港。可是已经迟到一天，金佩扬已在上一天带了部队解放吴江去了。因时值夕阳西下，二人就只好在溪港借宿一宵。翌晨，我们折回八坼，沿公路走吴江，才与金接上关系，那已是吴江解放的下一天了。此外，4月下旬，张鹤鸣在浙江嘉善汾玉乡搞的外围关系李文潮，突然寻到“小小商店”来看我，摸出一张铅印的“名片”，说要找张鹤鸣。这人，我从未接触过，于是就告诉他，张在芦墟镇义兴祥布店里，让他往芦墟去找。

我与当地党内同志的联系，一般是在外边茶馆里，预先约定时间、地点，准时赴约。但有时外边接触不方便，就相约到小小商店里商谈。特别是近解放的半个来月中，由于工作紧张，需要接触的人多了，从单线扩大了横的关系，有时还要召集二三人或四五人一起开小会研究。这样，小小商店的内屋正是很好的活动场所。店堂里对外在做生意，里间党内同志装着闲谈，商量工作。

解放前夕，江浙边境著匪胡伯龙，别号龙骞（天）飞，冒充人民解放军，自封为“第三旅旅长司令”，企图武装“劫收”黎里区，从四栅向

镇上进攻。被我党控制的黎里区大队短枪班和镇工商自卫队一起打退,粉碎了胡匪的“劫收”迷梦,保住了当地的武器、粮食、档案等不受损失,保护了当地工商业和居民的安全。党内对打退胡伯龙匪部的战斗曾作了反复多次的部署,分批召开了党员骨干、自卫队员的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在小小商店的里屋进行的。最后一次,刚开好会议,胡伯龙匪部进攻的枪声就响起来,战斗开始了。有几个同志来不及离店进入防守阵地,只好在小小商店权宿一宵。这时的小小商店,又仿佛是党支部的地下司令部的驻地了。

(平静人同志离休前系吴江县人大专职常委)

回忆我的一段活动

焦康寿

1946年7月，国民党向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彻底撕毁了停战协定，我军奋起反击，取得了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我党贯彻敌退我进的方针，决定加强沪宁沿线的斗争，9月成立了华中十地委，属苏中区党委领导。抽调了一批原在苏南工作后北撤的同志和一部分武装，回到苏南和坚持在原地斗争的同志会合，加强地下党和武工队活动。这时我正在华中分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回到苏中区党委组织部。十地委决定我回苏南工作，要我负责开辟淀山湖地区。9月我去地委报到后，参加了地委召开的会议。做了一番准备工作。10月，由包厚昌带我们从东台附近的罗子头出发，经一仓三仓、弼港、如东的掘港、马塘等地，到达九地委。当时国民党军已侵犯到如东南通的三余、兵房一带，我们不能再向南去，就在如东县委停留了好多天。后又从掘港东面乘船渡到吕泗，再由海门县委送我们从灵甸港乘船到上海吴淞口登陆，到上海时大约已是11月了。

在东台时，地委决定到淀山湖地区工作的同志有我和爱人苏民（陈秀中）、吴明和爱人范青、陆志明、陈阿大，这些同志都是在东台一起出发的。同行的还有去其他地方的好多同志。到海门后，我和吴明、陈秀中、范青一起在灵甸乘船去上海的，其他同志乘另外的船。我们到上海后，先找到吴明的一个同乡。此人在浙江路浙江旅馆当茶房，我们就暂住在这个旅馆里。后来打听了吴明在苏州的亲戚情况后，我们四人又到了苏州盘门大街吴明的一个亲戚徐兴泉家住下来，这时蒋一民、张根生已在这个亲戚家立足。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日子久了不行，住了几天后，我和陈秀中又转移到苏州铁瓶巷陈锡元家里，陈是沙洲何洛的弟弟，当时已入党，在一个肥皂厂当职员。可是

这个地方来来往往或住下来的沙洲同志更多,此时一下子找不到去淀山湖地区的立足点,在苏州这两个地方又不能久住,我就和陈秀中回上海住到张永明、杜珍那里去了(在普陀路的苏州河北棚户区)。由于这里经常来往的同志也很多,住久了也不行,我就转移到北京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去了,陈秀中的父亲是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陈秀中住在她父亲家。在这个期间,我常到苏州吴明处设法找去淀山湖的立足点,直到春节后几天(即1947年2月),在盘门的吴明亲戚家结识了二位吴江县屯村来买大粪的农民(吴明的亲戚徐兴泉开粪行的),一个叫耀祖,记不起姓什么了,还有一个也想不起名字了。我以去他们那里做卖布生意的身份,由他们帮我租赁了同里凌家廊下一个姓陈老太婆的一间房子。二月末三月初,我和陈秀中到了同里立足。吴明比我略早一点,与范青、蒋婉贞、蒋一民到达吴江城盛家厍立足。吴明以做中医为掩护,蒋一民以帮人家开辟水机作掩护。在吴明到达吴江城时,陆志明也到了吴江城里一个亲戚家里立足,以“算命”作职业掩护。之后不久(大约在三四月间),李海明又通过关系打入了南库的国民党自卫队,大约4月份又由李海明介绍陈阿大去南库做裁缝为职业掩护(陈在1946年11月到上海,也因找不到下乡立足点,暂在杨树浦做裁缝)。

另外,还有顾加生同志,在我到十地委报到时,他已先带了一个锡剧团到淀山湖地区活动了。我在东台出发时,包厚昌同志交代由他到江南联系上后再把顾的关系转交给我,我到吴江后没有和他联系上。

我们在十地委出发时,都没有明确职务,我是负责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这个地区包括吴江、吴县、昆山、青浦、松江等地。当时沪宁线的镇江、丹阳、句容一带属丹北工委领导,武进、江阴、无锡一带属澄武工委领导,江阴、无锡、常熟、沙州、吴县的一块属澄锡虞工委领导,常熟、太仓、吴县、昆山一块属苏常太工委领导,上述地区均统一属十地委领导,都有地下党和武工队活动,而

且基础都较好。太湖以西铁路以南的大片地区属另一地区的党领导，而且基础也较好。淀山湖地区在十地委来说，是一大片空白区，开辟这块地区，逐步从地下党活动到开展武装活动，可以和苏常太、澄锡虞两个地区连成一片，我们十地委在沪宁路东段的回旋余地就更广阔了。当时十地委确定的方针就是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胜利”，并且要我们作十年八年的长期打算。当时十地委分工由地委委员、澄锡虞工委书记李中和我单线联系领导。我们到吴江后，李中在4月份来吴江和同里看过我们的立足点。5月初，我去上海李中处联系时，当时的十地委书记金柯和十地委城工部长杨斌（听说已确定为十地委副书记）也在那里，他们确定我们淀山湖地区的工作，改由杨斌负责领导。杨斌还记了我在同里立足点的地址，并约我在5月17日（或18日）到上海杜美路（现在的东湖路）马路上见面（时间已不记得），汇报情况，商谈工作问题。可是当我在约定时间前一天要去上海时，在吴明处看到新闻报上一条很小很奇特的消息，说是浦石路居民金柯失踪，当时我们立即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发出的通知，金柯被捕了。我决定暂时不去上海，弄清情况再说。隔了一二天，我收到李中化名并用暗语寄给我的信，告知金柯、杨斌均已被捕，李中回苏北去了，并要我迅速转移。

我接到李中信后，即去吴江城与吴明商量转移立足点的问题。那时澄锡虞工委赵建平也接到李中的信，包厚昌也迅速从苏常太地区来信与赵建平联系，并要他帮助我解决立足点和经费的困难（包厚昌在苏常太但对澄锡虞的工作、我们去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都一直很关心，所以情况也很清楚）。赵建平同志布置许桂仙（许丽娟）和金娣为我在无锡西门外蠡桥附近庵上村找了一间房子，作为立足点。我和陈秀中大约在5月底前几天转移到这个地方。我们仍以商人面目出现，因为当时杨斌只记了我在同里的立足点，还不知道吴明等同志的立足点，所以吴明等就不必转移。这期间，包厚昌又来指示，决定我参加澄锡虞工委，任组织部长，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

也归为澄锡虞工委负责。原由赵建平同志联系领导,但赵再领导不方便了,锡北、锡东、苏(州)北等的地下党组织也就交给了我去负责,澄锡虞工委由赵建平同志负责。在吴江的蒋一民、李海明、陈阿大等明确归吴明领导,陆志明由我直接联系。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动静,同里这个立足点没有被敌人发觉的迹象,而吴江这一带敌人也不象澄锡虞、苏常太地区的敌人那样注意我党我军的活动。为了便于隐蔽,便于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我和陈秀中大约在八月底九月初又回到同里凌家廊下立足了。由于陈令仪同志已经怀孕,不便在无锡西门外河埭口小学教书立足了。就和李桐明一起转移来同里我们处立足。因为李桐明是负责澄锡之间那一片地下党的县特派员,所以他的经常工作仍在澄锡之间一带活动。

由于十地委南下时,地委委员、负责联络工作(即敌工工作)的任天石刚到上海即被捕;1947年5月,地委书记金柯和城工部长杨斌又同时被捕,李中已回苏北去了,我们的活动与苏中区党委失去了联系;包厚昌从苏常太地区传来指示,要我去苏中区党委一次,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中秋过后,大约在9月下旬或10月初,由张永明陪同我一起去苏中,我们以合法身份到东台附近,下乡找了区党委。当时正是苏中、苏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华中工委,原苏中区党委机关转移到射阳县合德镇去,我们也一起到了合德。当时得知华中工委决定要成立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原地委所辖各个地区工作归国区工作部负责,由韦永义具体负责国区工作。当时韦在二分区,要我等待韦到华中工委再作汇报,我就在华中工委等待。张永明先回来了,我住在华中工委又生起大病来了,当时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治好。等韦永义来华中,我汇报请示好后,即返回苏南。在解放区由民工把我送到海门,然后又由灵甸港乘船到上海,到同里已经是十二月下旬了。陈令仪和陈秀中均已分娩,包厚昌已从苏常太地区来到吴江多时了。大家等待我回来,可是几个月没有消息,他们都很焦急(赵建平、吴明等好多同志同样很焦急)。我赶快把汇报

请示的情况及华中工委的指示向包厚昌和澄锡虞工委的赵建平、张卓如、朱帆、苏常太工委的陈刚作了传达。华中工委的指示现在已记不大清了，能记得的几点大体是：形势很好，解放大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我们原定坚持地下斗争十年八年的时间，可能不需要这么久了；十地委不再建立了，原十地委所属各工委由华中工委国统区工作部领导；要积极准备大军渡江工作，在江南坚持有困难的同志去苏北，并指名包厚昌要回苏北去，别的同志要包研究决定；澄锡虞工委由赵建平任书记。我的病也是回到同里请了中医才治好的。

包厚昌根据华中工委指示，和我们研究工作的部署和组织上的变动。澄锡虞工委张卓如和我回苏北去，苏常太工委江坚（地委委员、工委书记）和陈刚工委委员、浦太福回苏北去。经过请示华中工委同意，我们作了一番准备。在春节后，即1948年2月，我和陈秀中离开同里到了上海，包厚昌也同时从吴江到了上海。由我们事先约定沙洲的一条我们的交通船，从吴淞口接我们去苏北靖江县丹华港。我随包厚昌到了华中工委。华中工委决定，成立华中工委江南工委和一、二、九地委，江南工委分别领导原十地委各个地区的工作，不成立国区工作部。包厚昌任华中工委江南工委副书记。我到一地委江南工委担任组织部长，书记是地委书记钟明兼，副书记是张志强，联络部长是张卓如，领导澄锡虞和澄武二个地区。吴江的工作仍属澄锡虞工委负责。

我在吴江断断续续的一年时间里，关于开辟淀山湖地区的工作，只是做了找关系、交朋友、建立立足点的工作，这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前提条件，首要的一步。有了这一步才能真正开辟工作，没有这一步也就谈不上开展什么工作了。由于时间短，中间又有一些曲折，加上主观努力还不够，就是建立立足点的工作，也进展不快，所以我在吴江的这一段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来。以后朱帆去了，工作才逐步有所开展。关于建立立足点的工作，还要补充一下：陆志明在吴江城没有多久就找到了尹山的一个亲戚家作为立足点，仍以“算命”为掩护展

开工作。赵建平妹妹陈雅英和妹婿到苏州葑门外郭巷开小店，徐行之也到了郭巷立足。我去甬直镇通过两个同乡的关系，把原沙洲县地下党的负责人仲国璠转移到了甬直，以医生为职业进行掩护。

我离开同里时，开辟淀山湖地区的任务交由朱帆具体负责（他是澄锡虞工委委员，还有别的许多任务），我原来分工负责的几个县的地下党组织由沈鲁钊负责，因沈在无锡有较好的立足点。而且与几个地区的地下党联系也方便，所以没有转移到吴江来。

（焦康寿同志离休前系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徐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吴江工作点滴情况

朱 帆

开辟吴江地区的工作,是在1946年冬的华中十地委会议上决定的。由于我们对这个地区情况不明,人生地疏,关系也不多。因此,第一阶段工作只能分散立足,积蓄力量,待逐步了解情况、发展关系后,再开展第二步工作。这一阶段工作,是1947年初华中十地委南下过江后开始的。从1947年初到1948年1月,由澄锡虞工委委员焦康寿负责。先后派到吴江县同里镇上落脚的有:焦康寿、陈秀中、李桐民、陈令仪、钱少光、许杏仙、许丽娟等同志;派到吴江城内松陵镇落脚的有:吴明、范青、蒋婉贞、唐云青、陈元章、陆志明等同志;派到南厓、横扇一带落脚的有:张根生、陈逢贤、张健;派到平望附近周家溪落脚的有:朱剑波、朱林芳;派到北厓附近落脚的有:唐裕兴、陈毓英;顾加生、郭城、何枫等领导的“锡剧团”,开始在吴县境内的郭巷、车坊、甬直一带,1948年秋季以后,在同里、屯村一线。

1947年10月左右,十地委常委包厚昌司令员来吴江,在城内吴明处落脚,负责指挥“苏常太”、“澄锡虞”两个工委的工作,并改“澄锡虞工委”为“锡澄虞中心县委”。调焦康寿负责打通与苏中区党委的联系,调朱帆接替焦康寿继续开辟吴江地区的工作。

1948年春节前后,为巩固包厚昌在吴江以经商为掩护的合法面目,由吴明与房东黄云焕、石灰行商人王炳生合股在三里桥开设石灰窑,作为活动据点。为此,又先后调张根生、陈祖良、王彦萍到窑上工作。

1948年3月4日,包厚昌获苏中区党委通知,离开吴江回苏中解放区。

当时,我们根据澄锡虞地区农村斗争的多年体会,在敌占城镇应

坚持秘密活动的原则,不能有轻率暴露的举动,以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但在广大农村,应在秘密的基础上,配合武工队(组)的活动,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抗丁、抗税、抗租、护粮”等群众性斗争。增强群众斗争信心,团结基本群众,控制保甲长、分化瓦解敌人统治。这是我们在澄锡虞地区“反清乡”斗争中积累下的斗争经验。

当时,吴江虽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却深受地主、高利贷者、流氓、恶霸等的压榨剥削,生活十分贫苦。抓壮丁、逼租税,阶级矛盾极为尖锐。

吴江又是有名的河网地区,东临淀山湖,与淞江、青浦相连;北界吴县、昆山,地处三县交界;南与浙江相邻,北跨两省湖网之利;中间有苏嘉公路及大运河南北分割。东部的活动余地很大,而且湖网纵横、村落散布,极利于秘工干部隐蔽和武工组的活动、转移。西部地区活动余地较小,从平望到湖州,又有一条公路和一条塘河并行,把吴江南部地区分隔成两小块,不利于武工队的活动。因此,我们当时开辟的重点,放在东部地区。西部以长期秘工坚持为主。

1948年5月,我们调整布点,开始秘工、武工两条线斗争的准备工作。当时是:吴明、范青离开吴江城,向东转移,以便了解和熟悉淀山湖一带的地形和敌情。顾加生的“锡剧团”,从吴县的郭巷向东活动,负责侦察吴县、吴江界河两侧的土顽和地形情况。到1948年冬,已活动至角直、同里、屯村一线。石灰窑上的王彦萍、陈祖良利用租用的柴船,以收柴作掩护,熟悉同里镇周围的河网地形和群众关系,以备武工队(组)活动开始后的秘密宿营和转移。

1948年10月,朱帆和倪妙珍从苏州迁居同里,并多次与许丽娟一起到同里镇周围农村,以职业为掩护,认地形,交朋友,成立了石灰窑党支部。

由苏北单独南下的中共党员李海明(张健),加强了控制南厍和横扇的自卫队,并在南厍自卫队员中发展了毕华等3名新党员,加强对自卫队员的组织起义工作。

1949年1月,王彦萍、吴阿根到锡东武工队调来两支短枪和一些手榴弹,并在石灰窑上秘密训练。

1949年2月,朱斌从锡东武工队调回吴江,准备开展同里以南的建党工作和武工活动。

1949年3月,朱林芳离开周家溪,转移到吴县车坊——郭巷一带,联系顾加生等同志在农村的基本群众关系,以备武工活动开始后,跨越吴江、吴县界河两岸的秘密转移。

1949年4月初,得到正式通知:“解放军将要过江了!”为此,我们暗藏短枪及手榴弹,到同里以南朱斌家附近的农村,在农民中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公开宣传解放军即将过江、国民党即将垮台的形势。公开号召:农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交租、抓丁,反对苛捐杂税、高利贷剥削,开展保丁、保粮、反剥削。

这次实践,前后有半个多月时间,同里镇上的敌人丝毫不知道我们的活动。在农民中获得了拥护,有一些积极分子逐渐靠近我们。

实际上带着武器的民运工作队(组)活动,比单纯的秘工活动有信心,有力量,影响大。组织的对象,也不象单纯秘工那样,重点放在城镇中上层和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中间,而是在城镇秘工的基础上,以农村中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受剥削、受压榨重的贫苦农民及部分青年农民中间。斗争发展方向,也不是长期的秘党活动,而是逐步地从秘密、隐蔽趋向半公开、公开的农民斗争活动。

可是,由于我们到吴江地区的时间短、力量弱,对地形、道路、敌情不熟,因此,到1949年4月中旬,我们的武工活动还只是开始,还只是小组规模的隐蔽的武装民运工作(组)活动。以后,转移到庞山湖农场散落的农户中活动,以及到同里以北吴江、吴县界河两侧的小村庄中活动等,都还没有超出小组活动的范围,群众中的影响还不大。由于我们的活动区还不大,群众对我们的认识还不深,不巩固。解放军何时过江?过江后规模如何?吴江何时解放?当时毫无所知,也没有把握。因此,还不敢过早拉出来,成立公开的武工队,进行

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活动和群众斗争运动。

1949年4月21日下午,我在周家溪和朱林芳商谈迎接大军过江的准备工作,回到平望,发现从苏州南下的所有汽车、轮船、民船突然停驶。询问车站、码头,也不明原因;电话询问,也不答复。我们预计,大军已过江了!我们必须立即组织党员、群众查明情况,进行迎接大军过江的一切准备工作。我立即从平望步行赶回吴江,深夜回到石灰窑上。一早就让张根生进城查实情况。22日中午,张根生回窑证明,解放军确已过了长江,无锡以西的沪宁线已经停驶火车,苏州敌人已将全部车船封存,准备南下逃跑。当时我们一听这个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动员窑上所有党员及工人,向周围群众大力宣传解放军已经过江、江南即将解放的胜利喜讯。发动沿公路、运河的群众,立即监视公路、运河,准备应付苏州等地敌人南逃时的拉夫抢掠。并立即派人分别通知吴明、李海明、陈阿大、顾加生剧团等同志到庞山湖农场集中行动。

4月22日下午4时左右,首先发现国民党军沿公路南逃布防。到傍晚,大批车船沿公路运河南下,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及家属。从苏州南下的尹山桥、三里桥、八坼大桥等一线,全被敌军占领封锁;沿途残兵抓船、抓夫、抢粮抢物,溃不成军。入晚,沿运河农村和石灰窑上,已不能安心立足,我们带着周围群众,撤退到庞山湖农场安置、暂避。并派人在庞山湖农场西堤放哨,监视敌人行动。可是未到深夜,党员吴巧生的弟弟被国民党匪兵抓去,石灰窑上也已有国民党残兵上去搜索。庞山湖以西农村,均已受到威胁。

23日清晨,我们集中起来的党员和工农群众已达二三十人,只有两条短枪,武器太少,就转移到同里南面朱斌家附近的村上宿营。这时,我们已经不是武工组的隐蔽活动,而是公开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民运工作队出现了。晚上,吴明等从周庄赶来会合。党员吴大根派到同里镇上去侦察敌情,镇自卫队的一个中队拉到同里以南的青庙庵向我们联系投诚。李海明接到我们通知,领导南厍自卫队的全

体队员带枪起义，到庞山湖农场与我们会师，成了我们第一支警卫武装。

4月26日晚，我们已达50多人。举起了事先准备好的大红旗，开进庞山湖农场办公室，登上了庞山湖农场瞭望塔，解放了庞山湖农场。

27日，和苏州市军管会接上了联系，吴县已有工作队到达车坊、斜塘一线。吴江城内国民党的党、政、特务头子都已逃跑，国民党部队一个营（团部在平望）还在敲榨勒索，掩护败兵残部南逃。

不久，同里区长也得到消息，派人来与我们联系，邀我们进同里镇。我们对同里，只是控制了一个排，还有两个排态度不明。我们派张根生为代表，到同里向区长宣传形势与谈判，要他们保护好同里镇的安全，照常安居营业，等待解放和接收。至晚，张根生回来，同里区长同意投诚，接受所提条件，正式建立了联系。但我们坚持以庞山湖农场作基地，坚持解放军不到不进城，坚持团结群众，严密监视敌军的动态，警惕敌人垂死时的挣扎。

4月28日晚，吴江城内国民党军队仅存一连，但还在敲榨勒索。

4月29日清晨，得到庞山湖农场仓库报告，敌军残兵在清晨已全部逃离吴江城，到苏州的公路上，除公路桥被烧外，已全无敌踪。9时左右，我们与苏州市军管会联系请示。同时得到吴江城北门外庞山湖农场仓库急电汇报：“粮食仓库有遭劫危险。”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即将解放的大批粮食，以供大军南下之需，为此，全体人员跑步到吴江北门，保护了粮仓安全。

10时许，中共吴江县委和吴江县人民政府的南下干部沿公路步行来到吴江城外，我们立即改成欢迎队伍，热烈欢迎吴江解放，和解放吴江的南下干部们会了师。这时，街上的欢迎群众越聚越多，街道两侧，全都站满了欢笑喜悦的人民！

（朱帆同志离休前系江苏省环保局副局长）

筹建三里桥石灰窑经过

吴 明

1946年12月,我是与焦康寿、陈秀中、范青等一起从苏北渡江的。1947年春我到吴江工作,改名吴春生。以行医职业为掩护,寓内仓桥“鸿济堂药号”隐蔽下来,挂牌“中医吴春生”。我没有做过医生,抗战前学过两年中医,这算我第一次行医。我取得合法身份后,即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一面和职工交朋友,一面结识一些社会人士。起初全家住在三角井王家,后迁至城外航前街41号渔牧公司里面,设诊于盛家厍鸿济堂分店。我站稳脚跟,陆续安排一些同志到吴江建立点线活动。来的同志都以各种职业为合法掩护,有的当炊事工人,有的贩卖布匹,有的设摊,有的以算命相面为职业。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区长的蒋一鸣(化名张根生)通过关系到南厍乡长家机船上当开机师傅,在苏州时跟随我的地下党员陈逢贤也打入那里,他会做裁缝,就帮乡长家制作衣服。与我们一起南下负责开辟吴江工作的焦康寿和陈秀中夫妇,在同里镇立足,掩护职业是卖布。负责澄锡虞工作的赵建平(化名钱桂生)也常来吴江。根据工作需要,他把坚持在无锡的同志也陆续调来吴江。这段时间的发展是比较快的。

1947年5月,十地委在上海遭敌人破坏,领导我们的李中(地委委员)被捕,我们改由地委常委、军事部长包厚昌领导。包厚昌原是六地委的司令员,1942年春夏间,他带了6师警卫团的2个武装连回江南开展反“清乡”斗争,部队刚到达无锡地区田沙里,就和东亭等地的日本鬼子打了起来,战斗很激烈。从此敌对这支部队非常注意,加强了兵力,斗争十分尖锐。在斗争日益艰苦的岁月里,我常和他在一起活动,他领导我们,对我们也很信任。1946年南下后,他一直率部队在苏常太地区活动。敌人对常熟一带特别注意,不断加强

武装力量,进行“分区清剿”,突然袭击,那里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赵建平和我磋商,必要时包厚昌打算撤离农村转到我处,要我考虑以什么身份出现较为合适?开店只能几个人且比较固定,不是好办法。后来我与隔壁石灰行的王炳生商量,计划开办石灰窑,赵很赞同。我就积极筹备,一切由我出面,决定我和寄兄(指包厚昌)、王炳生(邻居)、黄云焕(房东)四股集资合办,王炳生以窑租为干股。当时物价飞涨,金元券不断贬值,金额以米计算,股金共180石大米。很快签订了合同,办理手续,并取名为“万丰石灰窑”。地址就在吴江北门外三里桥东窑港,这原系王炳生停业的石灰窑。经过一番努力,很快恢复投入了生产。石灰窑四面环水,进出须要船摆渡,对我们活动非常有利,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活动基地。

1947年11月间,包厚昌撤离农村,转到吴江。当时他带了警卫员唐云青(化名吴洪才,说是我的侄儿),由政治交通员许桂仙陪送住在我家里。包化名周柏生(说是我的寄兄),对外以万丰石灰窑老板出面,对内进行地下革命活动,领导苏常太、澄锡虞两个工委的工作。他到吴江后,来往的人很多,陈刚、张卓如、钱茂德、赵建平、李桐民都来过。由于有石灰窑牌子作掩护,窑上的工人张根生、陈元章、陈祖良、郭泉生(王彦萍)、张永定(包的警卫员)等全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加上地理环境好,活动更为便利,外界一时也不易注目。我也以老板的身份到处活动,到湖州去,推说采购柴草、石头;到震泽、平望、黎里等地去,就说推销石灰等,实际是去观察地形,了解搜集国民党党政军的组织情况。包厚昌到吴江后,原拟和苏浙皖的钱敏那里取得联系,老包还同张达行去过杭州,但没有能联系上。回来时他买了不少进步书籍,如《静静的顿河》、《青铜时代》等,为了便利工作的开展,那时包厚昌还请隔壁老太教会打麻将。在这段时间里,苏常太、澄锡虞好些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和布置工作,或召开会议,都是以打麻将这种合法方式进行的。这个方法效果很好。包司令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和蔼可亲,上下关系亲密无间,只要接触到他的言

行,就会使你对他产生敬爱之心。

随着形势的发展,吴江活动地区逐渐扩大,这时我们已弄到了吴江县全图、全县水道系统详图和吴江第三区(盛泽)地图,还运来了短枪,准备在农村开展武装活动。中共华中工委根据形势的需要,于1948年2月,召包厚昌回苏中。包离开吴江后,由钱茂德陪同,经上海乘船前往苏中。当时考虑突然离开,会使人发生怀疑,就假造他父亲病亡,由工委政治交通员许桂仙(许丽娟)前来“报丧”,要“大哥”急须回去料理丧事。当时周围几家邻居还送了白份呢!焦康寿调走后,吴江工作由朱帆领导。包厚昌在吴江我处住了数月,来往的人不少,都说是我的亲戚或同乡。出于工作需要和安全起见,包走后,我和范青就转移到梅堰“宝元堂药店”。不久又转移到昆山县和吴江县交界的周庄镇。我改名为吴九如,在“天生堂药店”以行医职业为掩护。1949年4月29日,吴江解放,我们配合大军进行了接管。后来我就调到苏南行署调研室去工作了。

(吴明同志离休前系无锡市科委顾问)

开辟吴江革命工作的情况

许丽娟

1947年，中共澄锡虞工委根据上级指示，坚持开展江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当时的斗争方针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胜利。”斗争的策略是：多交朋友，分化瓦解敌人，秘工与武工相结合，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全局斗争。

1947年初，从苏北派回来的吴明、范青夫妇，通过合法关系，在苏州盘门大街大粪行徐若浓家立足。后来范青又通过关系，在吴江县城松陵镇找到了房子。当时我和赵建平曾到盘门大粪行去过一次。

吴明以中医职业为掩护，在松陵镇盛家厍鸿济堂药店立足。他们努力熟悉情况，范青工作很活跃，交了一些朋友，特别是女青年朋友。吴明为了站稳脚跟，利用邻居的关系，合股开设源昌祥百货店（我曾到这店里送过几次信）。中共澄锡虞工委认为，吴江县处于江浙交界的太湖、淀山湖之间，如能把吴江县这样的水网地区开辟好，就能和太湖的薛永辉游击队联系起来；同时，还可以往中共苏常太工委地区发展，在昆山县建立隐蔽联络点。为此，工委委员焦康寿和陈秀中夫妇被派到吴江县领导开辟区的工作。焦康寿住在同里镇凌家廊下，以布商作掩护。同时把唐裕兴和陈毓英两同志派到同里镇。在这期间，工委派我去吴江县同里镇送过信。

1947年第三季度（可能是9月），包厚昌司令员从苏北的江南办事处来到中共澄锡虞工委，向工委传达指示。开了一次工委全会，有6名委员参加，会是在工委书记立脚点（也是工委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即我的住所，三间很破旧的房子）苏州中心桥北岸4号开的。为了安全起见，会议开到一半就转移到国民党警卫森严的苏州十全街

工委委员张卓如的隐蔽立足点、蒋介石大老婆毛氏公馆旁边，继续开会。

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已号令全军开展全面反攻，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解放军强渡黄河，8月分兵三路挺进大别山区。为此，包厚昌对开辟吴江县的工作很重视。工委全会后，包同警卫员唐云清到吴江县检查工作。包化名周伯生，唐化名红财。包以吴明亲属的名义住在吴明处，并用商人身份作掩护。包还曾到同里镇与焦康寿研究工作。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全局总反攻，把分布在无锡、江阴、常熟和吴县等地“脸红”的（即已暴露身份）同志，调几个到吴江县石灰窑当工人或烧饭。张根生、王彦萍、朱林芳、马阿娥、马世根、张健、陈元章、陈逢贤……等都被调到石灰窑来准备武工斗争。

不久，苏中工委（后改为江南工作委员会）来令，调包厚昌回苏中工委工作。1948年2月间，赵建平命我立即把一封紧急信件送到吴江县城吴明处，交给包厚昌，并说：“你要想办法让包厚昌同志马上离开吴江，到苏州娄门北张巷王阿土家（也可能是葑门大街钱茂德家）。要让吴江群众不怀疑，还要保证老包的安全。”这个紧急命令怎样去完成呢？我绞尽脑汁心生一计：用家里死了父母去报丧的办法。于是，我就在去吴江的路上买了三尺白布，将白布撕成两条腰带。到了吴江就把白布带结在腰上。在吴明和范青家见到老包，我就装哭说：“父亲病故了，叫大哥马上回家料理丧事。”当然，包看了信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包还到石灰窑上向那里的同志们布置了工作（名义上是老板到窑上看望工人），就跟着我回苏州了。当时，吴江县的几家邻居，都给我送了锡箔以示吊唁。范青对邻居们说：“你们要是一定要送的话，那就送点钱吧，锡箔送我了，路上也不好拿。”当时我想，范青真机智！我们的活动经费正十分困难，很需要点钱。老包到苏北的苏中工委后，又把焦康寿和张卓如调到江南工委去了。

中共澄锡虞工委决定，调吴明和范青到吴江县周庄镇去。他们去前还转了个弯子，先到吴江县的梅堰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转移到

周庄。吴仍以中医职业作掩护，范做吴的政治交通员。工委派我往周庄镇送过信。

1948年4月中旬，工委书记赵建平对我说，要调我和朱帆一起到吴江县工作。他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艰难的，朱帆同时还要领导其他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我与朱帆是老上下级了，因此一口答应。赵又说：“最好你先到同里镇找到唐裕兴，把房子租好。等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朱帆再去。”并说：“你到同里后，不准让吴江县和其他地方的人知道，以防万一。你由朱帆直接领导，但朱要常常离开吴江的，如遇急事可直接来找我。你的任务是在同里镇站住脚，然后回农村深入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抗丁抗租，教育群众，发展党员，创造条件，准备武装斗争。”我到同里镇找到了唐裕兴夫妇，研究了同里的政治形势、敌情和地理条件。租了凌家廊下凌家的三间柴间，房东说：“你家人口多，住在这房子里比较好。因为这房子里经常闹鬼，无人敢租。房钱可以便宜点。”我去一看，认为房子很好，东边是小河浜，河东岸边是放棺材的房子。住房离后门很近，如有敌情容易转移，同志们来往也不易被敌人发觉。我回苏州向工委书记汇报后，书记说朱帆不能马上到同里去，决定先把钱志芳、许杏仙两同志调到同里和我一起工作，组成一个假的家庭。钱志芳当作我的二哥，许杏仙当作我的二嫂（其实许杏仙是我的亲妹妹）。工委书记要我把澄锡虞工委批准钱志芳和许杏仙结婚的事，叫钱茂德去通知他俩。我到吴江县同里镇办妥了一切手续后，在1948年6月末，我、钱志芳和许杏仙三人正式到同里镇林家廊下的三间柴间里组成一个“家庭”。就这样，在同里镇报上了户口，钱志芳挑白铁担走街串弄，以给群众修铅盆、热水瓶壳等为掩护，了解同里的情况。我到上海批发来不少针织品和阴丹士林布的布头，在车子权老婆周桂英开的茶馆旁边的泰来桥上摆摊子，卖针织品和布头，同时了解镇上的情况。许杏仙烧饭掩护我们，同时还去批发过鲜菱角上街卖。两个月后，工委书记第二次来同里布置和检查工作，书记决定把唐裕兴、陈毓英夫妇调到吴

江县横扇,以弹棉花为掩护搞联络工作。同时为了打通澄锡虞工委和苏常太工委的联系,把钱志芳和许杏仙调到常熟县吉翠园3号,开展联络工作。他们夫妇俩调走后,我的工作重点立即转移到农村,认识了一些忠诚老实的农民。我乘船到钱家厍一带,以卖零头布为掩护开展工作。我晚上卖布,白天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这年8月,朱帆来同里布置和检查过一次工作。10月,朱帆和他的爱人倪妙珍带着三个孩子搬到同里镇。不久,朱帆又把他的弟弟陈祖良调来。这时,我又和朱帆夫妇及他的三个孩子,组成又一个“家庭”。朱帆成了我的大哥,倪妙珍成了我的大嫂,三个小侄儿,还有一个小哥陈祖良,共七口之家报了户口。倪妙珍掩护我们工作。她烧饭,还发黄豆芽,由她和陈祖良一起到街上卖,我又到上海批发来许多零头布。因为我的零头布卖得特别便宜(只要能维护粗茶淡饭就行了),因此在车家茶馆喝茶的农民都来买我的布。我还赊帐,秋后还钱不要利息,目的是和农民交朋友,可以向农村开展工作。这时茶馆的老板娘周桂英也多次要求我做她的寄女儿。经过调查,我了解车子权夫妇是徐州人,车是国民党员,是同里镇自卫队的排长,抗战时当过巡官,群众叫他车巡长。此人信神佛命运。他放了一点高利贷,利息比别人低,因而部分农民说他好。我将这个情况向工委委员朱帆和工委书记赵建平等分别作了汇报。他们一致同意我认周桂英为寄娘,以便利用车子权的社会地位,通过茶馆喝茶的农民,我可以以卖布为名到乡下去,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员。

我按照领导上的指示,首先到钱家厍一带,住在俞锦林家,俞锦林小名叫阿根福。我白天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就向前后村的小青年们卖零头布,并且给他们做衣服,不收手工费。群众都管我叫女裁缝或卖布阿姐。他们都围坐在我的周围,我一面为他们做衣服,一面就趁机向他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和阶级教育。重点是培养发展俞锦林和小毛(朱斌)入党。同时还在吴江县师范学校中发展了一名女学生杨秀云入党。她是由范青培养了一段时间,在范调离县城

时交给我继续培养发展的。1948年11月，我在同里镇还发展了朱帆的爱人倪妙珍入了党。朱帆同我一起到过钱家厍、胡屯港一带活动，和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

我还跟着八坼附近的农民深入农村活动，在一个贫雇农家里住了几天。按成本价卖给了农民一些布，同时对他们进行了一些革命启蒙教育，交了几个朋友。我还到屯村一带农村活动过。

在新区开展武装斗争，既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还要在周围建立许多合法的隐蔽点，这样才能有进有退。为此，我以做买卖为名，到靠近吴江县的昆山茜墩镇，那地方由水路到吴江县周庄镇很近。我在茜墩镇住了两天，观察了全镇的情况，感到这里地理条件很好，然而三青团在镇上很活跃，因此，我在那里没等站住脚就走了。

不久，政治交通员王阿土从苏北运来一些《新华日报》和毛主席关于开始全国总反攻的文章，以及我军节节胜利的传单，我们决定先在吴江县城张贴。因为当时反动派大造共产党的谣言，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我们要把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和我党的政策告诉老百姓。我把这些宣传品送到吴江县师范学校杨秀云处时，正赶上吴江县长（也可能是县党部书记长）死了，出大殡，棺材停放在大公园里，前往吊唁的人来来往往。杨秀云就趁城里这种乱糊劲儿，在大街上张贴《新华日报》等宣传品，达到稳定群众情绪，警告敌人的目的。

工委决定要抓紧时间开展武工斗争，工委书记直接布置我一项任务——运枪。他说：“开展武工斗争需要枪，我已同锡澄工委的江革、钱仁忠、钱定军等同志说好，拿出两支驳壳枪来。这条路线别人不熟，想派你去取，但要通过两个市县的几道敌人封锁线和关卡，危险性很大。”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说：“这条线路我熟悉，保证完成任务。”书记又说：“你只要把枪送到盘门大街徐若浓家，叫他放在大粪船里，运到吴江交给张根生或王彦萍就行。他们要用这枪开展武工活动的。”我在锡澄工委无锡长安桥石舍乡四二房巷顾廷根书记兼交通站长处取到了枪。老顾还送我一段路，祝我一路平安。我

在运枪路上,经过无锡市西门外前宋巷三三三号蒋秀葆交通站时,因为有人出卖,我被敌人追捕。我在5分钟内脱险,溜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正赶上早晨南门小站一趟慢车。到浒墅关下火车换乘轮船。我看身后没有跟梢的,就先到镇上上塘青竹桥弄口联络站钱少良处吃饭。少良开杂货店掩护搞联络工作,他一见我就喊:“你给我送货来了!”他接过装枪的包说:“好重呀!”等浒墅关开往苏州的轮船快开的时候,我布置少良先把包送到轮船上,放在安全的地方。少良告诉了我放包的地方,我再空身单独上船。到了苏州,雇了一辆黄包车拉到盘门大街大粪行徐若浓家。我和他一起再用大粪船送到吴江三里桥的万丰石灰窑,交给了张根生。

1948年末,朱帆和我研究,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须组织些有文化的青年去苏北培养,为解放江南准备干部。当时有朱斌、杨秀云等新党员,还有一批积极分子,杨秀云的未婚夫朱明豪、现苏州大学总务处的徐若浓等,当时他们已经各自把家庭都安置好了,由于敌人已经封锁了长江,因而都没有过去。

1949年1月,朱帆对我说,他工作太忙,今后由吴苏和我一起工作,吴有家属,以什么名义出面为好,等吴来后再研究吧。朱走后,倪妙珍和三个孩子仍然与我一起住同里。

1949年1月末,吴苏来了。几天前我曾到苏州接他来同里熟悉过路线,和朱帆交接了工作。现在他是正式来接替工作的。我告诉吴,近来同里的形势很紧张,敌人常来查户口。吴说他没有正式身份证。我们研究仍用兄妹的名义就不行了(因吴讲一口常州话)。我的意见,遇到临时查户口,就说吴是我的未婚夫,因为接到我的信,知道最近犯了胃病,从常州赶火车来看我,一急就忘带了身份证。吴睡我的房间,我和倪妙珍睡一屋,当天下半夜,我听到敲门声。我马上轻声嘱咐妙珍,一定要按编造的关系称呼,切勿紧张。开门后,警察首先跟我到妙珍房内查对户口和身份证,等敌人往我的房间走时,我就大声说:“我家今天来了个亲戚。”这时吴苏已经起来坐在床上。

敌人要看他的身份，我大声说：“他是我的未婚夫，是因为听说我最近犯了胃病，他急忙赶来看我的。因为急于赶火车把身份证忘在家里了。”吴苏也向敌人讲他家的买卖的字号。敌人继续追问，我抢着回答我们预先编好的话。警察一定要把吴带走，说如果吴是好人，取身份证来保他。我大声说：“我犯胃病，在布摊上疼得呕吐了，我写信告诉他，他能不着急吗？你们要带走，那我马上找寄父去！”吴苏被带走后，我马上去找寄娘周桂英，这时天还没有完全亮，寄娘的儿子车列平出来开门，我一进屋就扑到周桂英的床边哭了。她被我哭得懵头转向，就说：“行了行了，不要哭了。我一定用我的老面子把他保出来，你再哭，我的心要碎了！”小列平说：“姐姐不要哭了，妈妈一定能把姐夫保出来！”我回到住处叫妙珍赶快做饭，我往镇公所给吴苏送饭。我看到因没有身份证被抓去的人不少，屋门口还有一个兵站岗。我大声说“太不象话了，本镇自卫队排长的女婿也抓来了。”我告诉吴苏不要怕，寄娘去保他了。我了解到他还没有受审讯，。我又去寄娘家，这时周桂英正在家里发愁。她说区长和镇长不同意放，一定要拿身份证和户口本才能放人。又说：“桂仙呀，磕头作揖都不行，你就马上到常州拿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去吧！女婿的安全有我呢，我叫列平去送饭。”我听到这里就哇地一声哭了，边哭边说：“寄娘呀！谁家姑娘没过门，就跑到婆家去要未婚夫的东西？多叫人家笑话我呀！以后过了门，我怎么在他家过日子呀？”我哭得好伤心，我还说：“他父母都知道我在同里镇有寄父母，很有地位，一个堂堂的自卫队排长的女婿，就关起来了，我没有脸去见他的父母。这次他到这里来，主要不是来看我的，主要是让寄父母看看是否同意；假如你们都同意，我们就准备结婚了。你不是说过，我找对象必须你同意吗？”这时周桂英非常激动，连声说：“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不要着急，我拼出这条老命来，也要把我的寄女婿保出来！”

我回到住处，布置妙珍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下午二时左右，列平告诉我们，区长和镇长都同意下午三点放姐夫。我说：“小弟，

妈妈今天累了,你今天多干点活,我去接你姐夫。”列平走后,我就到镇公所附近等吴苏出来。

我送吴苏迅速离开了同里镇,他急忙赶到苏州去了。我回住处,把自己的衣服用水泡湿后,用竹竿晾在院里。正在这时,小列平来找我,说:“姐姐,今晚妈妈要请出力保姐夫的人吃饭,叫你和姐夫、大嫂全家都去吃饭。”我说:“行,你姐夫一夜没有好好睡觉,现在正睡呢。等他睡醒了,我们全家都去。”列平说:“妈妈还叫我买鲜鱼呢。”我说:“你就到东街去买吧,那里经常有活鱼。(因为我们脱身要往西走)你在家帮着干点活,不用再跑来叫我们了。”等列平走后,我们就四门大开,布置了一个空城计。我和妙珍迅速从小路转到街西头的轮船码头,赶上了去苏州的最后一班轮船。

当晚6时,我们在苏州盘门外上岸,到娄门内妙珍的姑姑家。第二天到苏州市卫道观前2号华忠良联络站,找到了吴苏和他的爱人陆璐珍,他们见我安全归来高兴极了。联络站的同志告诉我们到农村找工委的路线,我和吴苏就下乡了。找到工委后,我就又在工委任秘密政治交通员了。此后吴江县的工作,仍由朱帆回去领导。

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过江后的第二天,中共澄锡虞工委又交给我一项很艰难的任务:要我把怎样和进驻吴江县的解放军接头等事宜,立即通知吴江的朱帆和吴明同志。

当时我从外地完成任务刚回到工委,工委限定我这次吴江去必须在两天以内返回来。我马上从无锡北面的斗山附近的一个村子出发,中共澄锡工委连夜派了两名武工队员送我到东亭附近。我一人到无锡东门一个同志家化装换了衣服,到车站一看,客车没有了。国民党的地方官吏和汤恩伯的部队都在抢着往几节敞蓬军车上挤。车厢里的伤兵大喊大叫:“快开车,快开车呀!共军已经过江了!”我这时大模大样地要上这趟火车,有个军官拦住了我。我说:“你没有长眼睛呀!我是从南京来的。我接到我哥哥的电报,叫我马上到上海护送我母亲到重庆去。”这个军官说:“小姐,令兄是谁?”我说是马步

芳(我父亲曾通过当炊事员的同事介绍,给马步芳的母亲当过炊事员,知道马步芳的母亲在上海的住址)。他吓了一跳,赶快陪笑说:“小姐对不起!”他后退了两步,我就上了军车。火车开开停停,车上的国民党兵不时用机枪往车外扫射。就这样,火车勉强开到浒墅关。我被挤在火车头上(身上还藏着文件),大家挤得有点站不住了。这时有几个军官要求下车解手,我也跟着下去了。当时小麦已长得很高了,我就装作到麦田里解手的样子溜跑了。这里到苏州的路线我很熟悉,我穿过敌人的不少封锁线和关卡,直奔苏州盘门的汽车站和轮船码头。这时到吴江县的汽车和轮船都没有了,我到大粪行找徐若浓联系。我把装着绝密信件的火柴盒交给他,要他无论如何今夜一定要把这个火柴盒送到吴江,交到朱帆或吴明的手里。徐立即摇着大粪船往吴江送信去了。我便连夜往无锡赶路,到虎丘附近,天还没有大亮,我又化装成农村妇女。原想沿铁路走,这时铁路和公路上,都有从长江岸边撤退下的汤恩伯的部队,拥拥挤挤地往上海方向赶。他们倒背着枪,嘴里骂骂咧咧,碰到老百姓就抓夫挑东西或领路。于是我又往梅南方向走,走到枫桥又碰上了汤恩伯的败兵,要抓我去当挑夫。我就装哑巴,他们问我什么,我先摇头不说话。有个败兵说她是一个哑巴,于是就把我放了。走了一段路,就钻到一户人家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到灶房里,伸手从锅底下抓一把烟灰往脸上抹,又把衣服撕破,把头发弄乱,像个疯子,再摇摇晃晃地往北走。路上没有国民党兵时,我就加快脚步走。碰上敌人败兵时,我就装疯子,嘴里胡言乱语的。其实我心里非常高兴,长途走路也不感到累,也不害怕。

走进梅南地区就有我们的地下党了。后来又遇到了敌人的散兵,他们一面逃跑,一面跑进农家屋里抢东西。我躲避不及又遇上了,又要抓我当挑夫,我就装疯。快到梅村镇了,我不从镇里穿过去,因为如碰上坏蛋强学曾手下的人,就要被抓去杀头,我从西仓镇的东边穿过去。走到梅北区的一个联络点上,老顾家见我这般模样吓了

一跳,喊道:“桂仙,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我大笑起来,说我是装疯,不然早被国民党败兵抓去了。他家的两个小青年连夜送我到梅北塘埂上,群众告诉我赵建平等等都在许家桥。我们拚命赶到许家桥,大家见我回来了,就把我托起来,高兴地大声喊:“桂仙回来了!”当夜我又跟着澄锡虞工委到东亭镇接收政权去了。

从此我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地下工作的生涯。这次赶往吴江送信,也是我为吴江县人民的最后一次服务。1975年我在苏州治病时,吴明也在苏州治病。久别重逢的徐若浓一见我就高兴地说:“阿姐呀,你最后交给我的火柴盒,我吃了许多苦头,直接送到了吴明手里。”吴明点头,说是准时送到的。

我已离开吴江30多年了,有许多地名、人名和具体事件都记不清了。而且当时是单线领导,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1983年5月,我离休后回苏南探亲,蒙中共吴江县委党史办的邀请,得以旧地重游。我到同里镇探望了老乡亲们,看望了房东凌家大嫂。她高兴地告诉我,解放不久,她就把我们原住房子里的家具,都送到吴江县政府去了,并且她把县政府开给的收条,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我还探望了老寄娘周桂英,才得知那天当夜我们走后,同里镇自卫队长和副队长到了她家,追问我和吴苏、妙珍以及三个孩子的去向,并说是车子权和周桂英放走了共产党。周桂英说:“我们全家有三个脑袋你们可以拿去,但你们早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还同意放人呢?”车子权还曾为此被一度关押。

吴江县同里镇的广大群众,当年那样坚决地掩护我们,使我深受教育。

(许丽娟同志离休前系辽宁省新华印刷厂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我的工作回顾

高山

1947年9月，经中共南方局（时南方局来上海，正与上海局合并）决定，由我来接替赖卫民（赖应棠）在苏州、无锡、吴江的工作。当时吴江已有吴江县中学的倪明，倪是经苏州范文贤同志发展入党的。他俩均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倪明武大毕业后回吴江，利用吴江中学校长倪承楹的亲属关系，到吴江中学任训育主任，以职业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

那时时局严重恶化，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军事进攻。党中央指示要加强大中城市的工作，按照中央“短小精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首先要建立党的力量，建立好党组织，发展党员……

吴江县城有一座完中，是县中。几个镇上还有些小规模丝绸厂，由于内战，亦奄奄一息。吴江濒临太湖，土地肥沃，主要靠农业。有不少外地移民来太湖围垦造田，其中有河南帮赵安民为其领袖人物。

在吴江中学，倪明发展了教师胡德瑒（胡斌）入党，胡原系伪中大的进步学生。后来，胡斌又发展教师余名清入党。胡还在学生中发展了党员，其中有陈关孝、王无非、史月娥、黄强华、王寄南等等。余名清也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与倪明是同学，后来胡斌与余名清结为夫妇。

倪明通过费旭初、费因笃来了解吴江的情况。发现赵安民坚决主张抗日，赵有“咸菜司令”的别称。因他平时能与士兵共甘苦，经常吃咸菜，由此而得名。赵安民担任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少将司令，为人正直清廉，遭到国民党的排挤，遣散在家。我嘱倪明同志，要利

用费旭初、费因笃的关系，接触赵安民，先从时局、抗战、持久战等谈起，交换意见，进行充分的考察。赵安民坚持抗战，所谈看法与我党主张是一致的。

我经过分析，觉得赵安民进步可靠，就让倪明介绍，把我作为一个外地进步人士与赵接触，使我对赵能作进一步的考察了解，我发现赵安民确实为人正直，而且家庭经济也相当拮据。当时按照赵的地位，他是很可以搜刮一些钱财的，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谈，认为赵对党比较尊重，不象一般上层人士有些自以为是（近年来，我听赵安民长子赵洪祚说，其父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投身过革命。这情况赵安民当时没有谈）。他的认识，与我党的主张基本一致，那时我们发展党的力量，就是包括发展武装力量的。赵安民因系河南帮太湖围垦农民的领袖，又搞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他虽遭排挤遣散在家，但其同乡、部属连营干部不少，而且有些还在工作，掌握着一定的武装。为此，我决定秘密发展赵安民入党。（我那时的职务为中共苏锡吴工委负责人。1942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我以地委委员条件入中央“二一”高级党校学习过。）

1948年初，我到上海，与赖卫民一起向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汇报工作时，我谈到了赵安民的问题。钱瑛同志表示赞许，并嘱我要谨慎，不要暴露。

当时我对赵安民作了工作布置：要赵利用同乡、部属的关系，联络感情，组织群众，必要时给予武装，赵安民在这一方面是化了不少精力的。另外，赵还组织过他的部属下太湖。那时太湖里湖匪很多，赵安民就带了部属下去，名为打富济贫、打击奸商，实际上是去组织小型武装，联络散匪，再予改造。一次不巧，在活动时，为太湖水警队捕去。因赵部属的船为帆船，而水警队则为小汽轮，速度够不上，故没有能逃脱。赵安民就一面派人去稳定情绪，一面迅速设法营救，那时只要没有政治色彩，一般湖匪也就问题还不大，当然亦是很冒风险的。

1948年9月,组织上调我第二次去无锡工作,我就将赵安民的关系转交给周克同志。1984年6月,吴江县委党史工作座谈会上我得知,周克又转给了苏州工委张云曾,张云曾又转交给了金佩扬。到解放时,赵安民组织起武装有两千人左右。至于大军渡江那样顺利,当时确是没有这样估计的,布置是作好战斗准备的。

费旭初是在1948年初被发展入党的。因他在吴江找不到工作,生活上发生困难,后来他去外地一中学找到一个音乐教师的位置,工作一阵子。

费因笃当时是作为一个进步教师,与他保持一定的联系。费因笃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物价飞涨,政治腐败表示不满,对共产党表示同情。费还自称,天主教的最终目的与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相同。我们对费因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同时也从他的传教中,了解到一些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费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吴江中学教师党员胡德瑒(胡斌)、余名清于1949年初调离吴江去无锡工作,直至解放。

1948年2月,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党员刘惕恒在斗争中暴露,苏州城防指挥部要找他,组织上布置紧急撤退,刘星夜离开苏州去上海。刘惕恒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生,是由倪明向其父亲(倪父任苏州工专的总务主任)介绍而安排在苏工专教导处任教务员的,并兼几节课,进行学生工作。为防止株连介绍人,保护地下党的安全,倪明也就紧急撤离吴江。1948年底,倪明又调去无锡工作,直到无锡解放。

(高山同志离休前系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

地下党工作回忆

倪 明

我在1945年夏从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毕业后到重庆,与同学刘惕恒等一道,由新华日报社介绍去湖南、湖北新解放区,结果未走成而留在蒋管区。1946年春回到苏州。我通过远房叔叔、吴江中学校长倪承楹的关系,于1946年8月到吴江中学教书。那时,我虽然还未入党,但与党已经有了联系,我决定回到吴江教书,决心在家乡扎根,以吴江中学为基点,开展革命活动。

我1946年8月回到吴江,1947年7月入党,至1948年1月撤离吴江,共一年半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情况大体如下。

我到吴江中学,担任训育主任,教全校的公民课,并兼任高一班的级任教师。那时与我一道到吴江中学的有武汉大学同学刘玉(她在1945年夏从重庆到中原解放区,1946年春从中原突围出来,回到苏州她爱人范文贤的家中,范原名万经野)。刘玉在吴江中学教初中英语和女生体育,兼初一班的级任教师。我们到吴江中学以后,经常与在苏州教书的武大同学范文贤、陈凤萧等在一起,学习时事政治,并讨论在教育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时,由于我们初到吴江,又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所以我在吴江进行活动时,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做好本职工作,搞好与周围教师的关系,以便站住脚跟。对教师,通过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同时向他们介绍当时在大中城市已经比较流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的情况。对学生,通过阅看他们的周记、作文等,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注意发现有正义感、要求进步的同学,以便作为培养的对象。对于面上学生的公开活动,我是推动他们开展一些班级的自治活动,讨论时事,组织歌咏

队、篮球队等,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以便活跃学校的沉闷气氛。对社会上的人士,则是利用我土生土长的有利条件,经常广泛接触亲戚朋友和老同学等,全面了解社会状况和历史情况,并因人而异地进行一些适当的工作。

就这样,经过一年时间,到1947年放暑假,我对吴江的一般社会情况和教师的基本情况,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学生中,也发现了一些比较纯洁、有正义感的同学。

1947年7月暑假期间,我由范文贤介绍、陈邦辛(也是武汉大学同学)监督,在苏州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了。同时,由于当时国民党已经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已经爆发,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此,我们力求自己的工作更加实在,活动方式更加隐蔽。我入党以后,范文贤就介绍高山同志来联系我,于是我就在高山的领导下,开展吴江的地下党工作。从我入党到1948年1月撤离吴江的半年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从外地邀请一些进步的大学生到吴江中学来教书,并在他们中发展党员,以集结革命力量,开展吴江的工作。

1947年暑假以后,刘玉不再到吴江教书,我就把由范文贤介绍的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胡斌(化名胡德琢)和陈凤萧介绍的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余名清,一起安排到吴江中学来教书,胡教物理、化学,余教英语。胡斌曾参加过中央大学的“五二〇”学生运动,他在1947年8月到吴江中学后,我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感到他要求参加革命的心情比较迫切,工作表现也较好,所以在1947年10月,经请示高山批准,由我介绍胡斌入党。余名清是由苏州地下党员陈凤萧介绍来的,余到吴江以后,政治上要求进步,对做教师和同学的工作也较积极,我亦经请示高山同意,就交给胡斌去联系,并发展了余名清入党。后来,他俩就结婚了。

二、注意发现要求进步、有正义感的学生,并进行培养教育,以便今后在条件成熟时成为建党的对象。对这方面的工作,我和刘玉从

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半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的,是有一定基础的。例如在我担任级任教师的高一班,就有周维新、郑永骏、计重远等同志。在刘玉担任级任的初一班,就有王寄南、史月娥、王无非等学生。胡斌入党后,我也要他在自己担任级任的班上做深入的学生工作。因为教师在自己担任级任的班上做深入的学生工作,比较自然,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胡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后,发现了陈关孝、沈祖吉、黄强华等同学比较好。对以上这些同学,我们都是作为积极分子来培养的。过了一段时间,胡对学校的情况逐步清楚了,高山就要我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开展校外的活动。因此,我就要胡多负责校内的学生工作。

三、接触社会,了解情况,开展工作。

我到吴江后,在和校外人士的接触中,发现有一些人明显表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经过我们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后,他们能明白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参加革命。鉴于我们开展工作的需要,后来发展入党的有这样两人:

一是赵安民。1947年上半年时,我就听吴江中学教师费因笃说,赵安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不满,现在很苦闷,想东山再起搞武装。对于这样一个抗战时期曾在太湖里做过忠救军司令的人,能有这样的言论,我是很重视的。为此我曾先后向范文贤、高山汇报。但开始时,都只是作为一个情况来掌握的。到1947年10月后,高山对我说,如果能通过赵安民在太湖里搞一支武装,并为我们所掌握,那对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配合太湖地区的解放,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高山要我直接去和赵接触,以便弄清他的真实态度。当然,要接触这样一个人物,危险性是相当大的。因为他本人曾搞过忠救军,他的两个弟弟当时还是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军事科长和吴江县保安团的营长。但我们分析,赵在抗战以前,曾因与福建人民政府有联系而被国民党逮捕过;抗战胜利后,并未因当了忠救军游击司令而升官发财、鱼肉人民,相反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挤,当时正被遣散在家,

经营农业。而且群众还反映，赵本人生活俭朴、为人正派等。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在谈话中掌握分寸，注意他的反应，灵活应对，是可以去接触他的。于是，我经费因笃介绍认识了赵安民，以后我就单独去找他。每次谈话，我总是先顺着他的话来讲，然后逐步表露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也能接应我的话而且表明自己的态度。从而使谈话逐步深入。例如开始时我说：“目前社会黑暗，我们青年人很看不惯，你想东山再起，我也愿意跟你们一道干。”他就说：“你们搞文的，我搞武的。”后来去找他时，我就说：“现在要搞武装反蒋，我们力量单薄，恐怕还得要和共产党有些联系才行。”他就说：“抗战初期，我在湖南衡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时，曾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但现在却很难找了。”我就说：“我的有些同学比较左倾，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共产党联系。”他就说，“那你去找找看。”我说：“你也想办法去找找看。”再一次去时，我说：“人没有找到，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论联合政府》，一本是《论解放区战场》。”他就说：“让我好好看看，你带这些书可要小心，若被人查出来就麻烦了。”在这些谈话中，我有把柄在他手上，但他也有把柄在我手上，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他表示：“共产党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都是很对的，的确是为国为民的。如果能够找到共产党，我愿意接受共产党交给的任何任务。”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赵的态度已经明朗，而我的安全并没有发生问题。因此，我和高山都认为赵的反蒋和要求找党是真的，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同时，高山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请示了上级，上级领导也同意我们做赵的工作。于是，就在那天晚上，高山和我一道到赵家，做赵的工作。我们一方面与他交换对时局看法，同时让赵介绍自己的历史，那天夜里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我回学校上课，他们继续谈话。此后不久，因为苏工专地下党员刘惕恒出了问题，我和刘都奉命紧急撤离苏州。以后，赵安民就由高山直接联系。地下党和赵安民的联系就是这样，由我先开了一个头，以后由高山亲自掌握，并发展他人党。

二是费旭初。费旭初是我哥哥倪达幼年时的同学，早年在上海音专读书。抗战胜利后，他失业在家。我刚回到吴江时，听我哥哥说，费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对我姐姐倪淑英到延安参加革命表示同情、向往。以后我就主动去接触他，通过交谈，感到他对时局有一定的认识。他常说，但愿江南早点解放，国民党早点完蛋等话。同时也知道他仍然爱好音乐，并正在搜集江南的民歌等。这样，我就把他作为一个经常联系的对象。后来，为了活跃吴江中学的气氛，我推动学生自己成立青年歌咏队，并邀请费旭初来教唱歌。同时，我也鼓励费旭初去教唱歌。他在歌咏队里，除了教唱一些应付国民党的歌曲以外，更多的是教唱抗日歌曲（如《太行山上》），民歌（如《小白菜呀》）以及在苏州、上海学生中流传较广的讽刺歌曲（如《茶馆小调》、《古怪歌》）等等。对教唱歌这件事，费是很认真的，也能注意掌握分寸。通过唱歌，在学生中起了一定的积极进步作用。同时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1947年夏入党后，继续保持与费旭初的联系，他的思想认识不断有所提高。到1947年底，在地下党与赵安民的联系已有较大进展的情况下，为配合进一步去太湖里发展武装，决定由我和费旭初谈入党的问题。当费旭初知道党组织正在考虑他的入党问题时，明确表示了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所以，费旭初是在1948年初，由我介绍、高山批准入党的。没几天，我因发生苏州刘惕恒的问题而紧急撤离吴江，费旭初就由高山去直接联系。

在吴江中学的教师中，当时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还有费因笃、倪承楹、庄寿鸿、刘公直等人。一方面我能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经常地向他们作一些宣传工作。以保持一定的联系。

1948年1月，由我介绍到苏州工专去教书的武汉大学同学、地下党员刘惕恒，因在反对学校当局开除五个学生的活动中，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开始，我还想通过我父亲倪荻舟（时任苏州工专总务主任）的关系把局面扭转过来。但后来知道，学校当局已经把学潮的情况报告苏州城防指挥部，局面已难以扭转。因而我立即向地下党

领导汇报，经研究决定，刘惕恒和我都在当天下午作紧急撤离。我就是这样离开了吴江，吴江的地下党工作，以后就由高山直接去领导了。

(倪明同志离休前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吴江中学的活动情况

胡 斌

1947年夏,我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毕业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辗转介绍,到吴江县中学当教员。1948年12月,为了迎接大军南下,党组织调我到无锡市工作。我在吴江中学一年半(三个学期)时间,地下党活动的情况,现就我回忆所及,叙述如下。

一、对吴江县中的领导

我是作为吴江县中训育主任倪立明(倪明)的朋友和老同学而到吴江的,由倪推荐给他叔父——校长倪承楹的。我当时用的原名胡德琢,教高、初中物理、化学课。刚进校时,我和倪立明两人住一间房。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和交谈,他得知我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就已经参加了党的外围核心组织“十月社”,并参加过南京“五二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以及搞过助学运动等进步学生运动的工作。不久,他就让我写自传和入党申请书,经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1947年9月,在倪立明家里,由中共党员高山、倪立明两同志为介绍人,为我举行了入党仪式。

我入党后的第一个联系人是倪立明。按照他的意见,他负责校外和学校内上层人物的工作,我负责校内学生的培养发展工作。教师中余名清也是党员,她是武汉大学毕业生,在苏州参加地下党组织的。经苏州地下党组织介绍,交给倪立明到吴江中学来教英语。倪立明经常要我和余名清到他家中碰头,谈学校的情况,反映教师和学生的动态,研究如何联系群众,做进步学生的思想工作。有几次晚上,在倪立明家里,我们还一起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这一时期,吴江县中学党的工作是由倪立明负责的。

记得在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我有一二十天没见倪立明来学校

了。随后(1947年12月)高山直接到学校找到我,告诉我说,倪立明在苏州一个中学的活动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吴江县中学。县中的地下党工作由我负责,他以后和我直接联系。还说,因工作需要,我的候补期定为三个月,组织上已批准我转为正式党员,可以在县中发展党员。因此,从1947年12月起直到1948年底我离开吴江县中学,这一段时间县中地下党的工作由我负责。高山直接领导我们。有时高山不便来吴江时,就通过苏州地下党的同志找余名清去苏州布置工作,然后再由余名清转告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苏州一个茶馆里,我们和高山会面。当时国民党金元券贬值,市场大刮抢购风,我们到中午都买不到饭吃,跑了好多店只买到一些花生米充饥。眼看国民党反动派要垮台了,解放在即,我真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啊!

第二学年快要开学时,校长倪承楹对我说,学校教务、训导两处合为教导处,原教务处主任刘公直任教导主任,要我任教导副主任。我请示了高山,经同意后,就当上了县中的副教导主任,并任高初中的理化课。

大约在1948年8月,高山告诉我说,为迎接大军渡江解放江南,地下党组织由苏南学联单线联系调整为地区单线联系,我的联系人换成了老张同志(即江苏工委书记张云曾同志),他会来县上找我接头,说是我的舅父。9月,老张与我接上头,11月老张说高山要调我和余名清去无锡工作,吴江县中党的工作由我发展的党员教师赵广祥负责。1948年底,我离开吴江县中前和赵广祥说过:“苏州来的老张直接和你接头联系。”我和余名清借口回武汉老家就调到无锡市工作了。

二、培养发展党员的情况

我到吴江县中的第一学年,主要是根据倪立明提出的分工意见,在学生中了解、物色发展对象,做了些教育培养工作。这段时间,倪

立明经常与我研究学生工作的情况及做法,我利用教高初中理化特别是兼任初三级任的合法身份去接近学生,开展工作。开始,我通过批阅学生周记,了解学生的思想倾向,平时也留心观察学生的言行。最初发现陈关孝、沈祖吉两位同学的周记上对国民党挑起内战、在蒋管区镇压学生运动有些不满,他们也常主动和我接触,要求进步心较强。我就注意和他们接触、谈心,向他们讲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情况,分析内战形势,并借一些进步的书籍杂志给他们看。要他们看后再找我谈谈自己的认识。经过这样培养、教育,当他们对革命有了一定认识,有了行动的要求时,我要他们结交进步同学。经过陈关孝、沈祖吉了解,黄强华和初二班的王寄南、史月娥、王无非等同学表现较好,我就吸收他们作为培养、教育的对象。

由于地下党组织通过学校任职的党员关系(主要是倪立明),不断介绍进步教师来江中任教。来江中的教师前后是不少的,倪立明未离开江中这一段时期中,除了我与他经常研究学生工作外,教师中还有余名清,她住女生宿舍,做女同学和女教师的工作。她与邵文枚老师、小余老师都相处较好。在男教师中,高中历史教员郑白清表现进步,他是广西人,家在外地,我与他接触较多。为了不引起学校其他教师的怀疑,我与郑白清和本县的一些老师一样,常去听弹词说书等。

倪立明离开江中后,高山直接与我联系。我以江中教导副主任的公开合法身份接近学生,继续做培养、发展工作。经过大半年的培养,陈关孝、沈祖吉首先发展,让他们写了自传和入党申请书。然后交给高山审查,经他批准,吸收陈关孝、沈祖吉入党。由于地下党在吴江中学的学生中已有相当时间的工作基础,加以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的影响日益增大,威望迅速提高。这一段时期,在高山直接领导下,经过我们的工作,江中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进展较快,除了陈关孝、沈祖吉之外,还先后在学生中发展了赵广祥入党。这样,到1948年下半年,江中的地下党组织,在教师中由我和党员余名清、赵广祥

联系，在学生中由我和陈关孝、王寄南联系，再由他们联系其他学生党员。随后，学生党员成立了党支部，选举王寄南为支部书记。

三、吴江县中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在我未到吴江县中以前，倪立明、刘玉等同志在学生中曾组织时政讨论会，并以歌咏、体育活动来联系、教育学生。学校内有一部分爱好读书的学生组织了青年读书会，还出版过小报。我来江中后，倪立明给我介绍了党在学生中的一些活动情况。由于江中地处县城，类似当时大城市学生的公开进步活动，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放在发展组织、团结培养进步学生上，以积蓄力量，迎接大军南下。我们在学生中做工作都比较隐蔽，讲求实效、讲求合法、公开的方式。个别接触交往多，集体活动甚少。尤其在倪立明被迫离开吴江中学以后，高山要求我们注意保存力量，不要搞公开的活动。自然，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影响下，吴江中学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学，对校方提出过民主改组学生会的要求，经过斗争，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产生学生自治会，选举进步学生担任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接着，寄宿的学生不满校方办伙食克扣学生，要求自己办伙食，有的党员学生也参加了。闹到倪承楹校长那里，校方被迫同意学生自己成立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江中的这一些民主进步活动，当时并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胡斌同志曾任湖北省石化局计财处处长）

吴江学生运动

王新五

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9年5月初,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展开了吴江地区青年学生的反蒋爱国运动。1946年冬天,以吴江县中学、江苏省吴江乡村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反蒋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学生运动的发展,不仅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加强了革命启蒙教育,而且对推动吴江各界的反蒋爱国运动及迎接解放,起了先锋的作用,也为解放后的新政权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青年干部。

根据当时地下党的单线活动原则,吴江青年学生在反蒋爱国运动是分两条线展开的。

一条线是先在中共苏南学联工委,后调整为中人苏州工委领导下进行的;另一条线则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在吴江的党员领导的。这两条线是在吴江解放前的一月许(即1949年3月)才会师的。

第一条线主要是在中共地下党员倪明、胡斌、赵广祥等同志领导下进行的。1946年8月,中共苏南学联工委派遣了倪明、刘玉等到吴江县立中学开辟工作,他们领导和开展了吴江青年学生的反蒋运动,并发展了党组织,生气勃勃地开展了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为解放吴江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青年干部。这条线上进行的大量工作,要请倪明等老同志回忆,这里就从略了。

另一条线则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在吴江的党员王新五具体主持下展开的。

1946年冬,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学生党员王新五(1946年5月由徐祖德、汪礼彤在复旦介绍入党),因病回吴江休养。他的党组织关系仍由上海党直接联系。1948年夏,王新五的健康基本恢复,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当即与马兴、夏枫和潘庆林等在外

地升学的江中毕业生，在暑期中一起组织了“吴江旅外同学会”。在当时全国进步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团结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进行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随后，为了扩大影响，进而团结教育校内的学生，将“吴江旅外同学会”，扩大为“吴江青年同学会”，吸收吴江中学和江苏省乡村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同学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为几十人。

吴江青年同学会主要举办了下列三件事：

一、开办“江友”图书阅览室

“江友”图书阅览室是对社会广大群众开放的图书报刊阅览室。除订有《新闻天地》等作为掩护外，大量订有进步报纸杂志和图书，供阅览和借阅，如：

《文萃》、《观察》、《民主》和《文汇报》等报刊；

《竖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第四十一》等苏联的文艺小说；

《大众哲学》和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

《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解放区见闻录》等介绍红军和解放区的读物；

其他如当时由苏联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进步读物等等；

还有仅供内部阅读的党的刊物《群众》。

阅览室在学校放假期间，由青年同学轮流值班，平时主要由王新五值班。阅览室对进步青年介绍苏联文艺小说，对其中比较了解的青年就推荐他们阅读“解放区见闻”等读物，对会员中比较可靠的学生则组织他们内部阅读党的刊物《群众》。

阅览室是王新五用中山街他家的两间空屋设立的，所以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阅读报纸杂志的。几百册图书除了由青年同学会会员捐赠一部分外，大部分是王新五拿出来的。书橱等设备也是王新五

提供的。当时借阅和读书的积极分子有邹金林等进步学生。在筹建阅览室中,积极分子有杨琨、叶锺瑾等,他们为阅览室油刷标志等,做了不少工作。

解放后,在吴江新建立的县新华书店,就是利用“江友”图书阅览室的房屋及设施开业的。新华书店开业后,阅览室的图书阅览等活动就停止了。阅览室的图书后来都交给了吴江县图书馆。

二、出版“江友”油印小报

《江友》油印小报,由王新五牵头,马兴主编,编委有马兴、夏枫、王芷芸、潘庆林、陶养生等。参加编辑、刻印和发行的还有王正斌、刘树春、林怡然、杨熙华和刘中干等。

《江友》结合当时的国内时事政治形势,揭露反动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江友》刊登了《密勒氏评论周报》上翻译的或从陕北解放区电台广播的战讯中听到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还介绍了各地高校进步学生运动的动态,以及吴江青年学生的活动概况等。

《江友》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吴江的青年学生,《江友》在当时的吴江青年学生中起了一定的宣传革命、鼓舞斗志的作用。

三、举办暑期补习班

在1948年暑期里,江中毕业的青年同学,利用江中每年暑期都有补习班的传统,开办了一期暑期学生补习班,给在校同学补习了功课。

吴江青年同学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是通过放电影、搞义卖来筹措的。电影是由马兴向他的母校——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联系取得的。

1949年3月,也就是离开吴江解放前的一月许,中共苏州工委将王新五在上海的党的组织关系转给江中的党员赵广祥,两条线由此会师。党的组织在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保存力量、迎接解放”后,工作虽统一布置,活动仍是分头进行的。

青年同学会分别秘密准备了县党部、政府机关、警察局、保安队

和粮食仓库等的位置图及电话号码簿等,提供了接管政权用的机密资料,还印制了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招贴,以配合解放军入城后的方针政策的宣传。1949年4月29日,组织欢迎队伍,热烈欢迎解放大军和党的南下干部进入吴江县城。至此,吴江完全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手中。

(王新五同志离休前系国家文化部基建司财务处处长)

我在同里

孙瑞成

我 1940 年入党, 1941 年入伍, 在北撤前为单线特派员, 北撤时任区宣传委员。1946 年 11 月, 我从苏北返回苏南, 当时属中共十地委丹北工委领导。丹北工委包括镇江、丹阳、武进、扬中四个县, 工委书记是赵文豹。我们的任务是找职业掩护, 有个立足点, 发展组织, 积蓄力量, 待机行动。方法是以广交朋友——择交朋友——深交朋友, 直到发展组织。

在回来之前, 由十地委书记金柯找我谈了话。然后我和另外三个人: 张泽华、严瑞庆, 一个女同志一起于 1946 年 10 月 23 日到达上海。先找严的妹夫, 然而他正巧不在上海。严在出去找工作时又遇到了叛徒, 被密捕密放。为此, 我也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 即回到了苏州。

1947 年 4 月, 我利用表兄吴伯荣的关系, 到吴江县同里镇立足。我改名孙云峰, 以在吴伯荣的鼎泰南货店当职工为掩护开展工作。我负责外部, 吴伯荣负责内部, 所以, 我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同里镇为立足点, 活动在苏州、上海和镇江一带。

1947 年春, 我在苏州看到《明报》上登载了中共十地委的组织系统分工的情况。我分析一定是十地委出了叛徒, 因为党的内部分工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在春节前夕, 我到上海找到了十地委, 把情况向组织作了详细汇报。当时, 组织部长陈云阁代理地委书记, 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讲, 把你们的关系转到苏常太工委去吧, 先到朱禄贵处, 隔三个月我们去联系。

我在同里镇期间, 发展了一些党员(先由我发展了几个, 后又由吴伯荣发展), 共有 14 人。因当时上级要求我们在广交——择交

——深交朋友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因而不填申请表，不举行任何仪式，但要求党员记牢自己的入党时间。我在1948年冬离开时，交代吴伯荣负责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担任支部书记）。

1947年6月4日，“邹月娥惨案”发生时，我在同里。邹月娥是同里镇第四保国民学校女教员。那时同里驻有国民党军官一百多人，这天晚上，有军官五人，闯到邹月娥家，用棉花等物塞满她的嘴，进行轮奸，使邹惨死。我们利用当时群众极其愤怒的情绪，以吴伯荣担任镇南货业同业工会主席的有利条件，通过商量，决定让吴伯荣出面，进行合法斗争，发动群众进行罢市、罢工、罢课，要求严惩凶手，讨还血债。整个事件是我们一起商量研究，由吴伯荣出面的。我记得上午开会，下午就进行了罢市、罢课，共计有三天。在罢市、罢课的第二天，镇长就挨门挨户动员复课开市，并说什么日本人在中国不知奸淫了多少妇女，而军官队是我们的有功之臣，何必要如此呢等等。我当时在店堂就当面对他说：“既然军官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残忍？你还好意思帮说什么呢？”镇长没有话可说，就转身走了。在群众的压力下，三天后政府答应惩办凶手。

当时，军官队的凶手想逃走，我曾对自卫队商团班长陈安堂（吴伯荣店中的职工，其妹夫在1941年牺牲）讲：“你们要把轮船码头查封好，不准他们进出，不能让他们随便跑掉。”

我还为邹月娥写过一首诗和一幅挽联：

邹君才学贯青年
月白风清星满天
惨遭暴徒来践踏
女士不屈堪称贤
品行端方坚贞不屈可谓女中丈夫，
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不愧巾帼英雄。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的一年中，我一直坚持在同里开展工作。1949年春节前，我离开同里到上海，因解放军要过江了，我又回

到苏州,没几天苏州就解放了。此时,同里镇还没解放,我就托人带讯给吴伯荣,让他把镇自卫队的枪支集中起来,将镇上的工厂、仓库等保护好,迎接大军到来,结果,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孙瑞成同志离休前系句容县侨办主任)

“地下团”芦墟支部的点滴回忆

沈立人

全国解放前夕，汾湖之滨的芦墟镇曾经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一个支部。她是前中共太湖工委（太湖游击队）领导的“地下团”的一个直属支部，先后发展了进步青年 10 余人。时间虽然已过去 40 年，有些事情只留下依稀的印象，但回忆起来，仍使我们这批已逾或已届花甲之年的战友们深受激励。

1948 年秋末，我与战友们因组织秘密团体“群社”被捕，关在“首都特种刑事法庭”，并被判处 7 年有期徒刑。实际上只蹲了 70 天的“老虎桥大学”，在 1949 年元旦蒋介石下野后的求和声中，与其他公开审判的“政治犯”同时得到释放。回到苏州后，接上了前太湖工委的关系，工委书记薛永辉要程伯皋和我为主要负责人，根据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苏州城里（当时还叫吴县）发展地下团员，为迎接解放培训青年干部。

我是吴江人，虽然离开故乡芦墟已久，但是还熟悉几位亲友，考虑有条件发展一个点。在此以前，“群社”开展活动时，我爱人宣镜渊一度在芦墟小学教书。通过她的关系，先后认识了陈力、陈景天、袁荀、王仲煊、夏怡曾、殷安如等几位青年教师。后来，陈力和袁荀来过苏州，我也去过芦墟。经过酝酿，从学习团章入手，在 1949 年 2 月底，这个支部终于呱呱堕地了。记得当时，我们几人聚在陈景天家里，谈形势，谈任务，谈志愿，谈理想，直至深夜，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

以后的活动是：（1）发展组织，迅速壮大。我们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和店员、职工，只是没有农民。大家家庭出身各有不同，但思想认识基本相近。（2）学习文件，提高觉悟。学习的文件有

《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是从苏州带往芦墟的。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在缸里，上面还塞满了雪里红咸菜。(3)向群众宣传，有目标地传递和散发在苏州编印的《新民主报》和其他秘密宣传品。在一个小镇上，这要冒一定的风险。(4)适当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由袁荀转到苏州，再送到太湖游击队去。这些情报在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完成，显然需要日以继夜的紧张活动，而不能坐待解放。

大军渡江后的下一天，芦墟“地下团”的同志立即有人来找我，谈起他们已经引人注目，受到威胁，问我怎么办？但是，当时我们也只是接到上级的一些原则指示，有联络上层人士、保护生产、掌握物质、迎接大军进城等。此时，芦墟已经有点象真空地带，他们几人一商量，决定索性把牌子亮出去，以安定人心。芦墟同志这样做了，确实发挥了主动性，而在组织纪律上是欠缺的。当然，这个责任，应由我负。

苏州解放后，市委办了第一期团训班，芦墟的地下团员有七八人进了班，毕业后多数同志回吴江分配工作，少数同志留在苏州。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坎坷不平，遭遇不一，有的不尽公正。直至1986年，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对太湖系统的地下团作了复议，才解决问题。前几年，我与黎里镇柳亚子纪念馆的殷安如通信，从他那里知道芦墟支部几位战友的情况，但至今未及晤面。现在，除原来我苏州市财政局工作的陈力在“文革”后患喉癌去世以及当时的联络人冯培先也因病不治外，多数同志已经离休。今年4月，我和宣镜渊在郑州信息学院的干休所找到了解放后未再相逢的陈景天，也已两鬓苍白了。回忆往事，心情是欣慰的。但愿有一天，能去芦墟重新聚首，畅谈往事，重温青年时代的这段生活。

(沈立人同志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共十三大代表)

纪念沈月箴

肖心正

沈月箴于1981年2月4日去世。

2月11日举行追悼会，亲朋群集哀悼。同她一度工作过的老领导、老战友都送来了花圈，其中有党的情报系统的老上级吴成方，现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生前好友彭柏山和夫人朱薇明等等多人。吴老已过80岁了，还亲自赶来参加。那时潘汉年还没有平反昭雪，月箴遭受无辜株连也没有复查平反，所以对于悼词的内容，我们经过千斟万酌，当日又经过吴成方的修改，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她抗战八年中为党工作，特别是在党开辟吴江地区工作方面，作出过积极贡献的一段斗争历史和功绩。参加追悼的不少亲友，包括她的家属在内，第一次听到她以往的革命经历，想不到多年以来以费一苇笔名的弹词编写者，却曾为党历尽艰险。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平反昭雪的通知。同年12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决定：“沈月箴历史清楚，解放前曾做过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1955年7月16日，以反革命案把她逮捕，1956年12月24日释放，是受潘汉年错案无辜牵连，现予纠正，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她的沉冤终于平反了。潘汉年和她本人的平反，原是她奄奄一息、忍死以待的一桩心事，可惜早死了一年十个月，等不到这一天。但是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貌，生者则从中增加了对她的全面认识，这难道不是她生前的强烈愿望吗？

(一)

沈月箴，江苏吴江县平望镇人（1919年生——编者注）。她在儿童时代受父母仳离的影响，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寄养于黎里女子小学

美术女教师徐某家中。

小学毕业后回平望照顾其父亲生产,读一些旧书和各类小说,能背诵《红楼梦》葬花词,又酷爱弹词,喜欢缠绵悱恻的唱腔,颇有身世飘零之感。

抗战的炮声一响,江南水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淞沪战线上撤下来的大量伤兵从苏嘉铁路运到吴江。县里举办护士训练班,她被介绍去学习 and 实习救护伤兵的工作。参加这个训练班的青年大部份是自愿报名的,内有中学生,有小学教师。她在班中同吴江李同真、黎里杨赞珠等相友好,在抗日高潮中,迈开了关心国家大事的第一步。当时上海宝山一仗,下来很多伤兵集中吴江。伤兵医院解散,她又随父亲避难于黎里,寄住表兄毛海涛家。1937年11月吴江沦陷,日军占领平望时,又烧毁了她的房子,于是她真正成为无家可归的少女,在黎里生活下来,时方18岁。

1938年初,吴江中学王怒安老师失业在乡,办了一个国文补习班,以学旧体诗为主。同班级六七人,其中有黄惠姊弟、月箴和金大鹏等。月箴初学旧体诗,她写的七绝,诗意清新,老师在她本子上曾援笔题署曰《墩隐诗草》,并把她原名月珍的珍字改为箴,于是她才废其旧名。另外她自己又起一个别号叫雨莎,因莎草喜湿,以示不怕风雨。在那段日子里,她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决心摆脱家庭束缚,走革命道路。

(二)

1938年8月,月箴和李同真一起到上海,事前她和大鹏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打算通过她的表兄毛啸岑,从柳亚子先生那里去找共产党关系。她并没有白费心血,终于由王绍整介绍,参加了共产党情报系统领导的“武抗”,在中央特科的党员丁秉成(原名陈显堂)、张琼英(当时称她为“李太太”)夫妇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情报干部入党问题的规定,沈月箴在1938年9月

参加“武抗”进行情报工作之日起，就是中共正式党员）。

吴江地处苏浙两省交界的苏、嘉、沪三角地带，面临太湖，是河港交织的水网地区。当时，除了吴江城区和苏嘉铁路沿线的平望、盛泽等镇有敌伪驻军外，其它市镇的大片农村并无守敌，而游击队多如牛毛，其中著名的有太湖地区的程万军、赵安民的部队，严墓乌镇地区的朱希部队，黎里北厍地区的郝道生、陈阿有、黄玉麟等部队，各占一方。这些部队中也有抗日分子，但大部分是游而不击，有的则鱼肉乡民，被称为“老刀牌”（即土匪）。1938年夏，国民党派遣沈立群为吴江县县长，在严墓和黎里地区成立沦陷区的县政府和抗敌自卫团。当时共产党情报系统策划兵运工作，打算运用各种地方社会关系对这些部队做争取改造工作，建立人民武装抗日力量。于是上海党组织派遣丁秉成前来吴江，在太湖地区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党的工作，当然，在那样复杂的条件下，工作是十分艰苦的。

月箴从上海回来后，以毛啸岑表妹的身份去找沈立群，打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充任办事员，站住了脚跟。1938年9、10月间，许多青年同志和党员相继从上海到吴江和太湖地区来，她接受组织上交代的接送任务，初步显露了她具有秘密工作的才干。丁秉成从上海到黎里，后来丁和其他同志从黎里到严墓，都是由她陪同带路的。凡敌伪岗警检查盘问的时候，她都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例如施光华（当时用名胡光华）到吴江也是由她带领，她和施作为同学，特意买了七八盒日本货的野猪牌蚊香，把秘密文件藏在底层的蚊香盒子里，坦然地拎在手里，坐在黄包车上。经过岗哨，日军哨兵指着她手里的蚊香盒子问：“蚊香？”她毫无惧色，神态自若地晃了晃拎着的盒子，日军哨兵没有检查就放行了。

开始，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在苏嘉铁路路旁的黎里、北厍、浙江的陶庄等地区活动，后来转到严墓地区活动，月箴始终跟随。她和县长沈立群、秘书沈秩安等上层关系搞得不错，与青年亦十分接近。

我和沈文潮都是盛泽绸厂职工，因战事停工失业，由于和沈立群是亲属关系，便在县政府谋职，后投奔到抗日的队伍来了。国破家亡，满腔热血，矢志抗日救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还是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还没有公开暴露反共的真面目，国民党县政府标榜的抗日救国，不过是一种手段，已经渐渐地徒有抗日之名，游而不击是实，谋私利，图虚名，顽固势力日渐嚣张，压制青年抗日活动。我们对这种现实十分不满，心情越来越苦闷。

1938年10月，月箴同大鹏在黎里镇小学邀集青年20多人，举行抗日座谈会，我和俞清志都参加了。这是我同她第一次见面，印象很深。自此以后，她经常主动接近我们，亲切交谈，对俞清志反复宣传“武抗”的十大救国纲领，希望他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对沈文潮也做思想工作，使他坚持在沦陷区工作。特别是她对我说过的话，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我们的生活里有爱也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我们的周围并不是无边的黑暗，而是有光明的，一线曙光，要经过搏斗，才可以争取得来的，不要尽钻在矛盾的小圈子里，要跳出这个小圈子，到大圈圈里来，到大海里去游泳。”记得她还把这些话写在我的一本记事簿里。那时我已经有收集材料的习惯，曾经把她的题词，她给我、给大鹏和给清志的信件，收藏好在一只书筐篓里。可惜在1942年间为防日军搜查，我的母亲把它同我6年间的日记一起埋藏到乡间的小棺材里，等后来挖出，已经全部烂掉了。

她和我们经常穿越平望和八坼之间的苏嘉铁路，来往于黎里严墓之间。每当傍晚或拂晓蒙胧时，我们趁巡逻的敌人过去后，就偷越封锁线，她紧握一支八寸手枪，坐在船上，注视前方，等远离危险地带之后，她又轻声地唱起“游击队之歌”来了。1938年12月，她曾和我潜入敌占区盛泽镇观音弄一个富户家中，在深夜挖掘埋藏在地下的一支七九式步枪、一支四寸小手枪和许多子弹。此后，那支小巧玲珑的手枪就长时期归她使用。

1938年10月后，她利用取得县政府通信员的机会作掩护，担负

起党的情报工作的艰巨任务。县政府通信员的职责，是把县政府的报告文件，送往位于宜兴张渚的国民党江苏省第二区专署，再把国民党上级的文件带回吴江。途中要经过苏州、无锡、张渚等地区，每一处都要经过日伪岗哨的多次盘查。在当时条件下，单身女客住宿是很受人注意的，旅馆内常在半夜突击检查，但她都从容对答，没有出过岔子。为了我们党掌握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她利用种种适应身份和社会习惯的办法来掩藏这些国民党密件，终于通过了敌人一道道关口的严密检查，到了我们的手里。有一次在无锡城门口遇到了危险，一个汪伪女警察对她手里的二盒食品，发生了怀疑。正要检查，她冷眼盯住女警察，悄悄说：“大家都是中国人，讲点交情！”女警察也盯了她一眼，马上机灵地叫她快走。此后，月箴把这件惊险而奇异的遭遇，写成一篇小品，题名《女警察》刊登在我们编辑出版的《义旗》上。

她每一次从张渚回来，在把文件送达县政府以前，先在黎里或严墓戴家湾住处，把国民党的反共绝密文件及有关重要情报资料抄录下来，提供给党组织，直接交给了秉成。由于她的艰苦努力，为我党获得了大量的重要情报资料。除此之外，她还和我一起作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有系统地收集整理了一份吴江地区敌伪顽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资料。施光华为指导我们的工作，曾交给月箴《采访指南》一书，她后来交给我，我把它紧缩成一个小本本，一直保存到解放。

1939年5月间，国民党县政府设立无线电台，可以和张渚的专署和江南行署通报。为了进一步控制文电通讯机构，全面掌握情报来源，月箴曾推荐译电员。上海党组织派王莹（现在北京公安部工作）到吴江，但由于国民党县政府上层阻挠，王莹无法打入而重回上海。后来由沈文静担任译电员，我们仍然控制了这个机要部门。

1939年年初，县政府的工作重点从苏嘉线路东的黎里地区，转移到路西的严墓地区。我们住在严墓镇郊的雷墩荡戴家湾，散居在

贫农雇农家里。那儿是一片连绵的桑林，满眼郁郁葱葱，她常常和我们漫步到镇上去，迎送友人，领取上海寄来的进步书刊。“武抗”的上海战友洪锡瑾、张流芳先后到过严墓和黎里来探望我们。张流芳还从上海秘密送来了“武抗”章程的油印本，由我保存到撤离严墓时才销毁。她和我们亲切交谈，倾听我们的吐诉，欢快地畅谈抗日主张和前途，团结在她周围的不止是我们几个人了。

当时的“武抗”以县政工队为立足点，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严墓、算墟庙等地区的农民、青年群众中，工作开展得很好，影响很大，鼓舞了农民和士兵对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在县政府里的青年群众也汇成一气，参加了政工队的演剧、歌咏活动。“放下你的鞭子”激起了群众的义愤，“流浪三部曲”、“太行山上”、“救亡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响彻田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强的围屏，哦！延安，你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这首激励青年产生无限力量的“延安颂”是她当时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1939年7月，由统战对象严墓税务所主任马希仁主办，我负责编辑的《敌忾》月刊出版了。在创刊号上有洪奔的木刻“夜袭”作为封面，发表了丁秉成、金大鹏、庄绍桢、马希仁、姚逊等撰写的抗日救亡文章。月箴和我一起冒着酷暑，赶2小时路程，到搬迁在震泽镇郊农村的震泽印刷所进行校对，印数500份，分发给本地读者和浙江、江苏、上海的单位 and 书刊报社，受到读者的欢迎。由于我们采用了《上海周报》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口号，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密令爪牙通知震泽印刷厂拒绝承印，因此《敌忾》只出版了一期创刊号就夭折了。月箴当时除协同我一起编辑校对出版工作以外，还写了几篇反映农村抗日活动的散文，其中就有一篇《女警察》。1940年6月，重新出版的《义旗》上还登载了她几篇文章，文笔流畅，清秀隽永，文如其人的文章。

当时丁秉成在太湖一带进行地方武装的争取转化工作，建立了

一支由 30 多人发展到 100 多人的由我党领导的“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丁秉成常常在黎里、严墓一带活动，直接领导月箴工作，对她关怀备至。记得 1939 年初，丁秉成给她写过一张字条“警惕！警惕！注意生活。”这张字条给我看到了，月箴说，这是老丁教育她在国民党县政府内活动要努力学习，在生活上防止受自由散漫的影响。还有一次，丁秉成从上海来，随带一磅黑色绒线，自己不用，送给她结围巾御寒，使她深感党的温暖。

同年 8 月，她患恶性疟疾，病中还写了一篇题名《炎夏的草地》的散文，描写农村抗日生活。当时，施光华等都曾来戴家湾探望她。8 月下旬，丁秉成等在吴兴、宋淞遭国民党突然袭击而牺牲。从 9 月开始，“武抗”人员分批撤离吴江。

同年 12 月以前，国民党江南行署举办特种工作训练班，通知各县政府选派人员前往训练。为了深入敌人心脏，更好地开展党的情报活动，月箴就与我和大鹏研究，抓住这一时机，使金大鹏也打入这个训练班，同去的还有沈文潮和马希贤。

月箴和我在严墓戴家湾送别大鹏等登上一叶小舟远去，随即月箴也离开严墓农村到上海做城市工作了。

(三)

月箴到达上海以后，与申新九厂厂校教师李同真同住在槟榔路（今安远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党内受“李太太”——张琼英领导，后来曾被派去无锡梅光迪部队提取捐款，将款项上交给季方。以后她就转受吴成方领导，化名为沈墨樱，以霞飞路（今淮海路）伟光医院任职员为社会职业（伟光医院院长李伟光是台湾籍共产党员，已去世）。党组织又曾经派她到南京去，打算打入汪伪和平军十四路军谢文达部做争取转化工作。行前，组织上指出，此行的任务艰巨，在纸醉金迷荒唐无耻的环境中，情况十分复杂，但她并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服从党的分配，毅然准备只身前去。后来因为情况发生变化，此

事没有成功,仍折回上海。

在这段日子里,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丁秉成的谆谆告诫她逐渐淡忘了,终于在1940年4月,没有得到吴成方的同意,就擅自离开了伟光医院,转到浙江北路上海难民收容所办的慈联中学,并在新闻路一所劳工夜校教书,化名兰琼。慈联中学是上海地下党办的,她去那里是否另外接上组织关系,就不得而知。当时她对我们没有直言相告,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学校里她仍然贯彻难民收容所党支部的方针,生活也十分艰苦,吃的是难民收容所的粗粮,每月只有几元生活费,有时在外边吃不上饭,就饿一顿,从此得了胃病、贫血症和其它多种疾病。

接着发生的变化是,同年秋她随同在慈联中学工作的一个南洋华侨青年潘培能离开上海远去新加坡,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开始用王静娴的化名。临行前,她在阴历7月7曾来严墓与我道别。我发现她对严墓的一草一木怀有特殊的感情,似乎不忍离开,然而她毕竟悄然渡海而去。

当时吴江工作正处在朝气蓬勃的高潮时期,许多抗日青年对她十分怀念。我曾经写了一封三四千字的长信,详述雷墩荡人们的活跃气氛,希望她回家乡工作。

我的信是1941年4月初写的,然而不久之后,反共高潮血染了严墓。沈文潮、虞仞千等同志壮烈牺牲了,我们被迫撤离吴江。而她在新加坡也由于参加抗日斗争,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赶回上海,和我们重新见面,这是同年9月间的事了。

她在上海呆了个把月,寄住在佛教觉园内她胞兄沈宗威的单身宿舍内。我们虽然常见面,但不谈工作,不久她又单身去香港。事后知道她到达香港后,就在王绍鏊的领导下工作。她曾来信说起常见到柳亚子先生,亚子先生很喜欢她,曾以诗相赠,称他为“吴江花木兰”。可惜这首原诗早已遗失,而且在新近出版的柳亚子诗集中也找不到了。

1942年初，月箴受党组织的派遣到达桂林，在党的情报系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公开面目是“西南联大”借读生。同年11月，她从桂林调回上海，组织上决定送她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她从桂林到上海，竟赶了一个多月的路程。

她到上海后，由刘人寿联系，逗留的日子很短。11月12日，组织上通知她同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一起到淮南根据地去。因为鲁迅艺术学院在华中没有设分院，组织上分配她在华中局情报部做秘书工作，部长就是潘汉年。当时她仍用王静娴的化名，另名王珍，同志们都叫她小王。

她在华中局情报部工作时，潘汉年根据中央来电，指示张唯一将密藏在上海中央文库中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文件送到延安去，以供中央起草“七大”文件参考。刘人寿同志把这些文件摄成缩微相片交给交通员带往根据地，无奈当时华中局情报部没有照相放大机，只好叫交通员何萃和秘书沈月箴两人配合，用一面放大镜边读边抄，终于完成了任务。所以当时送去中央的这份重要文件，还是月箴亲手缮写的。对于这件事，她一直讳莫如深，从来没有吹嘘过，直到刘人寿写的《怀念潘汉年同志》，在1982年9月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公开发表后，我们才知道。

此外，在工作余暇，她仍旧十分爱好旧体诗词，曾经手抄杨帆同志于淮南根据地所作的诗稿，精心珍藏下来，又收藏了孩子剧团、汉年夏衍合影等多种珍贵照片。从这些爱好中也可看出她当年的志趣，曾得到一些负责同志的赞赏。记得在淮南工作的历史学家李亚农同志有诗相赠：“绰约风姿锦绣才。当年秋瑾似重来，征人何幸沙场里，得见奇葩烂漫开。”

她在根据地先后共约9个月，到1944年7月因肺病复发咳血，经组织批准，调回上海治病。8月间，潘汉年化名王伯威来上海，她以侄女身份，在汉年同志身边工作，常和张唯一、张静林、董慧等接触。9月，她和我一起到吴江芦墟，利用当地伪区长是我们同乡的关

系,搞到一张化名王伯威的身份证,潘汉年从上海出发,秘密通过敌占区前往延安。潘汉年临走时,把她安排在胶州路瑞芝村。我曾同她不时见面,但限于党纪的约束,不能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来我也被敌人逮捕了。我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她还通过组织,提供过营救我出狱的线索和办法,后因情况复杂未果。相隔8个月,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宣告胜利。我出狱后同她再次相见。此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她在上海也曾为党做了些有益工作。

月箴为党做过多年工作,特别是在吴江地区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所以写下这些史实,作为怀念。

(肖心正同志离休前系华东纺管局秘书)

附录四:烈士传略

张应春



张应春(1901-1927),女,1901年11月11日(农历十月初一)生于吴江县黎里区葫芦兜村(今黎星村),字蓉城,应农谚“十月应小春”之说而取名应春,后因仰慕秋瑾女侠为人,又自号秋石。

应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张鼎斋(又名肇甲、都金)是一位博学乡儒,曾任黎里女校教师,加入过柳亚子先生创办的“南社”。母亲姓金,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因一连生下4个女孩倍受歧视,以致精神几乎失常,这使应春从小仇恨封建礼教,萌发争女权的强烈愿望。

张应春少年时就读于黎里女子高小。她从小疾恶如仇,敢说敢为。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年号为“洪宪”,校方下令学生在写课堂日志时,将“民国”改为“洪宪”,应春十分气愤,大骂袁贼倒行逆施,坚决不从。她的反抗精神深得同学钦佩。

应春勤奋好学,各科成绩均佳,数学尤为出众。她平时生活朴素,关心同学,柳亚子的小妹柳均权是应春的同窗好友,在教室内,两人的课桌平列而置,放学回家结伴而行,十分亲密。应春多次对均权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乃封建意识,我辈要勤奋学习,要争女权,要以天下为已任。令兄亚子为何与你姐妹三人取名‘平权’、‘公权’、‘均权’?你该顾名思义!”

1919年,张应春高小毕业,随即考入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门学校。三年读书期间,她关心时局,经常在日记中表达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痛恨,和对国家兴旺、人民自由的渴望。她在日记中写道:“想到国家前途甚至危险,美、英、法、日四国能同盟协约……恐怕就是瓜分我国的基础。我想到这一层,更加惊骇得不得了,心中不觉叭

一跳,好象开汽车一般。”她每当度假时,总要带着妹妹走访农家,和乡亲们谈心,询问收成好坏和生活情况,关心农民疾苦。她说:“农民终年辛勤耕作,却不得温饱,太不公平。”

张应春在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到福建厦门集美女子师范担任体育教员一年。暑假,应春因小腿患丹毒而回家乡医治。一路上,耳闻目睹人民疾苦,到家后,她与同学和乡亲交谈中,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鼓励大家。

在这段时间里,经柳均权介绍,张应春与柳亚子先生结识往来,十分投机,成了亚子先生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学生和战友。1923年秋,张应春经柳亚子介绍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任教。在松江,她先后结识了中共党员侯绍裘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等。张应春在这个环境中深受教育和熏陶,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她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张应春投身革命后,为了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女权,毅然带头剪去发髻。在二十年代的旧中国,女子剪发还极为罕见。她父亲知道后,严词责备。应春说:“大人苟终弗儿谅者,儿且远走北国,终身不复宁家矣!”表现了她一往直前的坚决态度。

1925年春,张应春离开景贤女中,回到吴江县家乡。她的齐耳短发,在故乡遭到某些人的非议,有的小孩跟在背后叫她“盛泽尼姑”,但她意志坚强不为所动。在张应春的竭力倡导下,黎里镇创办了一所暑期妇女学校,应春被公推为主任教师,负责教务工作。同期,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在黎里镇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张应春与柳亚子、江苏省党部代表侯绍裘(中共党团书记)一起登台,发表演说。她慷慨激昂地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心协力,国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抛弃三大政策,就意味着背叛了三民主义。”号召大家时刻记住和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她雄辩的讲话受到听众热烈的赞许。会后,应春手捧孙中山先生遗像,和柳亚子、侯绍裘等一起带队上街游行。

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正式成立,张应春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革命呈现出一派蓬勃气象。但是,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反动面目日益暴露。1925年9月的一天,沈玄庐(又名沈定一,上海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后堕落为西山会议派骨干)闯到江苏省国民党党部,指责省党部进行赤化宣传,诬蔑共产党抢席位,抢占省党部各级委员会名额。张应春义正辞严地予以反驳:“在革命困难的时候,你们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革命形势好转了,就想来坐享其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提出的,你想反对,难道你比孙先生还高明吗?”驳得沈玄庐理屈词穷,灰溜溜地离去了。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工作开展十分艰难,张应春常常通宵达旦,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工作之中。在国民党右派下令解散妇女运动委员会后,应春针锋相对,与中共党员杨之华等日夜奔波,另行组建了妇运会。

在斗争实践中,张应春深切地体会到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她挤出时间到中共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场所——上海大学听课。张应春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识不断提高。1925年10月,由侯绍裘介绍,张应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11月17日写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说:“我认为入了党(指中国共产党),当然以党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牺牲的。至于使命呢?我们恐怕无异吧——革命,孙先生遗给我们的使命吧?”表达了她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精神境界。

1925年12月,国民党右派把庆祝东江胜利为主题的妇女集会改为各界妇女联欢会,张应春对此十分不满,拒绝参加大会以示反抗。她在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接连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并就妇女工作的经费、妇女部长人选、及注重劳动妇女工作等问题,与柳亚子进行磋商。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应春

作为江苏省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会上,她提出了关于妇女运动的两项议案。回沪后,张应春又参加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召开的市县干部联席会议和干部训练班,与各县干部广泛接触交谈。她每天工作很忙,经常和妇女部秘书史冰镒等彻夜讨论问题,第二天一早又投入新的工作。

为了指导妇女运动,扩大革命宣传,张应春决定创办一个妇女界的刊物,名曰《吴江妇女》。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吴江妇女》于1926年3月8日妇女节的那天在上海创刊,张应春为主编。刊物的宗旨是:号召妇女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以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张应春在创刊号的《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一文中说:“我们吴江的妇女……要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经济独立,为社会上法律上教育上求得种种的平等”,“向压迫阶级进攻”。《吴江妇女》在当时只能秘密出版发行,张应春冒着生命危险,忘我工作,承担了组稿、撰稿、编辑发行、筹划经费的全部工作。《吴江妇女》虽然仅出版了5期,但它对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和指导作用。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在南京举行,张应春与柳亚子、侯绍裘等人先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那天上午,在南京夫子庙贡院召开的大会上,张应春发表了演讲。会后,举行群众游行,她手执“拥护国民会议”的旗帜,走在女工队伍的最前列。下午,在中山陵墓破土奠基时,国民党右派雇用一批打手冲击会场,向柳亚子等左派领导人大打出手。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张应春等女同志挺身而出,奋力护卫,使柳亚子等安全脱险。

同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到段祺瑞政府请愿,刘和珍等爱国青年学生惨遭屠杀,酿成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张应春怒不可遏,亲自执笔撰写了《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指出:“革命的事业,没有流血是不会成功的。我亲爱的女同胞,大家起来奋斗吧!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找着光明

的道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她还在《悼北京为爱国惨死的女烈士》一文中写道：“烈士们！姐妹们！你们可以算死得其所了。……你们的流血是群众的。”“北京女烈士的惨死，在意义上可以和德国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卢森堡的被害相提并论。”张应春日夜奔走，四出演讲，每天只是随便吞几口冷饭充饥。一次，她被密探跟踪，就机警地避入贝勒路恒庆里柳亚子的住处，摆脱了敌人的盯梢。

1927年3月，罗亦农、周恩来几次提议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南京，以加强中共对革命的领导。侯绍裘率省党部成员于4月2日抵达南京。因积劳成疾，正在吴江家里治病休养的张应春接到裘一连三封急电，便不顾家人劝阻，于4月7日毅然离家赴宁。此时张应春已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国济难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党外仍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

4月9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中共南京地委召开各革命团体负责人会议，决定第二天上午举行南京市肃清反革命派大会。10日上午9时，四五万群众举行集会，侯绍裘愤怒谴责蒋介石唆使数百名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拘捕工会、党部负责人的反动罪行，要求释放被捕同志，惩办凶手。大会组织群众到总司令部请愿，不料，又遭敌人的血腥镇压，当场有数十群众被打死，受伤者数以百计。当晚11时，中共南京地委会同国民党省市党部、总工会的中共负责同志，在南京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和对策。11日凌晨2时，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南京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虎臣带领便衣特务50余人突然包围了会场，侯绍裘、张应春、刘重民、谢文锦、许金元、陈君起等10人同时被捕。

在狱中，张应春英勇顽强，坚持斗争。敌人严刑逼供，将她吊打一天一夜，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可她只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一句话，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凶恶的敌人恼羞成怒，最后将张应春装入盛有石灰的麻袋，用刺刀活活戳死后，秘密抛入通济门外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张应春牺牲时年仅26岁。

1928年,柳亚子从日本回国,四处寻找张应春烈士遗骸未得。悲愤之余,请画家绘制《秣陵悲秋图》,并征集题咏,以寄哀思。柳亚子诗云:

“血花红染好胭脂,
英绝眉痕入梦时。
挥手人夭成永诀,
可怜南八是男儿。”

1931年,柳亚子等南社友好在张应春的故乡北厍葫芦兜村的北莲荡滩无多阍西处建造烈士衣冠冢,于右任题“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于墓前。

1987年,吴江县人民政府为张应春烈士墓重新镌了一块纪念碑,并于墓园旁新建了烈士纪念室。

1991年11月,在张应春烈士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中共吴江县委、吴江县人民政府在吴江公园尊立张应春烈士雕像。张爱萍将军为雕像题字:“张应春烈士永垂不朽!”

孙世实



孙世实(1918-1938),又名孙方,吴江县七都乡叶港村人。1918年生,是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孙本文先生的二儿子。孙世实从小聪明活泼,品学兼优。1935年暑假,他于南京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孙世实学习很用功,又乐于参加社会活动,热心为同学们服务。当时,清华大学办有消费合作社,实际上是一种由学生自己管理的校内福利商店。孙世实入学不久,就被推选为合作社经理,他精明能干,把合作社办得有条有理,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就在孙世实考进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

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到了极点。“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年仅十七岁的孙世实,满怀爱国热情,参加到这场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去。1936年初,孙世实和黄华、蒋南翔等同志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前后,他在校内外做了许多救亡工作。有一次,北平宪警数百人突然包围清华大学,并分头冲进学生宿舍,搜捕、绑架进步学生。孙世实和其他清华进步学生对这种野蛮行动极为愤慨,他们用砖石砸坏了敌人汽车,千方百计抢救被绑架的同学。在这次斗争中,孙世实和其他20多位同学被拘捕,关押了三个多月。出狱后不久,他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北平学联大会,并被选为北平市学联的交际常委,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6年下半年,在抗日救亡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的孙世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北平市学联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七七”事变以后,孙世实和一部分同学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在淞沪抗战的隆隆炮声中,他发动组织上海平津流亡同学会,演讲、开会,四处奔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不久,他到了南京,在枪林弹雨中,仍然毫不畏惧地到处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

南京沦陷的前夕,他只身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孙世实一到武汉,正好湖北省教育厅招收乡村巡回宣传队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报名应考,并以第一名录取。不久,他就被分配到鄂西沙市、荆门、宜昌一带开展工作。因当时国民党政府并无诚意发动群众起来抗战,对救亡青年多方限制,宣传队的工作很难开展。没有多久,宣传队又被调回武汉。孙世实决定离开宣传队,与北洋大学来的党员刘讷等一起留在鄂西宜昌,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同当地党员张清华等取得联系,组成了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后来,在中共湖北省委直接主持下,建立宜昌区委,由孙世实

担任区委书记，领导宜昌及附近的枝江、宜都、公安、石首等县党的开辟工作。这一时期，孙世实多次收到父亲、哥哥的来信，要他去四川读书。但孙世实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毅然决定留在抗日第一线。当时，宜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孙世实和另外一个同志住在一座破楼上，一上楼，楼板就咯吱咯吱乱响。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办公桌，只有一张像厨房里大案板似的桌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孙世实和他的同志们坚持在宜昌地区开展活动。他经常下乡到所辖各县去抓党的开辟工作。在市区，他对国民党的反动青年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多方面团结青年知识分子。他把市区追求进步的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帮助流亡过境的青年安定生活，并努力做一些争取中间人士的工作……所有这一切，当时年仅 20 岁的孙世实都干得很出色，很老练。

孙世实在宜昌当区委书记时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韦君宜是区委的组织委员。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在宜昌又一起工作，两人志同道合，逐步从同志关系发展到恋爱关系。1938 年夏，省委调孙世实回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湖北省队部训练部长，不久任省队代理队长，并兼任全国学联干事。韦君宜也调到省委机关工作。这时，日寇已逼近武汉，孙世实和韦君宜都把全部精力扑到抗日救亡工作上，整天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唯一谈恋爱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散会之后在回所时同行的一段马路上，即使是一点时间，谈话的内容也大多是工作和学习。

1938 年 10 月，武汉即将沦陷，在武汉的共产党组织和一些机关团体分批撤退。孙世实勇敢地留守到最后，直到 10 月下旬才撤离。本来，孙世实可以乘一班客轮先走，但当时与他同行的原沙宜中心县委负责干部李声簧身染重病，因没有铺位不能走，他便坚决地留下来伴护李声簧，随留守武汉的《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乘“新升隆”轮船撤离武汉。10 月 23 日，“新升隆”轮行至湖北嘉鱼燕子窝附近江面时，突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霎时，全

船火起，难民中许多老人、妇女、小孩哭着、喊着，乱成一团。这时，船很快地下沉，头顶上的敌机仍在疯狂地扫射。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孙世实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安危，他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把李声簧安置在一张倒放的方桌上，拖到江面，让他飘离沉船，结果，身患重病的李声簧得救了。而孙世实则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仅20周岁，同船遇难的有100多人，其中有25位是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

1938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在重庆为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壮烈殉难的25位同志举行了“保卫大武汉殉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吴玉章、秦邦宪和董必武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致悼词。邓颖超专门写了哀悼诗，高度评价死难烈士的革命精神。重庆《新华日报》为死难烈士出版了追悼特刊。

丁秉成

丁秉成(1908 - 1939)，原名陈显堂，曾用名李愈秋、丁月搓，1908年生于山东省峄县(今为枣庄市)。他早年参加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夏，丁秉成受中共中央特科的派遣，到江浙太湖地区开辟工作。先后随他来吴江的有张琼英、施光华等近30人，其中有少数中共党员，其余是中央特科的秘密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的成员。他们来吴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改造杂牌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丁秉成到吴江严墓后，通过进步人士的帮助，使“武抗”人员陆续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政工队，并由丁秉成担任政工队的指导员。他利用政工队作为“武抗”的活动基地，团结了一批青年，通过办识字班、出墙报、教唱抗日歌曲、演短剧等活动，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丁秉成对青年关怀备至，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进步青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平望镇女青年沈月箴,年仅20岁,在丁秉成的直接启迪教育下入了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丁秉成与上海党组织秘密联系及文件传递,大多是由沈月箴完成的。丁秉成还指示沈月箴利用当时任县政府交通员,常去三战区传递公文的便利条件,搜集吴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及时不断地送交给上级党组织。

1939年春夏之间,中共吴江支部在严墓车家坝成立,丁秉成任书记,张琼英、施光华任组织、宣传委员。同时,又建立“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为负责人。

为了早日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丁秉成废寝忘食地四处奔走,不畏艰难困苦,坚定不移地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吴江境内的游击队情况错综复杂。七都到横扇一带有一支游击队,是淞沪抗战中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组织起来的武装。丁秉成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通过同里镇人、中共党员王绍鏊的介绍,与该游击队的副司令曹绍纹建立了关系。尔后,丁秉成又把“武抗”成员安插到该部政训处担任总干事,并利用此职之便,在政训处所属的战地青年服务团中,开展对一些爱国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吴江黎里、北厍一带,还有一支200来人的游击队,大队长郝道生是东北人,队里有不少人原先是东北军的,从上海流散到黎里。丁秉成根据上海党组织的指示,通过镇上的统战关系,结识了郝道生,直接对郝部进行工作。

1939年春,丁秉成通过关系与太湖别动队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钱康民取得了联系。钱康民是中共党员,与太湖别动队司令赵安民是老同乡老同学,结交很深。丁秉成遂示意钱康民做赵安民的工作。当时太湖别动队已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改编为江南挺进纵队第三团。由于赵、钱两人治军甚严,该部军纪作风较好,三战区怀疑该部内有共产党活动,以调虎离山的方式,安排赵安民去湖南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并派政工人员来该部监视。钱康民处境困难,丁秉成与钱康民研究了应急办法。不久,钱康民利用机会,从第三团里拉出40

多人枪，建立了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由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这支抗日武装，穿港湾，越河浜，出生入死，驰骋水乡，把江浙接壤的吴淞、义皋、大钱一带，联结成一个广阔的杀敌战场。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100多人，并与当时已东进到达无锡梅村的新四军“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丁秉成和钱康民率领这支部队与太湖边的群众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群众视这支部队为自己的部队，每当部队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便欢欣鼓舞，前来问寒问暖，送茶送饭，掩护伤病员，传递情报信件，军民水乳相融，亲如一家。

可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却对这支抗日部队深感不安，视如芒刺。他们企图以“合法”名义收缴部队的武装，被丁秉成义正辞严地顶了回去。

1939年8月23日清晨，驻吴江七都的国民党28军62师在吴淞附近埋伏下优势兵力，突然袭击了正在行进中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罪恶的子弹接连击中了丁秉成的腹部，他顽强地用手捂着外流的肠子，忍着剧痛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牺牲，时年31岁。

第二天，中共中央特科的战友和当地群众含泪在胡家兜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深情垂念丁秉成在太湖畔为建立党的武装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钱康民



钱康民(1907 - 1939)，1907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革命家庭。他父亲钱涤根190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长期奔波在外，从事革命活动，无暇顾及家事。但每当他得空回家时，总要带些进步书刊和宣传品给小康民看，并向他讲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事迹，

教育他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憎恨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父亲的言传身教,使钱康民在幼年时期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北伐战争开始后,钱涤根潜回上海建立国民革命军特别行动总队,并亲自任总指挥,动员群众积极配合和支援北伐。此时,钱康民初中毕业,告别家乡,到上海模范中学读高中,与父亲住在一起。他一面学习,一面帮助父亲做些放哨联络工作,多次来往于上海、吴江之间,传递密信,联络吴江人士响应北伐。1927年1月,钱康民父亲不幸被捕遭杀害。钱康民闻讯后,悲愤满腔,立志要继续学习和工作完成父辈先烈未竟的事业。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和革命斗争的洗礼,磨炼出了钱康民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品格。

钱康民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政法系。在大学里,他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地吸取丰富的知识,先后掌握了英、法、日等五国语言,并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和革命理论,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还经常写些唤醒民众、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同时,他仍与父亲的好友何香凝、柳亚子以及中共党员廖承志、王绍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在这一时期,钱康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上海财政局工作,后由组织上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江浙联防处任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康民利用职务之便,将倾向共产党的同乡同学赵安民介绍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特派员黄秉英,由黄任命赵为“太湖别动队”司令。钱康民、赵安民遂到浙江、安吉、吴兴一带发动爱国青年起来抗日,收集流散枪支,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过充分发动,很快就建立了一支500余人、300多支枪的队伍。1938年1月,太湖别动队在浙江省长兴县正式成立,赵安民任司令,钱康民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3月,部队进驻杭嘉湖地区,继续扩大武装。至7月,已发展为一支拥有8000余人、6000多支枪的队伍。钱康民在部队积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战士“先有国,后有

家”、“中国人要有骨气，誓死不做亡国奴”，鼓励战士们奋勇杀敌。他还数次拒绝日军高官厚禄的引诱和劝降。

1938年8月，面临国民党第三战区欲收编太湖别动队的压力，钱康民和赵安民冷静分析时势利弊，为使部队免遭不必要的损失，遂同意接受收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江南挺进队独立支队。10月，日本侵略军大规模扫荡杭嘉湖地区，钱康民、赵安民率独立支队在双林与日军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但钱康民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勇猛异常的无畏精神和行为，却在战士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3月，独立支队余部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江南挺进纵队步兵第三团，纵队司令调丘玉林来任团长，钱康民、赵安民仍留团内。因钱对部队管理甚严，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故而部队军纪作风较好，以致丘玉林检阅三团时，认定团内有共党分子，并联络汉奸部队围攻三团，虽未能得手，但后来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却派了一批政治指导员到团内监视活动，并将赵安民调送湖南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部队的处境十分险恶。5月，钱康民与中共中央特科派来吴江争取武装抗日的党员丁秉成取得联系，并按照丁秉成的意见，利用机会从团里拉出40多人枪，组建了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他们执行党中央“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率领这支抗日部队周旋于江浙两省交界的吴淞、义皋、大钱一带，袭击日伪，宣传动员民众，仅2个多月，部队就发展到100多人。并与当时已东进到达无锡的新四军“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江浙太湖义勇军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仇视。1939年8月23日，钱康民、丁秉成率领部队行进到东太湖吴淞附近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国民党28军62师优势兵力的袭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钱康民，临危不惧，果断指挥突围，双方激战2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钱康民左肋及前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虞仞千



虞仞千(1921 - 1941), 1921年11月生于嘉兴县新塍镇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经常失业,母亲给人做针线以贴补家用。仞千年少英俊,又是独生子,深得父母宠爱,视若掌上明珠。因家境清贫,初中未毕业就自谋生路,为博一技之长,自学立信会计,后在镇上农民银行办事处当练习生。在发放农贷工作中,深感农民之疾苦。

抗战爆发后,17岁的虞仞千激于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说服双亲,来到严墓,同当地青年一起投入方兴未艾的抗日救亡洪流。开始在税务所任会计,他正直朴实,沉默寡言,嗜好读书。认识肖心正等人后,志趣相投,结为好友。1940年初,肖借口人手不足,调他进县政府当助理会计。于是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肖心正、金大鹏、沈文潮等人,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曾和沈文潮等在严墓大庙演出短剧《毛维德》深受群众欢迎;盛泽除奸前夜,虞仞千和肖心正通宵印刷传单,为宣传做准备。1940年11月,他又为县政府开办的税务青年训练班教授财会知识,实际是替地下党员的时事政治课打掩护。他与学员同吃大锅菜,同睡统地铺,经常值夜班,以防日军和反共势力的突然袭击。表现得非常出色。

虞仞千一心抗日,以国家利益为先,置个人之事于后。他父母年老体弱,多次催他成婚,好了却一件心中大事。他却说服对象,不到抗日胜利,决不结婚,又好言劝慰老人,使他们理解自己的爱国心愿。在学习和工作中,虞仞千在政治上渐趋成熟,他深恶痛绝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和对抗日青年的政治压迫,终于向肖心正、金大鹏提出寻找共产党的要求。1940年12月,党组织吸收他参加搜集情报工作,担任密写。他动脑筋,想办法,研究出密写新招——用蜡纸刻写,然后印

刷，一丝不苟地完成任任务。1941年8月，虞仞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奉命从广德开赴吴江、青浦一带，执行反共任务。“忠救军”一到严墓就叫喊县政府内有异党活动，形势日趋紧张。四五月，浙西系统在吴江的两个地下党员先后被捕，其一牵连到肖心正。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紧急汇报后，立即布置金大鹏、肖心正迅速撤离吴江，沈文潮、虞仞千因未暴露身份，继续原地坚持。当时，沈、虞二人感到既孤单，又缺乏经验，但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8月，肖因经手帐目未了事务，自上海返严墓，与沈、虞同住在谨下浜农民家。肖向他们传达了上级对形势的分析，并相互交换了情况。20日，即肖回严墓的第7天清晨，“忠救军”逮捕了原税训班学员袁璋，肖闻讯赶到镇上营救无效。“忠救军”得悉肖的行踪，密谋杀之。傍晚，肖从镇上回农村宿地，途中听到枪声，谨慎地折回镇上一个熟人家投宿。当夜12时左右，“忠救军”便衣多人，突然敲开沈文潮、虞仞千的房门，追逼交出肖心正。沈、虞二人从容不迫地回答：“不知道。”特务翻箱倒筐大肆搜查，一无所获，遂将沈、虞绑架而去，从此杳无音讯。时虞仞千20岁。

解放后，在镇反中获悉沈文潮、虞仞千当夜被敌人用小船押到南浔马腰的桑田，秘密杀害，遗骸已无处寻觅。党和政府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沈文潮



沈文潮(1915 - 1941)，1915年生于吴江县盛泽镇里安街，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到镇上华记绸厂当学徒，为母分担起抚养弟妹的重担。

1931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年11月家乡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残暴地蹂躏了文明、古

老的家园,昔日繁华的市容,顷刻满目萧条,一片凄凉。爱国之心驱使着不甘当亡国奴的热血男儿寻求抗日救亡之路。1938年6月,沈文潮的叔父沈立群受第三战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委派,从江西上饶回到吴江,建立沦陷区的县政府,并声称要建立武装游击队,招收失学、失业青年参加工作。沈文潮怀着抗日的愿望进入了县政府,当司法书记(文书一类的工作)。当时在游击区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为避免日伪的骚扰,县政府经常流动,生活极不安定。

在工作中,沈文潮先后接近了打入国民党县政府的中共上海情报系统的党员沈月箴、肖心正、金大鹏,其中肖和他原是亲戚,四人结为好朋友。他们同吃、同住在农民家里,经常交流对时事形势的看法,肖还借《上海周报》、《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给他阅读,让他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情况,使他逐步产生了拥护共产党的理想。当长兄从重庆来信,叫他脱离沦陷区,到后方工作时,他已丢不下这班火热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朋友了。他毅然谢绝哥哥的关心,表示不怕危险,在家乡坚持抗日到底,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1940年八九月间,经沈文潮的一再要求,金大鹏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吸收沈文潮参加情报工作。

此时,沈文潮已担任县政府的总收发和监印官,其妹又当上了电台的译电员,为我党组织收集情报大开了方便之门。参加党的工作以后,沈文潮干劲更足了,凡是抗日的工作,都争着去做:在严墓大庙唱歌、演剧,宣传抗日;机智地闯越道道敌伪检查哨,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传送捐款收据;参加武装除奸等等。

1940年12月12日,沈文潮得知金大鹏、俞清志(三区区长、进步青年)要除掉安清同盟会盛泽分会会长、大汉奸叶冠吾的计划后,自告奋勇一同前往。傍晚,他们悄悄潜入盛泽镇,隐藏在沈文潮家中,派小弟叫来向导许永寥,一起商量行动方案。尔后化装来到叶宅。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沉寂的夜空,恶贯满盈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次杀叶活动,推动了青年武装抗日的积极性,也使敌伪极为

震惊。1941年8月，沈文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即与虞仞千同时牺牲，时年26岁。

王化鹏

王化鹏(1916-1941)，又名王听涛，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东林。他的父亲是县内著名的画家，年青时去上海美专学习，后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宣传工作。北上到济南时，亲眼见到不少革命志士被蒋介石惨杀，颇感失望，离开部队回到了老家。但他带回了不少宣传物品，给家庭带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这使幼小的儿女也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

王化鹏7岁进村办崇兰小学读书，11岁随父亲到县城二戴小学求学。小学毕业考进嵊县中学，中学毕业后到杭州考入社会教育学校。他从小勤奋好学，在中学读书时就喜爱文学，不仅喜读世界名著，而且自己也进行创作。他曾和周丹红及弟弟王梦飞组织过一个文艺团体，取名“颶风社”，并出刊《颶风周刊》。后来又有一些校外的文艺青年参加，其中也有地下党员负责指导，这样使大家得到了阅读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著作的机会，有了共产主义的向往。王化鹏酷爱诗人马雅科夫斯基那种音节短促、节奏鲜明而富有战斗色彩的诗篇，他也学着写这种诗作。在校时，他常有诗作和译文在壁报等校内刊物上发表。同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与印发救亡传单，参加示威游行等。以致在第二学期被校方开除。在返家途中又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以宣传赤化、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坐了6个月的牢。但是反动派的迫害并没有把他吓倒，相反使他更清楚地认定自己该走的路。后经保释在家住了半年，又与胞弟王梦飞同赴杭州，进了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攻读体专科，同时学习音乐。

王化鹏进入杭师后，依旧和市里的进步青年保持联系。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侵犯杭州前夕，杭师部分师生由学校组织向浙东撤退，到了浙西建德作短期休整。当时的进步教师王耘庄和张同光号

召同学们离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王化鹏兄弟和 10 多位同学热烈响应，一同离开学校，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他们在教师指导下，抄收广播中的抗战消息，从逃难同胞中打听前线战况，出刊《救亡情报》。王化鹏既当记者，奔走于车站码头；又当售报人，叫卖于街头巷尾。他们到浦江，到永康，多方寻找抗日工作岗位。一面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籍，一面进行自我训练，学习口头宣传本领，向群众作各种抗日宣传工作。王化鹏从容老练，表达能力强，演讲时有声有色，听者动容。1938 年春，他们又随教师王耘庄到金华，在“浙江省第四游击支队”分别担任各中队的指导员。王化鹏在第三大队第七（或第八）中队，与士兵同吃大锅饭，同睡统地铺，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道理。七八月间，王化鹏与同学们仍由老师王耘庄介绍，到永康方岩参加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倡办的省“抗日自卫会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9 月，参加全省县政工队集训总队集训。集训后王化鹏参加了以姚旦为队长的“省政工队第一大队第二队”。10 月，随队出发浙西前线，受命开展对敌“政治进攻”。我党要求同志们在这个旗号下到浙西开辟工作，散播革命种子，开展党的活动。当时，先后编队从方岩出发的各队中，以姚旦队中的党员为最多，王化鹏就是其中之一。

王化鹏在浙西敌后先后到过吴兴、桐乡、崇德，任过菱湖工作组组长，州泉工作组副组长。当年的浙西环境非常险恶，斗争尖锐残酷，王化鹏工作得很起劲，还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写诗作文。从 1939 年到 1940 年短短一年间，他写了很多反映战斗生活的短诗。他的诗清新、质朴，充分反映了同志们的如火豪情。登在队刊《突击》半月刊上，流传到浙江、桂林后方和香港文化界，得到好评。

1940 年夏秋，王化鹏调入吴江县政工队，负责民运工作。不久，苏浙特别支部成立，他任宣传委员。当时吴江县地处敌伪相互勾结的三角地区，政工队所在地严墓（今铜罗）及其周围，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杂牌军，又有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和平军，情况非常复杂。

要在敌人心脏地带发动群众抗日，组织培训进步青年，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危险性极大，任务十分艰巨。同年10月，王化鹏与特支其他同志一起在严墓镇创办了青年“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进步书刊，教唱抗日歌曲，讨论时政，撰写短小精悍之文章，出版油印快报《正义》和《严墓新闻》，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了严墓镇党支部，王化鹏任支部书记。此外，王化鹏还亲自动手编写《识字课本》，举办“识字班”，谱写抗日歌曲，不但提高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还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得到群众的拥护，从而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达到高潮。吴江县的国民党顽固派趁势向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发起疯狂的进攻。迫于形势变化，组织决定革命力量转入我党控制下的三区，王化鹏任三区部队的指导员。为使三区部队和民运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王化鹏多次深入乡村进行细致的调查，与广大穷苦农民交朋友。当他了解到盛家埭村的地主、富农对佃农、雇农的盘剥特别苛刻时，便组织大家学习老区实行的“二五减租”的农村政策，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为贫雇农撑腰，使地主、富农不得不按“二五减租”的规定办事。又如，他了解到某哑巴家的童养媳受婆婆虐待，便会同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去哑巴家做工作，支持这位童养媳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

王化鹏还非常重视争取统战对象，耐心教育当地的乡长和保、甲长为抗日工作出力。如大谢乡庄浜的保长，年纪轻、稍有文化、倾向抗日，他就布置两位进步青年与他结交，晓以大义，结果使这个保长自告奋勇做“联村会”的串联工作，还常常为我党提供物质上的帮助，遇到敌情则通风报信，安排隐蔽场所。后来，当我党力量被迫撤离三区时，也是他用化名弄来“良民证”，使同志们顺利通过碉堡林立的敌占区。

1941年5月，王化鹏奉命去新四军六师工作。当他离开三区驻地，准备通过新滕转达解放区时，突然遭遇到日军“清乡”部队的搜

索,不幸被捕,解至吴江敌宪兵队,经受酷刑,坚不吐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品质,后惨遭杀害,时年25岁。

陈有民



陈有民(1922-1941),又名陈子耘,1922年生于吴江县铜罗镇,1939年,参加由中共中央特科地下党员丁秉成任指导员的国民党吴江县政工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同年8月,因丁不幸牺牲,大部分随丁来吴江的党员、青年奉命转入昆山“联抗”。1940年初,18岁的陈有民追随革命也来到昆山“联抗”。在这里他得到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培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于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5月,昆山“联抗”整编为江抗第三支队第一中队。6月17日,在大风湾与日军遭遇战中,陈有民带伤作战,英勇顽强,得到党支部领导的赞赏,此后担任班长。10月底,四支队收编了地方武装石渊如部队,陈有民调往石部任指导员。1941年3月,新四军成立6师18旅,陈有民任52团2营4连指导员。日伪清乡时,2营转移到铁路以南、苏锡太湖一带打击牵制敌人,由此归入16旅建制。1941年11月,陈有民在杨树园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2岁。

顾葆恒



顾葆恒(1916-1942),又名戈白章,吴江县同里镇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教员家庭。他生性聪颖,极富正义感。7岁上同里镇丽则小学,12岁毕业。尔后,到苏州高师就读,于1934年毕业。时值其父辞世,于是他回到家乡同里,接父班在东溪小学执教。1936年,在亲戚的帮助、支持下,考上苏州东吴大学。一年后,转考入复旦大学。抗战爆发

后停学，回同里参加“抗日后援会”，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年秋，上海被日军攻陷。此时，顾葆恒与同里镇王天基、王锦帆等三人商量后决定离家去延安参加抗日武装，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一路北上到汉口，经人介绍至八路军驻汉中办事处。该处领导人李涛安排他们去新四军。当时新四军刚组编，缺少政工人员，顾葆恒三人被介绍至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在该队政治部所属服务团搞宣传工作。其时，顾葆恒改名戈白章。

1938年，部队到达南昌，顾葆恒遇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不久就调到一支队政治部下属的服务团做宣传工作，一直战斗在陈司令员的身边。当时，支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顾葆恒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1940年顾葆恒调到支队政治部工作，任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此期间，顾葆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他还曾回皖南老一团工作了一段时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顾葆恒随三支队五团副团长江渭清等同志一起经过8天8夜苦战，终于突出重围。新四军把原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改建为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顾葆恒于1941年3月到1941年10月在该旅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在此期间，顾办事认真，工作积极负责，作风正派，给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8月，部队转移到苏北靖江一带，顾开始患痢疾，病势严重，组织上专门派医生、护士照料他，但他仍不肯休息，坚持工作。期间，部队不断向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战略转移，旅部首长考虑到顾的身体状况，让他改任宣传科长。1941年底到1942年初，他的身体有所恢复，但尚未痊愈，就又到军部工作去了。本来身体有病的顾葆恒，加上拼命工作，再次病发，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42年7月在阜宁病故，年仅26岁。

倪淑英



倪淑英(1916 - 1943),又名宋维,吴江县松陵镇人,1916年生。她曾在松陵镇城西女子小学和同里镇女子小学读书。1928年8月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在该校学习6年,毕业后,先后在吴县县立新闻小学和上海市中振小学任教。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满怀爱国激情的倪淑英从上海回到吴江,立即组织回乡过暑假的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她自己带头走上街头,和同伴们一起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文艺节目,以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对上海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抗战开始。这时,倪淑英已经无法返回上海。她留在吴江积极从事抗日后勤工作,主动为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服务。这一年9月,倪淑英来到吴江县西南部的严墓区钮家汇小学任校长。在教书之余,她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大家起来抗日。不久,局势更加恶化,苏州、吴江即将沦陷。11月,倪淑英与全家一起跟着逃难的人群向浙江山区撤退,经杭州、江山,于年底到达湖南长沙。

到长沙后,倪淑英曾到长沙难民收容所帮助工作。在那里,她接触到一些革命同志,经常听他们分析战争形势,讨论抗日工作。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他们决定到抗日前线去。1938年2月春节前夕,倪淑英和其他几个同志离开长沙,北上汉口,找到了原苏州女师的老师罗琼同志(19世纪80年代前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同年三四月间,经罗琼介绍,她取道西安,到达延安。

倪淑英在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时，她同张国坚同志相识并结了婚。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陕西省枸邑县织田镇工作。不久她和张国坚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先后担任冀中公安局秘书副主任、机要秘书和晋察冀公安局的秘书长。她还是机关的党支部委员，平时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她当年的警卫员杨志毅同志回忆说：“淑英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上艰苦朴素，而且特别能吃苦。对同志，她有股火一般的热情，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我1939年参军时才13岁，没有什么文化，她就给我找来钢笔和本子，教我写字、读书，学文化。冬天，我有时晚上睡觉没被子，淑英同志就常拿她的大衣给我盖。”1940年底，倪淑英在机关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1943年秋季，华北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一场极其野蛮、极其残酷的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反扫荡斗争，长达两个多月。倪淑英的爱人张国坚当时担任冀中公安局局长，工作非常紧张，而倪淑英正怀孕，不能随他一起跟着大部队行动，组织上决定她参加分散的战斗小组活动。她所在的战斗小组共有9位同志，他们坚持在阜平、涞源两县交界的山区活动。开始时，小组里有2匹骡子，但山路崎岖陡峭，骡子不顶用，只得靠步行爬山。当时倪淑英同志拖着沉重的身子，行动困难，但她一声不吭，坚持跟上队伍。

倪淑英对这场反扫荡斗争的残酷性早有思想准备，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在斗争中她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安全。1943年9月中旬，倪淑英所在的战斗小组爬上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神仙山最高峰，在神仙山一带转了十多天。当时，她的警卫员杨志毅同志正好患疟疾、发高烧，躺在山上走不动，行军要靠其他同志背，而据点的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情况十分紧急。杨志毅要求战斗小组不要管他，赶快转移，倪淑英坚决不同意。在他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倪淑英把最后两支退热针给他注射，使他转危为安。

10月13日凌晨三四点钟，倪淑英和她的战友们宿营在涞源县

梓木沟村东头路北的一个大院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敌人来了!同志们当即决定向后山突围。他们翻过院墙,到了后山,又往高处爬一阵,回头向下一看,只见一大片头戴钢盔的敌人正在向他们包围过来。这时,后山已经没路可走,倪淑英同志一面销毁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日记,一面奋不顾身地向敌人投手榴弹。然后改道往西,走了二三里地,来到一条干河沟边,顺沟又爬到西头的小山坡上,敌人越来越近了。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倪淑英的手,顿时鲜血直流,杨志毅同志赶紧帮她包扎了伤口。这时,离开敌人只有十几米远了,小组的另一位同志起来,要杨志毅留下掩护,他搀扶倪淑英撤退。当时已是清晨五六点钟,天亮了,目标越来越暴露。在这紧急关头,倪淑英却要杨志毅赶快走,要他脱身后给机关报个信。杨志毅不肯一个人撤走,倪淑英说:“我命令你走!”并且用力把杨一推,杨志毅滚下了山坡。

杨志毅离开后,倪淑英和其他3位同志隐藏在一块巨石之下,准备作最后的战斗。她把一直带在身边的张国坚的照片咬在嘴里,把一个个手榴弹扔向哇哇嚎叫着围上来的敌人,很快十几个日本鬼子倒在阵地前。由于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倪淑英等4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倪淑英身中8弹,时年27岁。

反扫荡斗争结束,部队在河北省阜平县石家寨为倪淑英同志开了追悼会。1956年,苏州市民政局给倪淑英烈士家属签发了烈士纪念证。



姚之英

姚之英(1920-1944),小名魁元,又名姚达,1920年生。幼时随教私塾的祖父就学,后到严墓(今铜罗)镇父亲开设的中药店做事。他是家中的长子,又是唯一的男孩,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希望他子承父业,做一个循规蹈矩、自食其力的人。之

英遵照父亲的教诲，刻苦钻研中药业务。他待人和气、礼貌，深得长辈和同龄人的喜欢。

1937年11月，家乡沦陷，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族的危亡激起了姚之英的爱国热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再也无心安分地从商，而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在工作中，姚之英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化鹏、陈友群，十分钦佩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姚之英参加了“青年读书会”，阅读了《论持久战》、《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革命书籍，从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1940年11月，姚之英经王化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支部青年委员。他家的药店变成了我党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党的支部大会常在这里秘密举行，严墓镇支部的活动计划也常在这里议决产生，姚之英还利用自己的职业掩护，组织了一批要求上进的青年阅读革命书籍，学习革命理论，教唱革命歌曲，以激励革命斗志，提高思想认识。

姚之英在自己投入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时，还鼓励妹妹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年初，他鼓励妹妹参加了由中共党组织参与创办的税训班的学习，这年端午节又送妹妹投奔了新四军，并多次给妹妹写信勉励她坚定革命信念，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吴江县严墓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此时，姚之英离开新婚的妻子，由党组织派往三区盛泽工作，公开身份是区公所助理员。1941年12月，由于中共严墓区委书记赵子扬（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和中共党员蔡允中（公开身份是三区区中队指导员）被“忠救军”追捕而撤离，姚之英也一起撤往苏西游击区。后奉派去宜兴县委工作，任我方乡长。1942年夏，由于敌人大扫荡，外来同志难于隐蔽，姚之英又调往锡南县委，任组织部干事。

当时的锡南环境非常险恶，它紧靠日伪大本营无锡城，是敌我争夺的要地。1942年春，锡南被日伪划为重点清乡区，沿太湖筑起篱

笆墙,进行梳篦式扫荡。而我地下党组织不畏艰险,以顽强、忘我的精神,秘密建立游击队,恢复党的工作。姚之英与县委组织部长张文龙一起,在葛埭桥镇以开小店为掩护,开展工作。1943年上半年,形势趋于好转,我党在锡南地区建立了三个区委,姚之英任新安区区委书记。不久,又成立了公开的政权——锡南办事处,并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锡南抗日防卫团”,姚之英兼新安抗日防卫队大队长。这时姚之英的工作已半公开化,他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积极、热情地四处奔波,穿梭于新安各乡和新四军锡南太湖游击队之间,指导训练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每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姚之英总要挤出时间教通讯员吴锡良识字,谆谆告诫他“要革命就要学习文化,有了文化,对革命道理就懂得多一点”。姚之英性格随和,待人诚恳,与群众情同手足,因此工作开展很快。

1944年3月3日,姚之英参加县委会议结束,一早带着通讯员小吴赶往周巷参加党支部会。当两人走到吴泥湾村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两名便衣日军,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日军两支枪逼着姚之英。在这危急时刻,姚之英把手中的公文包丢给小吴,然后一个箭步向前用双手紧紧抓住敌人的两支枪,大声对小吴说:“快跑!”。不料后面赶来大批日军,将他们团团围住。日军欺侮小吴人小,拷打逼问他联络站在哪里?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姚之英见状,立刻说:“这小人是我在途中抓来带路的,不是新四军,你们放了他。我是新四军,有什么事问我好了。”日军将信将疑,把姚、吴两人一起押往小溪桥据点。当晚,吴锡良在被审问中,也坚持说自己是被抓来带路的,其他一概不知道。日军信以为真,就将他放了出来。姚之英被押往周新镇日军据点,党组织曾设法营救,终因敌人戒备森严而未成功。

姚之英虽身陷囹圄,但立场坚定,大义凛然,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这天夜里,姚之英被押出牢房,他立即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奋力争脱敌人的魔掌,从一日军身上抢下一把刺刀,拼命向敌人戳去,后遭敌人乱刀捅死,时年24岁。

顾关通



顾关通(1923.12 - 1945),又名夏再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12月出生于吴江县湖滨乡(现松陵镇)吴模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

1936年暑期,顾关通从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毕业,考入上海弘毅中学。1936年底,吴江庞山湖实验农场招收农业管理人员,因这个农场直属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在吴江是块“硬”牌子,经父亲再三动员,顾关通回吴江考进了庞山湖实验农场农业干部训练班。经过四个月的培训,顾关通被派在农场的二区工作。不久,日军侵华。1937年10月底,吴江沦陷,农场西撤。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顾关通,为了照顾年老的父母,只得回到家中。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顾关通满腔仇恨,年仅14岁的他,就开始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当他听说本县的横扇驻有抗日部队时,就瞒着父母,和一个大一点的同学赶到横扇。通过一连几天的留心观察,这支队伍毫无一点抗日气息,顾关通感到这不是他理想的去处,因此,只呆了一星期就离开了。为了寻求真理,1938年春,顾关通又考入苏州草桥中学,尽管学校生活丰富多彩,但亡国奴的耻辱时时刺痛着他的心,特别是中国人经过日本兵的岗哨时都要低头鞠躬,更使他深恶痛绝,不想再在苏州读书。所以只读了一学期,关通就回家了。

这时期的顾关通,考虑着自己的前途,更担心国家的命运,心情非常沉重。当时,他的父亲在县城松陵镇上有一住所,紧靠着日本宪兵队。关通和同学蒋蓉生在这里住了十来天。每当夜深人静,宪兵队刑讯拷打中国人的声音阵阵传来时,关通两眼冒火、双拳紧攥,悲愤得说不出话来。怎样才能拯救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同胞?15岁的他感到力不从心,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情况之下,他和蒋蓉生一

起书写了十几封匿名信,投寄给县城里为非作歹的汉奸,痛斥他们的卖国行径,以解心头之恨。这年下半年,关通重去上海弘毅中学插班读书。一年半后,顾在弘毅中学初中毕业。

1940年2月,顾关通从上海回来不久,就毅然奔赴太湖之滨的严墓区章奥村,参加了由庄绍桢同志领导的国民党吴江县抗日青年工作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庄绍桢同志是1938年6月由邓子恢同志派到吴江一带开展敌后抗日工作的中共党员。他给青年们上课,讲革命道理,教唱《延安颂》、《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每天早晨带领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他还将从新四军军部带来的《八路军将领列传》、《论持久战》等书籍借给青年学习,使他们了解共产党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在庄绍桢同志的引导下,关通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下定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在此期间,顾关通还结识了浙江南浔籍的青年张斌,两人志同道合,成了亲密战友。

1940年夏,张斌、顾关通等5人受庄绍桢的指派,到路东(苏嘉路以东)地区开展敌后工作。他们先到北厍,后又转移到金家坝。在那一带,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出版《正义》刊物,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顾关通还多次机智勇敢地穿过敌伪军的封锁,将刊物和传单散发到敌占区。在此同时,关通也目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互相火拼、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对来犯之敌却一枪不发;也亲眼看到北厍镇上挂着“抗日”牌子的国民党吴江县党部路东办事处,吃百姓粮、用百姓钱,却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赌,干尽刮民事。顾关通和张斌等人忍无可忍,在一天夜里将大幅标语贴在办事处的大门上,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顾关通还在《正义》上发表题为《败类》的文章,痛斥国民党投降派“挂羊头、卖狗肉”的罪行。“青工团”的宣传活动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能容忍,1941年夏,在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青工团”即被伪县政府解散了。

不久，顾关通不畏艰险，闯过重重封锁，赶到敌后的宜兴张渚，进胥井临五中学习，渴望能留下继续参加抗日工作。但没过几个月，日军又侵入宜兴地区，学校被迫解散。顾关通只得又辗转回到吴江家中。

1942年秋，伪吴江县政府公布了一个“减租”章程，名义上实行减租，实际上旨在加重压榨。顾关通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非常同情农民的疾苦。他根据广大农民的呼声，积极酝酿发起一场抗租斗争。首先，他写了一篇题为《农村一瞥》的文章，在一些农民中传阅，为抗租作舆论准备；接着，带领一批人到伪区、县政府交涉，要求实行真正的减租。迫使伪县政府不得不同意考虑重新召开“减租重征会议”，研究减租问题。在重开的“减租会”上，顾关通代表农民发言，义正辞严地戳穿了伪县政府假减租、真敲榨的骗人把戏；针锋相对地提出“减租应按灾情轻重、地区差别、田块上下区别对待；农民头上捐税太重、地主应与农民合理负担”。一番有情有理有据的讲话，直驳得会议主持者无言相对，鼓舞了农民抗租的信心。但是，这次会议并未达到真正减租的目的。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会后，顾关通和同学韩云兰立即邀集了湖梅、施庞、泰东及顾柳四乡的农民代表，到吴模村的圆通庵（俗称“十样景”）开了一次会，组织发动齐心抗租。这次会议还吸收了“催主”（当时对收租人的称呼）参加，要他们站到农民一边来。这次湖滨四乡农民的抗租联合行动，在周围农村引起很大反响。同里、八坼等地的农民也纷纷起来抗租。伪县政府惊慌失措、恼羞成怒，立即采取镇压措施，以13个地主告发为借口，将顾关通和韩云兰抓进监牢，带上脚镣手铐，囚禁了两个多月。这次斗争，更使关通懂得“在敌人的手掌之中是不能求得活路的”，也更坚定了“到火热的革命大熔炉中去，靠党领导”的信念。

顾关通十分关心家乡的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积极鼓励农民子弟上学念书。1943年1月，关通动员各界人士募捐重建本村校舍，

自己则带头捐出两石大米,并学木刻、写诗文、印发宣传品,他的行动感动了全乡农民,短短3个月,新校舍就告落成,深受农民赞扬。

1944年春,顾关通到吴县光福乡下,以教书为名,继续积极寻找救国真理。在那里,关通见到了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群众热爱的真正的抗日队伍——新四军游击队,还阅读了很多的革命书籍及报刊,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这年7月,关通接到张斌从苏北新四军寄来的信。不久,他就离别了父母妻儿,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千里投军到达苏中解放区。

顾关通参加革命后,改名夏再生。他把参加革命、参加新四军看成是生命的再生,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忠心。

1944年8月,顾关通在新四军一师苏中公学11队参加整风学习。他认真学习革命真理,深入钻研整党文件。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他就用部队每月发的一张白纸,用棉线装订成小本子,详细记录首长的报告和学习心得体会。由于他勇于解剖自己,刻苦钻研理论,思想进步很快。

1945年3月,整风学习结束后,顾关通随着粟裕司令员率领的部队南下,参加创建苏浙军区、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根据组织分配,顾关通到杭嘉湖一带农村负责搞民运工作。为了建设革命根据地,他深入敌后,热情宣传抗日,积极发动农民起来抗租减租,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一次在返回驻地途中,遭到敌伪军的包围和追击。顾关通宁死不屈,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敌人枪杀于浙江菱湖乡下的一个鱼塘之中,时间是1945年7月,年仅22岁。

解放后,故乡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他,将他出生的划船港村改名为关通村。1985年,在他牺牲40周年之时,湖滨乡(现松陵镇)人民政府在烈士故乡竖起了纪念碑,原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亲笔题写了“夏再生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这年清明节,故乡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以此缅怀先烈的英雄事迹,决心继承先烈革命遗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沈波



沈波(1925 - 1947),又名沈炜青、沈步青。1925年生于吴江县严墓(铜罗)镇一个殷实的小商家庭。他天资聪颖,生性活泼,6岁进南街小学读书,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喜爱唱歌、吹口琴、打篮球、乒乓球,在小伙伴中颇有威信。年纪稍长后,就有关心国家大事的意识。高小毕业这年,正逢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不久家乡沦陷,母校被烧,家境败落。

1940年夏秋,中共党员王化鹏、陈友群先后从浙西来到严墓开展工作。他们在青年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创办了“严墓青年读书会”,与青年们一起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进步书刊,号召青年为民族利益而斗争。15岁的沈波就象干渴的小苗得到雨露滋润,焕发出勃勃生机。他积极参加读书会,演戏、唱抗日歌曲,印发宣传品,袭击日军,积极与地下党员一起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波及吴江,敌、伪、顽相互勾结,搜捕、监视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吴江。为保存有生力量,党组织安排部分党员、青年骨干撤离吴江。5月4日,王化鹏、沈波奉命去新四军六师,当两人走到坛丘大谢乡附近时,被突然遭遇的日军“清乡”部队逮捕,押回吴江日本宪兵队。敌人把王化鹏列为重点怀疑对象,进行严刑逼供,单独关押。沈波人小,敌人未加重视,将他与另2人同关一室。沈等人商议,主张越狱。9日,日军看守疏忽将一把脚链钥匙掉在牢房中,三人急切寻找出逃时机。13日夜晩,狂风怒吼,大雨如注,沈波三人打开脚链,用小钉卸下窗上玻璃,鱼贯而出,迅速翻过院墙,急奔南门城墙,原准备以草绳系城

而下,不料绳断。风雨中听得日军已追扑城下,守城伪军也被惊醒。沈波不加思索,一跃而下,消失在雨幕之中。

5月31日,沈波由中共党员陈友群带领安全离开吴江,经上海、苏州转达新四军六师,被分配进行署“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他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环境中与学员们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一个月后,他又只身去盐城抗大学习,但途经苏中地区时,敌人已开始大扫荡,盐城失守,抗大解散,于是他就此留在泰东县委,负责油印室的工作。油印室的工作繁琐而艰苦,沈波常常一个人闷在工作室里,夜以继日地刻钢板、忙油印,眼睛酸胀了,揉揉再干;夏天忍着燥热和蚊叮虫咬,冬天手脚生出冻疮。但他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42年3月,沈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泰东县合并到东台县,沈波任东台县委宣传干事,并继续负责油印室的工作。

1945年9月,县机关随军进入解放了的东台县城,沈波任县委青年科长,并兼任城厢区工作队队长。他根据上级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惩奸反霸运动,给汉奸、卖国贼以应有的惩处。不久,沈波调任时堰区委副书记。1946年5月,他响应上级“五四指示”,带领时堰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欢天喜地分得了田地。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沈波组织保田队,在全区内开展保田、保家乡的群众运动。并按照县委要求,深入群众宣传“参军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的进攻,保住‘五四’土改的胜利果实,让大家永远过上好日子。”深入浅出的道理,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激情,全区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送的参军热潮,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8月,沈波任时堰区委书记。10月,国民党军占领时堰镇,沈波和时堰区委、区署的同志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同年冬,东台县的时堰、城南两区划归紫石县,紫石县委为了便于领导,将两个区合并为

台南区。沈波被调到东台县三仓区委任副书记。

1947年4月，沈波调到紫石县委任台南区工作队队长。5月，因时堰地区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紫石县委考虑到沈波对该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又调他任时堰区委书记，着重做恢复基层政权工作。6月4日上午，沈波在甸张一农舍召开骨干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县委关于恢复天宁乡工作的指示，宣布自己为天宁乡指导员，并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工作计划。会议结束后，沈波率领八九名武工队员向天宁乡行进。由于叛徒告密，武工队途径丁家墩子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的还乡团的伏击。敌人依仗人数众多的优势，向武工队猛扑过来。沈波见敌我力量悬殊，便果断命令大家向东转移，准备从三条沟涉水东渡突围。队伍边打边退来到河边，敌人紧紧咬住不放，形势十分危急。为保护同志们安全转移，保住这支武工队，沈波坚定地说：“我掩护，你们赶快游水过河。”大家知道沈波不会游水，都争着带他过河。他大声说：“带我过河，会耽误时间，牺牲更多的同志，你们快走，不要管我。”说着就地一滚，隐蔽到一个土丘后面，开枪阻击敌人。子弹打光了，敌人蜂涌而上，沈波向队员脱险的方向看了看，就纵身跳入水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凶残的敌人，将沈波尸体捞上来，砍下首级，挂在时堰镇牛桥口等交通要道“示众数日”。当地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沈波烈士报仇。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烈士。1966年3月，后港大队在烈士牺牲地建造了沈波烈士墓。1967年，甸张大队改称沈波大队，1983年5月，又改称沈波村，以示纪念。

寿鸿



寿鸿(1918 - 1948),女,曾用名梅菊,1918年6月14日出生于吴江县南麻汤家浜村。先后毕业于吴江县平望镇小学、镇江蚕桑学校。

1937年,寿鸿在青云天亮浜蚕桑办事处担任蚕桑指导工作,结识了吴江县地政局来天亮浜搞土地登记的胡志坚(当时胡在党的影响下,参加抗日活动)。后胡志坚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做政治工作,两人仍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寿鸿在胡志坚的教育鼓励下,逐步接受了我党抗日民主救国,只有解放全民族才能解放自己的进步思想,她不忍日军的蹂躏欺压,激于革命义愤,于1940年10月与胞妹寿志勤毅然离开家乡,通过日伪占领区,进入豫皖苏边区怀远县龙亢集西钮家湾的新四军四师驻地,参加了革命。

寿鸿先进淮上中学学习。当时根据地建立不久,战斗频繁,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极不安定,物质生活艰苦,伙食标准相当低,每人每日只有1斤米原粮,且绝大多数是粗粮,菜金每天5分法币(包括柴火费),常吃高粱贴饼,也没有什么蔬菜,更不要说肉类了。睡的是地铺,常常是在群众的堂屋过道里铺上麦秸,许多人挤在一起睡。衣服公家无力全发,自己带什么就穿什么;难得发给一点粗布料,自己做成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向我根据地猖狂进攻,环境愈加艰险,寿鸿和同志们一起,紧密联系群众,不怕困难,经受了考验和锻炼。1941年春夏,寿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夏,新四军四师先后转移津浦路东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皖东北地区),寿鸿先后在泗阳县任工作队长、乡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朱岗区委宣传部长、泗阳县委秘书、育庙区委宣传部长、淮北交

总局副局长等职。她在“3月反顽斗争”、“33天反日伪大扫荡”等战斗中，勇敢沉着，意志坚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1945年春夏，在寿鸿的影响下，她三妹寿志民也投奔淮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1946年夏秋，寿鸿随部队转移去苏北、鲁南的渤海地区，任华东野战军九纵留守处妇女干部队队长。她在随队北移途中，把整个身心全部扑在工作上，对事业满怀信心。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事事以身作则，处处关心同志，并常常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全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后来，寿鸿终因积劳成疾，因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医治无效，1948年9月8日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平县段家店病故，年仅30岁。

寿鸿遗体安葬在德平县后刘家二区烈士陵园东北第三冢。1954年，山东省民政厅为寿鸿墓立碑志文。

潘天扬

潘天扬(1918-1949)，1918年10月生于吴江县坛丘乡坝里村，曾用名沈月明。

1941年二三月，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所属的严墓区委书记赵子扬与中共海北工委海盐工作团团长蔡允中先后转移来吴江县坛丘开展工作，并建立了中共大谢支部。党组织在大谢农村采取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古老方法联络感情，组织群众。当地农民潘天扬、钱福宝、顾春泉等踊跃参加，很快在村上办起了夜校，宣讲抗日形势，教唱抗日歌曲，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潘天扬积极肯干，四处奔走，为贫苦农民说话撑腰，教育群众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敌人。潘天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该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天扬入党后，更加忘我地工作，深入农户调查，组织学习老区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在一些乡村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迫使地

主、富农同意减租。同时注意耐心教育倾向抗日的乡、保长为为我党服务。为了对付猖狂一时的日军扫荡，大谢党支部提出了一套各村联防的办法，潘天扬等党员认真做好联村会的串联工作，遇有敌情通风报信，使农民生活稍得安定。

1941年底，大批“忠救军”特务队涌到严墓地区，日伪军频频扫荡，四处布设暗哨，搜捕共产党人。外来党员奉命全部撤离吴江，大谢支部暂时失去联系，坛丘的农村党员也都转入地下。

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中，我地下党员顽强地坚持斗争。1942年4月，中共新塍区委书记沈如淙受中共嘉兴县委指示来吴江县坛丘恢复大谢支部，地下党员重新填表登记。潘天扬被推选为党支部武装委员。支部以大谢乡为基点，在平望、盛泽、南麻、梅堰、震泽等地秘密发展党员，不断扩大活动范围。

1946年冬，潘天扬去盛泽染坊中开展活动，发展党员，翌年建立中共灰练坊支部。

1947年，大谢支部在浦东转移来的党员肖斧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支部组织党员，发动群众，选择有利时机，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年底，中共杭嘉湖工委书记方休来大谢乡筹备武装，与潘天扬等党支部委员连续开了两个通宵的会，并在大谢农村实地察看地形。方休等认为大谢乡一带环境条件都很好，可联系苏浙边界地带好几个县，东南西北都有回旋余地，决定在这一带搞武装。为此，党支部专门研究了如何组织斗争、配备武装干部、解决枪支弹药等问题，商定先展开秘密武装活动，搞一批武装联络点，然后再成立公开的游击武装。此后党支部几次组织了运枪活动，并作出了从敌人那里去搞枪支的决定。

1948年4月23日，是新塍传统庙会日。大谢党支部决定乘人多拥挤之机突袭敌人，由支部武装委员潘天扬和党员顾阿坤去执行这任务，上级领导沈如淙坐镇香灰桥茶店亲自指挥。那天，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农民拥到新塍赶庙会，潘天扬与顾阿坤按既定计划袭击

了驻新滕镇东岳庙的新北乡国民兵队班长金振声，并缴了他的枪。当时枪声一响，庙会秩序大乱，国民兵队惊慌失措，东奔西跑，当敌人清醒过来追击时，潘、顾已经跑过来龙桥，迅即撤回了大谢乡。这次夺枪活动使党的影响很快地扩大到嘉兴、吴江两县的广大地区，并有力地震慑了敌人。

不久，潘天扬、顾阿坤由中共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介绍去青东参加“江南人民反征总队第一支队”，潘天扬在该部任组长。这支游击队流动在淀山湖东一带，白天埋伏，晚上活动，有时支队集中行动，有时分组活动。潘天扬在部队勇敢善战表现突出。一天，部队在向重固方向转移途中，潘天扬小组8个人尚在村里的一幢房子里，出村口的桥突然被敌人封锁了，敌以两个营的兵力进行扫荡，阵阵枪声向村里射击，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潘天扬带领大家从后墙窗户翻出，跳入河中潜泳撤退。潘天扬一口气游过六七条河浜，他一直游在最前面，一边摸清情况，一边在河岸系好绳子，让不会泅水的人顺利过河。接着潘天扬又敏捷地抄到敌人背后，用步枪把敌人的机枪手打掉，封锁了石桥的敌人火力。使全组同志安然突围脱险，但自己却与全组同志失去了联系，后来负了重伤。

青东游击队大队长陆雪林把潘天扬托给重固开上海的航船老板，让他把潘藏在航船的货仓里带到上海垃圾桥埠头。当晚，中共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和党员吴阿炳（吴江县庙头人）弄了一部黄包车，把潘藏在阿炳家三层阁楼上，由十六铺民船工会医务室余澄怀医师秘密给予医治，请邻居帮助照顾潘天扬的吃饭、洗衣、换药。当时正值夏天，潘天扬伤口发臭，臭气一直薰到楼下厨房间。有关同志不畏辛劳，悉心照料，潘天扬十分顽强，咬紧牙关，不哼不叫。三四个月后，身上的弹片才取出，伤口终于愈合了。

1949年初，中共淞沪工委浦西特派员陈伯亮安排潘天扬去南汇县坦直桥当勤务兵。5月下旬，潘天扬在一次误会冲突中不幸被打死。年仅31岁。

解放后,吴江县人民政府追认潘天扬为革命烈士。

吴义琛

吴义琛(1914-1949),女,吴江县震泽镇人。1914年8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早亡,母亲为家庭妇女,家境贫苦。她自幼勤奋好学,1931年,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她和同学一起到南京请愿,被国民党政府强行驱散。吴义琛看清了反动政府的腐败,认识到必须寻找真理,拯救祖国。1934年,她从苏州女子师范毕业后,到杭州清泰门外稔稼桥小学教书。1938年初,她女扮男装,由家乡到上海、宁波,尔后到皖南泾县茂林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她随部队突围转移苏北淮阴、淮安地区。在淮河流域一带活动,在苏北平原辗转战斗。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吴义琛随部队在苏北、鲁南一带战斗,时任苏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政治指导员。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医治无效,于1949年7月25日在山东济南光荣牺牲,时年35岁。当地政府将她安葬在济南市东门外白马山上。

寿保全

寿保全,男,震泽镇新幸村田鸡坝人,1921年7月生,1944年8月参加革命,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涟水因战牺牲,时年25岁。牺牲前为华中野战军6纵48团4连机枪班班长。

倪金龙

倪金龙,男,南麻乡东庄村东阳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5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1949年在吴江因公牺牲,时年26岁。牺牲前为严墓区南麻乡副乡长。

后 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之际,《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正式问世了。

把吴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记述下来,以教育党员,教育人民,教育子孙后代,为不断推进吴江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吴江党史工作部门的不懈追求。早在 1981 年,在吴江党史工作部门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对本市(县)党史资料的全面征集和研究工作。通过走访老同志、召开座谈会和查阅档案报刊等多种途径,征集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核实的基础上,于 1990 年初写出了《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征求意见稿。经过修改、补充,又于 11 月写出了送审稿。再经进一步修改、补充,于 1991 年 6 月正式出版了《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

《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出版发行后,曾成为对全市(县)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教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党史研究的深入,已有必要对《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进行进一步的充实和修改。为此,经中共吴江市委同意,我们以《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为基础,结合《吴江革命史料选》、《吴江英烈》等书籍的相关内容和新的党史研究成果,对《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进行了修改和充实,并改名为《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需要说明的是,附录中所列的《回忆录》部分,由于当时的斗争情况十分复杂,各人在斗争中所处的环境不同,对情况和问题的了解和理解有所差异,加上时隔久远,故有些地方的叙述可能与史实有些出入。附录《烈士传略》所收录的烈士,系在解放前牺牲的吴江籍党员烈士和牺牲在吴江或主要活动在吴江的非吴江籍党员烈士的生平传略,以烈士牺牲的时间先后排列。《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等书籍的编写出版,始终是在中共吴江市(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

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当年在吴江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的热情帮助与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的热情指导。市(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历任成员,为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给予了不少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在党史办公室(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过的同志,先后为此付出过辛勤的劳动。原县委书记张卫国同志为《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撰写了《序言》。本书在这次修订过程中,同样得到了众多部门和同志的支持。中共吴江市委书记朱民同志在百忙中拨冗为本书作序,市委副书记范建坤同志对本书的修订工作多次给予具体的指导,并审阅了本书的修订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修订时间比较匆忙,加上水平所限,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著者

2006年6月

《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编写人员

主 编:陈铁民

副主编:王卫平 徐佑永

编 辑:徐佑永 金 丽

编 务:吴致和 沈建国 沈坤荣 吴蓉华

《吴江革命史料选》编写人员

编 辑:沈永慧 徐佑永 金 丽 吴致和

参加资料征集、整理的有:居玉堂 王国增

《吴江英烈》编写人员

主 编:钱士坤 谢阿金

副主编:王卫平 徐佑永 徐惠琴

编 辑:吴致和 金丽 朱俊良 沈建国 沈坤荣 吴蓉华

参加资料征集、整理的有:沈恩得 沈炜洲

《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修订人员

张志远 陈云根 刘建华 陆建忠 吴蓉华 胡小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吴江地方历史. 第一卷/中共吴江市委党史工
作办公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6
ISBN 7-80199-462-0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
织—党史—吴江市 IV. D235.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6288号

书 名: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

作 者:中共吴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王志刚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吴江市同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大32

字 数:343千字

印 张:13.75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0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462-0

定 价:29.00元



1921-1949

中共吴江地方历史

第一卷

中共吴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著

ISBN 7-80199-462-0



9 787801 994622 >

ISBN 7-80199-462-0

定 价:29.00元